

清 帝 列 传

光 绪 帝

冯元魁 著

吉 林 文 史 出 版 社

序 言

清王朝统治中国历经十代皇帝,光绪帝载_殳是清朝第九代皇帝。他四岁入承大统即位登基,在位三十四年(1875 ~ 1908)统治时间之长是继康熙、乾隆二帝以后位居第三。但是光绪帝也是清朝政权倒数第二名皇帝,是一个衰世之君。因为光绪帝是衰世皇帝,所以一些致力于改变国家面貌的仁人志士对他的评价褒贬截然不同。资产阶级改良派歌颂他“无上圣德”,资产阶级革命派则斥他为“载_殳小丑,未辨菽麦”。也有人对光绪帝的坎坷生涯寄以同情,感叹他的软弱和不幸。然而,或褒或贬,或寄以同情,这些无不蒙上感情色彩,无非是发政治之鼓动和历史之幽情而已,并不是对光绪帝郑重的历史评价。

历史地、实事求是地指出光绪帝在中国近代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者,首推范文澜先生。他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指出:“光绪帝是满洲皇族中比较能够接受新思想的青年皇帝,颇有所作为”。著名近代史专家陈旭鹿先生在《光绪略论》一文中赞成范文澜先生的评价,他认为光绪帝是一个“在向前看”,“向西方学习的青年皇帝”。本书希图通过史实,勾划出光绪帝“颇有所作为”,“在向前看”的青年皇帝的基本风貌,力求较合理地评论他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

光绪帝作为“能够接受新思想”,“颇有作为”的青年皇帝主要表现在他亲政后的十年间(1889 ~ 1898)所发生的两

件震撼世界的大事件中做出的积极表现。一是中日甲午战争,二是戊戌维新变法运动,这是两件关系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大事,也是光绪帝一生价值和命运所系。

光绪帝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站在爱国家、爱民族的立场上“一力主战”,他反对妥协,痛斥顽固派割地乞和的可耻行径。尽管甲午战争的结果是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加深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半殖民地程度。然而,无论在战争过程中,还是在后来签约、准约的时候,光绪帝始终以鲜明的态度为维护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尊严使出了最大的力度,因而历史对他是无可指责的。

中日战争失败以后,光绪帝痛定思痛,卧薪尝胆,经过深刻反省之后毅然主持变法运动,给予维新派以有力的支持。在维新变法运动中,光绪帝亲手绘制了近代中国第一幅发展资本主义的蓝图,并全力推进,企望付诸实现。光绪帝不愧是清季维新变法运动的实际决策者和颇有作为的维新元首。光绪帝抬头看世界,主张向西方学习;低头看民众,主张广开言路。他不仅允许下级官吏进呈变法疏奏,甚至丢开“祖宗成法”的束缚,鼓励绅商士民上书言事,颇有民主作风,光绪帝也不愧是清朝的一个开明皇帝。

光绪帝所以有名,就是他在新陈代谢的时代激流中做出了顺应历史潮流的重大贡献。光绪帝所以能为后人所怀念,就是他为了改变中国落后现状,力争跟上世界前进步伐,在极端艰难的处境中,不顾失权丧命的危险而作出了毕生的努力。

光绪帝作为衰世皇帝,他具有励精图治,救亡图存的进取精神,同时又有对慈禧太后的独断专横逆来顺受的软弱性格。这种进取与妥协的矛盾心态,是他所处时代统治阶级政

治态度的写照,因而我们可以从光绪帝矛盾、复杂心态中窥见中国之命运,从而得出改造旧中国应走什么道路,应有哪个阶级、哪个群体来肩负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的结论。

本书写作过程中得到马洪林教授的悉心指点,还得到尚尔元同志的多次来电鼓励,笔者表示由衷的谢意。此外,曹霞美、贺峥二同志帮助誊写了部分书稿,在此一并致谢。由于笔者学识所限,凡疏漏差错之处,欢迎史学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教。

冯元魁

1992 年 11 月 18 日于上海市东安路寓所

第一章 皇族世家

第一节 黄带子和红带子

清朝制度,奉太祖努尔哈赤的父亲显祖塔克世为大宗,他的直支子孙称“宗室”,以系金黄色的带子为标志,努尔哈赤叔伯兄弟的旁支子孙称为“觉罗”,以系红色带子为标志,故在满族爱新觉罗家族中,有“黄带子”和“红带子”之区分。清朝的历代皇帝都是显祖塔克世的直支子孙,所以宗室成员均系“黄带子”,显示他们在清王朝中的身份与地位。

光绪皇帝,姓爱新觉罗,名载_瑾,即位后年号光绪(1875~1908),庙号为清德宗景皇帝。载_瑾于同治十年六月二十八日(1871年8月14日)出生在北京宣武门内太平湖东岸的醇王府,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九代孙,“黄带子”一脉相承。

努尔哈赤(1559~1626)是清王朝的奠基人,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建立金政权(史称后金),年号天命。后金政权的统治中心,初期在辽宁省的浑河流域,筑都城于浑河的支流苏子河与嘉哈河交汇处的赫图阿拉,俗称“老城”(今辽宁省新宾县境内)。努尔哈赤在这里创八

旗，“定国政”登汗位，“每五日集朝一次，协议国政”^①，随着统一女真族和对明战争的不断胜利，1625年（天命十年，明天启五年）迁都沈阳，现存的沈阳故宫，就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的宫殿，金政权的统治地盘扩大到整个辽东地区。爱新觉罗皇族是金政权的核心，努尔哈赤创建的八旗制度，是满族行政、军事、生产三者结合的社会组织。八旗的最高组织形式称“固山”（满语旗的意思），基层组织称“牛录”，每300男丁编为一牛录，设牛录厄真一人，五牛录为一甲喇，设甲喇厄真一人，五甲喇为一固山，设固山厄真一人，副职二人，称美凌厄真。1601年努尔哈赤建旗时只有红、黄、蓝、白四旗，1615年又增设镶黄、镶红、镶蓝、镶白四旗，合称八旗。八旗旗主即固山厄真，均由爱新觉罗家族成员兼领，努尔哈赤是八旗的最高统帅。所以，后金政权实际上是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爱新觉罗奴隶主大家族的统治政权。

清朝虽无中国封建王朝传统的立嫡立长的皇位继承制度，然而，从努尔哈赤到宣统皇帝溥仪，凡十二帝268年，皇位一直在“黄带子”内延续交替着，因为自雍正帝始确立了适合满族历史传统的立储“家法”，保证了皇位始终在“黄带子”直系子孙范围内传递。

努尔哈赤曾经希图仿效汉族封建王朝生前确立嗣皇帝（皇太子）的办法，并有过两次尝试。第一次确立长子褚英，第二次确立次子代善为汗位继承人，但都是遭到满族氏族制遗风的抵制而失败。满族社会是以八旗制度为基础而组成

^① 金梁：《满洲秘档》·《太祖行军琐记》。

的八大群体,保留着“由氏族制度中发展起来的军事民主主义”。^①在氏族制时代,“一切职位多数场合都是在氏族内部选举的,因而是在氏族范围内世袭的。”^②由于氏族制影响的作用,努尔哈赤在其晚年,采取了平衡八旗势力的办法,来维系爱新觉罗家族的统治政权。“天命间,立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各置官属,朝会燕餐,皆异其礼,锡赉均及,是为分。”^③天命十一年(1626)努尔哈赤因患毒疽不治而崩。爱新觉罗家族的长房(褚英已死)代善的长子岳托和三子萨哈廉向代善提出:“国不可一日无君,宜早定大计,四大贝勒(皇太极——引者)才德冠世,深契先帝圣心,众皆悦服,当速继大位。”代善曰:“此吾夙心也。”“议遂定,乃合词请上即位。”^④皇位在“氏族范围内世袭”,皇太极继承汗位,尊努尔哈赤为太祖。1627年为天聪元年。

皇太极庙号太宗,年号先为“天聪”(1627~1635),后改为“崇德”(1636~1643),在位十七年,1636年改国名曰“大清”,族称曰“满洲”,正式称帝,大清王朝第一帝。

崇德八年八月庚午(1643年9月21日)“太宗崩,储嗣未定。和硕礼亲王代善会诸王、贝勒、贝子、文武群臣定议,奉上(世祖福临——引者)嗣大位,誓告天地,以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和硕睿亲王多尔袞辅政。”^⑤皇太极“暴死”以后,皇位承继的斗争在系“黄带子”的族内激烈地展开了。“先

① 王钟翰:《清史杂考》第30页,195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02页,197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③ 《光绪大清会典》,第1卷。

④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1卷,第3页。

⑤ 《清史稿·世祖本纪一》第2册,第83页,中华书局1976年出版。

帝上宾,诸王兄相争为乱,窥伺神器,”^①“图尔格等……传三牛录下护军,备甲冑弓矢护其门,尤属变乱,”^②大有剑拔弩张之势。爱新觉罗宗室面临干戈相当,短兵相接的残杀局面。努尔哈赤第十四子、睿亲王多尔袞,站在维护爱新觉罗家族整体利益的立场上,毅然拥立福临(皇太极第九子)为嗣皇帝,表现了他政治家的卓识和气魄,使满洲贵族集团免于分裂,清政权转危为安。顺治帝在表彰多尔袞维护“黄带子”免遭肢解的功绩时说:

我皇考上宾之时,宗室诸王,人人觊觎,有援立叔父之谋,叔父坚誓不允。念先皇殊常隆遇,一心殚忠,精诚为国。又念祖宗创业艰难,克彰大义,将宗室不轨者尽行处分。以朕系文皇帝子,不为幼冲,翊戴拥立,国赖以安。^③

爱新觉罗家族在皇位转递的大事件中,经历了一次严峻的考验。

1644年为顺治元年,其时福临年仅六岁,以叔父多尔袞和堂兄济尔哈朗为摄政王,代替皇帝掌理朝政,批答章奏。顺治八年(1651)福临亲政,皇权度过艰险暗礁,仍在努尔哈赤的直支子孙手中,“黄带子”得以延续善衍。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1661年2月5日),顺治帝患痘症崩,终年二十四岁,在位十八年(1644~1661),庙号世祖。福临宾天前夕,立第三子八岁的玄烨为皇太子,即帝位。遗诏由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政大臣,次年(1662)为康熙元

① 《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10卷,第4页,顺治元年十月丁卯。

② 《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38卷,第3页,顺治五年四月癸酉。

③ 《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9卷,第22~23页,顺治元年十月甲子。

年。

四辅政大臣当政 ,爱新觉罗宗室遭到严重的挑战 ,皇权面临旁落的危机。四辅政大臣虽非皇族 ,然而 ,他们跟随太宗驰骋疆场 ,辅佐世祖定鼎燕京 ,侍卫内廷 ,功勋显赫 ,乃三朝重臣。

四位辅政大臣既非“黄带子”也不是“红带子” ,他们分别是 :

索尼 赫舍里氏 ,满洲正黄旗人 ;

苏克萨哈 纳喇氏 ,满洲正白旗人 ;

遏必隆 钮祜禄氏 ,满洲镶黄旗人 ;

鳌拜 瓜尔佳氏 ,满洲镶黄旗人。

四辅政大臣是满族中旧势力的代表 ,他们企图使满族历史发展转轨 ,延缓封建化的进程 ,达到篡夺皇权的目的 ;四辅政大臣中以鳌拜最为险恶 ,辅政不久 ,大权就落入他的手中 ,鳌拜专横跋扈 ,藐视幼主。康熙六年(1667) ,玄烨亲政 ,皇权与鳌拜集团的矛盾更趋剧烈。他竟然当着康熙皇帝的面 ,挥拳捶胸 ,要挟绞杀异己苏克萨哈 ,根本不把已经亲政的康熙帝放在眼里。康熙八年(1669)新年 ,鳌拜身穿黄袍 ,接受群臣朝贺拜年 ,俨然以皇帝自居。康熙帝年轻有为 ,雄才大略 ,当然不甘心充当鳌拜手中的傀儡皇帝。其时 ,他的护养人 ,祖母孝庄皇太后还健在 ,她决不允许心爱的孙子 ,随便鳌拜戏弄。孝庄皇太后是清太宗的妻子 ,世祖的生母 ,也是一位满洲贵族中的女能人。入关初期 ,她辅助幼帝 ,周旋于多尔袞和济尔哈朗等权势之间 ,度过了许多次险恶的政治风波 ,使政权仍转递在顺治帝手中。这次要从鳌拜手里夺回权力 ,她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孝庄皇太后在满洲贵族中很有威望 ,康熙八年五月 ,在她的支持下 ,康熙智擒鳌拜 ,粉碎了鳌

拜集团篡政夺权的阴谋，夺回了权力，宗室“黄带子”的延续得到了保证。

康熙皇帝鉴于鳌拜篡夺皇权的教训，于康熙十四年十二月（1676年1月），立了第二子孝城皇后所生的允禩为皇太子，颁诏天下曰：“帝王昭基垂统，长治久安，必建立元储，绥隆国本，以绵宗社之祥，慰臣之望。”^①于康熙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授允禩以册宝，立为皇太子，正位东宫，以重万年之统，以系四海之心。”^②然而，预立皇储不合满族传统，后果适得其反，松弛了“黄带子”的凝聚力，加剧了宗室内部的明争暗斗。刚立太子时允禩才一岁半，别的皇子也未出世，所以尚无掀起风波。随着岁月的流逝，康熙帝在位时间很长，得子甚多，诸后妃生三十五子，长大授爵位者十八人，至康熙四十年以后，这批皇子都先后长大成熟，宗室内觊觎太子桂冠的斗争亦就日甚一日地发展起来了。允禩其人淫于酒色，喜怒无常，越来越不得康熙帝之欢心，诸皇子便施展阴谋，企图取而代之。允禩唯恐太子地位被他人所夺，便结成党羽迫不及待希图早日接皇帝位。这样就给康熙帝的安全造成威胁，对此康熙帝也有所察觉。他在上谕中指出：

“今观允禩不法祖德，不遵朕训，惟肆恶虐众，暴戾淫乱。……专擅威权，鸠聚党羽，窥伺朕躬，起居动作，无不探听。”“今允禩欲为索额图复仇，结成党羽。今朕未卜今日被鸩，明日遇害，昼夜戒慎不宁。”^③

为了预防不测，康熙帝宣布废允禩皇太子，幽禁上驷院

①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第304卷。

②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56卷，第21页，康熙十四年十二月丁卯。

③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234卷，第3~4页。康熙四十七年九月丁丑。

旁,其党羽索额图等被诛,其时在康熙四十七年九月(1708年10月)。

清宗室内部,除太子党外更有不少的皇子党。当皇太子被废以后,为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更加剧烈了,“诸王当(太子)未定之日,各有不并立之心。”^①康熙帝为了缓和这种剧烈的争夺局面,于次年(康熙四十八年)三月,复立允禩为皇太子。

允禩是权欲极大的野心家,当他恢复了皇太子地位以后,变本加厉地进行抢班即位的阴谋活动。至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已六旬的康熙帝深感不除允禩必留隐患,当年九月己酉(10月4日)谕诸皇子等:

“皇太子允禩,自复立以来,狂疾未除,大失人心。祖宗弘业断不可托付此人,朕已奏闻皇太后,著将允禩拘执看守。朕明日再颁谕旨示诸王大臣。”^②“数年以来,狂易之疾仍然未除,是非莫辨,大失人心,“如此狂易成疾,不得众心之人,岂可付托乎。故将允禩行废黜禁锢。”^③

康熙五十一年十月初一日正式废皇太子,禁允禩于咸安宫。康熙帝两度立太子的教训是深刻的,故他斩钉截铁地宣布,“诸皇子中如有谋为预立皇太子者,即国子贼,法所不宥。”^④父皇的警告怎能阻止诸皇子的夺位野心,“因允禩之废,皇太子不定,遂启诸皇子觊觎大位之心,纷置党羽,联络

① 《戴铎奏折》第九件。

②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251卷第7页。康熙五十一年九月己酉。

③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251卷、第8、9页。康熙五十一年十月辛亥。

④ 《清史稿·允禩传》第30册,第9062页。中华书局1976年出版。

臣工刺探朝政,及其父王之起居,希冀迎合上意,借邀宠眷。右翰苑侍从之臣,若日近帝侧之奄寺,皆为皇子辈联络之门。”^①就在诸皇子为争夺嗣位斗争的密锣紧鼓声中,康熙皇帝于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1722年12月22日)在畅春园驾崩,享年六十九岁,庙号圣祖。

康熙帝的第四子胤禩是诸皇子在夺嫡竞争中的胜利者,登上皇帝宝座,1723年为雍正元年。

雍正帝鉴于圣祖建储教训,对于确立今后接班人的态度“详加审慎”,“圣祖因二阿哥之事,身心忧悴,不可殚述。”^②父皇立皇太子悲剧,他历历在目,心有余悸。然而,胤禩即位之时,已经四十五岁了,难免遇有不测,预先建储是摆在雍正帝面前不能回避的问题。所以,他登极以后,决心对建储制度作一番别出心裁的改革。雍正元年八月召诸王大臣及文武诸臣于乾清宫西暖阁,发布上谕:

“今朕诸子尚幼,建储一事,必须详如审慎,此事虽不可举行,然不得不预为之计。今朕特将此事,亲写密封,藏于匣内,置之乾清宫正中,世祖章皇帝御书‘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乃宫中最高之处,以备不虞,诸王大臣咸宜知之。”^③

雍正十三年八月己丑(1735年10月8日)雍正皇帝崩于圆明园,享年五十有八岁,在位十三年,庙号世宗。

世宗宾天以后,庄亲王允禄当诸王大臣及文武群臣前启“御书”,宣诏第四子弘历即帝位,1736年为乾隆元年。

① 单士元:《清代起居注》,载《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268页,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

② 蒋良骥:《东华录》第25卷,雍正元年八月。

③ 蒋良骥:《东华录》第25卷,雍正元年八月。

清朝秘密立储制度就此启端。乾隆帝遵照世宗所创建的立储“家法”，未立皇太子。乾隆六十年九月（1795年10月）为了不超越他祖父康熙皇帝在位六十一年记录，故召诸皇子皇孙于勤政殿，“宣示恩命，立皇十五子嘉亲王**弘晳**为皇太子。以明年丙辰建元嘉庆元年。”^①以后又当了三年太上皇，于嘉庆四年正月壬戌（1799年2月7日）崩逝，终年八十有九岁，庙号高宗。

嘉庆（仁宗）、道光（宣宗）两帝，遵照“家法”，秘密建储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传递帝位。咸丰帝（文宗）在咸丰十一年（1861）避难热河行宫，病危中立唯一的儿子载淳为嗣皇帝（穆宗），1862年为同治元年。同治帝无子，立堂弟醇亲王**奕訢**的儿子、道光皇帝的孙子年仅四岁的载**湙**为嗣皇帝，1875年为光绪元年，载**湙**称光绪皇帝，是“黄带子”的第十一朝皇帝，也是清王朝确立全国统治政权以后的第九个皇帝。

9

第二节 “圣母皇太后”——叶赫那拉氏

慈禧太后是光绪皇帝的姨母，也是立光绪帝载**湙**为嗣皇帝和后来把他幽禁瀛台的亲手炮制者。她是咸丰皇帝的懿妃，同治皇帝的母亲。同治帝载淳登极以后，尊为皇太后，其完整的徽号是：“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②因居住西宫，又称“西太后”。她两朝“垂帘听政”，左右晚清政治长达半个世纪，是满洲贵族中的女强人。

① 《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第14816卷，第5页，乾隆六十一年九月辛亥。

② 《清史稿·后妃传》第30册，第3930页。中华书局，1976年12月版。

慈禧太后(1835~1908),满洲正黄旗人,本是叶赫那拉氏,安徽宁池广太道惠征的女儿。叶赫那拉,是满族中的一个支族,在努尔哈赤统一女真族以前,叶赫是海西女真族中的一个强悍的部落,最晚并入满洲族。叶赫部依仗明朝在辽东的力量,长期与努尔哈赤的建州女真族为敌,直到明朝万历四十七年(1619)后金八旗兵在萨尔浒战役中打败明军以后,才被征服。努尔哈赤对被征服的叶赫族采取了残酷的屠杀政策,致使两部族之间结下不解的怨恨。然而,入关以后,满洲贵族是清王朝的核心,满族各部均处特权地位,他们同舟共济,维持清王朝对各民族的封建统治。随着时间的流逝,满族内部的部族怨结也日渐淡漠。叶赫部中的那拉这一支脉,编入正黄旗,而两黄旗按照清朝惯例,由皇帝直接兼领,成为卫戍首都的上三旗(两黄正白)之一。叶赫那拉部强悍善战,是八旗兵中的劲旅,这不能不对其后代在清王朝中的地位产生影响。

叶赫那拉氏于咸丰元年(1851)十六岁被选入宫,初时只是圆明园内的一般宫女。她生长在江南,“雅善南方诸小曲,凡江浙盛行诸调,皆琅琅上口,曲尽其妙,”加之“少而慧黠,亶艳无匹侪”,^①因而得到咸丰帝的宠幸,咸丰四年(1854)封为懿妃,次年进为懿贵妃。

其时,正值英国和法国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之际。咸丰八年(1858)五月,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清军仓惶逃跑,侵略军很快占领天津,北京遭到直接威胁。咸丰帝派大学士桂良和吏部尚书花沙纳前往天津,同英、法、美、俄四国

^① 《清朝野史大观·清宫遗闻》第1册,第70页。1981年6月。上海书店印行。

进行谈判(在天津,美、俄两国亦卷入战争)。在侵略者的军事威慑之下,清政府的代表被迫签订了丧失主权的中英、中法、中美、中俄《天津条约》。咸丰九年(1859)六月,英法两国公使又以进京换约为借口,带着海军舰队到达大沽口,并发炮攻击大沽炮台,清军守将奋起还击,侵略军遭到严重打击以后,被迫退出大沽口。咸丰十年(1860)七月底,英法侵略者经过了充分的准备,又窜到大沽口外,八月初,侵略军避开设防的大沽炮台,改道从北坨登陆,八月二十四日再次攻陷天津,进逼北京。九月二十一日英法联军向通州以西的八里桥一带发动进攻。从大沽口逃回北京的僧格林沁秘密向咸丰皇帝建议,迅速离开北京,于是次日(二十二日)咸丰帝带着皇后钮祜禄氏(东太后)和那拉氏(西太后)仓惶从圆明园出走,打着“秋弥木兰”的幌子,逃往热河避暑山庄。临走前命他的弟弟恭亲王奕訢留守北京,“授为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督办和局”。^①

咸丰皇帝奔逃热河以后,十月六日英法联军攻占圆明园,凡殿阁堂室陈设的文物珍宝被洗劫一空,然后点燃大火,清廷经过一百多年经营,综合中西建筑艺术,内藏无数珍宝文物的壮丽宫殿和园林,烧成一片废墟。十月十三日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城,退居城外的恭亲王奕訢,被侵略者的暴力吓破了胆,经咸丰帝同意全部答应了英法所提出的苛刻条件,十月二十四、二十五日,奕訢代表清政府,分别同英、法、俄三国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中国社会在半殖民地的泥坑中又陷深了一步,中国人民的灾难又增加了一层。

^① 《清史稿·诸王传》第30册,第9105页。中华书局1976年12月出版。

咸丰皇帝一行是九月三十日逃到热河的，住在“烟波致爽殿”里，这里是清朝皇帝在热河的“寝宫”，嘉庆二十五年（1820）七月廿五日，嘉庆皇帝（玆琰，咸丰帝的祖父）就死在这座“寝宫”里。至今已关闭了40年，没有别的皇帝来这里就寝过，殿里尘封垢积，冷落萧疏。虽然经过热河总管的“打扫预备”，但室内的陈腐霉气，却仍然散发难忍。昔日皇帝的避暑圣地，而今成了咸丰帝的避难之所，此时此景，更加勾起了这位倒霉皇帝对京城的向往。他到热河的当天，立即给留守北京的奕訢发出谕旨，命他“总期和局连城……朕即可及早回銮”。^①外国侵略军直接攻占中国首都，并烧毁皇帝行宫——圆明园，这是震撼世界的大事件，不仅对大清帝国，而且对几千年中国封建王朝来说，也是一件史无前例的奇耻大辱。尽管咸丰帝想“及早回銮”，然而，无情的现实却使他再也不可能实现这一愿望。

咸丰帝在热河度日如年，日复一日地过了一年以后，忧郁成疾，一病不起，于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1861年8月22日）清晨，在“烟波致爽殿”驾崩了。咸丰帝终年三十一岁，他唯一的儿子载淳只有五岁，是当然的嗣皇帝，第二年（1862）为同治元年，尊其生母叶赫那拉氏为慈禧皇太后。载淳承继大统年仅六岁，因而围绕着由谁来执掌最高权力的问题，便在满洲贵族集团内部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随侍咸丰帝去热河避难的除了两宫太后以外，还有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额駙景寿、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等人，这些侍从大臣中特别是肃顺最有才干，权欲最强。他虽

^① 《大清文宗显皇帝实录》第328卷。

然在宗室中爵位并不高,但咸丰皇帝倚为心腹,是郑亲王乌尔恭阿的第六子、端华的弟弟。^①咸丰年间由御前侍卫升迁工、礼、户部侍郎、左都御史、理藩院尚书、户部尚书等职。肃顺同载垣、端华结成一党。这样,肃顺集团、北京的恭亲王奕訢、两宫太后三股势力,在咸丰帝逝世前后形成了清王朝的鼎足局面。

咸丰皇帝在驾崩前的一天,口授遗诏。立载淳为皇太子,命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大臣”并通知北京和各地,决定明年(1862)改用“祺祥”新年号。

咸丰皇帝死后不久,慈禧太后即刻利用各方力量,成功地发动了“祺祥政变”,推翻咸丰遗诏,清除肃顺为首的八位“赞襄政务大臣”,为她独揽大权的“垂帘听政”奠定了基础。首次表现出这位女强人超众的政治手腕和果断的斗争权术。

慈禧其人,“貌视恭谨,性实乖戾……其为人也极善狡谋权变。”^②她自己也说:“入宫后,宫人以我美,咸妒我,但皆为我所制。文宗宠我,迨后皇子生,我之地位更巩固矣。”^③自受宠于咸丰帝以后,她在皇帝身边“时时披览各省章奏。”^④日渐掌握朝廷要员的情况和熟悉处理政务的办法,因而她的权欲也就与日俱增了。咸丰皇帝在世时,对慈禧的权欲与野心已有察觉,为防止身后她“恃尊跋扈”,曾秘密给慈安太后留下一道手谕:“如恃子为帝,骄纵不法,卿即可按祖宗家法治之。”^⑤咸丰帝病重期间,对肃顺等人 and 慈禧太后两大势力

13

① 《清史稿·肃顺传》第38册,第1699页,中华书局1976年出版。

② 恽宝惠:《关于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之因果》载:《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71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出版。

③ 徐珂辑:《清稗类钞》第3册,第36页。

④ (英)濮兰德等《慈禧外传》第一章。

⑤ 《清朝野史大观·清宫逸闻》第1册,第71页,上海书店印行,1981年。

均不放心,他虽然口授遗诏,命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大臣”,然唯恐康熙初年鳌拜等四辅政大臣专断大权的历史悲剧重演,故所以同时又赐给皇太子载淳“同道堂”印,赐给母后“御赏”印,可代替皇帝朱笔。凡“赞襄政务大臣”拟定的“上谕”,须知盖皇帝、皇太后印章才能发出,企图以此相互制约,稳定政局。据翁同龢的记载:“赞襄政务大臣行文吏部,令通行各省衙门,嗣后奏折件,经赞襄大臣拟旨缮进,俟皇太后、皇上阅后,上用‘御赏’下用‘同道堂’二印,以为凭信,仍照朱批恭缴。”^①又有记载:“两印均大行所赐,母后用‘御赏’印,上(同治帝——引者)用‘同道堂’印,凡应用朱笔者,用此代之,述旨亦均用之,以杜弊端。”^②两枚大印,均掌在慈禧太后手中,她把握着清廷政权的最后一张王牌。

如今肃顺等人从咸丰帝那里获得了实际控制最高统治的权力,不仅严重地妨碍了慈禧太后独操政权的野心的实现,而且还夺去了她在朝廷中的“独尊”地位。“夫己氏(指那拉氏——引者)声势大减,诸所钻求,不敢轻诺”^③。这对于权欲熏心的那拉氏来讲,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她也决不会就此罢休。因而千方百计地进行了一系列除掉肃顺等人的阴谋活动。

首先,联络留驻北京而掌握清廷相当权力的恭亲王奕訢。

奕訢是道光皇帝的第六子,咸丰帝的异母弟,任过几年

① 《翁同龢日记》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九日。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第1册,第129页。

② 《清宫秘史》,载《东方杂志》第9卷第2号。新崩逝的皇帝,称大行皇帝,文中“大行”指刚死去的咸丰皇帝。

③ 《清宫秘史》,载《东方杂志》第9卷第2号。

军机大臣,有处理政事的经验,遇重大事件更受咸丰帝的倚重。英法侵略军进攻北京时,他受咸丰帝之命,委为全权大臣,处理中外事务。在北京的奕訢同在热河行宫的肃顺等人,为争夺权力,处于誓不两立之势。咸丰帝在热河未死之时,奕訢曾赴热河行宫觐见皇帝,商议国是,肃顺等人企图乘机诛杀奕訢。然而,奕訢毕竟是咸丰帝的兄弟,当咸丰帝察觉肃顺等人的阴谋时,即秘密召见奕訢,告诉他:“你在这里不妥,他们将不利于你,赶快秘密地回京罢。”^①奕訢便借口去布塔拉喇嘛庙观赏,从庙的后门出走脱险。

咸丰帝死后,肃顺等人以“赞襄政务大臣”身份控制朝政,当然引起在北京以奕訢为首的一大批清朝贵族官僚的不满,此时同肃顺集团的矛盾,终于达到一触即发的地步。奕訢在北京同外国侵略者和谈签订条约,对于他们提出的要求无不一一答应,颇得外国侵略者的赏识和信任,因而在西方列强的支持下,敢于藐视咸丰帝遗诏,很快和慈禧太后结成联盟,积极策划政变,进行推翻“赞襄政务”八大臣的活动。

其次,拉拢钮祜禄氏慈安太后。两太后在行宫“俯巨缸而语,计议甚密。于是羁縻肃顺,外示委任,而急召恭亲王至热河,与王密谋”。^②然而,当时肃顺等人已视两太后和北京的奕訢为政敌,多方设法来防范热河同北京的联系。慈安太后想出了一个“苦肉计”的办法,“以微过将安(德海)责打逐出,以防肃顺察觉”。^③毒打安德海以后,下令送回北京内务

① 溥雪齐·溥杰:《慈禧第一次垂帘听政时的一些内幕》,载《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69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出版。

② 薛福成:《庸庵笔记》第一卷。

③ 恽宝惠:《关于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之因果》,载《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71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出版。

府处理。安德海暗藏“懿旨”，密召恭亲王奕訢赴热河面商计宜。奕訢接到“懿旨”以后，立即向热河送来了奏折，要求觐见皇帝（实际上会见两太后）。肃顺等“赞襄政务”大臣则用“留守责任重大”的上谕，不准奕訢离开北京。奕訢不顾肃顺等人的阻挠，毅然于八月初一日（9月4日）以“奔丧”为名，赶赴热河。肃顺又以“叔嫂不通问”的礼法，竭力阻止奕訢与两太后见面。最后奕訢化装成“萨满”^①才进了太后的寝宫，“恭邸今日大早到，适赶上殷奠礼，……祭后，太后召见，恭邸请与内庭偕见，不许，遂独对，约一时许方出。”^②“两宫涕泣而道三奸（指肃顺、端华、载垣——引者）之侵，因密商诛三奸之策。”^③这次密谈，主要是商量发动政变的计划部署。对于发动政变的地址，两太后和奕訢都认为在热河是不行的，因为热河是肃顺集团的势力范围，同情那拉氏者不多，而且肃顺兼领侍卫内大臣，控制着寝宫的警卫。奕訢的势力主要在北京，只有回到北京，采取突然袭击才能成功。所以恭亲王奕訢奉告太后说：诛三奸，“非还京不可。”慈禧太后问奕訢：“奈外国何？”奕訢对曰：“外国无异议，如有难，唯奴才是问。”^④奕訢向西太后作出如此肯定的保证，不是没有根据的。当时英国公使卜鲁斯曾经直言不讳地表示：“只消清朝廷不在北京，怡亲王、端华和肃顺继续掌政，我们就不能说中国人民已确实承受了（《北京条约》）——引者）。各省当局看到国家重臣，实际掌权的人是偏向于不友好的，他们也就

① “萨满”为满族崇仰的萨满教之男巫。肃顺化装萨满之说见溥仪：《我的前半生》第5页，群众出版社1964年出版。

② 《清宫秘史》，载《东方杂志》第9卷第1号。

③ 薛福成：《庸庵笔记》第一卷。

④ 王昉运：《祺祥故事》，见邓之诚辑《旧史拾零》。

形成和我们为难的倾向。”因此他主张“我们应以温和和协调的态度获致恭亲王及其同僚的信任,消除他们的惊恐,希望迟早总会发生变动,使最高权力落到他们手里。”^①卜鲁斯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外国侵略者不仅“无异议”,而且将竭力支持奕訢从肃顺手里夺取权力。

奕訢同慈禧太后商定密计以后,于八月七日(9月11日)匆匆离开热河返回北京。此后,热河、北京两地政变的准备活动紧张地进行着。

第一步,是两太后指使亲信上疏,要求太后临朝垂帘听政,以试探舆论。八月十日(9月14日)御史董元醇上疏进表:“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更于亲王中派一二人,令其同心辅弼一切事务”。^②董元醇的上疏,其用意已经十分露骨,就是要求推翻咸丰帝的遗命,剥夺“赞襄政务大臣”的权力,让太后和奕訢(即所谓“更于亲王中派一二人,令其同心辅弼一切事务”)来执掌朝政。董元醇乃疏逖小臣,竟敢如此发端,当是另有所授,昭然若揭。肃顺集团亦敏锐察觉,此事件非同一般,故即刻予以反击。他们以咸丰帝遗诏未曾提出“太后临朝”,况且清朝开国以来也从无皇太后垂帘听政典故的“祖宗旧制”为根据,在董元醇上疏的第二天(9月15日),由载垣起草了一个驳斥董折的上谕,要求慈禧太后盖印发下。慈禧不仅拒盖印章,而且连董元醇的原疏也不肯发下,双方“见面大争”,端华“怒形于色”,“太后气得手颤”^③,剑拔弩张,相持不下。肃顺集团以停止办公表示抗议,慈禧太后

① 1861年11月12日英国驻华外交大臣罗素涵,转引自《历史教学》1952年4月号。

② 薛福成:《庸庵笔记》第1卷。

③ 薛福成:《庸庵笔记》第1卷。

唯恐小不忍则乱大谋,只得以屈求伸,作了暂时退却。“ (16日)日将中,上(实际是慈禧太后——引者)不得已,将折及拟旨发下照抄”,载垣等才“照常办事,言笑如初。”^①肃顺集团因为小小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们对慈禧太后的阴险面目还没有完全认识,当然更料想不到以后会遭杀身之劫。

第二步,是利用起运咸丰帝“梓宫”的机会,先期回京,布置侍卫,当八位“赞襄政务大臣”入京之后,便一网打尽。

九月廿四日(10月26日)咸丰帝“梓宫”离开热河起运回京,行至喀喇和屯,两太后的銮仪挟持幼帝,突然加速行程,甩下载垣、端华的扈从队伍,先回北京,而肃顺因直接护送“梓宫”,行速缓慢,远远落在后面。九月廿九日(11月1日)两位太后回到北京的当天,恭亲王奕訢指使亲信——大学士贾桢、周祖培和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合奏,要求“太后临朝”,钦差大臣、兵部右侍郎胜保则直捷奏请:“为今之计,非皇太后亲理万机,召对群臣,以通下情而正国体;非特简近支亲王,佐理庶政,尽心匡弼,无以振纲纪而顺人心。”^②北京继热河以后,再次掀起“太后临朝”的舆论,发出了政变的信号。北京是奕訢的势力范围,与热河不同,“太后临朝”之请,在贵族官僚中有其市场,也合外国侵略势力的心意,所以这出闹剧愈演愈烈。九月三十日(11月2日)慈禧太后即刻发出了早在热河暗中拟好的上谕,宣布载垣、端华、肃顺等人有“专擅”、“欺蒙”之罪,解除了他们的职务,载垣等人还茫无所知。当天,“恭亲王率周祖培、文祥等入朝待命。载垣等已早到,尚未知解任之信,……见恭亲王等则大

① 薛福成:《庸庵笔记》第1卷。

② 《清代七百名名人传》第1035页。

言曰“外庭臣子，何得擅入？”^①载垣等正在斥责奕訢之时，慈禧太后又传旨：“命恭亲王将载垣、端华、肃顺革去爵职拿交宗人府。”^②载垣等以“赞襄政务大臣”的身份抗争：“我辈未入，诏从何来？”^③不等争辩分晓，载垣、端华等人已经成了阶下之囚。

护送“梓宫”的肃顺，行至密云半壁店，也被慈禧的亲信，随同护送“梓宫”的醇郡王奕綏逮捕入囚。^④慈禧太后采取果断手段，以迅雷之速发动突然袭击，除掉政敌，充分显示出这位敢想敢做的女强人本色，几十年之后，宫里还流传着半壁店擒拿肃顺的故事。

十月初一日(11月3日)慈禧太后任命在政变中立了大功的恭亲王为议政大臣和军机大臣，兼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十月初六日(11月8日)，又上谕，宣布将肃顺斩首，令载垣、端华自尽，其余五位“赞襄政务大臣”或革职、或充军。并以皇帝的名义宣称：“载垣、端华、肃顺于七月十七日皇考升遐，即以赞襄政务王大臣自居，实则我皇考弥留之际，但面谕载垣等立朕为皇太子，并无令其赞襄政务之谕，载垣等造作赞襄名目，诸事并不请旨，擅自主持……。”^⑤干净利落，矢口否定咸丰帝有授命赞襄政务之遗诏，既可逃脱违背先帝遗命的罪名，又可免得日后有人利用咸丰帝遗诏为肃顺集团翻案。

① 《清穆宗毅皇帝实录》第1卷。

② 《清朝野史大观·清宫遗闻》第1册，第74页。

③ 《清宫秘史》，载《东方杂志》第9卷，第1号。

④ 溥仪：《我的前半生》第3页。

⑤ 《清穆宗毅皇帝实录》第6卷。其实咸丰帝关于任命“赞襄政务大臣”遗诏原件，至今仍保留在故宫档案里。不顾历史事实是一切阴谋家的惯用手法。

这样,就结束了八大臣辅政的局面,史称“祺祥政变”。

十月十八日(11月20日),幼帝载淳正式登基,年号不用“祺祥”,而用“同治”,意为两宫太后与皇帝共同治政。即着颁布《垂帘章程》,由太后批阅奏章,召见臣僚。从此清朝开始了由满洲贵族女强人慈禧太后掌政的“垂帘听政”时期。

第三节 在醇王府出生

同治十年六月二十八日(1871年8月14日)子时,光绪皇帝载_殳诞生在北京宣武门内,太平湖东岸的醇郡王邸第(即现在中央音乐学院所在地)^①。

载_殳呱呱落地,是醇王府天大的喜事,小生命给这座古老的府第带来了新的生机。载_殳的父亲奕_统是宗室直系,载_殳的母亲叶赫那拉氏是慈禧太后的胞妹。按照成例,皇族宗室新添一个小成员(男孩)必须进宫启奏,请求皇上赐名,意味着“黄带子”的蕃衍,祖宗基业后继有人。当时在宫里实际上掌握朝政的是载_殳的姨母慈禧太后。是日早朝,十五岁的同治皇帝和他的母亲那拉氏西太后在接受大学士、军机大臣等大臣朝拜磕头以后,奕_统启奏醇王府喜得贵子,慈禧太后表示道喜祝贺,便执笔赐名载_殳。因为早朝以前,内廷太监已把醇王府喜事报告太后,故事先已有准备,当即赐给这位刚临人间的姨甥一把嵌着许多珠宝的小金锁。“_殳”及金锁

^① 根据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的回忆,后来的醇王府不是光绪帝出生的那座府邸。载_殳做了皇帝以后,按清雍正朝的成例,把太平湖东岸的醇王府腾出,作为“潜龙邸”。慈禧太后把什刹前海的一座贝子府第,作为醇亲王奕_统的府第,时人称为“北府”。

都是吉祥的象征,祝愿小载殄长命百岁。

六月卅日(8月16日),载殄出生的第三天,旧时称“三朝开眼”,是婴儿的第一个庆贺日子。作为皇亲国戚的醇王府,当然要大庆一番。

醇王府仪门以内的一片大院里架起篷帐,悬挂着彩绸和宫灯,作为临时安置宾客的大庭。这一天,王府门外车水马龙,宾客鱼贯而入仪门者有:宗室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和朝廷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六部九卿等等显贵要员。他们纷纷向醇郡王奕訢及载殄的生母,奕訢的福晋那拉氏致词祝贺,并赠送各种绸缎珠饰等珍品礼物。一批接一批,川流不息。^①然而,小载殄的父母以及纷至沓来祝贺的大小官僚,未曾想到这位刚临人世的皇族小成员,竟在四年以后,登基龙座成为君临天下的万岁爷。

小载殄在醇王府生活仅四年时间,这四年可谓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满月、双满月、周岁、两周岁……。小载殄咿咿哑哑的学语,扶拉着太监、乳母的手,摇摇晃晃地学行走,十分活泼可爱。他最欢喜的是花和鸟。醇王府堂室层层,院庭错落,警卫森严,除太监和女仆之外,小载殄从未有过同邻里亲朋好友一起玩耍快乐的体验,只有四季盛衰相替的花木和扑来飞去的小鸟,给小载殄带来一点乐趣和点缀醇王府的生气。所以他非常喜欢花和小鸟,有时还自语一通,似乎在沟通感情,他就兴奋极了。在四年间,他想得到的一切东西,是从来也不会使他失望的,尤其是他尽情地享受了母爱的温馨。刚满四岁的时候,父亲奕訢给他请来了一位饱学端行的门馆先生,开始教他读书写

21

^① 参见德龄《瀛台泣血记》第22~32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

字,每天必须识字十个,而且每字必须颠来倒去的认着,使他永远不会忘记。小载殄天资很聪明,凡是教过的字都能牢牢地铭记着,数日所教的字总在一起也都能顺口念读和书写。这时,他对画图和剪纸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把学过的字一个一个地剪下,贴在白纸上,先是剪成方块,后来按笔划剪,既有助记忆和书写,又是一门动手的劳作。载殄特别喜欢画小鸟、野兽、人物,画着贴着,他那日常憩息的卧室,四壁皆是。小载殄常常望着自己的作品发出快乐的欢笑声。^①

就在这一年的一天(1874),从宫里传出消息,说同治皇帝染上了天花疾病,并且病势日复一日地在加重着。因为这个突然而来的消息,夺去了小载殄最快乐的一段童年生活,也给醇王府带来了巨大的震荡,一切都随着这个消息发生变化。

光绪皇帝的生父奕缙(1840~1891),是宣宗(道光皇帝)的第七子,宫里称呼他为七王爷,载殄是他的第二子,载殄以下还有载璣、载沣(袭醇亲王爵,也是宣统皇帝溥仪的父亲)、载洵、载涛。^②奕缙于咸丰元年(1851)封为醇郡王。九年(1859)三月,十九岁时在咸丰帝的贵妃,叶赫那拉氏直接主持下,同她的胞妹完婚。按宗室成例,皇子结婚以后,就得“分府”出宫,迁离紫禁城另立邸第。“分府”以后,奕缙仍受命“在内廷行走”,是慈禧太后的亲信。咸丰十一年(1861),慈禧太后发动了宫廷政变,奕缙积极参予,曾亲自在密云半壁店捉拿护送咸丰帝“梓宫”返京的肃顺,为西太后夺取清王朝大权立下了汗马功劳,^③被视为是那拉氏“最靠得住的附

① 参见德龄:《瀛台泣血记》,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

② 《清史稿·奕缙传》、溥仪:《我的前半生》。

③ 溥仪:《我的前半生》第5页。

和者”。^①从此他飞黄腾达,获得了正黄旗汉军都统、正黄旗领侍卫大臣、御前大臣、后勅大臣、管理善扑营事务、署理奉宸苑事务、管理正黄旗新旧营房事务、管理火枪营事务和神机营事务等一系列头衔,其时奕缙年仅二十一岁。

同治三年(1864)慈禧太后给奕缙加亲王衔,次年又命“弘德殿行走,稽察课程。”^②奕缙是满洲贵族核心集团中的一个要员,十九岁同慈禧太后的胞妹结婚“分府”另立邸第,这是他政治生涯的转折点,尔后就深深地卷入宗室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复杂的政治角逐和错综的人际关系,使他青年时代起就操重老练,明哲保身。奕缙具有中国封建社会官僚阶层典型的矛盾心理,既是野心勃勃,企图掌握最高权力;又是害怕一旦政治斗争失势,落得丧身破家的下场。在醇王府第里,他亲笔写了不少格言和家训,是他矛盾心理的写照。奕缙他勉励子孙的条幅是这样写的:“福禄重重增福禄,恩光辈辈受恩光”。表明他期望子孙后代世为朝廷重臣。但他又命名自己住的正房曰“思谦堂”,书斋里的条几上摆着的“敬器”^③,刻着“满招损,谦受益”的铭言;子女房中,还挂着“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祸也大,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多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的格言。^④奕缙这种矛盾性格,正适合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下的宫廷气候,所以他能够长期得宠,倍受器重。

同治十一年(1872),奕缙进封为醇亲王,十二年穆宗亲

23

①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第307页。

② 《清史稿·奕缙传》第30册,第9107页。中华书局1976年出版。

③ 敬器:古代的一种巧器,仿灌溉用汲水陶罐。《荀子·宥坐》云:“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奇焉。孔子问于守庙者曰:‘此为何器?’守庙者曰:‘此盖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闻宥坐之器者,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宥同右)。

④ 溥仪:《我的前半生》第8页。

政,皇帝已经成人,无须“稽察课程”了,故罢“弘德殿行走”之职。

同治十三年(1874)载淳驾崩,载湉入承大统,即皇帝位。其时,奕䜣矛盾心理作出了最充分的表现。据《光绪朝东华录》所载: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丙子醇亲王奕訢奏:“臣侍大行皇帝十有三年,时值天下多故,尝以整军经武,期睹中兴盛事,虽肝脑涂地,亦所甘心。何图昊王不吊,龙驭上宾,臣前日仰瞻遗容,五内崩裂,已觉气体难支,犹思力济艰难,尽事听命。忽蒙懿旨下降,择定嗣皇帝,仓猝间昏迷罔知所措,迨舁回家内,身战心摇,如痴如梦,致触犯旧有肝疾等症,实属委顿成废。惟有哀恳皇太后恩施格外,洞照无遗,曲赐矜全,许乞骸骨,为天地容一虚糜爵位之人,为宣宗成皇帝留一庸钝无才之子,使臣受悒悒于此日,正邱首于他年,则生生世世,感戴高厚鸿施于既矣。”^①

“福兮祸之所伏”,这是古人处事格言。儿子为皇上,福星高照,然而福中伏祸,不能不预防。奕䜣是慈禧太后的亲信,十三年来,靠了皇太后这座泰山,成了朝廷重臣、参予国家机要决策。正因为是慈禧太后的内廷亲信,所以奕䜣比别的大臣更了解太后的阴险多谋和绝对的权欲。慈禧太后是光绪皇帝的“圣母皇太后”,而奕䜣是皇帝亲生之父,与太后本应并坐并立。然,国家无二主,朝廷无并尊,太后和皇父之间日后关系如何处置,对奕䜣来说确是棘手的难题。明哲保身的奕䜣,认为退出政治舞台乃是最佳的选择,所以他恳切要求皇

^①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3页。

太后“许乞骸骨”，留下一把老骨头颐养天年。慈禧太后选定载瑾为嗣皇帝当然有多种复杂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因为奕缙这种小心翼翼性格，对她今后的地位不会造成威胁。尔今奕缙“许乞骸骨”的恳求，慈禧太后便顺水推舟，把醇亲王奕缙的奏折，交王公大学士、六部九卿集议之后，作了以下批复：

该王因伤痛过甚，触发旧疾，哀恳出于至诚，不得不量为体恤，拟将该王所管各项差使均于开除。……著以亲王世袭罔替，用示优异。^①

奕缙虽再三推辞“世袭罔替”的崇高荣誉，因西太后不允而接受。这样，一切差使尽去，“但令照料普陀峪陵工”^②，戴着“亲王世袭罔替”的光荣帽子，做些无关紧要的事务，可以在王府享享清福了，这倒符合他“满招损，谦受益”的逻辑。为了防止以后有人以抬高他的身份来贬低西太后，而遭来莫须有的横祸，因而于光緒元年（1875）正月初八日又给慈禧太后上了一个名曰《豫杜妄论》的密奏：

臣见历代继承大统之君，推崇本生父母者，备载史书。……皇清受天之命、列圣相承，十朝一脉，迨穆宗毅皇帝春秋正盛，递弃臣民。皇太后以宗庙社稷为重，特命皇帝入承大统，复推恩及臣，以亲王世袭罔替。渥叨异数，感惧难名。原不须更生过虑，惟思此时垂帘听政，简用贤良，廷议既属执中，邪说自必潜匿。倘将来亲政后，或有草茅新进，趋六年拜相捷径，以危言故事耸动宸聪，不幸稍一夷犹，则朝廷滋多事矣。仰恳皇太后将臣

①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6页。“世袭罔替”即子孙世代承袭王爵，不必按例降袭。

② 《清史稿·奕缙传》第30册，第9108页。中华书局1976年出版。

此折留之宫中。俟皇帝亲政,宣示廷臣世赏之由及反寅畏本意,千秋万载,勿再更张。如有以治平、嘉靖之说进者,务目之为奸邪小人,立加屏斥。果蒙慈命严切,皇帝敢不钦遵?不但臣名节得以保全,而关乎君子小人消长之机者,实为至大且要。^①

醇亲王奕綏就是这样小心翼翼,诚惶诚恐地做了十六年的“皇父本生考”。在这十六年间,由于他对慈禧太后“谦卑谨慎,翼翼小心”^②,不失为太后“最靠得住的附和者”,所以他的职位和权力日趋迁升且不断加强。

光绪二年(1876)授命在毓庆宫照料载瑾读书;

光绪五年(1879)赐食亲王双俸;

光绪十年(1884)授命参予军机处决策;

光绪十一年(1885)“以总海军事务,所有沿海水师,悉归节制调遣,”奉命设海军衙门;

光绪十二年(1886)赐奕綏及其福晋坐杏黄轿;

光绪十四年(1888)赐于什刹海原贝子毓揆府第另建醇王府,并拨帑银十六万两葺治。

光绪十六年(1890)醇亲王奕綏薨,终年五十有一,慈禧太后亲诣王府祭奠,定称号曰“皇帝本生考”,谥曰“贤”。^③

奕綏的一生,对清王朝是鞠躬尽瘁,对“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是“谦卑谨慎”。在他离世前的一年(光绪十五年二月)慈禧太后曾对他的为人作过如下评论,可谓恰如其分:

(自光绪帝)寅承大统,醇亲王奕綏,谦卑谨慎,翼翼

①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三)总第2580页;《清史稿·奕綏传》第30册第9109~9110页。中华书局1976年出版。

②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三)总第2581页。

③ 《清史稿·奕綏传》第30册,第9111页。中华书局1976年出版。

小心。十余年来 ,深宫派办事宜 ,靡不殚竭心力 ,恪恭尽职。每遇优加异数 ,皆再四涕泣恳辞。前赏杏黄轿 ,至今不敢乘坐。其秉心忠赤 ,严畏殊常 ,非徒深宫知之最深 ,实天下臣民所共谅。^①

光绪皇帝载殄 ,虽出生在醇王府 ,然而 ,四岁离府 ,冲幼入宫。此后 ,其生父奕缙仍在毓庆宫照料读书课程 ,但完全以君臣之礼取代了父子感情。所以奕缙明哲保身的处世为人 ,对于成长中的小皇帝无多大影响 ,而民族灾难 ,国家面临被列强肢解险境的大气候 ,给光绪帝幼年心灵以极大的启迪 ,后来成为维新运动的元首 ,是历史所铸成 ,完全违背了慈禧太后用奕缙性格模式塑造光绪皇帝的企望。

^① 朱寿朋 :《光绪朝东华录》(三)总第 2581 ~ 2582 页。

第二章 嗣皇帝位

第一节 嗣位在“中兴”之时

光绪皇帝载湉嗣皇位前夕,19世纪70年代初期,正是清王朝从外患内忧的困境中挣扎出来的所谓“同治中兴”时期。光绪朝以前的道光(宣宗)、咸丰(文宗)、同治(穆宗)三朝,历经半个世纪,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社会性质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时期。

道光二十年(1840)英国向清朝发动了鸦片战争,经过二年时间,以清朝战败告终。道光二十二年七月(1842年8月)订立了《中英南京条约》,赔款洋银二千一百万元;割让香港为英国殖民地;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中英南京条约》是清朝政府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朝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演变的转折点。从此,闭关自守的门户被打开,中国人民身上开始套上了被奴役的锁链。

过了十年不到的时间,咸丰元年(1851)中国大地爆发了由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农民起义的烽火燃烧大半个中国,清王朝处在岌岌可危的境地。

再过了十年不到的时间,咸丰八年(1858)五月,英国、法国联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两年以后,又以清朝失败而

结束。咸丰十年,清政府分别同英、法、俄三国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中国社会更深地陷入半殖民地的泥坑。

道光、咸丰两朝是大清帝国的多事之秋,内忧外患接踵而至,清王朝面临倾覆的边缘。到了同治初年,内外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给清王朝带来了新的转机。

在列强方面,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同清政府订立了不平等条约,为其商品输入和原料掠夺铺平了道路,需要有一个“和平经营”阶段,因而出现了“中外和好”局面。在国内,同治三年(1864)天京陷落,太平天国运动失败,虽余波此起彼伏,但已掀不起风波。同治年间,中国的政治经济都有明显的变化,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清王朝最高统治集团,为了应付时局,其统治政策作了某些调整,这就是旧时史家所标榜的“同治中兴”,也是慈禧太后第一次“垂帘听政”时期。

29

“同治中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央集权开始松弛,以满洲贵族为主体的清王朝,逐渐成为满汉地主阶级的联合政权。

1644年满洲贵族入主中原,清王朝的各级统治政权中,充分体现出满洲贵族的主体作用。清袭明制,中枢机构设置内阁和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内阁大学士和六部尚书虽满汉复职,但是“向来各衙门印务,俱系满官掌管”,^①“各衙门奏事,但有满臣,未见汉臣。”^②内阁虽为百曹总汇,然而,雍正朝以前,议政王大臣会议凌驾于内阁之上,“国初定制,设议政王大臣数员,皆以满臣充之。凡军国重务不由阁臣票

①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129卷,第1页。顺治十六年十月辛卯,谕吏部。

②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71卷,第2页。顺治十年正月庚午。

发者,皆交议政大臣会议。每朝期,坐中左门外会议,如坐朝仪。”^①雍正朝始,满洲贵族的主体作用逐渐转向皇权独裁,别设军机处,“特简”大学士和尚书、侍郎若干入充军机大臣,直接听命皇帝,内阁形同虚设。

地方十八个省的长官是总督和巡抚,多由满员所任。皇权是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中央集权的最高体现,也是满洲贵族特权的最集中反映,嘉庆皇帝声称:“我朝列圣相承,乾纲独揽,……而至用人行政,令出惟行,大权从无旁落。”^②

这种以满洲贵族为主体的高度集中的统治局面,同治年间即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时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首先加强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功能。^③恭亲王奕訢为首任大臣,它的职责是:办理外交事务,派出驻各国公使,兼管通商、海关、海防,订购军火,主办同文馆和派遣留学生等项事务,并管辖南北通商大臣。“总署”集外交、经济、军事为一体,其地位相当于军机处,是凌驾于六部之上的洋务内阁。因为总理各国事务,少数满洲贵族已经无能垄断,“同治中兴”时期,越来越多的汉族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被委任为总理事务大臣。到光绪年间,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者由汉族官僚成了主要角色,满洲贵族的主体作用随之削弱。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置,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枢机构的一项重大调整。自秦汉以来,中央集权制的中枢机构有过多次调整,如秦设三公九卿,汉武帝设“中朝”,汉光武帝“置三公事归台阁”,隋唐的三省六部制和宰相制,明清的内阁制

① 昭槁:《嘯亭杂录》第四卷。

② 梁章巨:《枢垣纪略》第一卷。

③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署”、“译署”。创置于咸丰十年十二月。

和清朝雍正年间设置的军机处。历代新的中央机构的调整，目的都是为了加强封建专制制度和皇权独裁。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置则不然，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适应外交和洋务需要而建立的中央机构，反映了旧的封建统治机制已经不能适应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新情况日益发展的趋势，同时，也是汉族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在清朝政权中地位日渐重要和不断提出的实际要求。

在同外国侵略者和太平天国作战过程中，以满洲贵族为主体的大地主阶级当权派的懦弱无能已经充分暴露，促使清朝统治集团的核心力量进行适当调整，更易新的支撑。为此，在“同治中兴”期间，慈禧太后大力起用汉族地主阶级的中坚分子，晋迁高职，委以重任。

咸丰十年（1860）十一月二十日，即“祺祥”政变后十八天，慈禧太后“命曾国藩统辖苏、皖、赣、浙军务，节制巡抚、提督以下各官”^①。不久，又加曾国藩太子少保衔，任协办大学士。同时还起用他所保荐的亲属、门生、部属为封疆大员。据统计，仅一年余，由曾国藩保荐任用的有：曾国荃为浙江按察使，李续宜为安徽巡抚，沈葆楨为江西巡抚，李鸿章为江苏巡抚，左宗棠为浙江巡抚，刘长佑为广西巡抚，严树森为河南巡抚，江忠源为贵州巡抚等等。同治朝以前，总督、巡抚多为满、蒙八旗，或汉军旗人担任，以鸦片战争时期为例，重要省分如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督抚共七人，其中满蒙大员就有琦善、托浑布、伊里布、乌尔恭额、怡良五人，汉员仅林则徐、邓廷桢二人。同治年间，封疆大臣中汉族地主阶

^① 《清史稿·穆宗本纪》第4册第772页。中华书局1976年出版。据有的史料记载，任曾国藩为总督和协办大学士，是慈安太后的决策。

级代表人物比例增长,这是满汉地主阶级权力再分配的产物。

清朝封建政权中满汉成员结构的变化,也是在农民起义波涛冲击之下中国政治形势变化的客观反映。

军队是政权的重要支柱。清军入关,八旗兵所向披靡;镇压三藩叛乱,绿营兵屡建战功。自嘉道以来,八旗将士养尊处优,绿营军备废弛,清军战斗力大为削弱。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掀起,初期清政府先后调集湖南、云南、广西、广东、湖北等省绿营数万人,并以原两江总督李星沅、大学士赛尚阿为钦差大臣,调向荣、乌兰泰等一批八旗将领围剿太平军。但是这批清军却是一战即溃,太平军愈战愈强,1853年2月,自武昌沿长江东下,水陆并进,3月攻克南京,定为都城(天京)。同年4月,向荣、琦善分率八旗、绿营兵三万余人先后在长江南北,建立江南、江北大营。然而,八旗、绿营外强中干,全无进攻之力,仅在战略上对天京起着威胁作用。

太平天国运动兴起不久,捻军纵横于淮河北,东掠苏北,北蹂鲁南,“将溃及胸腹”与太平军遥相呼应。八旗、绿营兵在同捻军作战中也象同太平军作战一样,闻风溃散,屡战屡败。同治四年(1865)四月,清朝名将僧格林沁在山东曹州被捻军包围,全军被歼灭,僧格林沁亦阵亡于此役。

正值清王朝主要军事力量八旗、绿营日趋懦弱无能之际,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湘军、淮军相继崛起,并最终形成汉族军阀集团势力。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进士,历任内阁学士、侍郎等职。曾从倭仁讲习程朱道学,深受穆彰阿的赏识。咸丰二年(1852),因母丧回籍守孝,次年清廷命他在本省办团练,开始编练湘军,组成了一支在绿

营以外的正规军。曾国藩看到原有的八旗、绿营军制松弛，营伍中习气败坏，因此他编集的湘军“别树一帜，改弦更张”，^①“奉朝廷之命，兴君子之师”，不沿袭八旗军、绿营兵旧制。湘军以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为骨干，各级将官均有曾国藩直接选派并利用宗族、同乡、师生等封建关系进行招募、训练和指挥。凡入伍者从严选择，以“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士气者为上”，并均须取具保结。先后招募陆水兵各五千人，连同夫役总计一万七千人。全部湘军只受曾国藩的调度和指挥，实际上成为曾国藩的私军。这支利用封建宗法关系编建起来的近代军阀部队，一改八旗、绿营“将不知兵”的松散状态与腐败习气，其士兵素质朴实，训练严格，因而战斗力远超八旗、绿营，出战以后，虽多次遭到太平军的沉重打击，几次溃败，却始终不散，成为太平军的强悍敌手。曾国藩也就此成为汉族军阀集团头子第一人。

李鸿章(1824~1901)字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咸丰八年(1858)入湘军为曾国藩幕僚，咸丰十一年(1861)冬，由曾国藩推荐为江苏巡抚，不久又受命回安徽庐州(合肥)以曾国藩湘军中拨出若干营为基干，招募团练，创淮军。淮军完全按照湘军的传统建制，在太平天国战争结束以后，湘军逐步遣散，李鸿章的淮军成为最大的汉族军阀集团的实力派。

曾国藩、李鸿章汉族军阀集团的崛起，表明以满洲贵族为主体的中央集权机制开始松弛，地方实力派逐渐成为清朝的举足轻重力量。

其次，对外关系方面，出现了“中外和好”的新局面。

^① 《曾文正公书札》、《与王璞山》第2卷、第10页。

咸丰、同治之际,中国各种政治力量交结,社会矛盾处在复杂多变之中。当太平天国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西方列强静观动态,在太平天国与清政府之间进行了慎重的考察与比较,以选择支持哪一方面最有利于推行他们的对华政策。咸丰十一年正月(1861年2月),英国驻华海军司令何伯率领一个舰队,由上海沿长江西上,目的是窥探太平天国的力量,了解天京政权对列强的态度。“据苏松太道吴煦密禀,闻其路过金陵,欲见发逆,与之说明,两不相犯,使洋船往来江面无碍,并欲与该逆互通交易等情。”^①说明西方列强当时对太平天国的态度是“两不相犯”,因为他们对其了解还很朦胧,只是因为共信上帝,在感情的天平上略有倾斜而已。何伯在长江往返,历时二月,还派了一个叫威司利的军官留在天京观察了一个星期。他们既到了清朝官兵驻守的汉口等地,又到了太平天国的京城。经过了实地考察,终于作出了支持清政府帮助清军武装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选择。威司利向英国政府建议说:“英国当向太平军通告云:吾人再不能袖手旁观,……且吾人今已与清廷结成友善的盟约,故决助其扫荡乱事。吾极深信一经如此通告,……直向南京施以一击,则乱党全局将可于一月内崩溃。为施行此一击,吾人现已有充分的武力在中国。”^②威司利的建议,实际上是“有充分的武力在中国”的列强对华局势的一个共同声明。美国也表示“支持和加强清廷而不是听任帝国在叛乱之中分崩离析”。^③

①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73卷、第28页,本书以后简称《咸丰夷务》或《同治夷务》。

② 威司利:《太平天国天京观察记》,见简又文著:《太平天国杂记》第127页。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

③ [美]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第313~314页。

法国公使向恭亲王奕訢提出:愿意帮助清朝“攻剿发逆”,^①俄国也愿意与清政府进行军事合作,“官军于陆路统重兵进剿,该夷(俄国——引者)拨兵三四百名在水路会击。”^②不打不相识。外国侵略者同清政府打了两次仗,他们深知清政府虚弱无能,容易驾驭,而且订立的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量他们不敢翻脸变卦。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国,必须保存一个名义上统一的中央政权,才能确保列强在华的既得利益。当时一些政治敏捷的官僚,他们都认为西方列强是不可能抛弃清朝中央政府的,列强的共同利益是维持清政府的统治。当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在奏疏说,各国对中国政策是“欲胁各官以制百姓,胁朝廷以制官民。”^③任江西巡抚的刘坤一说得加更透彻,他在奏文中说:“洋人所重者利,所畏者民。……自知非仗朝命,无以制中国之民,图中国之利。”^④列强维护在华的共同利益,是当时“中外和好”局面的基石。况且前面所说的两次战争,其目的都不是要推翻现存的清政权而另塑一个傀儡政府,这是任何一个列强都难以办到的。他们只是要征服清政府,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市场和原料基地。这一目的现在只有清政府才能保证实现,太平天国则不然。不是因为太平天国有明确的反侵略的观点和强大的反侵略斗争的力量,而是因为太平天国的领袖比清朝皇帝和慈禧太后更加傲慢自大,闭塞愚昧,这样的新政权,断不能保护西方列强的在华利益,中国社会势必又会重蹈闭关排外的老路。

① 《咸丰夷务》第67卷,第55页。

② 《咸丰夷务》第69卷,第29页。

③ 《同治夷务》第55卷,第9页。

④ 《同治夷务》第54卷,第13页。

咸丰三年(1853)英使文翰访问天京,东王杨秀清致文翰的文书中说:“尔等英人久已拜天,今来谒主,特颁谕抚慰。……深望尔等能随吾人勤事天王,以立功业而报答天神之深恩,”一副“唯我独尊高于一切”的封建君主傲慢姿态。^①试问这样愚昧妄狂的政治领袖,能够兑现不平等条约吗?这是西方列强帮助清政府“攻剿发逆”的根本原因。

鉴于“夷”与“发逆”对清政府的利害关系,咸丰十年十二月(1861年1月)当时掌握清朝实权的官僚代表,恭亲王奕訢、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联合向慈禧太后上了一个奏折,分析当时政治形势,提出了清廷的基本政策:“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②奕訢等人的奏折较务实地提出了“同治中兴”时期外交政策的基点。并向朝廷建议设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便适行“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的内外政策的需要。不过当时只说是临时性的机构,“俟军务肃清,外国事务较简,即行裁撤,仍归军机处办理,以符旧制。”^③结果,它同军机处一样,由临时性机构而成为永久性机构,因为它们都是应运而生的历史产物,其命运必然是伴随至清政权覆灭而告终。

总理衙门建立以后,清朝同西方列强至少有二十年的“中外和好”时期,其执行的对外方针是:“办理外国之事,非

① 《英国政府蓝皮书中之太平天国史料》,丛刊《太平天国资料》第904页。

② 《咸丰夷务》第71卷,第18页。

③ 《咸丰夷务》第71卷,第19页。

恐决裂,即涉迁就,势本难以两全。两害相形,则取其轻,实未敢因避迁就之讥,致蹈决裂之害。”^①因为清政府对西方列强采取一切“迁就”的方针,所以中外反动势力很快地联合起来,携手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尔后又形成了“中外和好”局面,使清政权在外患内忧的困境中争得二十年的“中兴”时间。

第三,“同治中兴”反映在经济上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形成。官僚资本主义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种特有的经济形态,它是伴随着这一社会形态的形成而逐渐成长起来的。19世纪中期,中国开始迈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封建性和买办性为其特征的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就在这样的土壤上萌发出来的畸形经济形态,它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起了阻碍和导发的双重作用。

中国官僚资本主义经济是在列强“助剿发逆”的联合行动中孕育起来的。西方列强帮助清朝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除了直接出兵“助剿”以外,主要是用洋枪洋炮武装清军。60年代初期,湘军、淮军就逐渐装备洋枪洋炮,并在作战中显示威力。李鸿章赞扬说:“枪炮并发,所向辄靡,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②他还在淮军中“雇洋人数名,分给各营教习”,“又托法英提督各代购大炮数尊自本国寄来。”^③仅松江一地,李鸿章在半年中就请洋教头训练了一千二百多名清军学会使用洋枪洋炮。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下去以后,清政府对于湘淮军使用洋枪洋炮的功效,给以极高的评价:“各营得此利器,足以摧坚破垒,所向克捷,大江以南逐次

① 《同治夷务》第5卷,第55页。

②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第1卷,第10页。

③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第3卷,第16、19页。

廓清 ,功效之速 ,无有过于是也。”^①

洋枪洋炮如果只是托人西洋代购 ,“自本国寄来” ,那末跨洋渡海 ,费时费银 ,远水难救近火 ,故所以曾国藩、李鸿章他们在大量向外国购买的同时 ,便设法自行生产。同治元年(1862 ~ 1863)间 ,两江总督曾国藩已在安庆设军械所 ,江苏巡抚李鸿章在苏州和上海设洋炮局 ,同治四年(1865)上海成立的江南制造局。是在曾国藩支持下由李鸿章主办的 ,是第一个象样的官办军火工厂 ,除了生产枪炮之外 ,还制造军舰。同年 ,李鸿章又在南京设立了金陵制造局。同治六年(1867)北洋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创办了天津机器局 ,闽浙总督左宗棠于同治五年(1867)在福州创办马尾造船局。在 70 年代到 80 年代 ,全国许多省份包括陕西、甘肃、广东、福建、山东、湖南、四川、吉林、山西、浙江、台湾、云南、湖北等省都以“机器局”之类的名称 ,相继设立了军火工厂 ,它们都是由各省督抚动用官资设立的。

这些军事工业因为使用新式机器 ,雇佣了大量工人 ,大体上仿照西方的机器工厂的组织形式进行生产 ,因此已不同于旧有的官营手工业工场 ,而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工业企业。但是 ,这些近代企业不属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范畴 ,而是近代官僚资本主义经济的先体。

首先 ,这些工业企业完全是为军队提供武器装备的官僚企业 ,因为不生产商品 ,生产品不投入市场 ,所以不核算成本 ,企业只管生产 ,不管盈亏。因而这些工业企业没有从利润中转化而来的资金积累 ,也不能促进资本的增殖和企业扩大再生产。

^① 《同治夷务》第 25 卷 ,第 10 页。

其次 这些工业企业有着极为严重的封建性。企业大权完全为封建官僚所把持 ,经营管理也采用封建衙门的方式。机构庞大 ,坐食高俸、贪污虚报、浮冒原材料等等腐败现象比比皆是。雇佣的洋匠及工头视工人为奴隶 ,生产效力极为低下。

其三 这些工业企业具有明显的买办性。它在设备、技术乃至原材料、零部件 ,全都依赖西方国家进口。外国顾问、洋匠操纵了生产大权 ,并对整个企业有着决策作用。因此 ,这些工业企业实质上是西方列强军事工业的分支和外国军火商的主顾。

然而 尽管这些军事企业中国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联姻的畸形产物 ,它虽不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孕育起来的民族资本主义 ,但也不同于旧式的官营手工业工场作坊 ,而是地地道道的大机器生产 ,拥有大批产业工人的近代企业。其中也有一部分企业后来还是把产品转化为商品。因此 ,同治年间出现的近代工业企业 ,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既有束缚作用也有导发作用 ,表明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成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清朝政权机制的变化和对外政策的调整 ,以及近代工业企业的出现 ,这就是所谓的“同治中兴”的主要内容 ,这些现象确实给奄奄一息的清王朝造成了新的转机 ,所以《清史稿》评论同治一朝时说 :“穆宗冲龄即阼 ,母后垂帘。同运中兴 ,十年之间 ,盗贼鄣平 ,中外义安。非夫官府一体 ,将相协和 ,何以臻兹 ?”^①当然 ,《清史稿》的作者是站在清朝遗臣的封建立场上来评论同治帝的 ,有过分的歌功颂德。但其“盗贼鄣

^① 《清史稿·穆宗本纪二》第4册 ,第848页。中华书局1976年出版。

利,中外乂安,宫府一体,将相协和”之谓,在一定程度上却是同治朝历史变化的概括。光绪帝载湉嗣位于“同治中兴”之时,“上继十三载中兴耄定之庥,下开亿万年宪政文明之局”。^①所以“同治中兴”的内容对光绪朝的政治、经济有直接的影响。

第二节 同治皇帝之死

光绪皇帝载湉作为文宗(咸丰帝)的继子而接承穆宗(同治帝)皇位的嗣皇帝,在他四岁的时候,同治十三年十二月“甲戌(初五)穆宗毅皇帝臬疾大渐,酉刻,宾天。”^②他的堂兄同治帝载淳于1875年1月12日患天花症不治而死。关于同治皇帝的死疾,有不同的说法。《清朝野史大观》谓:“皇帝患淫创”,即染上梅毒致死,^③光绪后期的宫内女官德龄女士对同治帝患天花致死,也怀负疑云,她说:“又隔了一天,更可怕的消息传来了,说是皇上,正在出天花了,并且出得非常旺。但即使是这样,似乎也还没有什么重大的危险可说。因为同治的身体一向是十分壮健的,论到天花这一种病症也决非就是绝症,只要医治得合法,调护得适宜,要治好也是很有可能的,至多不过使同治那样一个美少年变为麻脸而已。”^④大概由于这些非正史的记载,所以民间有同治皇帝患花柳病而死的传闻,直至现今的一些文艺作品和影视剧中大

①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序。

② 《清德宗景皇帝实录》第1卷,第5页。

③ 《清朝野史大观》《清宫遗闻》第1册,第82页。

④ 《瀛台泣血记》第38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

加发挥,有声有色地描绘同治帝宿娼患梅毒致死的情节。《光绪朝东华录》关于同治帝疾症有间接的记载:“以太医院院判李德立等侍诊大行皇帝天花,保护不力,均革职带罪当差”,^①说同治帝患了天花疾病,治理不当而死亡。正史当然有避讳之嫌,不能信之为依据。然而,曾任同治皇帝的老师,当时为弘德殿行走的皇帝近臣翁同龢,他在日记里对同治皇帝发病情形有详细的记录,对于澄清“患梅毒致死”的传闻,是很有价值的第一手史料,现较关键的几段日记摘录如下:

“同治十三年(十月)三十日(1874. 12. 8)……连日圣体违和,预备召见皆撤。廿一日西苑受凉,十一月朔(12月9日)巳(时)初访绍彭,据云今日入直,知圣体发疹问安。”

“初二日(12月10日)……圣恭有天花之喜,余等入至内务府大臣所坐处,托案上入请安,送天喜,易花衣,以红绢悬于当胸。……昨日治疹,申刻始定天花也。”

上面两段记录,很明确地说明同治帝十月廿一日于西苑受凉,十天之后才诊断为天花疾症。此后,翁同龢在日记里还记录逐日病情、脉案和太医院处方。自十一月初起,病情愈发加重。

“初六日(12月14日)巳初三刻今日方如下:脉案云,天花七日渐已行浆,亦见饱满,而根晕未收,饮食亦住,唯咽痛音哑,咳呛堵塞,由于天花过稠密,气滞胸中,进清咽化毒。”

同治帝患病期间还召见大臣,翁同龢亲见同治帝水泡满

^①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一)总3页。

脸。

初八日(12月16日)辰初到东华门,……巳正叫起,先至养心殿东暖阁。两宫皇太后俱在御榻上持烛,令诸臣上前瞻仰,上舒臂令观,微语曰:‘谁来此伏见’?天颜温暉,偃卧向外,花极稠密,目光微露。瞻仰毕,略奏数语皆退。

初九日,寅初三刻入内,……辰初一刻又叫起,与军机、御前同入,上起坐,气色皆盛,头面皆灌浆饱满,声音有力。皇太后亦同在御榻。上首谕恭王:‘吾语无多,天下事不可一日稍懈,拟求太后代阅折报一切折件,俟百日之喜余即照常好生办事。’并谕恭亲王当敬事如一,不得蹈去年故习,话简而厉。

十二日(12月20日)是日巳午间从大光明殿接娘娘,走后左门一带,奉于养心殿,王贝勒及内府诸臣皆有执事,宫内皆挂红联,内监无职皆着红驾衣也。

十五日(12月23日)是日未刻送娘娘于大清门外,典礼极隆,仪卫甚盛。

旧时,中国人习俗,认为天花乃花神从天上撒落所致,故要接送祭祀天花娘娘,盼她手下留情,天花早日收归。另俗天花娘娘含羞,见红色即收花回归,所以民间凡患天花病者,不仅头裹红巾,室内皆挂红布,以避邪恶。此俗亦有一定道理,红巾裹头及室内挂红,为了不使强光折射,患者目光免受刺激。

上述记载,最的确地证明了同治皇帝所患疾症,乃天花病是也。自十月三十日发疹,十一月初一日诊断患天花症。至十一月廿七日病情日趋严重。

廿七日(1月4日)照常入,看昨方,按云脉滑缓无

力 帷肾愈流注 ,脓汁虽稍见稠 ,而每自流至一茶盅有余 ,恐伤元气云云。

廿八日(1月5日)适太医李德立、庄守和在彼 ,询以两日光景 ,则云 ,腰间溃处如碗 ,其口在边上 ,揭膏药则汁如箭激。

十二月朔(1月8日)……起居单内则所进饮食极少 ,而大便一夜行至二十一次。

初三日(1月10日)细看昨方 ,卯刻 ,按云诸症皆平 ,腰间红活而牙断黑烂 ,下利黑粘 ,系胃火郁滞 ,必须清利不能止塞云云。

初四日(1月11日)……惟上唇及左颊肿硬 ,有作腰之势 ,口气甚臭 ,胸满胁胀 ,食少舌干 ,毒火上亢 ,药用补气化毒。

初五日(1月12日)卯正二入 ,昨方按云 ,上唇肿木 ,腮红肿硬处揭破伤皮 ,不能成脓 ,仅流血水 ,势将穿腮 ,牙齿糜黑 ,口气作臭 ,毒热内攻 ,食少寐减 ,理必气血受病。……时日方落 ,有顷洩、恭邸、宝、沈、英桂、崇纶、文锡同入见于西暖阁 ,御医李德立方奏事急 ,余叱之曰何不用回阳汤。彼之不能 ,只得用麦参散。余曰即灌可也。太后哭不能词。仓猝间御医称牙关不能下矣 ,诸臣起立奔东暖阁 ,上扶坐瞑目 ,臣上前遽探视 ,弥留矣。……惨读脉案 ,云六脉俱脱 ,酉刻崩逝。^①

翁同龢在日记中关于同治帝发病、脉案、处方以及病情的发展至最后病终都有详细的记录 ,完全可以断定同治帝患天花(即痘症)而致丧命。

① 以上所引 均见《翁同龢日记》第2册。中华书局1989年出版。

近来从清代档案中发现了《万岁爷进药用药底簿》一份，它是清代皇帝的脉案档簿，比较详细地记录了同治帝于十月三十日(12月8日)下午得痘症，召御医李德立、庄守和入宫请脉起，直至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12日)夜病死，前后三十七天的脉案、处方、服用一百零六服药的情况。这本“脉案”是敬事房太监根据御医李德立、庄守和每请脉记录和所开药方，誊抄汇辑成册。从所载病情发展过程，同《翁同龢日记》所载很一致，所以可以断定，同治帝无疑是死于天花症，而绝非死于梅毒或其他病症。至于年轻的同治帝是否有微服出宫等风流韵事，野史中多有记载，然，这方面的传闻无考证之价值，也不能由此为据，得出同治帝患梅毒致死的结论。

44 同治帝载淳做了十三年的皇帝(1862~1875)，崩逝时年仅十九岁。他六岁(1862)即皇帝位，十八岁亲政(同治十二年正月，1874年)。同治朝几乎都在两宫太后“垂帘听政”下处理内外军政大事，就是亲政至逝世的一年中，朝政大权仍由慈禧太后牢牢地控制着，所以说同治帝是慈禧太后手里的傀儡皇帝。然而，这十三年的历史，清王朝众朝廷到社会，从政治到经济，从内政到外交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系列的变化，世人评价截然不同，有人褒之曰“同治中兴”，古人贬之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一步加深”。本章在《嗣位在中兴之时》一节已有评论。同治帝载淳之死，是清王朝晚期又一历史转折点，此后光绪朝统治中国三十四年，是“同治中兴”更高层次的发展，期间充满着改革与守旧，进步与反动的复杂斗争。

同治皇帝十九岁就一命呜呼，无子，该由谁来入嗣皇位，决定权完全操纵在满洲贵族的女强人，慈禧太后手中。

第三节 入承大统

同治帝崩逝之后,由谁来继承皇位是满洲贵族集团各派势力矛盾的焦点。

争夺皇帝宝座在宗室内部主要有两股势力:一是以当时掌握清朝一定实权的恭亲王奕訢为代表,他是道光皇帝的第六子,在“祺祥”政变中帮慈禧太后从肃顺集团手里夺回权力立下大功,成了慈禧太后最得力的助手,先后任军机大臣、议政王大臣兼领神机营等要职。他又是设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倡导者,首任总理大臣为清王朝兴办洋务的第一要人。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奕訢还作为清政府的全权代表同英、法谈判,亲手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和《中法北京条约》以及《中俄北京条约》,他尽量地满尽了侵略者提出的要求,颇得英、法等列强的青睐,因而在列强眼里他是清廷中的“开明大臣”,奕訢一度成为集内政、外交、军事于一人的清廷重臣。然而,奕訢随着权力的加强,其野心也日渐膨胀起来,难免同西太后发生权力之争。他“信任亲戚”,树党结盟,以便同“深宫”分庭抗礼。对于奕訢日益膨胀的野心,慈禧太后已有察觉,例如有一次“奕訢听了他妻父桂良的建议,提用门包,为数甚巨,被人弹劾。西太后抓到这个错处,便立刻加以谴责,令其退出军机(不久又恢复)毫不容情。”^①同治皇帝在临

^① 恽宝惠《清末贵族之明争暗斗》,载《晚清宫廷见闻》第62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出版。“门包”即收受规礼。

逝前夕,还警告“恭亲王当敬事如一,不得蹈去年故习,语简而厉。”^①尔今,权欲极大的奕訢当然不会放过这次皇权转递的机会,大有迫不及待之势。在同治帝驾崩的那天,两宫太后召近支王公、御前大臣、军机、内务府大臣等于西暖阁入见时,“当时首先碰到奕訢,传旨,奕訢说:‘我要回避,不能上去’”(结果还是去了——引者)为什么要回避呢?

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同治帝病重,由师傅李鸿藻代为批答章奏,君臣每日必见。有一天,同治帝当面交出朱谕一道,大概说时事艰难,赖国有长君,可传位于朕叔恭亲王,并命到了时候再宣布。西太后派去伺候(也可以说是侦探)皇帝的心腹内监,窃听此语,立刻奔告太后,遂将李鸿藻叫进宫内,问出朱谕,截留撕毁,事虽不成,奕訢或已闻知;一说是同治帝并无皇子,在近支内或溥字辈,或仍在载字辈内找一人继位,则奕訢的子孙可能性也很大,所以他要回避。^②

上述说法虽无别的文献资料可以得到佐证,未能作为信据。然,奕訢集团也是争夺继承皇位的一股力量,这是历史事实。

另一股势力是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最高当权派。同治帝在位十三年,他不过是一个傀儡皇帝而已,用行政,内务外交无不操纵于两宫手中,美其名曰“垂帘听政”,尤其是慈禧太后,实际上是大清王朝的女皇帝。历代封建王朝,由于皇位转递而引起宗室内部的残杀和社会的动乱,是屡见不鲜的,作为满洲贵族的女强人,又有“祺祥”政变经验的慈禧太后,她决不允许因为同治帝的早逝而丧失对清王朝的控制权

^① 《翁同龢日记》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九日。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第2册第1077页。

^② 恽宝惠:《清末贵族之明争暗斗》,载《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61页。

力。可是,同治帝遽然死去,不能不是对她继续掌握权力的一次挑战。她自己 also 认为这次比她的丈夫咸丰皇帝死时的情况更加严重。“时予年尚轻,文宗病危,……即宾天矣!……然彼时虽极悲痛,以为犹有穆宗可倚。孰意穆宗至十九岁,遽又夭折,自此予之境遇大变,希望皆绝。”^①然而,慈禧太后并不甘心因“希望皆绝”而让皇权旁落。“关于议立嗣君这一件大事,为了同治帝并无所出的缘故,委实很不容易解决。但太后是早就存了心的——也许她自己并不觉得有这种存心——她决意用她自己的主张去选择。在过去之中,太后对于无论什么事情,原是惯于用她自己的主张去解决的。”^②事情正是这样,同治帝病危期间,慈禧太后对于谁入承大统,早有心机。

同治帝驾崩的当天,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12日)由谁入承大统,继承皇位的闹剧,在慈禧太后一手导演下于故宫养心殿西暖阁揭开了帷幕。

47

同治帝是十二月初五日酉时(即傍晚)于东暖阁驾崩的。其时

慈安端裕康庆皇太后、慈禧端佑康颐皇太后御养心殿西暖阁,召洩亲王奕淙、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纘、孚郡王奕禔、惠郡王奕详、贝勒载治、载瑾、公奕謨、御前大臣、伯颜纳谟祜、奕劻、景寿、军机大臣宝鋈、魁龄、荣禄、明善、贵宝、文锡、弘德殿行走徐桐、翁同龢、王庆琪、南书房行走黄钊、潘祖荫、孙诒经、徐郙、张家骥入。^③

进行御前会议,商讨由谁入承大统。

① 徐珂辑:《清稗类钞》第3册,“宫闱类”,第36页。

② 德龄:《瀛台泣血记》第39页,1980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③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1~2页。

按照清朝“家法”皇帝驾崩无子，必从晚一辈中择一贤者为皇帝的嗣子，以皇太子的身份即帝位。同治帝载淳的晚一辈是溥字辈，而溥字辈有资格即位者有两：一是溥伦，他是道光皇帝的长子奕纬的长孙。可是其父载治则是奕纬的嗣子，他的直系祖父奕纪（载治的生父）既不是道光皇帝的儿子，也不是嘉庆皇帝的孙子^①，这样溥伦是皇族近支旁系，故所以得不到宗室的支持，慈禧太后当然更不可能把帝位拱手给他；二是恭亲王奕訢的第四子载沣的嗣子溥伟，其生父载涛是奕訢的第二子，他倒是道光皇帝的直支。可是溥伟的继父载沣，在宗室里声誉不佳，有传闻，同治帝“与贝勒载沣尤善，二人皆好著黑衣，娼寮酒馆，暨摊肆之有女者，遍游子。”^②有其父就有其子，父亲载沣名声不好，儿子溥伟当然也不配登上万乘之尊的皇帝宝座。

48

关于西暖阁彻前会议的情景，文献上记载众说不一。《清鉴辑览》载：一开始，西太后“含笑应曰：‘皇帝无恙’，语毕默然少顷，复言曰：‘圣躬颇虚弱，脱有不测，宗室中谁可承大统者？’”似乎以询问口气，探测众大臣的意向，而毫无悲痛之心。又说：内务府大臣文锡即刻提出：“请择溥字辈之贤者而立”。^③ 罗洩毅所著《德宗继统私记》载：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穆宗大渐，两宫皇太后御养心殿西暖阁，……太后泣语诸王曰：‘帝疾可为，继统未定，谁其可者？’或言溥伦长当立。醇亲王言溥伦疏属不可。（西太）后曰：‘溥字辈无当立者，奕訢长子今四岁矣，且至亲，予欲使之继统。’盖醇亲王嫡福晋，孝钦后妹也，孝

① 奕纪是乾隆皇帝第十一子永理的孙子。

② 《清朝野史大观》《清宫遗闻》第1册，第84页。

③ 《清鉴辑览》第24卷，第12页。

钦利幼君可专政。倘为穆宗立后,则己为太皇太后,虽尊而疏,故欲以内亲立德宗也。^①

罗氏所记同《清鉴辑览》大相径庭,据笔者判定,罗说较接近当的情景,我们可以从其参予御前会议的要员,翁同龢的日记中得到佐证。《日记》载:

十二月初五日晴寒。卯正二入,昨方按云:……忽传急召,驰入尚无一人也,时日方落。有顷,溥、恭邸、宝、沈、英桂、崇纶、文锡同入见于西暖阁,御医李德立方奏事急,余叱之曰何不用回阳汤。彼云不能,只得用麦参散。余曰即灌可也。太后哭不能词。仓猝间御医称牙关不能下矣,诸臣起立奔东暖阁,上扶坐瞑目,臣上前遽探视,弥留矣。天惊地圻,哭号良久,时内廷王大臣有续至者,入哭而退。惨读脉案,云六脉俱脱,酉刻崩逝。戌正,太后召诸臣入,谕云此后垂帘如何?枢臣中有言宗社为重,请择贤而立,然后恳乞垂帘。谕曰,文宗无次子,今遭此变,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现在一语即定,永无更移,我二人同一心(即与东太后——引者),汝等敬听。则即宣曰某(指立载灃——引者)。维时醇郡王惊遽敬唯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②

翁同龢把当时所目睹情形翔实地写进日记,应该说是可信的第一手史料。对照《清鉴辑览》的记载,显然是辑录者采纳了极不可靠的传闻所致。遗憾的是有的著作中,用《清鉴辑览》所载来描绘慈禧太后当时故作姿态,玩弄权术,那未免有失

① 见左舜生辑:《中国近百年史资料》第452页。

② 《翁同龢日记》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第2册,第1086页(以后只注页数)。

史实。

慈禧太后在同治帝崩逝以后的一二个小时里断然决定载瑾入承大统,并非是一时的“即兴”意见,而是事先的安排,其目的是为了第二次“垂帘听政”,继续控制朝政。在众多的御前大臣面前亮出立同治帝并辈的载瑾来入承大统的底牌,以迅雷之势“压服反对之议”,这位满洲贵族中的女强人在清朝最高统治集团权力之争中又一次取得关键性的胜利。关于满洲贵族内部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濮兰德和白克浩司两位英国作家在《慈禧外纪》一书中有较具体的记述:

倡议立道光子之长孙溥伦嗣位,此说甚为有力,盖立溥伦,则可为同治帝之嗣子也。惟有一事,颇有妨碍者,则以溥伦之父,乃由别支承继者也。当时王公主立溥伦者,力言其合于继序之正。然慈禧已决定揽权之计,虽违犯众意,破坏家法而不顾。慈禧志意刚强,毫不疑虑,专图巩固其政权,凭己之才力威望,以免除一切之障碍。……故慈禧决意立醇王之子,以承大统也。醇王之子,年既幼稚,则已可以重执大权,且得其母为己之妹,则他日帝虽年长,亦可使之恭顺以从己之意也。……恭王之子(实际上是孙——引者),年已十七,如立之,则不久即须亲政,而不便于己也。慈禧知立恭王之子(孙),必须遵循祖宗家法,不能久不归政,若违之,必致群情不服,而平日之与己为敌者,尤可藉以倾事也。以此之故,遂决意不立恭王之子(孙)。”^①

慈禧太后之所以立载瑾为嗣皇帝,更有宗室内其他成员所不具备的特殊条件。首先,载瑾的生父奕统在朝廷所掌握

① (英)濮兰德、白克浩司:《慈禧外纪》,第85页。

的权力远不及恭亲王奕訢重要,而他也在“祺祥”政变时成为慈禧太后最可信的重臣之一。奕訢其人,世故极深,明哲保身,处事圆滑,对于西太后“忠心耿耿,小心翼翼,”因而立了他的儿子当嗣皇帝自然对西太后无所威胁。其次,载殄的母亲醇王福晋那拉氏是西太后的胞妹,她与醇王的婚姻也是由西太后一手促成的。在封建社会里,婚姻关系往往同政治关系连织在一起,用西太后的话讲“且至亲”,^①“幼者乃可教育”,^②所以两代皇帝(光绪和溥仪)都出在奕訢醇亲王府里。总之,立载殄为嗣皇帝是慈禧太后深谋远虑之计,再一次表现出她的胆略与权术。

在御前会议上,慈禧太后当着众臣宣布醇亲王奕訢的儿子载殄入承大统为嗣皇帝,“维时醇郡(亲)王惊遽敬唯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③奕訢如此激动,一是他刚刚才四岁的儿子顷刻间成了万乘之尊的大清朝皇帝,那是连梦中都不敢想的大事件,由于事情来得如此突然而激动不止;二是,他从此成了大清朝的皇父,那末同“垂帘听政”的皇太后,关系又怎样处置妥当呢?天无两日,国无两尊,何况“西太后的手段毒辣,他了解得很清楚,以后切身危机,实属不堪想象。”所以致使“奕訢聚聆之下,吓得昏迷倒地,不能起立。”^④

由谁入承大统闹剧在西暖阁草草收场以后,东西太后即向朝廷内外发布懿旨,立载殄为嗣皇帝。

① 《清朝野史续编》第1种,第1页。

② 《翁同龢日记》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五日。第2册,第1087页。

③ 《翁同龢日记》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第2册第1087页。

④ 恽宝惠《清末贵族之明争暗斗》载《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61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

钦奉慈安端裕康庆皇太后、慈禧端佑康颐皇太后懿旨：皇帝龙驭上宾，未有储贰，不得已以醇亲王奕綏之子载（瑾）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特谕。^①

“懿旨”说得非常圆滑，把“枉国法，犯舆论”^②的粗暴做法披上了一件“顺理成章”的外衣。先说载瑾是咸丰（文宗）帝的嗣子，这样载瑾虽不是皇太子而也可算是皇子和皇弟了，在皇帝“未有贰储”的情况下，“兄终弟及”，既不违背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制度，又合满族的历史传统。再说“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同治帝终于有了子孙后代，舆论上也能搪塞得过去了。

关于德宗（光绪帝）入承大统问题，《光绪朝东华录》在序言中说：“穆宗毅皇帝弥留时，遗诏以嗣皇帝（指光绪帝）仁孝聪明，必能仰承付托，圣怀默契，神气攸归。”^③似乎立载瑾是同治帝生前的决定，很显然“穆宗遗诏”之语，不过是为了证明光绪帝入承大统的合法性而杜撰出来的谎言，不足为信。

慈禧太后为什么立载瑾入承大统，除了上面所述是为了继续“垂帘听政”的目的之外，德龄在《瀛台泣血记》里有独特见解亦不无道理。德龄原系慈禧身边得宠的“女官”，当时虽还未入宫，然她亲身经历宫廷生活，朝夕侍奉慈禧太后二年，因而对慈禧太后的性格和宫廷里面的人际关系比较熟悉，所以德龄关于慈禧立载瑾的心理解释，也有参考价值。现辑录如下：

①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1页。

② 丛刊《戊戌变法》（三）第37页。

③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一）第1页。

“又有不少人以为太后这次的悍然破坏清朝历代惯例,不将应嗣的人继嗣皇位,反使和同治并辈的人出而取代,实在是只为了要满足她自己的野心。她恐怕已经长成的溥伦不肯再俯首听命于她,致使一切的政权,她都不复再能干预。又说太后恐怕嗣立了溥伦,她自己将退为太皇太后,而让同治皇后夺了权去,所以她不肯使比同治晚辈的人嗣位。这个说法,都是绝对不准确的。她这一次的所以要不顾一切,依着她自己的主张去选立嗣君的缘故,是只有一般能够懂得真正的母爱,而且又无丝毫存见的读历史的人,才能体会得到的。总括起来只有一句话,就是她钟爱同治的心过于深切了。

她唯一的目的是要希望同治那一代能够继续的存在下去,犹如她自己没有死去一样。换句话说,就是她希望从另一个和同治平辈的人的身上寻求他儿子的印象,使她可以聊以自慰。”^①

笔者认为慈禧太后选立载_瑾为嗣皇帝,是她的权欲与情感两者揉合的产物。我们还可以从新一代年号“光绪”这个词意中得到解释,即有光大“同治中兴”之意。^②总之,把同治帝载_淳同光绪帝载_瑾从感情上连在一起,人们是可以理解的。

慈禧太后这位满洲贵族的女强人其性格是:凡是她想办的事,非办到不可,而结果也是一定能够办到。在慈禧太后授意之下,由潘佰寅、翁同_龢草拟“懿旨”,戈什爱班策划迎嗣皇帝入宫礼节。派御前大臣及孚郡王等以暖舆往醇王府恭

① 《瀛台泣血记》第40~41页,1980年云南人民出版社。

② “绪”可释为前人未竟之业或连绵不断之意。

迎。翌日凌晨寅刻，嗣皇帝的銮舆入故宫大清门，从正路入乾清门至养心殿谒见两宫太后。四岁的小载瑾在睡梦中被人们连哄带骗地从醇王府迎入皇宫，从此中国封建社会史上又增添了一位娃娃皇帝。

次年，1875年为光绪元年，“戊午（正月二十日）上（载瑾）即皇帝位于太和殿，礼成，颁诏天下，加恩中外。”^①载瑾的登基大典，文献中无详细描写，然而，人们可以想见，同影视剧中所出现的末代皇帝溥仪即帝位时那种可笑又可悲的场面，大概不会有多大的区别吧！

从1875年元月开始，大清王朝进入了第九代皇帝——光绪皇帝的新时期。

载瑾入承大统是名为两宫太后共同的决策，实际上是由慈禧太后一人炮制而成，她这种“枉国法，犯舆论”的不择手段，必然引起朝廷异己势力的不满和对抗。

在慈禧太后独断专横统治下，如果公开表示异议，必身遭横祸，因而凡有异议者，都是在打着忠于同治帝的旗号下表现出来的。内阁侍读学士广安于光绪元年正月十五日（1875年2月20日）上了一个奏折，提出以宋代太宗“传子竟未传侄”的历史教训，提出“即请飭下王公大学士六部九卿会议，颁立铁券，用作奕世良谟。”^②企图用“颁立铁券”作为立法来保证同治帝嗣子的皇位。广安奏折实际上是对慈禧太后继续“垂帘听政”局面的强烈不满。慈禧太后即刻发出“懿旨”，严加训斥说：

前降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

①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25页。

②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22页。

业经明白宣示 ,中外咸知。兹据内阁侍读学士广安奏请
 飭廷臣会议颁立铁券等语 ,冒昧读陈 ,殊堪诧异 ,广安著
 传旨申飭。^①

一下子把异议压了下去。

不久光绪元年二月二十日(3月27日),光绪帝登基大典以后仅一个月,同治帝的皇后阿鲁特氏身亡。阿鲁特皇后的绝食自尽是对慈禧太后不给同治帝立嗣的抗议,也是在慈禧太后专横统治下丧失生活信心的绝望表现。慈禧太后同阿鲁特皇后的矛盾,早在三年以前,即同治十一年选择册立皇后的时候已经发生。当时候选皇后者有二人:一位是侍郎凤秀的女儿;另一位是尚书崇绮的女儿。慈禧喜欢凤秀之女而慈安和同治帝则喜欢崇绮之女,结果册立崇绮之女为皇后,即阿鲁特皇后;凤秀之女立为慧妃。阿鲁特氏“端庄谨默,动必以礼”,唐诗能“背诵如流”,婚后与同治帝“伉俪綢笃”,倍受宠爱。可是,立阿鲁特氏为皇后违背了慈禧太后的意志。所以“不得宠于慈禧皇太后,穆宗崩,慈禧皇太后训责备至。(皇)后本已恻极,誓以身殉,遂不复食,至是,崩。距穆宗之崩未百日也。”^②然而,阿鲁特氏毕竟是同治帝册立的皇后,在宫里有较大的影响,光绪即位时按惯例,两太后封阿鲁特氏为“嘉顺皇后”。尔今又“誓以身殉”,一些不满慈禧太后的人,便借题做起文章,又掀起一场反对慈禧太后的小小风波。当年五月“御史潘敦俨因岁早上言,请更定谥号,谓:‘后崩在穆宗升遐百日内,道路传闻,或称伤悲致疾,或之绝粒霑生,奇节不彰,何以慰在天之灵?何以副兆民之望?’”

①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22页。

② 《清鉴辑览》第24卷第12页。

御史潘敦俨奏请给嘉顺皇后更定“谥号”，实际上借此发泄对慈禧太后不为同治帝立嗣的不满。西太后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她杜渐防微，一旦异己势力抬头，即刻予以严厉打击。慈禧太后对潘敦俨“以其言无据，斥为谬妄，夺官”^①处理同时，“恭上大行嘉顺皇后尊谥曰孝哲嘉顺淑慎贤明宪天彰圣毅皇后。”微小的让步，平息了这场风波。

五年之后，反对慈禧太后不给同治帝立嗣的风波又死灰复燃起来。光绪五年三月间（1879年4月），同治皇帝及皇后于惠陵“大葬”，御史吴可读“自请随赴襄礼。还次蓟州，宿废寺，自缢，未绝，仰药死，于怀中得遗疏，则请为穆宗立嗣也。”^②吴可读以“尸谏”的非常举动抗议慈禧太后违背祖宗“成法”的立嗣方式，其遗疏措辞甚为剧烈。遗疏内容，《实录》未有记载，只含糊其词地说：“据奏内有仰乞我皇太后再降谕旨，将来大统，仍归承继大行皇帝嗣子等语。”^③《清史稿·吴可读传》有避讳之嫌，不便详述，唯日本学者稻叶君山所著《清朝全史》倒有较明确的记载：

吴可读之遗疏有曰：两宫皇太后一误再误，为文宗立子，而不为大行皇帝立嗣。既不为大行皇帝立嗣，则今日嗣皇帝所承之大统，乃奉我两宫皇太后之命而受之文宗者，而非受之于大行皇帝，然则将来大统之归于承继子，自不待言。臣以为不然。今月虽无异议，而将来之纷纭难测，是言也。^④

吴可读在“遗疏”中把皇帝与太后的矛盾揭了出来，并将慈禧

① 《清史稿》第30册，第8931页。

② 《清史稿·吴可读传》第41册，第12462页。

③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741页。

④ 《清朝全史》下册第25页。民国四年中华书局印引。

所谓“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的搪塞之词，亦用“将来之纷纭难测”一言而蔽之。稻叶君山认为“遗疏”“实弹已太后之擅行继承也”^①，此语切中要害。吴可读“尸谏”的剧烈行动“朝野惊愕”，^②自同治帝崩逝以来，反对慈禧太后再度把持朝政的风波发展到了高潮，对西太后来讲确实是一个面临棘手的难题。前面所述的两起小小风波都被她用杀鸡儆猴的手段，镇慑下去，而这次，吴可读已自杀，无鸡可杀了，事情到了极端的地步就难办了。一些朝廷重臣，积多年之经验，深知西太后其人，一旦由她决定的事情，决不允许他人稍有异议，她“因揽权之一念，虽牺牲一切而不顾。”^③所以，她的亲信廷臣，纷纷上奏顺着西太后的的心思搬出“世宗宪皇帝治谋之善，超反古而训来兹”的立嗣理论（即不预立皇储的家法）来证明两宫太后的立嗣决策“以祖宗之法为法，即以祖宗之心为心”是“揆诸前谕则合，准诸家法则符”^④的“大计”，无可非议。经这批亲信廷臣的一番粉饰，非法变成了合法，慈禧太后便将计就计下了一道懿旨：“所有吴可读原奏及王大臣等会议折徐桐、翁同龢、潘祖荫、联衔折宝廷、张之洞各一折并闰三月十七日及本日谕旨，均著另录一分存毓庆宫。至吴可读以死建言，孤忠可悯，著交部照五品官例议恤。”^⑤慈禧太后又以两面三刀的手段将这次风波平息下去。从此以后，宫廷内外再没有人对慈禧太后擅立皇嗣的做法提出异议了。然而，这一系列的风波虽没能摇撼慈禧的铁腕统治，但也给清统治集团内部潜

① 《清朝全史》下册第25页。

② 《清朝野史续编》第一种，第5页。

③ （英）濮兰德、白克浩司《慈禧外记》第82页。

④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741～742页。

⑤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749页。

下了派系斗争的暗流。

四、垂帘听政

年仅四岁的小载湉入承大统，在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下当了十二年的小皇帝。慈禧太后两度“垂帘”，掌握清朝大权长达半世纪之久。^①

同治皇帝病重期间，慈禧太后已有“垂帘听政”的心机，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五日（1875年1月12日）“酉刻，帝崩逝，戊正太后召见诸臣入，谕云，此后垂帘如何？”^②此时已亮出“垂帘听政”的打算。次日（六日）载湉被抱入紫禁城入承帝位。当日礼亲王世铎等当即上奏：“伏思嗣皇帝尚在冲龄，一切应办事宜，惟赖皇太后亲加裁决，庶臣下有禀承，俟奉有谕旨，再将垂帘章程悉心妥议具奏。”^③要求慈禧太后再度“垂帘听政”。世铎等人的奏疏，正合慈禧太后的心怀，她马上以两宫名义于十二月初七日下午“懿旨”宣称：

“览王大臣所奏，更觉悲痛莫释，垂帘之举本属一时权宜，惟念嗣皇帝此时尚在冲龄，且时事多艰，王大臣等不能无所禀承，不得已姑如所请，一俟嗣皇帝典学有成，即行归政，钦此。”^④

① 慈禧太后两次“垂帘听政”，第一次在同治元年至同治十二年（1862～1873），第二次在光绪元年至光绪十三年（1875～1886），以后又二年“训政”至光绪十五年，光绪帝“亲政”以后，大权仍控制在慈禧太后手中，故掌大权长达四十七年。

② 《翁同龢日记》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五日。第2册第1086页。

③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4页。

④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4页。

同时,慈禧太后又以世事不省的小皇帝名义发出“上谕”:

本日据王公大学士六部九卿等奏请吁恳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一折,朕恭呈慈览。……祇承懿训,寅感实深。因思朕以薄德藐躬,钦承两宫皇太后懿旨入承大统,诞膺景命。仰荷大行皇帝付托之重,遗大投艰,兢兢在疚,幸赖两宫皇太后保护朕躬,亲裁大政,……朕实有厚幸焉。所有垂帘一切事宜,著该王大臣等妥议章程,详细具奏,将此通谕中外知之。^①

正式向全国挂出了两宫太后再度“垂帘听政”的牌子。第二次“垂帘章程”其名文内容不载于文献,无从考究有何新的涵义。然而,慈禧太后亮出再度垂帘听政旗号以后,似乎希图要在皇位转递之际,对清王朝的统治政策作一番改弦更张的革新,以巩固和发展“同治中兴。”据文献所载,其时两宫太后发布了一系列的“懿旨”,颇有弃旧图新之势,综其旨要,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曰:“广开言路,谏议时间”。懿旨宣称两宫太后“万几综理”因而需要“兼听并观,以通上下之情,措施方期悉当,”所以号召内外工臣,“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当据实直陈,务期各抒所见。与时事有裨而又实能见诸施行者,详细敷奏,不得徒托空言。”^②旨在弥合“入承大统”所引起的清朝最高权势集团中的分歧,重新调整其亲疏关系。

二曰:“敦崇节俭,力祛浮华”。去奢崇俭宜始自宫中,因

①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4页。

②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8~9页。

之凡“纷华浮丽之品以及目玩好之娱，一概不准呈进。”^①一切服用之具，俱以朴实为先，大小臣工各当振刷精神，以造成移风易俗的风尚。

三曰：“勤求闾阎疾苦，加意抚恤”。近来各省时有偏灾，疮痍未复，民生凋敝，各省“督抚当仰体朝廷爱民之心，勤求闾阎疾苦，加意抚恤。如清讼狱勤缉捕并办赈积谷等事，均宜饬地方官实力奉行。大吏以此考察属员，朝廷即以此考察大吏。”^②希图稳定封建秩序。

四曰：“各省营伍，整顿训练，以备不虞。”修明武备，悉力剪除积重陋习，做到“一兵可得一兵之用，而饷亦不至虚靡。”^③以整顿被太平天国起义击溃的武装力量。

五曰：澄清吏治，“各省督抚秉公考核，随时认真整饬以挽颓风。”“留心选举，任用贤能，”^④毋得以粉饰塞责，致负委任。

以上五条根本没有涉及封建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方面的改革，因而也不是治理清朝腐败的根本措施。但是，如果这些治标措施能够付诸实施，当然也可以使即将就墓的清王朝得以一定程度的回光反照，尚能作出一时的“中兴”姿势。然而，对于热衷于权力的慈禧太后来讲，这些只不过是旧店新开，装饰门面的官样文章而已，实际上却毫无踪影，成为一纸空文。

慈禧太后再次垂帘听政初期，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重新调

①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9页。

②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9页。

③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9页。

④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9页。

整她的亲疏关系,排斥异己势力。早在“祺祥”政变的时候已经形成了她的亲信集团,可是至今已有十三年了,其集团中各成员的势力消长是不平衡的,而西方列强在华力量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他们各自在清朝统治集团中都有其利益的代表人物。清朝统治集团中的官僚重臣,他们以列强为后盾,争权于朝廷,尤其在这次同治皇帝去世,由谁来“入承大统”的关键时刻,满洲贵族集团内部的矛盾已露端倪,形成权力重新分配的趋向。慈禧太后再度垂帘听政的闹剧虽然在众大臣的歌功颂德声中缓缓落下帷幕,可是异己势力的亮相使她深感不安,因而亲疏关系的重新调整是慈禧太后加强统治权力的首要大事。

宗室内部的异己势力使她感到是最危险的隐患。慈禧太后十三年苦心经营,虽权力倾世,然“垂帘听政”在清朝两百多年的统治史上,既无先例可稽,也无典章可托,连她自己也不理直气壮,再三声称“垂帘听政之举,本属一时权宜”,“一俟嗣皇帝典学有成,即行归政”。^①这种不合“祖宗家法”的“创举”随时有被否定的可能,而这种可能性必然来自宗室内部,其首要角色就是那位掌握相当权力的恭亲王奕訢。

奕訢是慈禧太后发动“祺祥”政变的核心人员,因而为慈禧太后所倚重,“授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命王爵世袭,食亲王双俸”,兼领宗人府、神机营等宫廷内外要职。^②奕訢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还代表清政府分别同英、法等列强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满足了列强提出的许多过高要求,又首

①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4页。

② 《清史稿·奕訢传》第30册,第9106页。

创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掌握“洋务”大权,颇得列强的欢心。他居功自傲,与“深宫”分庭抗礼的势头逐渐显露。同治四年三月,“两太后谕责王(奕訢——引者)信任亲戚,内廷召对,时有不检,罢议政王及一切任职”^①然而,奕訢在朝廷的势力已经尾大不掉,其党羽纷纷为他“奏请任用”,慈禧太后瞻前顾后,觉得打击奕訢势还为时太早,只得暂时妥协,“命(奕訢)仍在内廷行走,管理各国事务衙门”,“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②被割职务,几乎均得到恢复。此后,双方矛盾更纵深地发展着,各备戒心,以应付突然事变。慈禧太后一面继续任用奕訢,一面物色对象以取代奕訢的地位。新的对象,必须从满洲亲王中选择,最恰当的人选莫过于醇亲王奕诼和礼亲王世铎两位。慈禧太后采取一个极高明的办法,即“以两代一”,这样把奕訢的权力一分为二,两人得恩后必然死心塌地地为她效力,而以二分权又能相互制约,可避免集大权于一人的教训,不重蹈奕訢抗争的复辙。

醇亲王奕诼除了他明哲保身的性格和与慈禧太后的特殊关系以外,还有一个奕訢所不及的重要条件,就是“皇帝生身父亲”,因之他凭在“黄带子”中的优越地位,完全可以同奕訢抗衡。尽管他的儿子载湉“入承大统”时奕诼辞去一切职务,可是不久,慈禧太后又不断加强了他的权力,先后“赐食亲王双俸”、授命参予军机处决策,总理海军事务,以钳制和逐渐分割奕訢的军政权力。

礼亲王世铎,虽不是宗室直支,但也是“黄带子”身份,同

① 《清史稿·奕訢传》第30册,第9106页。

② 《清史稿·奕訢传》第30册,第9106页。

治年间“授内廷大臣，右宗正”，^①是满洲贵族集团中的后起之秀。世铎其人，灵活圆滑，善观气候。当小载殪入承大统之时，是他第一个上奏疏请求两宫太后再度垂帘听政，迎合了慈禧太后的需要，得到深宫的欢心和器重，从此世铎挤身于慈禧太后的亲信圈子，地位日趋显要。

光绪十年(1884)慈禧太后认为剪除恭亲王奕訢势力的时机已经成熟，是年三月决定对清朝发号施令的中枢机构——军机处班子进行全面的调整，以逐出奕訢势力于最高统治集团。先是发出懿旨说：

恭亲王奕訢等，始尚小心匡弼，继则委蛇保荣。近年爵禄日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屡经言者论列，或目为壅蔽，或劾其委靡，或谓簠簋不饬，或谓昧于知人。本朝家法綦严，若谓其如前代之窃权乱政，不惟居心所不敢，亦实法律所不容。只以上数端，贻误非浅鲜。^②

指责奕訢等人是清朝“振作求治”的阻力，国家大事“贻误非浅鲜”，故断然决定“著加恩仍留世袭罔替亲王，赏食亲王全俸，开去一切差使，并撤去恩加双俸，家居养疾。”^③完全、彻底地把奕訢清除出清朝权力机构之外。

同时，对奕訢觉羽及贯彻“懿旨”不力的各部要员，如：大学士宝焯、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李鸿藻、兵部尚书景廉、工部尚书翁同龢等也以“办事竭蹶”、“年老多病”、“经济非所长”等等理由，分别作出“开去一切差使”、“原品休致”、“降级调

① 《清史稿·世铎传》第30册，第8980页。

②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二)总第1675页。

③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二)总1675~1676页。

用”等处理。把奕訢势力逐出中央要职之后,立即安插亲信取而代之。授命“礼亲王世铎著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均著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工部左侍郎孙毓汶著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调徐桐为吏部尚书”;又特命“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著会同醇亲王奕綏商办。”^①经这番大调整以后,慈禧太后的亲信集团的成员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一批新的亲信,不仅对慈禧太后的懿旨唯命是从,而且得心应手,标志着慈禧太后的权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进一步的巩固与加强。

慈禧太后亲信集团的大调整,也反映了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向着更深的层次发展。奕訢势力盘根错节,他们也不肯就此罢休,当即予以抵制。慈禧太后懿旨发出不久,左庶子盛昱、右庶子锡钧、御史赵尔巽等纷纷上奏,抬出“本朝自设立军机处以来,向无诸王在军机处行走”的成例,“伏恳(太后)收回成命”;企图阻止奕綏和世铎进入军机处班子。慈禧太后断然回答,“在廷诸臣,自当仰体上意,毋得多读,盛昱等所奏应毋庸议。”^②把异己势力压了下去。这次亲信集团的新调整,给光绪皇帝亲政以后行使权力,设置了暗礁,也给戊戌新政的命运投下了阴影。

威胁慈禧太后专权独裁的异己力量,除了宗室内部的奕訢以外,在宫内慈安太后的力量也有非常直接的制约作用。因之,在剪除恭亲王奕訢势力的同时,也把打击的矛头指向慈安太后。

①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二)总1676页。

②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二)总1682页。

慈安太后,钮祜禄氏,广西右江道穆扬阿女,早年入宫,咸丰二年(1852)封贞嫔,进为贞贵妃,立为皇后。同治即位尊为“母后皇太后”,因寝居东宫故称她东太后,与慈禧太后共同“垂帘听政”。慈安太后“正位中宫”而于咸丰帝生前就立为皇后,故在满洲贵族中颇受尊敬。当时有“东宫优于德”,“西宫优于才”之传,连得慈禧太后的亲生儿子,同治皇帝也是“亲东宫而疏西宫”。慈安太后也并不是毫无权欲的人,只是比起慈禧太后来说,稍为“谦谨”和“不轻发言”而已。^①在同治年间的第一次“垂帘听政”期间,不少重大的“用人行政”决策出自东太后。如提携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和协办大学士,授命太常寺卿李棠阶为军机大臣;又以“失陷封疆”罪斩两江总督何桂清,将骄蹇贪淫的胜保逮下刑狱赐死;支持山东巡抚丁宝桢“就地正法”慈禧太后的心腹太监安德海。所以东宫皇太后在朝廷众臣中享有极高的威望,“东宫偶行一事,天下莫不额手称颂”,“凡天下军谋吏治及总督巡抚之黜陟,事无不谘,言无不用,中兴之业,于是乎肇矣。”^②东宫太后在朝廷上下,宫廷内外崇高的威望是慈禧太后行施独裁统治的障碍,也是她巩固权力的极大隐患。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同治皇帝年岁的成长,两宫太后之间的矛盾日渐显露并且愈益激烈,最突出地表现在为同治帝选皇后和斩安德海两件事情当中。慈禧太后“独喜”侍郎凤秀之女,慈安太后和同治帝喜侍郎崇绮之女,并立为皇后。这事件是同治帝“亲东宫而疏西宫”的公开亮相,慈禧太后以皇

① 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第56卷,第3页。

② 《清朝野史大观·清宫遗闻》第1册,第69~70页。

帝生母的优势有丧失的危险。即着是慈安太后支持山东巡抚丁宝桢斩太监安得海,这事件是同治皇帝同慈安太后携起手来,对付慈禧太后的一次挑战。这两件事情都是以慈禧太后失败为结果,反映宫廷内部的斗争由隐蔽到公开,并导向剧烈。这场斗争促使慈禧太后下决心除掉慈安太后。然而,要消灭东宫势力是极不容易的,慈禧太后只能忍耐韬晦,等待时机。

同治帝崩逝,对慈安太后极为不利,失去“挟天子以令诸臣”的优势。慈禧太后立了她的外甥载瑾为嗣皇帝,并且同皇父醇亲王奕訢结为同盟,扭转了不利局面,在宫廷、在宗室,她的力量更加巩固,更加雄厚。到了光绪初年,慈禧太后除掉慈安太后的形势逐渐成熟。

载瑾入宫以后,慈安太后对小皇帝施以恩惠,随着光绪帝年岁的成长,他同慈安太后的感情也越来越亲切。慈禧太后惟恐同治帝“亲东宫疏西宫”的情形在光绪亲政以后再度出现,从而失去“独尊”地位,因此必须刻不容缓地清除慈安太后,防患于未然。两宫矛盾的加剧,濮兰德和白克浩司有这样的一段记述:

光绪帝渐次长成,颇与慈安太后相亲,当时宫中人同此传说”。盖慈安性情和悦,不似慈禧之严厉,故得幼帝之亲爱。帝年尚幼,任其天真而动,常往东宫与慈禧较疏。慈禧深滋不悦,以为幼帝之心,向于东宫,殊不能忍。且有人进谗言,东宫阴令帝反对慈禧。以此之故,两宫意见愈深矣!^①

① 《慈禧外记》第105页。

突然事件终于发生了。光绪七年三月十日(1881年4月8日)东宫慈安太后暴死,这同慈禧太后的阴谋有关。东太后年仅四十五岁,“体气素称强健。”^①而此时慈禧太后倒患病不起,“自上年春间圣体违和”,“叠经太医进方调理,尚未太安。”^②佯作病态,扰乱视听。在慈禧太后患病期间,由东太后“独视朝”,逝世那天早晨,她还“召见军机御容和怡无疾色”,^③不料下午竟突然“暴死”,朝廷上下俱感惊讶!这位“常见动履康强,所宵勤政”的皇太后悚然“仙驭升遐”,连得刚刚开始懂事的光绪皇帝也感到疑惑不解,“朕心实所难安。”^④令人更觉蹊跷的是东太后去世后,慈禧太后当即传命枢府及亲属到她的寐宫略经“瞻视”,匆忙“小殓”,亦“未闻太医”对病情死因的诊断结论。由于东太后死得突然,而疑点种种,所以宫廷内外传闻四起。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说:

咸丰去世前就担心懿贵妃将来母以子贵做了太后,会持尊跋扈,那时皇后(指慈安太后——引者)必不是她的对手,因此特意留下一道朱谕,授权皇后,可在必要时制裁她。生于侯门而毫无社会阅历的慈安,有一次无意中把这件事向慈禧泄露出来。慈禧从此下尽功夫向慈安讨好,慈安竟被她哄弄得终于当她的面前烧掉了咸丰的遗诏。过了不久,东太后就暴卒宫中。有的说是吃了

① 《清德宗实录》128卷,第6页。

②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936,1124页。

③ 《清朝野史大观·清宫遗闻》第1册,第86~87页。

④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1065页。

慈禧送进去的点心 ,有的说喝了慈禧亲手做的什么汤。^①

当然 ,传闻不能作为研究历史的信据 ,不过对照种种蹊跷迹象 ,我们也不能排除心毒手狠的慈禧太后的阴谋活动。

光绪七年慈安太后去世 ,结束了清王朝自同治元年以来形成的由东、西“两宫垂帘”的局面 ,以后“垂帘听政”唯慈禧太后独尊 ,到光绪十年(1884)恭亲王奕訢^②势力被剪除 ,慈禧太后登上了清朝权力的顶峰。所以光绪十三年“亲政”以后 ,清朝的统治机制仍在她的权力轨道上运行。

^① 溥仪 :《我的前半生》第9~10页。

第三章 宫廷里的童年

第一节 慈禧太后的宠儿

童年时代的光绪皇帝 ,平心来说 ,他是慈禧太后的宠儿。载殪为嗣皇帝 ,是她最理想的、也是最适当的选择 ,从载字辈而论 ,载殪所具备的对她有利因素 ,是宗室中其他人所不能及的 ,因之 ,小载殪入宫以后慈禧太后关怀备至。她曾追述载殪入宫时的爱护情形说 :

外间疑我母子不如初乎 ? 试思皇帝入承大统 ,本我亲侄(满族称母家外甥谓侄——引者)。以外家言 ,又我妹妹之子 ,我岂有不爱怜者 ? 皇帝抱入宫时 ,才四岁 ,气体不充实 ,脐间常流湿不乾 ,我每日亲与涤拭 ,昼夜常卧我寝榻上 ,时其寒暖 ,加减衣衿 ,节其饮食。皇帝自在邸(醇亲王邸第——引者)时 ,即胆怯畏闻声震 ,我皆亲护持之。我日书方纸课皇帝识字 ,口授读《四书》、《诗经》 ,我爱怜惟恐不至 ,尚安有他 ?^①

慈禧太后抱四岁的小载殪入宫为嗣皇帝 ,不尽为了继续维持垂帘听政”的局面 ,更有其深谋远虑 ,就是永远成为(直到老死)主宰朝政 ,驾驭皇帝的太上皇。因为慈禧太后控制

① 瞿鸿机 :《四种纪略》丛刊《戊戌变法》(四) ,第 223 页。

政权的希望全寄托在载殓身上,所以她对小皇帝“自四岁入宫,调护教诲,耗尽心力,”^①力图培植起同皇帝的特殊感情。

载殓作为咸丰皇帝嗣子而入宫继承皇位的,慈禧太后也就成了嗣母。然而,从载殓进宫以后,她一再嘱咐宫里的太监和宫女,“必须教导光绪称她‘亲爸爸’,她非但要做爸爸,简直还要做亲生的爸爸咧!”^②这位满洲贵族中的女强人,其性格非常特别,她一心想当统治中国的大清皇帝,因之也就一心想做男人。“并且她时常很骄傲地说,她把大清帝国统治得非常出色,决不逊于任何一个男性的统治者,如今有人可以叫她‘亲爸爸’了,她久欲转女为男的愿望,可说是‘得此差足自慰’了。后来这个称呼便始终沿用着,直到光绪长大成人,还是叫慈禧为亲爸爸。”^③人们可以从小载殓对慈禧太后异乎寻常的称呼小看出,她对小皇帝的宠爱程度。小载殓离开醇王府,慈禧太后不顾人世间的骨肉之亲,强行切断载殓同生身父母的血缘感情,无论对小皇帝,还是对醇亲王奕訢和他的福晋,都是难以忍受的悲剧。可是在封建社会宗法制度的精神罗网里生活着的爱新觉罗皇族,这种为了大清王朝基业的延续,忍痛割爱,对其每一成员来说都是应该而且能够做到的事情,何况历史上此类“割爱”并不鲜见。故所以笔者认为没有必要用过份的笔墨去描绘和指责慈禧太后夺人骨肉的不道德手段。

清末民初的一些史著中有与上述内容完全不同的记载,在这里有必要作些澄清,以免谬误史事。

金梁所辑《四朝佚闻》·《德宗》一节中有“帝慑于积威,

① 费行简:《慈禧传信录》,丛刊《戊戌变法》(一)第466页。

② 德龄:《瀛台泣血记》,第52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

③ 德龄:《瀛台泣血记》,第52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

见太后辄战激”^①之语,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一文中说:

西后待皇上无不疾声厉色,少年时每日诃斥之声不绝,稍不如意,常加鞭鞑,或罚令长跪,故积威既久,皇上见西后如对狮虎,战战兢兢。因此胆为之破。至今每闻锣鼓之声,或闻吆喝之声,或闻雷辄变色之。皇上每日必至西后前跪而请安,惟西后与皇上接谈甚少,不命之起,则不敢起。……每日必跪至两点钟之久,始命之起。^②

这段文字,似乎慈禧太后从来就不喜欢光绪皇帝,因而导致后来“戊戌政变”,禁锢光绪帝于瀛台,直至死去。梁启超记载的上述内容是从一位名叫寇连材的宦官所记“宫中轶事”里摘录而来的。

义烈宦官寇连材者,奏事处太监也。初为西后服役,西后深喜之,因派令侍皇上,盖欲其窥探皇上之密事也。寇连材深明大义,窃忧时局,一日忽涕泣长跪于西后之前,极言皇上英明,请太后勿掣其肘,又言国帑空虚,请太后勿纵流连之乐,停止园工,并参劾西后信用之大臣。西后大怒,即日交内务府慎刑司下狱,翼日不待讯鞠,即行处斩。^③

在宫里有这样一位“深明大义”的爱国太监,敢于在西太后前犯颜极谏,而遭致“斩首”之罪,酿成“皇上闻之为之掩泪,北京志士莫不太息”^④轰动京师事件。然,在清朝宫廷生活中,寇连材的“义烈”举动是很难发生的。清朝有严禁宦官

① 丛刊《戊戌变法》(四)第221页。

② 丛刊《戊戌变法》(一)第256页。

③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丛刊《戊戌变法》(一)第258~259页。

④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丛刊《戊戌变法》(一)第258~259页。

干政之例,早在顺治十二年(1655)于交泰殿铸铁牌曰:“以后有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属托内外衙门,交结满、汉官员,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贤否者凌迟处死。”^①寇连材的“极谏”,内容大大超越了铁牌所禁之例,不仅“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贤否者”,而且指责西后纵乐,真是胆大妄为,慈禧太后以“即行处斩”的发落,应该说比之“凌迟”来,还算是宽大了他。西太后身边曾经有过安德海和李连英这样的心腹太监,但他们也只能狐仗虎威在宫里作威作恶,还不敢“越分擅奏外事”,安德海为慈禧太后往南方织办龙衣,被山东巡抚丁宝桢以“袒制不得出都门”之罪,“就地正法”。尔今寇连材者竟在慈禧太后的“泰岁头上动土”,真是不可思议。梁氏在《戊戌政变记》中所引之材料是不可信的。梁启超乃戊戌变法的主将,他憎恨镇压维新运动罪魁——慈禧太后,因此在《戊戌政变记》一文中取材挟着感情色彩,人们是容易理解的^②。为了说明慈禧太后素来就是光绪皇帝的压迫者,所以把经不起推敲的野史记载,信手拈来引入著作。然而,现今我们应该超脱梁氏的恩怨感情,实事求是地、客观地说明太后与皇帝的关系,把早期之关系同后期之关系区分开来,载殪入宫至亲政的十二年间,慈禧太后是宠爱光绪皇帝的。

在宫廷的童年生活里,慈禧太后不仅于日常起居中对小载殪关怀备至,而且对于他的成长也为之精心设计,周密安排。

小载殪虽然生在宗室之家,贵为亲王之子。但是他家的

① 《消史稿·职官志五》第12册,第3443页。

② 梁氏自己也承认《戊戌政变记》带着感情色彩,他说:“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见《饮冰室合集》专案73,第91页。

华贵决不能同君临天下的“万岁爷”相比较。从他入宫那天始,就要让四岁的小载殪懂得“万岁爷”的尊严。慈禧太后“特地嘱咐那几个被指定着服侍光绪的大太监,要他们必须尽力设法教导小载殪,使他知道自己的尊严。”^①光绪帝从登极大典结束后回到寝宫,周围的一群太监七张八嘴地告诉他说:“皇上,从今以后,你必须这样做、那样做,……因为你如今已是我们的万岁爷了。”^②小载殪尽管不知道“万岁爷”这个词含着何等尊严的意思,但在宫里,除了两宫太后之外,对其他任何人都可直呼其名,不管此人年龄多大,辈份多长,见了四岁的万岁爷都得下跪叩首行礼,登极大典那种众大臣齐齐下跪,连声欢呼皇上万岁、万万岁的场面,深深地印入脑海,映在眼帘,所以小载殪的心灵里,万岁爷至高无上的观念,很快地确立起来了,宫里唯我独尊,亲政以后向全国发号施令就是理所当然,礼所必行。

清宫有严厉管束太监的传统,而小皇帝身边大小太监形影不离,他们的品行必然潜移默化地影响小载殪的成长,慈禧太后对近侍太监的挑选十分谨慎,载殪进宫才十多天,两宫太后发布懿旨:规定光绪帝的“所有左右近侍,止宜老成质朴数人,凡年少轻佻者,概不准其服役。”^③内务府遵照懿旨,严格挑选一些“老成质朴”的太监,近侍皇帝,其中有一位名叫王商的太监,成了光绪帝的心腹。^④

内务府是清朝所特置的管理宫内事务和管教太监的专门衙门,也是小皇帝成长的重要环境。载殪入宫不久,慈禧

① 德龄:《瀛台泣血记》第53页。

② 德龄:《瀛台泣血记》第53页。

③ 《清德宗实录》第2卷,第12页。

④ 参见德龄:《瀛台泣血记》。

太后就注意整顿内务府。总管大臣是内务府的最高官员,掌理内宫政令和财政开销。其时,都察院御史李宏谟上奏朝廷,弹劾任总管大臣的贵宝和文锡二人,奏疏称:“今皇上尚在幼冲,皇太后训政伊始,亲君子远小人,尤为今日之第一要务,……今日之所共指为小人者,莫如总管内务府大臣文锡、贵宝。”并列举文锡“浮冒中饱”,贵宝徇护革员李光昭“报效不植”一案等罪行,要求对他们以革职处分。^①文锡不久前在西暖阁御前会议上首起发难,提出“请择溥字辈之贤者而立”的主张,气得慈禧太后当即“色变”。^②因之,西太后怀恨于心,如今御史李宏谟上奏弹劾,正是报复的好机会。所以两宫即下懿旨说:“该二员本属声名平常不能称职之员,贵宝、文锡著即行革职。”^③这事件的处理,既打击了异己者,又能整饬内务府,收到了一箭双雕之效。此举不久,慈禧太后又多次发出懿旨整顿内务府。指出:

我朝列圣,家法相承,整饬宦寺,纲纪至严。乃近来太监中竟有胆大妄为,不安本分,甚或遇事招摇与内务府官员因缘为奸,种种营私舞弊,实堪痛恨。……并著总管内务府大臣查该衙门官员中有结交太监通同作弊等劣员,即行据实指名严参,倘敢胆徇情面,意存护庇,别经发觉,定惟总管内务大臣是问。^④

因势利导,在经济上也加以整顿:

内务府向有应用经费,与部库本属判然。嗣后著总管内务府大臣将应入专款认真整顿,应用各款加意撙

①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12页。

②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12页。

③ 《清鉴辑览》第24卷,第12页。

④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12页。

节,量入为出,不得动辄奏请借拨部款。……该衙门司
员倘有浮冒情弊,即著随时查明严参惩办。^①

慈禧太后整顿内务府,目的是为了给小皇帝净化环境,防止不良习俗污染小载湉的身心。这方面的意向,她是说清楚的,在关于内务府的懿旨中,几乎每发一篇,慈禧太后总是首先强调:“皇帝尚在冲龄养正之功,端宜讲求。”^②表明她要求小皇帝严格地按照自己设计的模式成长,从精神上塑造大清皇帝,这就是她宠爱光绪帝的根本用心所在。

第二节 “典学授读”

历代封建王朝都十分重视对皇帝接班人的教育。自西周以来,历朝均有按照宗法嫡长原则,预先确立皇太子制度,所以对未来的皇帝也有专门的教育机构和教育制度,进行特殊的教育以培养封建王朝的“明君”。西周就有“帝入东学,上亲而贵仁。入西学,上贤而贵德。入南学,上齿而贵信。入北学,上贵而尊爵。入太学,承师问道。”^③根据王帝不同的年岁进行“仁”、“德”、“信”、“礼”、“智”等诸方面的专门教育。王宫专设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三师)辅导太子读书的职官。清朝因无预立皇太子制度,因而也不设帝师专职(清代三师为朝廷荣典而设的虚衔),只置“上书房”于乾清宫左侧为皇子读书的地方。然,同治、光绪两帝都是

75

①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33页。

②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12页。

③ 《太戴礼·保傅》。

“冲龄践祚”故以弘德殿和毓庆宫^①为皇帝授读书房。载殄入宫即帝位一年之后,明年就到了入学读书的年龄(六岁),于是在光绪元年十二月,慈禧太后对光绪帝的“典学”作了慎重的部署。十二月十二日两宫“懿旨”宣告:

“皇帝冲龄践阼,亟宜乘时典学,日就月将,以裕养正之功而端出治之本。著钦天监于明年四月内选择吉期,皇帝在毓庆宫入学读书。著派署侍郎内阁学士翁同龢、侍郎夏同善授皇帝读书,其各朝夕纳诲,尽心讲贯,用收启沃之效。皇帝读书课程及毓庆宫一切事宜,著醇亲王妥为照料。至国语、清文,系我朝根本,皇帝应行肄习。蒙古语言文字及骑射等事,亦应典肄,著派御前大臣随时教习,并著醇亲王一体照料。

对入学日期、帝师、课程等都作了具体规定,并命醇亲王奕訢总掌毓庆宫一切事宜。“钦天监奏选择入学吉期一折,著于明年四月二十一日皇帝入学读书,”^③光绪帝入学读书事宜基本安排就绪。

任何时代,教育都有其明确的政治目的,光绪皇帝“典学”是以继承大清基业为其出发点,从而进行精神塑造。所以除了选择帝师和课程安排以外,还得整肃教育环境,防止宫廷陋习劣俗的污染。数天以后(十二月十八日),慈禧太后又降“懿旨”指出:

皇帝于明年四月入学,允宜黜邪崇正,日进缉熙,所有毓庆宫一切事宜,前经降旨命醇亲王妥为照料。其随侍太监,自应慎选恂谨老成之人以供服役。著该王等随

① 毓庆宫原是嘉庆皇帝的寝宫,于斋宫右侧。

②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165页。

③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总第169页。

时稽查,如有积习未化,前后易辙者,即立予重惩,用示杜渐防微至意。^①

慈禧太后对光绪帝“典学”的重视和周密安排,并不能“说明西太后在光绪帝身上存在不可告人的隐秘心理”。这是每一代封建王朝乃至每一个地主官僚为了“荣宗耀祖”都要这样做的,无须过多指责。

光绪皇帝早在醇亲王府邸第已进行启蒙识字教育,如今是以皇帝“典学”名分,其所授课程有特殊的要求。他六岁授读,至十六岁“亲政”(1876~1886)的十年间,所授的课程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汉文:《钦定四书》为主要教材,此外有《诗经》、《二十四孝》和《孝经》、《左传》、《列圣遗训》等儒家经典及清朝历史《开国方略》。

(二)清文、蒙文:主要是满文《满洲实录》(图文并列)、清世祖御制《劝善要言》^②以及蒙古语言文字,师傅(教师)称谥达。

(三)“骑射技勇”^③,师傅(教师)称外谥达。

光绪二年四月二十一日(1876年5月14日),是钦天监选定的“入学吉期”,小皇帝载湉于是日入学授读。清晨(寅时正),帝师翁同龢与夏同善于“上书房”恭候。卯时正,光绪帝“诣圣人堂行礼”(向孔子像行礼),至毓庆宫,两位帝师及随侍大臣向皇帝“行三跪九叩,礼毕”赐坐。简单的“典学”仪式后由帝师给皇帝授课。其时,恭亲王奕訢传两宫懿旨曰:“上(光绪帝——引者)连日体不甚适,功夫不过一二

① 《清德宗实录》第24卷第20页。

② 《劝善要言》一书,原只满文,光绪十七年翻译为汉文。

③ 徐珂辑:《清稗类钞》第4册,“礼制类”,第2页。

刻可退。”^①开学的当天读汉书四句即止。

光绪帝入学以后，“颖悟好学”^②，“行、立、坐、卧皆诵《书》及《诗》”。^③“记忆力很强，天性又很欢喜读书，所以无论是答复翁同龢提出的问题，或是背诵已经念过的书，他都能应付裕如”。^④翁同龢每天讲读《四书》一般四到六句，即着就是练习大小楷若干张，“写仿皆佳（即描红大楷字）”^⑤。给光绪帝授课的师傅主要是翁同龢一人，“因子松（夏同善字子松，浙江仁和人——引者）口音不对，故特命摄教读了”^⑥，“摄教读”即辅导授读，夏同善浙籍乡音较重，光绪帝身居深宫不接触宫外世界，当然不易听懂浙籍乡音，故唯翁同龢一人执教授读。

光绪帝读书可谓是口到心到，从小就不死“啃”书本。一次课本上有“财”字，翁师讲解字义，光绪帝指书内“财”字曰：“‘吾不爱此’”，又曰：“‘吾喜俭字，此真天下之福矣。’”^⑦年仅六岁的小载湉，喜俭不爱财，志向高尚，所以他在“亲政”以后，关心民众疾苦，乃至以后树立雄心，变法图强，表明自幼就有较深的思想根底。据外人记述“除通常的科目外，载湉曾由在同文馆学习过的两个学生教授英语。”光绪七年十月开始授《开国方略》，八年正月授《左传》，其时，

①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年四月二十一日。1925年商务印书馆影印手稿本（以后从略只注年月日）。

②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见左舜生辑：《中国近百年史料初编》第486页。

③ 《翁同龢日记》光绪三年正月十九日。

④ 德龄：《瀛台泣血记》第113页。

⑤ 《翁同龢日记》光绪三年正月十七日。

⑥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年五月初十日。

⑦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年五月廿四日。

载殓年方十一、二岁 ,略明人间世事。然而 ,皇帝是人而不是神 ,光绪帝同普通人一样 ,也有他的喜怒哀乐 ,更有孩子的贪玩心思。小载殓体质虚弱 ,入宫以后失去父母之爱的天伦之乐 ,每天必去两宫“请安” ,应酬召见和祭天祀祖等繁礼褥节 ,常常使他精疲力尽。每天授读 ,课目不断增添 ,适逢严师 ,背诵、朗读不下一二十遍 ,大小楷至少十几张 ,小载殓不胜负担 ,有时“静坐不开口” ,无精打采。翁同龢在光绪七年十月初四日的日记中写道 :“上近来不平之意居多 ,从不肯自悔。臣等云将启奏 ,亦毫不介意 ,此关系圣德者大矣。”这位一丝不苟的帝师焦急万分。数日以后(十月十五日) ,慈禧太后召翁同龢等至东暖阁询问皇帝学业 ,光绪帝也在座 ,帝师翁同龢如实对云 :

近来心不专一 ,功课有减无增 ,并满书不读诸情形。

太后怒以训 ,词急切。上为之悚勤。次述一年中病状云 :“近来肝胃弱 ,腹中不调 ,脊背仍热 ,记性健忘。”^①

受到慈禧太后的训斥 ,光绪帝很不愉快 ,次日(十六日)“授读”“满书不开口……勉强写清字一行。……忽涕下 ,遂不可收拾。余(翁同龢——引者)亦失声骇呼!”^②这位严肃的帝师“亦失声骇呼” ,多么怜悯体弱的学生——小皇帝啊!

据《实录》记载 ,帝师最初为翁同龢和夏同善 ,光绪四年命孙家鼐“在毓庆宫行走 ,与尚书翁同龢授上读。”^③几位帝师中与光绪皇帝关系最密 ,影响最深的要推翁同龢。

翁同龢(1830~1904) ,字声甫 ,号叔平 ,晚号松禅 ,江苏常熟人 ,大学士翁心存子 ,出身于书香门第。翁同龢咸丰六

① 《翁同龢日记》光绪七年十月十五日。

② 《翁同龢日记》光绪七年十月十六日。

③ 《清史稿孙家鼐传》第41册 ,第12439页。

年(1856)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入翰林院。同治元年慈禧太后受命他在“弘德殿行走”为同治帝师。并于帘前进讲《治平宝鉴》^①受到“两宫太后嘉之”。^②自涉足宦海以后“周旋帝后,同见宠信”,“以帝师而兼枢密”,^③历官内阁学士、户部侍郎、左都御史、刑部、户部尚书,两入军机处兼总理各国事务,是清廷“久侍讲帷,参机务”^④的显要人物。

翁同龢其人,既不同于朝廷掌握大权的满洲贵族亲王,如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诼、礼亲王世铎等人;也不同于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起家发迹的地方实力派,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前者主持内政外交有浓厚的保守性,后者办洋务有鲜明的买办性。而翁同龢是深受封建传统文化熏陶的士大夫阶层的代表,他以一甲一名进士身份步入清朝官场,颇有封建知识分子洁身自好的气节。翁家乃“苏常望族”,自幼生活在商品经济繁荣的江南地区,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对翁同龢有一定的影响。他到了首都以后,“屡掌文衡”兼参予各国事务衙门,多少接触一些了解西方世界的开明人士,所以他 not 是一位闭目塞耳的封建官僚。

翁同龢的政治态度是竭力维护清朝的统治政权,中兴大清王朝,尽管他同保守的满洲贵族和地方实力派有不同之处,然翁同龢仍是清朝统治政权中的一位坚定要员。他的父亲翁心存也是科举进士,官至内阁大学士,其兄翁同书、弟翁同龢也都是清朝的显官重臣。他“世受国恩”,对于摇摇欲坠

① 《治平宝鉴》同治元年两宫太后“命南书房、上书房诸臣,取历代帝王治术足资法鉴者,汇纂成书,进呈,名曰:《治平宝鉴》”(《清稗类钞》《礼制》)。

② 《清史稿·翁同龢传》第41册,第12368页。

③ 金梁辑:《四朝佚闻》,《戊戌变法》(四)第222页。

④ 《清史稿·翁同龢传》第41册,第12371页。

的清朝政权则“朝夕忧劳，冀得图报于万一”。^①尔今慈禧太后授命帝师，他必然“尽心讲贯”，倾注毕身心血。

翁同龢肩负“端出治之本”的重任，他以“明君贤相”自勉，向光绪帝讲授“于列圣遗训，古今治乱反复陈说，曲尽其理。阐明政要，以忧勤为先。”“尤能直言极谏……有古大臣风。”^②翁同龢的精心教授，多方启导，对于成长中的光绪皇帝有较深刻的影响。“皇上自幼年即从之受学，交情最深，倚为性命”，^③所以光绪帝亲政以后“每事必问同龢，眷倚尤重。”^④后来成为中日战争时期的全力主战者和维新派的引荐者，是他同光绪皇帝长期来政治合拍的结果。

第三节 捉弄小皇帝的总管太监李莲英

81

载瑾入宫嗣位以后，他的近侍太监经内务府的严格挑选，均由“老成质朴”者任之，尤其是服侍起居的太监王商，“他始终是小心翼翼的看护着光绪……见他有做错的事情，便婉婉转转的劝正他，见他有不懂的事情，便详详细细的解释给他听。自从光绪的乳母出宫以后，他差不多就代替了她的位置，甚至还比她更小心周到。”^⑤可是，在宫里众多的太监都归总监管束，总管太监直接听从慈禧太后的指使。载瑾入宫之时，任总管太监的已经是李莲英了。这位闻名天

① 闵尔昌：《碑传集补》卷一。

② 闵尔昌：《碑传集补》卷一。

③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丛刊《戊戌变法》（一）第252页。

④ 《清史稿·翁同龢传》第41册，第12369页。

⑤ 德龄：《瀛台泣血记》第75页。

下的太监头目,专门同小皇帝作对,甚至后来光绪帝心爱的珍妃,她的一生都葬送在这个恶魔手中。

李莲英(1848~1911),直隶河间人。他本是乡间不务正业的无赖,“落拓不羁,曾以私贩硝磺入县狱。”得释后改业补皮鞋,故有“皮硝李”的绰号。^①河间县多有入宫为太监者,他的同乡叫沈兰玉的,在清宫为内监,颇得慈禧太后欢心。沈兰玉素与李莲英有交往,李便恳托其“引进”自阉入宫为内监。其时,京城盛行梳新发髻,爱发如命的慈禧太后极为喜欢,她“饬梳头房太监仿之,屡易人,不称旨。”^②李莲英视此事为飞黄腾达的阶梯,便出宫走遍京城的歌楼妓院,“刻意揣摩”,很快掌握了时髦女郎新发髻的梳妆技巧。又得沈兰玉的“引进”,李莲英便入梳头房,当了慈禧太后的梳头太监,“从此得幸”,每晨辄令李莲英执梳挽之,否则以为不适。”^③李莲英得到慈禧太后的宠爱,由梳头太监晋为总管太监,接替了原来安得海的位置,并赐二品顶戴,“渐著声势。”^④成了慈禧太后身边“营私纳贿,无恶不作”^⑤的恶棍。

李莲英是极端势利刻薄的小人,在他的眼里,唯独西太后“老佛爷”一人才有绝对的权威。事实也是这样,亲王贝勒、军机大臣、地方督抚等重臣大员,见了他都得恭维迎笑,鞠躬作揖。若想升迁肥缺,也得向他贿送重金、厚礼,凡是由他在慈禧太后跟前美言者,无不青云直上,官至要职,李莲英简直成为慈禧太后的一个影子。善于揣摩政治气候的李莲

① 《清朝野史大观·清宫遗闻》第1册,第96页。

② 《清朝野史大观·清宫遗闻》第1册,第96页。

③ 有妨血胤:《清秘史》卷下,第39页。

④ 《清史稿·朱一新传》第41册,第12463页。

⑤ 《清朝野史大观·清宫遗闻》第1册,第96页。

英,他知道从醇王府抱来的娃娃皇帝,即使长大“亲政”,也只不过是慈禧太后掌中的一个木偶,因而他根本不把小皇帝载瑾放在眼里。而且李莲英也懂得必须同小皇帝做对,从小的时候做出“规矩”,让这位小皇帝知道,总管太监就是太后耳目和化身,在他面前事事都要矮着三分,这样他就可以长期在宫里肆无忌惮地作威作恶。

载瑾入宫不久,就同这个阴险狡恶的李莲英结下了冤仇。其时,载瑾年仅四、五岁,当然不是因为他看透了李莲英的险恶用心,小孩子往往以貌相辨人之好歹。李莲英面相丑陋,还得意忘形地在光绪帝面前显露出地痞无赖的种种丑态,令小皇帝十分厌恶。有一次小载瑾竟极干脆地对李莲英说道:“你这人究竟什么缘故,会长得这样丑啊?我见了你真有些害怕,快给我走出去!”^①李莲英没料到这个小皇帝竟然会对他说出如此不客气的话来,心里当然是十分不快的。可是,尽管载瑾是个乳气未干的孩子,然他到底是君临天下的“万岁爷”,当面绝对不能反唇相讥,做出任何放肆举动,并且在退出皇帝寝宫前还得照例向他恭恭敬敬地磕头才好走路。这一回光绪帝的失言使李莲英耿耿于怀,伺机报复。

说到李莲英捉弄载瑾,同小皇帝做对,当然不可能是面对面的欺侮皇帝,他最初的方法是在慈禧太后面前搬弄是非,“孝钦(即慈禧太后)前短德宗”,^②让小皇帝渐渐地失去太后的宠爱,以后便直接向光绪帝发泄淫威。

首先从光绪皇帝和翁同龢的关系上找差错。翁同龢与光绪帝的师生感情融洽,李莲英非常不快,因为翁同龢自命

① 德龄:《瀛台泣血记》第76页。

② 《清朝野史续编》·《清宫琐闻》第4页。

清高,从不向李莲英恭唯好言,李早就想在慈禧太后面前恶言一番,苦于没有机会。尔今翁同龢却得到太后的器重,委以教授皇帝的重任,而且与光绪帝相处得十分和睦,李莲英更加妒忌这位在清朝官僚阶层中德高望重的二朝帝师。有一天,翁同龢坐着教授皇帝念书,被一个太监瞧见,立即报告了李莲英。按照君臣之礼,臣子是不能同皇帝并坐对话的,李莲英得到这个消息,喜出望外,认为这是报复小皇帝和翁同龢的好机会,就跑到慈禧太后的寝宫,跪着启奏道:“奴才启奏太后,方才奴才经过皇上的书房,瞧见翁师傅不守规矩,竟是大模大样的坐在皇上的面前,求太后定夺。”^①慈禧太后是个“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独裁者,尽管她随心所欲地践踏祖宗“家法”,可是她对于宫里稍有不规行为,就要大发雷霆,轻则鞭鞑,重则处死。他听了李莲英这个报告,怒不可遏,便立刻差人把翁同龢叫来。翁师傅是深明封建礼教的老臣,遵守君臣之礼,每次进毓庆宫教授皇帝念书,总是要皇上赐坐后才得坐下。有几次小皇帝忘了赐坐,他就是站立教授至课毕,这次当然是光绪帝赐他坐的,并无破坏礼法。但翁同龢不愿光绪帝因此事而受到太后的数落,故不作辩解,只是俯身低头,忍受慈禧太后的训斥,回到书房,也不把委屈告诉光绪皇帝。事后,光绪帝从小太监那里听说翁师被太后训斥,他唯恐年高德劭的翁师傅招来更大的麻烦,因而就由王商陪着来到太后寝宫,替师傅说情。光绪帝跪在慈禧太后面前低声说着:

亲爸爸,孩儿想求你老人家宽赦了翁师傅一次。因为我方才听见小的们说亲爸爸怪他不该在孩儿面前坐

^① 德龄:《瀛台泣血记》第82页。

下,已经说过他一场了。这件事实在是孩儿的不好,翁师傅原不想坐,只因今天的这课书比往常特别长一些,孩儿瞧他站着讲,样子好象很吃力,便自己教他坐了。并且他在坐下去之前,还照规矩,向孩儿磕了一个头谢过恩,然后再坐下。亲爸爸!你老人家能不能就赦过了他呢?多谢你,千万的多谢你!”^①

由于光绪帝的求情,这件事终于就此了结。然而,李莲英并不因为翁同龢受到慈禧太后的一顿训斥而罢休。平时,在光绪帝面前总是借指责小太监的机会,说几句冷话,或是故意弄些事情来失小皇帝的威仪。载瑾是个极聪明的孩子,他对李莲英的故意捉弄,日子久了他也能察觉出几分,回到自己的寝宫总要把李莲英痛骂一场。这样小皇帝越来越怀恨这个狡猾、阴险的总管太监李莲英了。

旧俗小孩七岁生辰是特别重视的大事件,有“男女七岁不同席”之谚,标志着人生从此时起,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何况是小皇帝,所以他过七岁生辰,宫里更加郑重其事。光绪帝七岁生辰那天,即光绪三年(1876)六月二十八日,举行了一次小皇帝独自临朝的演习。朝廷的军机大臣、部院尚书以及王公贝勒等依班次向小皇帝俯伏叩头,载瑾大模大样地坐在龙椅上接受朝拜,一副威严气魄。他的心腹太监王商站在旁边,指挥着那些大臣的进退,正象慈禧太后坐朝时李莲英一样。这件事刺激了李莲英的神经,预示他将来的可悲下场。自从那天以后,李莲英对光绪皇帝的怨恨到了一不做二不休的地步,小皇帝同李莲英的暗斗与日俱增。

某年元宵节,李莲英向光绪帝发出了公开的挑战。元月

^① 德龄:《瀛台泣血记》第83页。

十五日民间闹元宵的节日,晚上玩花灯作乐,以为元宵之夜花灯闹得越盛,那末这年的国运、家运以及个人的命运也就越好,皇宫里更是如此。照例元宵供神的糕饼尤其是那种元宝形状的糕饼,要赐给慈禧太后最关切的人,表示宠恩与祝福,光绪皇帝当然是慈禧太后最关切的第一人。可是李莲英却没有这样做,故意把元宝形的糕饼搬到自己的私宅分赐给别的太监食用了。光绪帝知道以后愤怒极了,顷刻到慈宁宫向太后诉说,李莲英也被召来责问,他辩解说:“外面就有许多重要的事情找到奴才那里来了。而且这些事情,统统都是关系老佛爷的事情。……万岁爷大概也明白,奴才是一向侍候惯老佛爷的,这些事情都不能教别人代替,而奴才自己也不肯随便让这些事情的搁下来。因此奴才便忙着先干这些事情,只得暂时把万岁爷的糕饼搁一会。”^①李莲英最善于揣摩西太后的心理,这样一说慈禧太后果然平了气,还认为李莲英对她是最忠不过的人了,于是转过话题,换上几句奖勉他的话,这件事就此不了了之。李莲英的辩说含着这样一个意思:“只要我手里有别的事情要做的时候,光绪的一切事,是绝对不在我心上的。”^②这分明是对光绪帝地位的藐视和尊严的公开挑战。

光绪十二年(1886)十一月廿六日是这年的冬至,“乙卯,大祀于圜丘,上亲诣行礼,”^③皇宫以冬至为新年之始,必须祭祀天地社稷,而是年冬至大祀,仪式尤为隆重,因为“本年冬至大祀圜丘为始,躬亲致祭,并著钦天监于明年正月选

① 德龄:《瀛台泣血记》第140页。

② 德龄:《瀛台泣血记》第141页。

③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二)第2191页。

择吉期,举行亲政典礼。”^①明年是光绪十三年,是载瑾入宫以来最为重要的一年,正月十五日要举行“亲政典礼”,从此时起,他要正式行使皇帝的权力了。因而十二年的冬至大祀圜丘可谓是明年“亲政典礼”的一次演习,是件极为重要的一件大事。光绪皇帝诣圜丘祀天这一场面也是向朝廷重臣要员显示新一朝皇帝智慧与权威的好机会。慈禧太后派了李莲英总管祭祀的一切事务,他把这次冬至大祀圜丘,视之为捉弄皇帝的良机,故意找差错要让皇帝当众出丑。那天李莲英“他什么事也不做,只在旁边冷眼觑定了光线,脸上还假意装出一种极温和恭敬的态度,表示他很忠心的意思。可是逢到光绪有些做错的地方,他就要用尖刻的话指责了,他知道今天他可以尽情的指责,无论如何也不愁光绪会在天坛吵闹起来。”^②

圜丘是明清两代帝王祭天的地方,位于北京天坛西首,北接祈年殿。祭天时圜丘石台上按放着“皇天上帝”的神牌,左右还竖放着皇帝列祖列宗的神牌作为配祀,气氛庄严肃穆。参与祀天的官员进入祀天门以后,必须全神贯注态度庄重,不能有任何杂念,因为这里是至高无上的圣地。每次主祭的皇帝都要穿特定的服式,而这次由于太监的疏忽,光绪皇帝穿的是太和殿受朝拜时的皇袍,典礼进行时光绪帝第一次见到祭坛上的神牌和各式祭品,颇觉新奇,不时地目光环视。光绪皇帝这一微小的失敬举动,在身旁的李莲英故意大声嚷着:“万岁爷不可太轻忽了,这是一所最庄严的地方,也是一件最庄重的礼节,岂可随便敷衍得的。而且今天是万岁

①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二)第2119页。

② 德龄:《瀛台泣血记》第145页。

爷第一次离开了太后,独自来主持这祀天大礼,尤其不能草草。……现在万岁爷已经不能算是个小孩子了。”^①这时的光绪皇帝确实不能算是个小孩子了,他已经快到十七岁了,明年就要“亲政”,正式行使皇帝的权力,然而当着众臣却遭太监头目李莲英的一顿训斥,他恨不得从神前的跪垫上跳起来,予以严厉的回击。可是,光绪帝不是以气用事的人,他知道如果在天坛祭祀大典上同李莲英闹翻,他的“亲爸爸”是决不会原谅他的,甚至会惹出大事来,所以他只得忍着气,看着李莲英的得意样子,快快完成这件祭天大事。

李莲英在光绪皇帝明年就要“亲政”的冬至祭天这一重要时刻,竟胆大妄为地教训皇帝,实际上要向朝廷大臣显示:皇帝亲政以后,大权仍在老佛爷手中,皇帝就是傀儡;只要慈禧太后握住政权,总管太监照样可以有恃无恐,权倾朝有。

第四节 乏味的宫廷生活

总面积达 72 万多平方米的紫禁城,城内殿宇宫室九千多座,重檐飞翘,黄瓦红墙,雄伟壮观。光绪皇帝自四岁进宫嗣位,至三十八岁饮恨辞世(1875~1908),在这座深宫里足足生活了三十四年。宫廷里的童年生活索然乏味,既无亲生父母的骨肉之爱,又无与邻里孩子玩耍的童幼之乐。小皇帝的日常生活慈禧太后有严格的安排,起居饮食极有规律。每天上午必做两件大事:早餐后在太监的陪同下,即至两宫太

^① 德龄:《瀛台泣血记》第 147 页。

后那里请早安，“每日问安一次”^①，光绪七年东太后去世以后只至慈宁宫西太后问安。进宫之初，四岁冲幼的载殪活泼可爱，慈禧太后对他的规矩也不十分严格，他可直入太后寝宫，恭恭敬敬的跪下请安。太后很喜欢他，总要问几句饮食、睡觉、冷暖之类的话，载殪倒也能温文有礼的回答着。随着年岁的成长，慈禧太后对光绪小皇帝的规矩也不断加码，若逢有些不快事情的发生，载殪的请安也就不能顺利通过。“每日必致太后请安，不命之起，不敢起，稍不如意，罚令长跪。”^②每日请安制度，既是皇室“家规”，也是慈禧太后“以威钳制”驯服光绪皇帝的一种重要手段，所以请安时的问话乃至训斥越来越加严厉。

第二件大事，跟着慈禧太后上朝。请安毕，由总管太监李莲英一声吆喝，外面的太监立即把太后所坐的藤轿抬到寝宫门前，太后独自上坐，头几年因为光绪帝年龄实在太小，由太后抱着他一起坐在藤轿上面，后来年龄渐渐成长了，便由太监们挽着他跟在轿子后面走着。太监、内廷侍卫在李莲英的指挥下，前呼后拥，浩浩荡荡至太和殿。在垂帘听政期间，太和殿有两把龙椅，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分别上座。光绪帝的一双小靴稳稳地搁在为他特备的那条矮凳上，早朝便开始了。

光绪皇帝确实很聪明，“他四岁进宫，随着太后上了几次朝，便马上理会得一切的动作了。……他每次坐到了那龙椅上，总是板起了他的小脸，装着一派非常庄严肃静的态度。使每一个见到他的人都不免十二分的诧异。”^③上朝的时间无定，全凭太后决定，有重大事件的决策，上朝至中午才罢。

① 《清朝野史》第十四种，第4页。

② 古灵后人：《清外史》第191页。

③ 德龄：《瀛台泣血记》第80页。

光绪小皇帝只是竭力约束着自己,端端正正地坐在龙椅上等待慈禧太后发出退朝决的命令。这些繁琐的朝仪礼节,对小皇帝来说,简直是受罪,他所以亲政以后能够接受变法革新思想,因为光绪皇帝从小就厌恶朝廷的俗套,有其思想基础。

小皇帝除请安、上朝之外的重大事件从光绪二年正月始,逢年过节“御慈宁宫,上率诸王大臣行礼毕,御中和殿受礼,太和殿受贺”,“上诣寿皇殿行礼”,“诣奉先殿行礼”,“祈雪,上亲诣大高殿拈香。”^①凡紫禁城里各宫殿内的祭祀、行礼、受贺等仪式,小皇帝必须“御诣”;离开宫廷的祭祀,一般均由亲王大臣代行,如“庚子,时享太庙,遣德长恭代行礼”,“辛亥,祈谷于上帝,遣奕劻恭代行礼。”^②直至光绪十二年,“冬至大祀圜丘为始,皇帝亲诣行礼。”^③

退朝下来,光绪帝诣上书房授读。先得完成老师布置的功课,“一个做皇帝的人,自然需要相当的智识和才力的。因此他的功课也委实很繁重”,^④做毕功课,便念读诗文。光绪帝的教师很多,除教授诗文的翁同龢、夏同善、孙家鼐以外,还有教授书法的、教授画图的、教授弓箭骑马的等等。虽然他已经懂得自己是至高无上的“万岁爷”了,但他对授读的师傅却是很恭敬,甚至比一般贵族子弟还要尊敬师长。他虚心受教,在师傅面前他是一个尊师勤读的好学生。后来他接触康有为等维新志士也总是虚心地向他们请教新知识,尤其对于世界各国兴邦强国,维新变法道理更是勤心听取,反复思考,他这种切心求知的好学精神,就是在宫廷童年生活中养

①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185~189页。

②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187~188页。

③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2219页。

④ 德龄:《瀛台泣血记》第80页。

成的良好品质。

在念读诗文和练习书法之余,总要留下一定的时间,学习画图。小皇帝很喜欢画图,在醇王邸第,他的寝屋里到处贴着自己画的飞鸟、花木、走兽,尔今有专师教授,自然兴趣更浓了。按慈禧太后的嘱咐,先午睡后进餐,光绪帝也就养成了这个习惯。

午餐以后,比较有趣的生活开始了,他可以在院子、花园里走走。小皇帝有一匹美丽的小马,鞍、辔、蹬、缰一应俱全,并且都是用最上乘的材料制成,十分精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光绪帝从小酷爱骑马,可惜近侍太监唯恐他从马背上摔下,所以总是左右前后扶扶拉拉,埋没了他对于骑马的天才。亲政以后,有一次光绪皇帝在观看兵操的时候,颇有感叹地对人说:“我也很喜欢骑马的,假使我小的时候没有他们这些人在旁边纠缠着的话,我相信此刻一定可以比他们骑得更好了。”^①小皇帝玩一阵子小马以后,便是练习射箭、击弹。骑射是满族的民族传统,皇室对王子、王孙有严格的训练要求,所以从皇帝到贝勒、贝子都有一套骑射本领。光绪帝虽然体格不太强健,然他的智力却很丰富,射箭、击弹都能得心应手,左右手交替使行。

宫里的晚餐,比北京一般市民要早一些,慈禧太后有早睡早起的习惯,因为她和皇帝每天要上朝,并且要聚精会神地去思考、决定重大事件,所以要有足够时间睡眠,否则上朝时无精打彩,会给臣下产生“圣躬违和”的错觉。晚餐毕,光绪小皇帝便在自己的寝宫同太监们一起玩着各种玩具,大约一个时光景,即上床睡觉。小皇帝的童年生活就是这样

^① 德龄:《瀛台泣血记》第86页。

乏味地度过的。最使他痛苦的就是失去母爱。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12日)深夜,小载殪从睡梦中被鸾驾从醇王府抬出,进了紫禁城,他的亲生母亲醇亲王的福晋知道从此以后她永远失去了自己心爱的儿子,怀着极度的痛苦送走了小载殪。中国人的习俗,民间子女一经出嗣之后,就永远属于他的嗣父母了,生身父母不能再过问子女的事情,何况是皇家呢。自己的儿子入宫做了皇帝,一切仪规,必须象旁的皇亲见皇帝一样,要向皇帝下跪磕头,更不能把儿子亲亲热热地搂在怀里了。小载殪进宫做了皇帝,自然比做醇亲王的儿子身价要高出百倍,对他的照料自然也更加周到了,可是这些百倍之高贵岂能代替母爱,也不能弥合失去母爱所造成心灵上的创伤。醇亲王奕綏见到自己儿子的机会比较他的福晋要多一些,他天天进宫上朝,虽不能共语家常,然总还能见一次面,看看儿子的模样。而载殪的母亲,要想见一次自己亲生儿子是很不容易的,虽然慈禧太后是她的胞姐,但是受礼法所拘,不能随便进宫探望,只有盼望慈禧太后派人传话进宫,才能同儿子见面。第一次母子相会是载殪进宫数月之后,醇亲王福晋进宫先得朝见胞姐慈禧太后,然后太后派太监把光绪小皇帝请到她的寝宫。母子见面也不能马上说话,必须向自己的亲生儿子——皇上下跪请安,小载殪见了母亲高兴极了,恨不得立刻就扑到“阿妈”的怀里,尽情地享受母爱的温馨。可是在严肃的太后面前,又有许多太监目视着她们母子,醇亲王福晋只能强抑感情,欲步却止,小皇帝也马上被他的乳母抱住了,他失声大哭,慈禧“太后挥手,把他打发出去,连醇王福晋也几乎掉下泪来”。^①慈禧太

^① 德龄:《瀛台泣血记》第59页。

后既然做了光绪皇帝的“亲爸爸”，她决不允许别人，自然连她的妹妹醇王福晋同光绪帝的感情超越自己。目的就是要要在光绪皇帝的心灵里确立起太后的绝对权威，所以慈禧太后为了割断光绪帝的母子感情，故意很少传话让醇王福晋进宫。偶尔一年半载进宫一次，“待她进了宫，却又不能单独和光绪见面，必须在太后以及许多人的监视之下，远远地站着，甚么话都不好说，无非在那里站上刻把钟便完了。”^①即使是这样乏味的见面，也很不容易盼到，每见过一次以后，不知要等待到何年何月，才能得到慈禧太后的懿旨下来母子重逢。

进宫的时间长了，光绪帝仍然惦念着他的母亲，翁同龢在他的日记中，留下了光绪帝默默静坐不语的记录时时可见，有时不肯念读诗文、一坐就是几个时辰，甚至半天不语一言。这分明是在思念自己母亲，思念醇王邸第的一切。平时光绪帝也常常郑重其事地问近侍太监王商和他的老师翁同龢说：“醇王福晋究竟是上什么地方去了，为什么隔了这许多时候，还不见她来看看我们？”^②王商和翁同龢也无可奉告，使光绪帝感情沮丧，失望地静默良久。

小皇帝从四岁入宫到十七岁亲政，十三年的宫廷生活就是这样乏味、孤独，这对于光绪帝的体质和性格都有深深的影响。

① 德龄：《瀛台泣血记》第71页。

② 德龄：《瀛台泣血记》第89页。

第四章 亲裁大政

第一节 多事之秋成熟早

94

在慈禧太后第一次“垂帘听政”期间,清王朝从外患内忧中挣扎出来,得到了一时新的转机,这就是清统治者所标榜的“同治中兴”。同治年间(1862~1874)慈禧太后运用铁腕手段,推行强人政治,开启了清季“中外人安,将相协和”的局面。^①然而,十九世纪的中国,清王朝度步二百余个春秋之后,封建统治制度已病入膏肓,气息奄奄,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任何强人政治,只不过是给即将就墓的封建王朝,注射强心针剂,决不能收到治理封建社会之效,即使有所复苏,也反是临终前的回光反照而已。

光绪皇帝“入承大统”以来,清王朝固族并发,天灾外犯屡屡而至,为清统治者所赞颂的“中兴”大业,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老,给人们留下的只是幽幽飘荡着的一个幻影。

光绪帝的童年,可谓是多事之秋,“时势多艰”给正处于“典学授读”时代的小皇帝却以诸多方面的启迪,人生旅途上他加速了成熟的步伐。德龄叙述光绪帝母亲,醇亲王福晋在

^① 《清史稿·穆宗本纪》第4册,第848页。

光绪入宫做皇帝时所盼切期望的心境 ,正是同光两朝历史变迁的深刻描绘。

一心只希望她的儿子 ,永远顺顺利利地做着他的皇帝 ,享受一切的荣华。无奈天心岂能尽如人意 ,他们尽是这样希望着 ,而事变之来 ,又岂是人力所能阻止的。并且来得也太快了 ,他们深所为幸的那一个和平安乐的时期 ,竟是这样的短促 ,如同夏天雷雨将作之前 ,天色必有几分钟特别的光亮一样。

接着 ,就发生了一长串不幸的事件。^①

德龄把“同治中兴”比喻为大雷雨来临前夕的一瞬光亮 ,即着就是“发生了一长串不幸的事件” ,这是很确实的。光绪帝即位不久 ,中国大地连续闹了好几年的灾荒。据史籍记载 :

光绪“二年五月 ,以近畿亢旱 ,直隶、山西、山东暨河南、河北等府 ,小民艰食 ;”

“ 闰五月 ,庚午 ,赈福建水灾 ” ;

“ 八月丁未 ,赈渐江水灾。辛亥 ,赈江西水灾 ” ;

“ 冬十月丙午 ,赈皖北旱灾。十一月甲申 ,截漕一万石 ,并提仓谷济苏、常留养灾民 ” ;

“ 十二月戊申 ,赈江北、淮、海灾。”^②

光绪皇帝登极以后的第二年 ,旱、水、海三灾齐发 ,波及中国南北诸省 ,尽管清朝当局截漕开仓 ,赈济灾民 ,然中国之大 ,被灾区域之广 ,清政府顾此失彼 ,灾区一片惨状。

有的是活剥剥地饿死的 ,有的因为死人不能埋葬 ,

① 德龄 :《瀛台泣血记》第 59 页。

② 《清史稿·德宗本纪一》第 4 册 ,第 856 ~ 858 页。

腐尸堆积 ,臭气熏蒸 ,酿成瘟疫 ,染病而亡的 ;也有怨叹命薄 ,而自杀的 ,情形真正非常的惨痛 !^①

旧时中国的老百姓遇到灾害 ,往往怨天尤人 ;“大家都说光绪这个皇帝有些不吉利。……光绪真是一个白虎星君投胎的皇帝。”^②从光绪帝登极以后 ,种种天灾接二连三。尤其是光绪三年(1877)遭到百年未遇的特大灾害 :

四五月间 ,广东雨水过多 ,江河泛滥 ,北江“长堤决口百数十丈 ,……居民淹死万余人 ,……四野田庐均被淹没。”^③

六月 ,“江苏、安徽蝗蝻为患 ;……山西亢旱尤甚 ;湖南、广西亦遭患 ;陕甘亦复苦旱 ,东豫、畿辅并有飞蝗 ;苏、浙地方猝遇大风” ;^④

“七月直隶、山东、山西、河南等省 ,田禾缺雨 ,荒旱成灾 ,粮价日增 ,流民遍野……而山西一省 ,荒歉更甚于去年 ,人情汹汹 ,朝难谋谋 ,子女则鬻于路人 ,攘夺或施于里党 ,啼饥者远连数郡 ,求食者动聚千人 ,户少炊烟 ,农失恒业 ;”^⑤

“本年九月间三姓地方(今黑龙江依兰县)猝遭风雹 ,田庐被淹 ,旗民荡析离居 ,殊堪悯侧。”^⑥

光绪三年的天灾遍及全国 ,受害惨重 ,其中山西最甚。“晋省成灾州县已有八十余邑之多 ,待赈饥民计逾五六百万

① 德龄 :《瀛台泣血记》第 60 ~ 61 页。

② 德龄 :《瀛台泣血记》第 61 页。

③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 425 页。

④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 447 页。

⑤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 453 页。

⑥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 484 页。

之众，”^①“死亡遍野，为二百年之所无。”^②继光绪三年之后，灾害仍时有发生，光绪四年（1878）六月，台湾风灾，七月浙江金、衢、严等府水灾；八月永定河、沁河决。光绪五年（1879）五月河南蝗灾，甘肃武都、文县、天水一带地震，“历十有三日。”^③光绪初年的灾害，犹如咸丰年间的农民造反运动，给清王朝以沉重的冲击，农田歉收，财政匮乏，潜伏着深刻的经济危机。光绪六年（1880）清政府因军务、赈济支出递增，“部库出入并无盈余，现在库款存储无多，照常年收放尚可支持，没有意外需要，则支应即形棘手。”^④

多事之秋，每况愈下。至光绪九、十年之间（1883～1884）以光绪皇帝和帝师翁同龢为代表功封建统治集团中的务实派，深深地觉察到清王朝前景之暗淡，为此感叹不已。翁同龢在光绪九年除夕之夜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十二月三十日，除夕，阴。酉初即睡，辗转不寐，给计一年事，中怀忪忪也：一民生日蹙，一边衅、一水灾，一言路颇杂。^⑤

这段日记如实地反映了清王朝光绪初年政治经济的困境。光绪十年三月初八日，光绪皇帝召见大臣时发出叹息：“边防不靖，扈（疆）臣因循，国用空虚，海防粉饰，不可以对祖宗。”^⑥光绪皇帝面对严酷的现实，指出“扈臣因循”，“海防粉饰”，朦胧地萌发革旧图新的观念，否则就“不可以对祖宗”，忧心忡忡，担心大清基业断送在他一代。

①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514页。

②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757页。

③ 《清史稿·德宗本纪》第4册，第862～864页。

④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863页。

⑤ 《翁同龢日记》光绪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⑥ 《翁同龢日记》光绪十年三月初八日。

从光绪皇帝登极至中法开仗的十年间(1875—1884)是他“典学授读”接受封建教育的重要时期。其时,通过帝师翁同龢的渠道,不断传送各地灾情和国内外重要信息,而翁师“尤能直言极谏”,“秉性正直”,^①常在讲书释史时激发光绪帝继承祖宗基业的责任感。从而使他获得相当的阅识,因此在多事之秋的社会背景下,使之很快地成熟起来了。光绪皇帝“典学授读”十六年,到亲政前夕,他的学问有了长足的进展。光绪九年十一月初六日,“是日,上(光绪帝)作望雪诗四句,极顺;又作史论,亦通畅,且极欢喜。”“廿二日上作诗二首,极敏捷。”^②由于文史知识的增进,光绪帝基本上具备了披览臣下章奏的能力。

光绪帝奋力读书的时代,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国际局势发生了剧变。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依靠对本国劳动人民和不发达国家的残酷剥削,利用最新的科学技术成就,经济获得飞跃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是在不平衡规律支配下增长的,最显著的表现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工业产量总额比重中地位发生了新的变化,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上出现了新的不平衡局面。从而导致资本主义列强为扩大殖民地和分割世界的争夺逐渐升温,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了夺取殖民地的大高潮”。^③地大物博的中国当然是它们宰割的重要目标。

① 闵尔昌:《碑传集补》第一卷,《清代碑传全集》第126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1月出版。

② 《翁同龢日记》光绪九年十一月初六日、廿二日。

③ 《列宁选集》第3卷第798页。197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同治十三年(1874)“春,三月,日本寇台湾,争琉球主权”;^①

光绪元年(1875)英国翻译官马加理从缅甸越过中国边境,于云南被当地人民打死。英国乘机掀起风波,驻华公使威妥玛向清政府提出了范围极为广泛的要求,并以增兵缅甸、云南边境和出动舰队到渤海湾进行军事威胁。光绪二年六、七月间清廷派出李鸿章为全权代表,在山东烟台同英使威妥玛会谈,全部接受了英方提出的要求,签订《烟台条约》,中国赔款白银二十万两,并把云南省完全开放在英国殖民者面前;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沙俄对我国新疆地区不断地进行蚕食,占我领土为已有;

光绪九年以来,法国加速了占领越南和侵略中国西南地区以及东南沿海的步伐。

这样中国边陲事端四起,而且都是“彼先开衅”,可清政府却是赔款、赔礼疲于奔命,同治年间一度出现的“中外乂安”局面已成玉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边陲的侵犯和蚕食,1884~1885年中法两国兵戎相交,年轻的光绪皇帝在此间初显锋芒,并启迪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他在成长的征途上又迈出了一大步。

中法战争爆发前夕,光绪皇帝同帝师翁同龢已经参理朝政。光绪八年(1882)十一月“王文韶罢,命翁同龢在军机大臣上行走。”^②

“(十一月)初五……恩命臣龢在军机大臣上行

① 印鸾章编:《清鉴纲目》第12卷,第717页。

② 印鸾章《清鉴纲目》第13卷,第742页。

走”；“初七日……寅初一刻到军机处直房……先阅昨日所到外省各折，次看本日早事档，……然后再拟旨。”^①

翁同龢入军机处，每日审阅奏折，草拟谕旨获得大量的国内外种种情况，他直接与光绪皇帝沟通，皇帝的主见也可在“拟旨”中得到贯彻。除了翁同龢不断向光绪帝传递信息，听取他的意见之外，事实上光绪皇帝本身也已经参与处理一些朝政了。这时的光绪皇帝虽年仅十四岁，由于时势多艰和帝师的启迪为他较快的成熟奠定了思想基础。光绪帝同翁同龢朝夕相处，封建社会的“明君贤相”成了他们之间亲密关系的根柢，因而在内政外交方面形成许多方面的共识。例如光绪九年九月十八日，“是日，抄递张树声（两广总督——引者）电：有刘团（黑旗军——引者）退至顺化、谅山等。枢云刘不足恃，非添重兵出关不可。上（光绪帝）亦为然。”^②所以笔者认为中法战争时期清廷所发出的谕旨、命令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光绪皇帝的主战思想。

中法战争前夕，慈禧太后同光绪皇帝的关系如常亲切。她在光绪帝“典学授读”时期曾对他的成长作了精心设计，以为完全可凭她的思想模式来塑造这位新皇帝。因之，对于光绪帝的迅快成长，慈禧太后怀着“望于成龙”的喜说。作为万乘之尊的皇帝，诸多处理政事方面的知识能力，帝师是无法传授的，所以慈禧太后就在光绪帝授读时期，逐渐让他参与披览臣下章奏和议论朝政，以便灌输西太后的政见和处理政事的方法，真可谓是言传身教。翁同龢在日记中对当时光

① 《翁同龢日记》光绪八年十一月初五、初七日。

② 《翁同龢日记》光绪九年九月十八日，“枢云系翁自称。《清史稿·翁同龢传》载“又言刘永福不足恃，非增重兵出关不可”。与《日记》同语，故“枢云”为翁云。《清史稿》第41册，第12369页。

绪帝参与披览臣工章奏,有具体的记载:

光绪九年正月初八日“卯正三刻入见于西暖阁,上(光绪帝)亦在座,宝(璽)相递折,上接阅颇用心,自首至尾不少忽也。每一折毕,太后降旨,枢臣承(旨)后仍于上(光绪帝)前复述之,……太后朱笔授,上(光绪帝)圈之。……十二日,辰正入见于西暖阁,折件多,上(光绪帝)亦来,能细阅是日御史刘瑞祺条陈。”^①

在光绪帝亲政以前,慈禧太后对于光绪帝的成长予以热情的称赞,她在懿旨中说:

“十余年来,皇帝孜孜念典,德业日新,近来披阅章奏,论断古今,剖决是非,权衡允当。”^②

从上述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亲政前的光绪皇帝不完全象某些史著中所说的那样,“还是一个挂名皇帝”。何况那时的光绪帝对朝廷政事开始发生兴趣,并且有自己的主见,因而他不甘心做“一个挂名皇帝”,其时已经在行使着皇帝的部分权力。中法战争前夕,皇帝与太后的矛盾尚未显露,慈禧太后是想推皇帝于御前,她自己退居幕后,做大清朝的太上皇。

历史唯物主义者认为,一个人的成长和成熟,重要的条件是他所处的时代与生活的客观环境。光绪皇帝“典学”年岁,正是资本主义列强加紧宰割中国的时候,也正是千疮百孔的清王朝寿终正寝的时候,对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清统治者的表述是“事势多艰”。光绪皇帝所以不同于一般贵族子弟,能够在“授读”年岁得以较快地成长、成熟,较早地成为有主见的少年皇帝,除了帝师翁同龢给予开启心灵的窗户之外,他所生

① 《翁同龢日记》光绪九年正月初八日、十二日。

②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二)总第2119页。

长的多事之秋便是促进光绪皇帝成熟的重要因素。

第二节 涉足朝政,显露锋芒

“亲政”以前光绪皇帝已经涉足朝政,他刚开始行使皇帝权力的时候,正值中法战争之际。年仅十三、四岁的光绪皇帝在这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初显锋芒,明确地表达了他积极主战,反对妥协让步的爱国思想。

越南是中国南方的邻国之一,十八世纪末已经遭到法国的侵略,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法军进攻南圻,迫使越王缔结既赔款又割地的《法越条约》。七十年代法国又把侵略矛头指向北圻,其目标不仅要把越南完全成为他们的殖民地,而且企图由北圻打开通向中国西南地区,首先是云南省的大门,从而能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肮脏交易中得到更大的利益。法国海防领事士尔克赤裸裸地声称:

法军占领北圻是“因为它是一个理想的军事基地,由于有了这个基地,一旦欧洲各强国企图瓜分中国时,我们将是一些最先在中国腹地的人。”^①

所以法国侵略者急于占领越南北部,在光绪七、八年(1881~1882)法国大肆向越南北部地区推进,其战略目标是尽快打开中国的南大门。其时,清朝的一些官僚也看到了法国侵略者的险恶用心,认为中国与越南是“唇亡齿寒”的关系,主张不惜对法一战。这些人上自军机大臣奕訢、翁同龢等高层

^① 依罗神父:《法国——东京回忆录》,转引《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第71页。

官员 ;下至地方疆臣如两江总督左宗棠、两广总督张树声、山西巡抚(后升迁为两广总督)张之洞 ,驻法公使曾纪泽等人 ,他们提出“固守边界”的主张 ,^①认为对法国侵略越南“断无坐视之理”。^② 这些官僚虽然主张抵抗法国的侵略活动 ,但他们究竟不是清廷中的最高决策者 ,所以当时已经参与朝政的光绪皇帝其态度是主战 ,还是主和 ?对局势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因为皇帝在人们的心目中是至高无上、君临天下的形象 ,何况 ,光绪帝是掌握清朝大权的慈禧太后所亲手扶植起来的少年皇帝 ,那末光绪帝态度就成为朝廷上下众目所待的中心了。在中法战争初期 ,光绪皇帝对“战事不修”颇感忧虑。

光绪九年八月廿二日 ,“醇邸(醇亲王奕 綏——引者)来议事 ,寄彭玉麟筹勇赴广东等事 ,呈览。上(光绪帝)颇恨战事不修也。”^③

103

光绪九年(1883)法军侵入北圻 ,占领了河南和定南 ,越南政府向黑旗军求援 ,刘永福率军进攻河内。四月十三日(1883年5月9日)黑旗军在河内大败法国侵略军 ,击毙法军司令李维亚中校。法国政府又任命新的统帅 ,加派军队于八月间发动了新的进攻。在法军的大举进攻下 ,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遭受挫折 ,而邻近率军驻在山西、北宁等地的广西巡抚徐延旭和云南布政使唐炯却坐视法军与黑旗军激战 ,按兵不动 ,对黑旗军不作任何援助。刘军失利的消息由当时任两广总督的张树声电奏军机处。光绪九年九月十八日 :

① 故宫博物院编 :《清光绪朝中外交涉史料》,丛刊《中法战争》(五)第143页。

② 丛刊《中法战争》(五)第113页。

③ 《翁同 龢日记》,光绪九年八月廿二日。

是日,抄递张树声电:有刘团退至顺化、谅山等。枢云(翁同龢——引者)“刘团不足恃,非添重兵出关不可”。上(光绪帝)亦为然。^①

中国正式同法宣战以前,光绪帝已经明确地亮出了主战立场。

法国政府一方面积极调兵遣将,准备扩大战事;一方面要求同清政府进行谈判。清政府的最高当权派基本立场是倾向让步妥协,不希望扩大事态,故即刻派委军机大臣李鸿章为全权代表,先是光绪八年李鸿章和法国公使宝海在天津进行谈判。中方应诺撤退中越边境的清朝驻军,听任法军占领越南北部。法国茹尔·费理政府并不满足清政府所作出的让步,命法军加紧向越南北部发起进攻,同时改换了驻华公使,派驻日公使脱利古来到中国,于光绪九年五月在上海再次同李鸿章进行谈判。清廷对法国方面施展出尔反尔的狡猾伎俩没有任何准备,只得命李鸿章“仍遵前旨即回北洋大臣署任筹办一切。脱利古现在上海作何动静,李鸿章如定期北来,须知照该使,如有面议之事,俟其到津再行商办。”^②于是八月间在天津继续谈判。慈禧太后命李鸿章“相度机宜,妥为筹办”^③,给予极大的妥协权力。在这期间,法军攻占越南首都顺化,强迫越王签订了《法越顺化条约》,要越南承认是法国的“保护国”。天津谈判中,脱利古要求清政府承认法国与越南签订的《法越顺化条约》,并且提出用“土匪”名义清除英勇抗法的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以扫清它开通侵犯中国广西、云南的障碍。同时脱利古还用绝交和开战要挟

① 《翁同龢日记》,光绪九年九月十八日。

②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总(二)第1535页。

③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丛刊《中法战争》(五)第143页。

清政府作出更大的让步。八月三十日,光绪帝在召见枢臣时得悉“胁越之约”(即《法越顺化条约》)的内容非常气愤,“胁越之约断不能(认)”,“令总署坚持不许也。”^①由于光绪帝对法国侵略者的无理要求,坚持不妥协不让步的鲜明立场,所以李鸿章同脱利古的天津谈判没能达成协议。九月法国代表脱利古宣布中止谈判,表示法军要把进驻越南的中国军队赶走,中越军事冲突不断升级。光绪皇帝“令总署坚持不许”向法方妥协让步的断然决策,导致中法天津谈判破裂,皇帝的鲜明的主战立场,对时局发生了重大影响。光绪帝在涉足朝政不久就显露了他的锋芒和锐气。天津谈判破裂以后,清廷又用皇帝的名义,发了一道上谕,从军事及粮饷供给等方面作了认真的筹划。

壬辰,谕军机大臣等:法人胁越议约,尽攘该国权利,果如所议,越南无以图存,大局所关甚重。法使脱利古来京,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未提及此事,意殊叵测。刘永福一军屡获胜仗,当不因彼国仪和稍形退沮。现在进规河内,如能克期攻克,以固北圻门户,办理自易得手,前有旨谕倪文蔚等,令唐景崧设法激励。著该抚等密速妥筹,徐延旭著懍遵前旨星速出关,相机调度。所有滇粤防军,岑毓英、倪文蔚、徐延旭、唐炯,务当督饬将领严密布置,俾壮声援,勿稍松劲。粮饷军火,必须力筹接济。朝廷惟恐该两省饷需不继,致失事机,谕令户部筹拨有著之款。兹据该部奏称,截拨湖北应解京饷银十五万两解广西应用;四川应解京饷银九万两,湖南应解京饷银六万两解云南应用。此外,另由江西拨银五万

^① 《翁同龢日记》,光绪九年八月三十日。

两,湖北拨银五万两解交广西,四川拨银四万两,湖南拨银六万两解云南等语。已谕令各该督抚各别迅速拨解。本年京饷屡有截留,部库益形支绌,兹因边情紧要,特予添拨,该督抚等务当深体时艰,权力筹办,俾越事及早挽回,以维大局。将此由六百里各密谕知之。^①

这道战备谕旨,是光绪帝坚持主战立场的具体体现,是枢臣根据光绪帝上月卅日“令总署”的主战思想草拟的,所以也是中法谈判破裂以后清廷的全面战备部署,并以每天六百里程火速传递至有关省份,表明光绪帝的积极主战态度,在清朝的中枢机构里发挥了较大的力量,对主战气氛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该督抚”等能够切实按谕旨部署积极战备,加之前线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和边防清军爱国将士的英勇奋战,越战中胜利是能够取得的。

法国政府既已定策要以武力驱逐驻越清军,然仅靠中越边境的军事行动岂能使清政府完全就范。法国政府便调遣海军向台湾、福建沿海进发,以左右牵制清政府的军事力量,使清廷置于顾此失彼的不利形势。为了完成其军事部署,法国施展和谈作为缓兵之计,光绪十年三月(1884年4月)法国又向清政府提出议和和要求,一个月以后,李鸿章同法国代表福禄诺在天津谈判,并签订了《中法会议简明条款》五款。其主要内容是中国承认法国有权“保护”越南、中国军队调回边境、法国商品可以由越南自由输入中国。《简明条款》订立以后,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清廷最高统治集团,满以为有了这个条款,越战即可平息,因而对台湾、福建沿海仍然毫不设防,亡羊而不补牢,不作战备。不料《简明条款》墨迹未干,当

^① 《清德宗实录》第170卷,第9页。

年五月底一支法国舰队闯入福建的马尾军港。七月初三日(8月23日)法国驻福州领事通告清政府说,“本日开战”。马尾军港内的法国舰队立即发动猛烈攻击,只用了一个多小时,就击沉了在这里的全部中国船只,包括十一艘兵船和十九艘商船,并且还击毁了整个造船厂,“师船尽歼,全闽大震,法舰复据澎湖岛。”^①左宗棠花了近二十年的心血建立起来的福建海军毁于一旦。

《中法会议简明条款》的签订和台湾、福建军事形势的吃紧,朝廷上下,举国哗然,要求抗法卫国呼声迅速遍及全国。在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主战派和主和派的阵营也就日益明朗化了。主和妥协派,在中央以慈禧太后为代表,地方以李鸿章为首脑。光绪十年是慈禧太后重新调整军机处及部院大臣和满洲贵族集团内部争夺最高权力斗争的关键时刻。唯恐因战事打乱了她的计划,更害怕一旦战事失利形成不可收拾的局面,重演咸丰帝和她离开京师到承德避难的悲剧。所以慈禧太后在越战爆发之始,就主张向法国妥协让步,企望以牺牲越南和清除黑旗军为条件,草草结束中法军事冲突。李鸿章竭力执行慈禧太后的让步政策,他的指导思想是“战则敌兵或更舍越而先图我”,若“陈师远出,而反戈内向,顾彼失此,兵连祸结,防不胜防”。^②《中法简明条款》就是中央和地方掌权的主和派推行妥协让步政策的产物。

关于主战派,前面已经说过,中央是以翁同龢、奕訢为代表,地方是以张树声、张之洞、曾纪泽等人为代表。而光绪皇帝则以鲜明的态度支持主战派。光绪十年七月初二日,正是

① 印鸾章:《清鉴纲目》第13卷,第750页。

② 丛刊《中法战争》(五)第157页。

法国舰队攻马尾军港前一天,光绪皇帝得到法军在福建沿海进行军事挑衅的情报后作出指示:“上(光绪帝)意已决定主战,若不赔款即撤兵,可讲(和),否则令(向)关外(镇南关)进兵。”^①光绪皇帝坚决主战的态度,促使局势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由于主战派的力量暂时处于优势,迫于形势,清廷于七月初六日(8月26日)下诏宣布对法作战。次日发出谕曰:

越南乃我大清封贡之国,二百余年载在典册,中外咸知。法人狡焉思逞,肆意鲸吞。……先启兵端。……衅自彼开。各路统兵大臣及各该督抚,整军经武,备御有年,沿海各口如有法国兵船驶入,著即督率防军合力攻击,悉数驱除。其陆路各军有应行进兵之处,亦即著赶速前进。^②

108 尽管在此以前,中法两国军队早已在越南开仗,尔今清政府正式下诏对法宣战,并命令海陆兵勇对来犯法军“悉数驱除”,无疑是对前线将士莫大的鼓舞,所以海陆战全面接仗以后,捷报频传。

在陆战方面:清政府派出重兵与刘永福黑旗军协力作战,“赏刘永福记名提督,赏戴花翎”。^③清军士气大振,各将领“统率所部出奇制胜,将法人所占越南各城迅图恢复。”^④在援越抗法斗争中发扬了中国人民爱国助友的光荣传统,向法国侵略者展开了气壮山河的英勇反击战,镇南关、谅山、临洮战役中均重伤法军,收复了大片失地,获得重大胜利。

① 《翁同龢日记》,光绪十年七月初二日。

②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二)总第1773页。

③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二)总第1772页。

④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二)总第1773页。

在海战方面 :六、七月间 ,法将赖师皮率舰队至台湾基隆 ,并“致书其守将 ,约二十四小时内须将基隆让出 ,守将置不答 ,法舰炮击基隆炮台。”^①督办台湾防务刘铭传“率兵从法军背后进击 ,”士卒“奋激并力攻法军 ,法军始弃基隆 ,乘舰遁。”^②击退了法军的进攻 ,使敌人闻风丧胆 ,虽常出没于基隆近海 ,但始终不敢登陆挑衅。

中越军民抗法反击战的辉煌胜利 ,不但重伤法军实力 ,打乱了它开通中国南大门的战略部署 ,也使法国首都大为震惊 ,挑起侵略越南和中国的茹尔·费理政府因此而当即倒台。

中国抗法战争取得了陆海战的重大胜利 ,说明中国人民和当时的清朝政府是有力量抗击侵略势力的 ,关键在于最高统治集团是否敢于进行反对侵略者的正义战争。当害怕列强势力的主和派占主导地位时 ,必然采取妥协苟安的让步政策 ;然而 ,一旦主战力量在决策的中枢机构中占了上风 ,必然调兵遣将 ,筹饷运粮 ,集人力物力于前线 ,鼓励将士众志成城 ,上下协力 ,战争必然能打出胜利局面。在中枢机构中出现主战、主和分歧的时刻 ,皇帝的态度是极其重要的。光绪皇帝涉足朝政 ,开始过问中枢 ,参与决策就以鲜明的主战态度 ,加强了中枢机构中主战派的力量 ,并一时占了上风 ,从而形成了全国上下一致抗击法国侵略者的新局面。其间 ,清廷发出的一系列谕旨 ,一改以往模棱两可 ,含糊不清的官样文章。而是积极部署作战力量 ,简放将领、调集粮饷、全面筹划 ,诸方面作具体安排。还赏功罚过 ,整饬军纪 ,最明显的是

① 印鸾章 :《清鉴纲目》第 13 卷 ,第 750 页。

② 印鸾章 :《清鉴纲目》第 13 卷 ,第 750 页。

表现在对黑旗军将领刘永福的态度上。过去清政府害怕刘永福率领黑旗军抗法胜利而难以控制,就是李鸿章所说的“而反戈内向”,“兵连祸结,防不胜防”。甚至诬黑旗军为土匪,企图借法国侵略者的力量消灭黑旗军。尔今则不然,不仅“著以提督记名简放,并赏戴花翎。”而且还表彰刘永福索抱忠怀,“……统率所部出奇制胜,将法人所占越南各城迅图恢复。”^①肯定了刘永福在抗法战争中所建立的功绩。清廷态度的转变,不能简单地解释是利用刘军抗法,作为同法国和谈的资本。应该看到,清廷中的主战派同刘永福在抗法援越方面的共识之处,因而必然改变过去对黑旗军的错误态度。

抗法战争新局面的开创,显示了年轻的光绪皇帝决策重大事件时的虎虎生气,也表现了他理政的智才与魄力。然而,从当时清统治集团中各派实力来看,光绪皇帝以及一些主战大臣,还未能全面控制决策大权,他们所持的主战立场只能一时发挥对局势转变的促进作用,而不可能具有“力挽狂澜”的强大力量,所以中法战争虽然在战场上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但仍然以向法妥协谈判而告终,光绪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1885年4月7日)清朝发布停战令。以慈禧太后、李鸿章为代表的清朝统治集团中的实权派,他们唯恐战争发展下去“大局将不可收拾”,^②在英人赫德的斡旋之下,四月二十七日(6月9日)李鸿章和法国公使巴德诺在天津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光绪皇帝以及部分大臣的主战态度和战场上的重大胜利,它的最终影响只是在谈判桌上法国

①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二)总第1773页。

② 《李文忠公电稿》第2卷,第60页。

侵略者没有提出“赔款”、“割地”的要求。相反,法国因为战事失利而有所微微克制倒给妥协派有了“体面”的下场。

第三节 太后“训政”

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在近代中国历次对外战争中,它的结局对清朝统治者来说,是一次比较“体面”的战争。既无赔款,也没割地,只是牺牲了越南的独立地位,承认越南是法国的“保护国”,法人在中国也只是得到广西、云南通商和修筑铁路的特殊权益。可是中法战争对光绪皇帝来说,却是他一生历史的新起点;同时,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关系也因这次战争而发生了新的变化,所谓的“帝党”与“后党”两个派系初现影子。

111

在中法战争中年轻的光绪皇帝开始看到了清朝统治政权的危机,敏锐地感到他在位的光绪朝面临着“对不起祖宗”的严重威胁。光绪十年(1884)三月初八日,召见枢臣,他感叹:“边防不靖,并(疆)臣因循,国用空虚,海防粉饰,对不起祖宗。”^①此言切中时弊,光绪帝对清朝危机的认识,已达到了理性的深度。中法战争中暴露出来诸如前线将帅指挥无能,被动挨打;中枢要员苟且图安,妥协求和等等弊病,表明整个统治机制的功能已经严重丧失。这一切促进了光绪皇帝的觉醒,毅然支持主战,在他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之时,就胸怀捍卫祖宗基业的雄心,这是光绪皇帝政治思想成熟的一个鲜明标志。从此,他在对外抵抗列强的侵略,对内革新变法

^① 《翁同龢日记》,光绪十年三月初八日。

的道路上迈着艰难沉重的步子不断前进。

光绪帝在中法战争中所持的鲜明的主战立场,使这场战争偏离了慈禧太后主和轨道,皇帝与太后的政见分歧初见端倪。政治嗅觉极敏感的慈禧太后,开始觉察出自己一手扶植的嗣皇帝,已经出格于事先精心设计的模式,不能不使她感到一股潜在的威胁。因而她要防范于未然,想方设法地“以威钳制”光绪皇帝,让新皇帝在她设制的规范之内,掌理朝政。

为了使清朝的大政方针不逾越“垂帘听政”的雷池,慈禧太后采取了两个方面的重大措施:措施之一,重新调整军机处班子。

光绪十年三月西太后改组军机处,其时正是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对于中法战争主和与主战剧烈争论的关键时刻,光绪皇帝明确地站在主战派一边,公开亮出同太后的不同主见,发人深省。为此,慈禧太后把对法国侵略者主战、主和作为是否适合“在军机大臣上行走”的一个重要原则。三月戊子(十三日)慈禧太后发出懿旨改组军机处,其中凡被逐出者,多系主战的大臣。其理由所列,各有其辞:

恭亲王奕訢,“近年爵位日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开去一切差使。”

“大学士宝鋐(入直)最久,责备宜严,姑念一系多病,一系年老,……著原品休致。”

“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李鸿藻内廷当差有年,祇为囿于才识,遂致办事蹉跎兵部尚书景廉……经济非所长,均著开去一切差使,降二级调用。”

“工部尚书翁同龢,甫枢廷,适当多事,惟既别无建

白,亦有应得之咎,著加恩革职留任,退出军机处,仍在毓庆宫行走。”^①

被逐出军机处的大员,懿旨中均未提及他们在法国侵犯越南的军事冲突中的立场。因为当时越战正在激烈地进行着,同时,法国又通过德国人德璀琳周旋于李鸿章和法使福祿诺之间,以促成中国再次谈判。这样局面下,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当然要掩盖其内部的分歧,如果把主战与主和的争论暴露出来,那末“诡诈多端”的法国代表福祿诺就会在谈判桌上增加筹码,清廷将处左右为难的尴尬地位。据《清史稿》所载,被逐出军机处的几位大臣均同他们的主战态度有关。^②

奕訢:“(光绪)十年,法兰西侵越,王(恭亲王奕訢——引者)与军机处大臣不欲,轻言战,言路交章论劾。太后谕责王等委靡因循,罢军机大臣,停双俸。”^③

按:《清史稿》直接了当地指出,奕訢被“罢军机大臣,停双俸”的主要原由是他“轻言战,言路交章”,这是对奕訢因主战立场而被逐出军机处原因之一的最好佐证。

翁同龢:“十年法越事起,同龢主一面进兵,一面与议(和),庶有所备。又言刘永福不足恃,非增重兵出关不可。旋与军机大臣同罢,仍直毓庆宫。”^④

按:慈禧太后的懿旨里对于翁同龢被撤军机大臣的原由,只是含糊其辞地说“既无建白,亦有应得之咎”,然未加举例说明。翁同龢在自己的《日记》里也不便坦言心怀。惟

①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二)总第1675~1676页。

② 《光绪朝东华录》、《清德宗实录》虽未载以上大臣的主战态度,而《清史稿》却有不同程度的记述。笔者认为《清史稿》的撰稿人如赵尔巽等都是“同光要员”。故西太后改组军机处的记载,可谓是当时人谈当时事,是比较可信的。

③ 《清史稿》第30册,第9107页。

④ 《清史稿》第41册,第12369页。

《清史稿》翁传对此作了明确的注脚,原来是翁同龢在中法战争中主张“一面主战,一面与议(和)”,并且要“增重兵出关”抗战,而“上亦为然”。师生政见不谋而合,同慈禧太后的主和方针唱反调,翁同龢军机大臣之冠当然会被摘去。

李鸿藻因当时崇厚与俄擅定伊犁约,鸿藻坚持不可,争于廷。……及法越启衅,言路愈奋发,劾罢枢臣。”^①

按李鸿藻一贯主战,在中法战争时期“言路愈奋发”主战态度更为激烈,故亦“劾罢枢臣。”

“景廉曰:‘政府如射之有的,言者期中耳,于我辈何憾?且诋政府者率无罪,未必非大臣之福也’,人服其量。”^②

按:《光绪朝东华录》所载景廉“经济非所长”这同他的兵部尚书头衔风牛马不相及,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其实,景廉主张开放言路,主要是要造成主战气氛,因为当时清廷与法国签订了《中法会议简明条款》,引起舆论哗然,景廉企望舆论的力量来迫使朝廷同法正式宣战。所以也被“开去一切差使。”

宝焯乃恭亲王奕訢的心腹,长期与之合作共事,“恭亲王资襄助”,“时偕恭亲王居西山游览唱和”。^③恭亲王下台必然株连同僚,加之宝焯年愈八旬,因而“以原品休致”的体面下场。

综上所述,光绪十年三月,西太后改组军机处班子是和皇帝同太后在中法战争中政见分歧的产物。军机处是封建专制统治制度发展的标志,它是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发号施令的策源地,应该为皇帝得心应手的工具,发挥左辅右弼的作

① 《清史稿》第41册,第12367页。

② 《清史稿》第41册,第12369页。

③ 《清史稿》第318册,第11698页。

用。慈禧太后改组军机处的目的,一是为了让她的心腹全面控制这个重要的中枢机构,不折不扣地贯彻太后的“既定方针”。改组后的“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著同醇亲王奕訢商办。”^①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刑部尚书张之万、工部左侍郎孙毓汶等西太后的心腹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或“学习行走”。二是,因为光绪皇帝亲政的年岁已经临近,慈禧太后在光绪帝亲政以前改组军机处,就是要在皇帝秘书班子中安插耳目,达到皇帝亲政以后仍能继续严密控制清朝大权的目的。

措施之二,施行“训政”,暂缓归政。

光绪十年三月慈禧太后改组军机处班子,许多主战大员被逐出中枢,可是同年七月初六日,清廷正式向法国宣战,并调兵出关,作了一些较为认真的抗战准备和部署。在清朝高层统治核心中出现这种矛盾现象,最主要的原因是光绪皇帝鲜明的主战态度所发生的效应。尽管当时的载湉还是一位初涉朝政的年轻皇帝,内外大事的决策权力牢牢地控制在慈禧太后手中,从无旁落与下移。然而,人们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形成的皇帝君临天下、至高无上的心态,是任何力量所不能动摇的。光绪皇帝所表示出来的主战态度,使得清朝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阶层他们的心灵天平失去了平衡,朝着主战力量倾斜,清政府迫于内外主战呼声的压力,所以作出抗战姿态,对法宣战。但是起决策作用的仍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妥协派,因而清廷仍然在寻求同侵略者和解的途径,从未改变过妥协让步的态度。上面已经论述,年轻的光绪帝在中法战争中初显锋芒,处在“垂帘听政”时期的慈禧太后也隐约

^①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二)总第1677页。

地预感到光绪帝的处政方针,同她原来设计的模式有出格、偏离的势头。随着光绪皇帝的成长,西太后权力转移的恐惧感也与日俱增。屈指推算,再过二、三年光绪帝快将十六、七岁了,就要从冲龄少年步入青年时代。满腔锐气和雄心勃勃的年轻皇帝必将摆脱“垂帘听政”的桎梏,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治理中国。

慈禧太后经历过多次政治风险,然而她都能在紧急关头施行权术,化险为夷,这次她精心设计了“训政”妙计,作为束缚光绪帝手脚的法规。意思就是从“垂帘听政”到皇帝亲政之间,划出一段“太后训政”的过渡阶段。其险恶用心是要在“训政”时期给光绪皇帝制造一个特殊的御座,把光绪皇帝以法定的傀儡皇帝面貌推上政治舞台。

光绪十二年(1886),十六岁的光绪皇帝经过十余年封建伦理教育,“孜孜念典,德业日新”。“皇上天亶聪明,过目成诵。六经诸史,前数年即能举其辞。”^①可谓已经到了“典学有成”的时候了,并且他对于掌理朝政也产生了极大兴趣和一定的能力,“近来披阅章奏,论断古今,剖决是非,权衡允当。”^②中法战争促进了光绪皇帝政治思想上的成熟,从而也增强了对于行使皇帝权力的要求。尔今的光绪帝正是风华正茂,其智力与阅历日新月异地成长着。君临天下,乾纲独揽的天子形象显现在人们的心坎里,而且对周围的人与事不断地发出威慑力量。总之,皇帝亲政,势在必行。

早在十二年之前,慈禧太后践踏“祖宗家法”强立与同治帝平辈的载湉为嗣皇帝,为了搪塞舆论,曾许过两条诺言:

①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二)总第2124页。

②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二)总第2119页。

一是：“皇帝龙驭上宾，未有储贰，不得已以醇亲王奕綏之子载瑾承继文宗（咸丰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①

其二，“垂帘听政之举，本属一时权宜，惟念嗣皇帝此时尚在冲龄，……一俟嗣皇帝典学有成，即行归政。”^②

时至今日，第一条诺言皇帝未曾“大婚”还可从缓计宜。而第二条诺言，皇帝无论从年龄（十六岁为成年）或从智力、阅历来说亲政条件已经成熟，“即行归政”已经到了兑现的时候了。鉴于这种形势，慈禧太后于光绪十二年六月初九日（1886年7月11月）召见她的心腹醇亲王奕綏、礼亲王世铎议论“归政”。其时西太后是否向醇、礼两位亲王暗示过“训政”打算，无记载可稽，人们不得而知。但是从“训政”闹剧一幕一幕地有步骤地搬上舞台，密锣紧鼓配合默契，不能不使人感到蹊跷。就在召见两亲王的当日，慈禧太后发出一道早已准备好的懿旨，做出一副急于“归政”姿态。

前因皇帝冲龄践阼，一切用人行政，王大臣等不能无所禀承。因准廷臣之请，垂帘听政。并谕自皇帝典学有成，即行亲政。十余年来，皇帝孜孜念典，德业日新。近来披阅章奏，论断古今，剖决是非，权衡允当。……自应钦遵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七日懿旨，即行亲政，以慰深宫期望之意。坛庙大祀，均应亲诣行礼，以昭诚敬。即本年冬至大祀圜丘为始，躬亲致祭。并著钦天临于明年正月选择吉期，举行亲政典礼。^③

①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2页。

②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4页。

③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二）第2119页。

讲的是这一套,做的是那一套,这是慈禧太后的惯用伎俩,他一面大讲皇帝“即行亲政”,一面抓紧编导“训政”闹剧。她善于借他人之口行己之事。懿旨发出的第五天,六月十四日,由她的亲信醇亲王奕诼、礼亲王世铎以及伯彦纳谟祜等人出面,他们用不同的理由上奏,“合词吁恳皇太后训政”。^①然而,“太后训政”在清朝史无前列,作为老练的政治能人——西太后当然要把“训政”闹剧编得天衣无缝,演得情真意切,使外界无可指责。她在“合词吁恳皇太后训政”奏折的批示中,装模作样地声称:该王大臣等所请训政数年及暂缓归政之议,均毋庸议。”^②即着,话题一转,隐约地亮出“训政”的意图。

至醇亲王折内所称,宫廷政治,内外并重,归政后当永照现在规制,凡宫内一切事宜,先请懿旨,再于皇帝前奏闻,俾皇帝专心大政等语。念自皇帝冲龄嗣统,托育训诲深衷,十余年如一日,即亲政后,亦必随时调护,遇事提撕,此责不容卸,此念亦不容释。^③

在这里慈禧太后借皇帝的亲生父亲奕诼口,对皇帝亲政以后的理政原则和皇太后凌驾于皇帝之上的绝对权威作了明确的肯定。和盘托出了事先策划好的“训政”法规,“归政后当永照现在规制”,就是要光绪皇帝永远不得改变“垂帘听政”的体制。

六月十八日再次发出懿旨,正式亮出了“太后训政”的招牌。

醇亲王奕诼奏,重申愚悃请允训政,礼亲王世铎等

①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二)第2123页。

②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二)第2125页。

③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二)第2125页。

奏再行沥诚吁恳训政数年各一折。皇帝初亲大政,决疑定策,实不能不遇事提撕,期臻周妥。既该王大臣等再三沥恳,何敢固持一己守经之义,致违天下众论之公。勉允所请,于皇帝亲政后再行训政数年。^①

慈禧太后表示“勉允所请”,“再行训政数年”之后,礼亲王世铎这位善于投西太后所好的圆滑人物,立即草拟了一个所谓《训政细则》于十月二十五日奏请慈禧太后呈览定夺,择其要点列下:

一,迅遇召见,皇太后升座训政,拟请照礼臣会议,暂设纱屏为障;一,中外臣工呈递皇太后、皇上安折,应请恭照现式预备,奏折亦恭照现式书写;一,近年各衙门改归验放验看开单请旨及暂行停引见人员,拟请循照旧制,一律带领引见,仍恭候懿旨遵行,排单照现章预备;一,乡会试及各项考试题目向例恭候钦命者,拟请循照旧制,臣等进书恭候慈览,择定篇页,请皇上钦命题目,仍进呈慈览发下,毋庸奏请派员拟题。至各项翻译场题,仍由南书房翰林办理,考试蒙古中书等项,仍由臣等照例恭拟翻译题呈进;一,内外臣工折奏应行批示者,拟照旧制均请朱笔批示,恭呈慈览发下。^②

从这份《训政细则》的主要内容来看,实际上是西太后“垂帘听政”的继续,所不同的只是过去上朝太后御座前用垂帘避大臣的视线,而今以“暂设纱屏为障”。其他清王朝最高统治机制的旋转轨道,同“垂帘听政”换汤不换药,无实质上的区别,大权仍然牢牢地控制在慈禧太后手中。《训政细则》

①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二)第2141~2142页。

②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二)总第2180~2181页。

施行以后,就成了清朝统治集团一切活动的法规,皇帝必须受到这个法规的制约,如果稍有出格就被视为“越轨”行为,太后有权加以处置。

经过慈禧太后精心策划,在光绪帝亲政以前,设置了一段“训政数年”的过渡阶段,其着眼点不仅是在于“数年”,而是企图通过“训政”这块跳板,到达长期控制清朝大权的彼岸;并且用《训政细则》作为光绪皇帝一切活动的法规,永远把光绪帝完全置于傀儡皇帝的地位。

《训政细则》出笼二个多月以后,于光绪十三年正月十五日(1887年2月7日)举行了光绪皇帝的亲政典礼。是日寅时正(早上),光绪帝诣大高殿、寿皇殿行礼;辰时二刻,诣慈宁宫率王公百官向慈禧太后行庆和礼;然后御太和殿,光绪召见百官大臣受贺,并颁诏天下。^①这天举行的庆典,名为光绪皇帝的“亲政大典”,实际上是一场“太后训政”的仪式,从此,清王朝开始了太后训政时期。然而,历史的进展往往会走向本来愿望的反面。慈禧太后设置的训政跳板,没能阻挡光绪皇帝走自己的政治道路;《训政细则》也没能发挥慈禧太后预期的效应,成为光绪皇帝理政的永久性的法规。相反,却使光绪帝增强了他的逆反心理。亲政以后的实践表明光绪皇帝偏离了慈禧太后制定的种种法规,“光绪新政”是对《训政细则》最好的回报。

^① 参见《翁同龢日记》光绪十三年正月十五日,《清德宗实录》第238卷,第7~8页。

第四节 大婚与“亲政”

光绪十三年正月十五日在故宫太和殿举行了光绪帝的“亲政”典礼,以“训政”之名取代了“垂帘听政”之实,西太后仍是清朝的最高统治的主宰者。慈禧太后所以要炮制“训政”骗局,因为光绪帝已经十七岁了,按中国社会习俗男子十六岁进入成人阶段,已经具备了娶亲的条件,所谓“成家立业”。何况是作为万乘之尊的天子,为亿万百姓的表率,皇太后再也不能“抱子坐龙廷”了。因而,时间每向前推进一刻,太后归政的舆论也就强烈一层,慈禧太后心理上所承受的压力与日俱增。她虽然搞了一个“训政数年”的过渡阶段,然这只是权宜之计,新的难题还不断地出现在面前,等待着她去应付。

光阴飞逝,一瞬间又是一年过去了,1888年是光绪十四年,光绪皇帝已是十八岁的青年了。他风度翩翩,沉着深思,泰然自如地召见臣下,接受百官朝贺陈奏,俨然以皇帝独断乾纲的姿态出现在皇宫殿堂。一阵阵的“皇上万岁”声不断地传到西太后的耳边,是对她极大的心理刺激。“太后归政”这一严酷现实,一步步地向着慈禧太后的独裁统治逼近着。其时的慈禧太后虽然精力还很充沛,处政理朝仍然决断如常,可是她到底也已经是五十四岁的妇人了,中国女子跨出五十,谓之“老嫗”,到了“颐养天年”的年岁。

面临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压力,按照慈禧太后这位女强人的性格,先发制人是她的一贯处世原则。光绪十四年六月

十九日(1888年7月27日)她发出懿旨：

前因皇帝甫经亲政，决疑定策，不能不遇事提撕，勉允臣工之请训政数年。两年以来，皇帝几余典学，益臻精进，于军国大小事务，均能随时剖决，措置合宜，深宫甚为欣慰。明年正月大婚礼成，应即亲裁大政，以慰天下臣民之望。^① 著钦天监，于明年二月内敬谨选择吉期具奏。

慈禧太后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比原定再“训政数年”大为提前，断然决定给光绪皇帝于明年（光绪十五年）婚配及“亲裁大政”，这是她又一高明的绝招。两年前颁布的《训政细则》已经形成“凡宫内一切事宜，先请懿旨再于皇帝前奏闻”的惯例，^②“旧制”成了新规，皇帝“亲裁大政”以后，也必“循照旧制”，谅他不敢擅自独断，所以落得做出慷慨大度之举，“以慰天下臣民之望。”何况在“婚配”问题上还可大做文章，严加防范。

宗室皇子的婚配是其一生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件。一般的皇子，一经婚配，就“依例先行分府出宫”自立邸第。^③皇帝的“大婚”与“亲政”是人生的同一里程，对光绪皇帝来说，“大婚”便意味着“太后归政”和皇帝“独揽乾纲”，光绪皇帝视此为解脱西太后控制的一个机会，也是他终日所盼的夙愿。十余年来，光绪皇帝在这位“亲爸爸”身边生活着，对慈禧太后的为人有所认识，这次西太后宣布明年给他婚配和让他“亲裁大政”的决定，知道她所怀的心机，是出于应付宗室内外和朝廷上下的舆论压力。

① 《清德宗实录》第256卷第6页。

②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三）总第2125页。

③ 溥仪：《我的前半生》第1页。

所谓“以慰天下臣民之望”云云，并非是慈禧太后装刷门面之美辞。按照清朝成例，皇帝婚配基本上都在十五、六岁这一阶段，因此皇帝婚配成了舆论的热门话题。笔者查阅文献列出清代皇帝婚配年岁如下：

顺始帝十五岁册封博尔济苦特氏为皇后；

康熙帝十四岁册封赫舍里氏为皇后；

雍正帝四十五岁即帝位，元年册封乌喇那拉氏为皇后，因中年即位另作别论；

乾隆帝十五岁册封富察氏为皇后；

嘉庆帝十六岁封喜塔腊氏为嫡福晋；

道光帝三十八岁册钮祜禄氏为嫡福晋；

咸丰帝十六岁（道光二十七年）册萨克达氏为嫡福晋，道光二十九年薨。咸丰二年（1852年）二十二岁册封钮祜禄氏为皇后（即东太后）；

同治帝十八岁，册封阿鲁特氏为皇后。^①

那么，十八岁的光绪皇帝，其大婚必然为“天下臣民所望”。因为大婚与亲政同一标志，与其说“臣民所望”光绪帝婚配，不如说所望慈禧太后“归政”。然在西太后“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气氛之下，“天下臣民”只能在皇帝“大婚”问题上借题发挥，对西太后施加压力。慈禧太后本人也心照不宣，她顺着“天下臣民”的心理，抛出了决定为光绪皇帝准备大婚的懿旨。况且选定后妃的大权掌握在太后手里，她继续可以利用皇帝婚配这个机会，在决择皇后人选时再次玩弄手法，在光绪皇帝身边安插心腹，可以更加严密地控制光绪帝，这倒给慈禧太后继续掌握大权，又增添了一层保险因素。

① 《清史稿·后妃传》第30册，第8905～8930页。

皇帝的婚配与“亲裁大政”，不仅是“天下臣民所望”，其实也是“君民”所共望。婚配对光绪帝来说并不“所望”，而“亲裁大政”正是符合他日益增强着的理政要求。在“典学授读”期间，帝师翁同龢教授《左传》，“古今治乱反复陈说”因而获得了一定的历史知识，能够“论断古今”“权衡允当。”历史上出现过许多傀儡皇帝，他们的苦衷和下场，是光绪皇帝的一面镜子，他不会甘心情愿地长期充当慈禧太后手掌里的挂名皇帝，所以慈禧太后发出懿旨不久，光绪皇帝即刻发出上谕，顺水推舟，企望自己的夙愿早日促成。

谕内阁 朕自冲龄践阼，仰蒙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垂帘听政，丰功伟烈，震古铄今，宵旰勤劬，数十年如一日。迨光绪十二年元月令朕亲裁大政，犹复曲垂慈爱，特允训政之请，劳心庶务及又两年。慈奉懿旨于明年二月归政，朕仰体慈躬敬慎谦抑之本怀。并敬念三十年来，圣母为天下忧劳况瘁，几无晷刻可以稍资休息。抚衷循省，感悚交深。慈复特沛温纶，重申前命，朕敢不祇遵慈训，于一切机务，兢兢业业，尽心经理，以冀仰酬我圣母抚育教诲有加无已之深恩。……所有归政届期一切应行典礼事宜，著各该衙门敬谨酌议具奏。^①

上述谕旨表达了光绪皇帝希望尽快地从“圣母皇太后”手中转移理政大权的心愿。何以此说呢？按惯例，凡太后恩典，包括皇帝在内，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总是要作出一翻“收回成令”或者“皇上闻谕后长跪恳辞”之类的请求，而这次光绪帝则顺水推舟，于同时发出谕旨，足以证明笔者的论断。谕旨所云“圣母为天下忧劳况瘁，几无晷刻可以稍资休

^① 《清德宗实录》第256卷，第6~7页。

息” ,光绪帝的潜意是现在我已成年了 ,“ 圣母 ” 可以轻松一下肩负的重担 ,“ 稍资休息 ” 道出了对慈禧太后“ 训政 ” 的不满心情。光绪帝深知慈禧太后其人贯于出尔反尔为能事 ,唯恐夜长梦多 ,以后变卦 ,故他把上谕发给内阁 ,按“ 红本 ” 收发程序 ,必公布于廷臣并纪录存档 ,今后不易“ 收回成令 ” ,并立即“ 著各该衙门敬谨酌议具奏 ” ,以造成事实 ,即可“ 归政 ” 有期。光绪帝初涉朝政 ,还未能完全摆脱政治斗争中的幼稚天真气息 ,而他的对手慈禧太后是一位具有丰富政治经验的女强人 ,因而对下一着棋如何走法 ,还很朦胧。“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慈禧太后在选定后妃过程中耍尽手腕 ,逼着光绪皇帝一步一步地走入她预谋的圈套。清朝皇帝的后妃有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等八个等级。^① 给光绪皇帝选择后妃至关重要 ,对朝廷的政治和皇帝的思想有直接的影响 ,冠冕堂皇的说法 ,是“ 佐理宫闱 ,以协坤仪 ,而辅君德。”^②慈禧太后本人 ,原来只是宫内的一般宫女 ,因为得到咸丰皇帝的宠幸 ,成为妃子后来渐渐步入青云 ,成为权倾天下的清朝最高主宰者。西太后根据她本人的经历 ,认为光绪帝的后妃必须是对她唯命是从 ,完全能够充当耳目的女子 ,达到严密控制光绪皇帝的目的。鉴于上述原因 ,所以在光绪皇帝的婚配问题上慈禧太后用尽心机 ,其整个过程 ,完全由她一手策划。皇后与妃都是在光绪十四年十月初五日(1888 年 11 月 8 日)一并选定。

十月“ 癸未(初五日) ,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懿旨 :皇帝寅绍丕基 ,春秋日富 ,允宜择贤作配 ,

① 参见《清稗类钞》策 3 册“ 宫闱类 ” 第 2 页。

② 朱寿朋编 :《光绪朝东华录》(三)总第 2513 页。

佐理宫闱,以协坤仪而辅君德。慈选得副都统桂祥之女叶赫那拉氏,端庄贤淑,著立为皇后。特谕。”

钦奉懿旨:“原任侍郎长叙之十五岁女他他拉氏,著封为瑾嫔;原任侍郎长叙之十三岁女他他拉氏,著封为珍嫔。”^①

关于慈禧太后为光绪帝选后、妃的情况,白蕉在《珍妃之悲剧》一文中生动的记述:

慈禧太后为德宗选后,在体和殿召备选之各大臣少女进内依次排立,与选者五人,首列那拉氏都统桂祥女,慈禧之侄女也;次为江西巡抚德馨之二女。未列为礼部左侍郎长叙之二女。当时太后上坐,德宗侍立,荣寿固伦公主及福晋命妇立于座后。前设小长桌一,上置镶玉如意一柄,红绣花荷包二对,为选定证物(清例选后中者,以如意予之;选妃中者,以荷包予之)。太后手指诸女语德宗曰:“皇帝!谁堪中选,汝自裁之,合意者即授以如意可也。”言时即将如意授与德宗。德宗对曰:“此大事当由皇爸爸主之,子臣不能自主。”太后坚令其自选,德宗乃持如意趋德馨女前,方欲授之,太后大声曰:“皇帝!”并以口暗示其首列者(即慈禧侄女),德宗愕然,既乃悟其意,不得已,乃将如意投其侄女焉。太后以德宗意在德氏女,即选入妃嫔,亦必有夺宠之忧,遂不容其续选,匆匆命公主各授荷包一对与未列二女,此珍妃

①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三)总第2513页。

姐妹之所以获选也。^①

据上述记载慈禧太后为光绪皇帝选定后妃的手法,仍是她强立载瑾为嗣皇帝的故技重演,完全违背光绪皇帝的意愿,给他的婚姻悲剧潜下了祸根。

入选的皇后,叶赫那拉氏(1868~1913),生于同治七年正月初十日(1868年2月3日),比光绪帝长三岁,入宫后于次年正月立为皇后,宣统时上徽号曰“隆裕”,故后人称她为“隆裕皇后”。其父亲副都统桂祥,是慈禧太后之弟,她是太后的侄女。慈禧太后立桂祥之女为皇后,确实可堪称居心叵测了。一则皇后是自己亲侄女,对她必是唯命是从,可以充为耳目,监视光绪皇帝的行动。正如英濮兰德、白克浩司书中所说的那样,“此次为光绪帝选后,其意重在为自己心,以监察皇帝之行为,而报告之。”^②二则是为了培植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那拉氏私家势力,步历史上外戚当权的后尘。光绪皇帝的母亲是西太后的胞妹,企图用“包含着叶赫那拉氏一族的血系”^③的载瑾当大清皇帝,这样便可为发展那拉氏私家势力开放门户。如今又立了她的侄女“一个十足的叶赫那拉人”^④为光绪帝的皇后,可“为将来母族秉政张本。”^⑤然而,事实的发展与慈禧太后的愿望相反,因为立隆裕皇后只是西太后的一厢情愿,不合光绪帝的意志,这种迫于压力“遂免奉

127

① 光绪帝选定后妃的日期,文献资料有不同的记载:《清宫词注》及《故宫周刊》为光绪十三年冬,《光绪朝东华录》及《清皇客四谱》为光绪十四年十月初五日,《翁同龢日记》光绪十四年十月初五日,记录懿旨与《光绪朝东华录》同,故笔者取十四年十月初五日说。

② 《慈禧外纪》第112页。

③ 德龄:《瀛台泣血记》第154页。

④ 德龄:《瀛台泣血记》第156页。

⑤ 白蕉:《珍妃之悲剧》《人文月刊》第6卷第6期第2页。

之”的婚配无疑是对他精神上是莫大的触犯,因而又增加了一层反弹力,皇帝与太后的关系由原来政治主见上的一丝分歧而发展为“母子”感情上的鸿沟,一片阴云在西太后和光绪皇帝的寝宫上面排回飘荡,日积月累必将酿成为一场雷雨交加的风暴。

光绪皇帝后、妃选定后,大婚与“归政”已提到议事日程。

本年十一月初二日“纳采”、初四日“大徽”。所谓“纳采”和“大徽”,就是皇上向被选为后的桂祥府宅传送诏书和聘礼。因为西太后选自己的侄女为皇后,其“采礼”是格外的丰厚,除按惯例两枚金戒指、一柄玉如意、一对杏黄贡缎制成的枕头套以外,还有大批极为华贵的绫罗绸缎衣料和向皇后赠送其他金银首饰。由内务府派出大官员送去,皇后母家当天即摆“采纳宴”以示庆贺。“纳采”和“大徽”之日,实际上就是皇帝大婚的开始。

经过一番紧张的幕后筹划,到光绪十五年(1889)正月,光绪皇帝的“大婚”和慈禧太后的“归政”事宜基本上准备完毕,于是慈禧太后于正月二十四发出懿旨:“本年正月举行皇帝大婚典礼,二月举行归政典礼。”^①

光绪帝的大婚典礼在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1889年2月26日~28日)三天内举行。

壬申(正月二十六日)“上诣慈宁宫行礼,御太和殿受贺”;

癸酉(二十七日)“大婚礼成”;

“甲戌,上诣寿皇殿行礼。颁诏天下覃恩有差。”^②

①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三)总2572页。

②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三)总第2576页。

关于光绪帝大婚经费,文献记载不一,有的说共计用黄金四千一百二十六两有差;白银四百八十二万四千一百八十三两,^①据《光绪朝东华录》载:

办理大婚典礼,户部去岁筹拨外用之款二百万两,著户部全数提拨来京,由礼仪处交进。其传办外省应需之款,由礼仪处随时奏明,核定价值请领,由支发再办理大婚之款,四百万两尚不敷用,著户部再行筹拨一百万两。先行提拨二十万两,由礼仪处交进,其余八十万两陆续筹拨。”^②

当时任户部尚书的翁同龢,在《日记》中说:“大婚提拨京饷五百五十万两,部库三百五十万两,外省二百万两。内交进五百十万,划拨外省制办〔 〕计银二十七万〔两〕”^③《日记》与《光绪朝东华录》所载其数基本接近。故笔者认为光绪大婚经费为五百万两有差比较可信。皇帝大婚之典花费巨款,豪奢盛大,历代如此,无可厚非。问题在于五百万两之巨款,通过为筹办婚礼而临时建立的“办事公所”这个孔道,滚滚流入慈禧太后以及她的亲信的私囊,“大婚”究竟花了多少银两只有老天爷才知道。说明清朝官僚的腐败已经渗透在各个肌体,这是清政权病入膏肓的又一例证。

光绪皇帝的“大婚”典礼以后,接踵而来的是“太后归政”,亦谓皇帝“亲裁大政”。在太后与皇帝之间环绕在“归政”与“大婚”两件大事展开了初次的较量。

别看十八岁的年轻皇帝稚气未退,羽毛未干,然而他天

① 柳诒徵:《清德宗之大婚》《史学与地学》第3期第38页。

②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三)总第2409页。

③ 《翁同龢日记》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日。按翁同龢于光绪十一年调户部尚书。

资聪颖,在十四年的宫廷生活中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政治斗争本领。早在慈禧太后发出皇帝婚配与让皇帝亲裁大政的懿旨以前,光绪皇帝就向西太后提出“颐养天年”的暗示,并开始进行具体筹划。光绪十四年二月初一日(1888年3月13日)光绪皇帝上谕:

朕自冲龄入承大统,仰蒙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垂帘听政,忧勤宵旰,十有余年。中外奠安,群黎被福。上年命朕躬亲大政,仍俯鉴孺忱,特允训政之请。溯自同治以来前后二十余年,我圣母为天下忧劳,无微不至。而万几余暇,不克稍资颐养,抚衷循省,实觉寝馈难安。因念西苑密迩宫廷,圣祖仁皇帝曾经驻蹕,殿宇尚多完整,稍加修葺,可以养性怡情。至万寿山大报恩延寿寺,为高宗纯皇帝侍奉孝圣宪皇后三次祝嘏之所。敬踵前规,尤臻祥洽。其清漪园旧名谨拟改为颐和园。殿宇一切亦量加葺治,以备慈舆临幸。恭逢大庆之年,朕躬率群臣,同伸祝嘏,稍尽区区尊养微忱。^①

光绪皇帝的上谕,意思是既然“上年命朕躬亲大政”,那么“圣母”皇太后“就可以养性怡情”了,暗示请她退出历史舞台。慈禧太后在光绪“吁恳再之”之下,只得“幸邀慈允”择于四月初十日“恭奉皇太后銮舆驻蹕”颐和园。光绪皇帝恭请慈禧太后往颐和园“养性怡情”的上谕,有的学者认为是慈禧太后“以光绪帝的名义颁谕,借口准备‘归政’为西太后扩建颐和园大加粉饰”。笔者认为如此判断,是值得商榷的。当时人翁同龢评论说:“谕旨委婉详尽,凡数百言”^②。大加

① 《清德宗实录》第252卷第1页。

② 《翁同龢日记》光绪十四年二月初(初一日)。

赞颂,可见谕旨非出于慈禧太后的亲信之手。翁氏所谓“委婉详尽”意思是说光绪皇帝用婉转的语言,说出了希望西太后“养性怡情”,不要再为“天下忧劳”的心里话。所以笔者认为,光绪帝筹划为慈禧太后修葺颐和园乃是他企望摆脱被控制地位的一个极为重要策略。正因为这段谕旨,慈禧太后察觉出光绪帝的用心。所以她相应地策划提前结束“训政”的骗局,突然提出皇帝大婚与亲裁大政,让光绪帝堕入新的圈套。这个骗局除了选定她的侄女为光绪皇帝的皇后来控制和影响光绪皇帝的思想与行动之外,还经与她的心腹一起策划之后,由礼亲王世铎等人提出了一个所谓《归政条目》作为光绪皇帝“亲裁大政”永久性的法规。光绪帝的“大婚”和慈禧太后“归政”日期即将临近的时候,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初一日(1889年1月2日)世铎上奏,迫不及待地抛出了太后归政以后,清廷的办事《条目》,其奏折的要点如下:

131

明年二月恭逢归政大典,除业经归复旧制各事毋庸另议外,现在应办之事,有应归复旧制者,有仍应暂为变通者。臣等悉心商酌,并与醇亲王面商,意见相同,谨拟条目,恭候钦定:一,临雍经筵典礼,御门本事,仍恭候特旨举行;一,中外臣工奏折,应恭书皇上圣鉴,至呈递请安折,仍应于皇太后、皇上前各递一份;一,各衙门引见人员,皇上阅看后,拟请仍照现章,于召见臣等时请〔懿〕旨遵行;……以上各条,恭候皇太后,皇上圣鉴别训。^①

这份《条目》实质上是过去《训政细则》的翻版。明确规定了慈禧太后的最大权力,其中关键是有两条:其一是,中外臣

^①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三)总第2542页。

工的奏折,仍应一式两份,即太后与皇帝各一,这样太后仍可在奏折上批示懿旨,决断一切;其二是各衙门引见人员,仍照规章,就是照《训政细则》“恭候懿旨遵行”,用人大权仍在西太后手掌之中。这两条概括地说即“用人行政”,这是清廷权力之根本。所以慈禧太后对《条目》非常满意,批示为“如所议行”。^①以《条目》为清朝处政准则,光绪皇帝名为“亲裁大政”,实际上在清廷统治权力中仍处于陪衬地位,不能完全摆脱挂名皇帝的处境。慈禧太后致所以如此慷慨大度,在“训政”仅一年半的时间,就让光绪皇帝亲裁大政,根本原因就在这里。经过大婚与归政的形式,慈禧太后在光绪皇帝身上加了两道枷锁,内廷则有皇后为耳目,外廷则有《条目》为法规,慈禧太后便可以在颐和园里安心“养性怡情”了。

慈禧太后以及她的心腹,经过一阵紧张的密谋策划,在紧接皇帝大婚以后,立即宣布光绪十五年二月初三日(1889年3月4日)“己卯(初三日)上诣慈宁宫行礼,御太和殿亲政受礼”。^②举行“亲政”典礼。慈禧太后在表面上做出一副“即日归政”的姿态,将驻蹕颐和园。

从光绪元年到十五年间慈禧太后不断变换招牌,由“垂帘听政”到“太后训政”,再后“归政”。其实,清朝的最高权力并无新的传递和潜移,各个阶段一脉相承。“垂帘听政”时期的“圣母皇太后”,在归政以后,成为凌驾于光绪皇帝之上的清朝太上皇。她“表面上虽不预闻国政,实则未尝一日离去大权,身在颐和园,而精神实贯注于紫禁城也”。^③光绪皇

①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三)总第2542页。

②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三)总第2580页。

③ 濮兰德、白克浩司《慈禧外纪》第112页。

帝依旧必须：“每日至颐和园请安。”^①纵观光绪帝大婚和太后归政的全过程隐隐约约地反映出皇帝与太后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的较量。慈禧太后控制清朝大权，至此历时近三十年，她的势力盘根错节，心腹、亲信密布上下，光绪帝是初出茅庐，处世经验肤浅，当然不是她的对手，犹如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手掌一样。然而，光绪皇帝不满现状，怀着励精图治之雄心，他决不甘心于傀儡皇帝的地位，因而清廷高层的权力之争必然会以新的内容出现在新的历史阶段。

第五节 同珍妃的爱情

光绪皇帝的婚配是慈禧太后出于进一步控制皇帝的目的而一手导演成功的，他的皇后是由“孝钦（西太后）之强迫指定遂勉奉之”。^②完全不是光绪帝本人的意愿。大婚之后，光绪帝与皇后同床异梦，没有新婚燕尔的亲密感情。

隆裕皇后，姓叶赫那拉氏（1868～1913年），她的名氏文献上没有记载，只有德龄在《瀛台泣血记》一书中称她静芬。在封建社会，一个女子一旦册封为皇后，就以册封时的尊称或以徽号来称呼其人。静芬于光绪十五年正月立为皇后，册封时为孝定景皇后，宣统帝溥仪即位，上徽号曰“隆裕”，^③故史著中称她“隆裕皇后”。她出生于同治七年正月初十日

① 《清室外纪》第142页。

② 徐珂辑《清稗类钞》第3册，“宫闱类”，第58页。

③ 《清史稿》第30册，第8931～8932页。

(1868年2月3日),长光绪帝三岁,是副都统桂祥之女,^①桂祥乃西太后的胞弟,她是西太后的侄女。据曾经与隆裕结识过的德龄所云,在慈禧太后给光绪聘配以前,静芬小时由西太后的安排,曾与光绪有一段时期的接触。“当时光绪只向静芬看了一眼,心上便老大不高兴。他觉得这个小女孩子,绝对不是他理想中的同伴”。^②然而婚配的对象却正是这个不讨光绪帝喜欢的女孩子,因而对这位皇后产生了更强烈的反感。隆裕入宫以后,由于受到光绪帝的冷落,所以便处处依附慈禧太后,企图借西太后的威力来改善她同光绪帝冷漠的关系。不料与隆裕的愿望相反,光绪皇帝同她的感情不但没有一丝改善而且他们之间的关系却越来越疏远,绝无挽回之希望。德龄在《瀛台泣血记》一书中说:

我在宫里头听许多人说,自从婚礼举行过之后,光绪和静芬从不曾有过半点亲热的态度,他们只象同处在宫里的两个陌生人而已。除非逢到什么令节,或是参加什么典礼,使他们实在不能不开口之外,平时简直绝对没攀谈过一次。^③

皇宫里有一种所谓“承幸簿”的记录,由一名老太监专门负责记录皇上召幸各宫后、妃的日期和进离宫时间;皇上到后、妃宫里去也必须作同样的记录。“承幸簿”只有皇帝和皇太后可以调阅查看,待新一朝皇帝登极以后便把上朝的“承幸簿”销毁。隆裕入宫以后,“承幸簿”上很少有过她的记录。婚姻的悲剧对隆裕来讲她的内心里上实在比囚犯还痛苦。

①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总第2513页,记载桂祥是副都统,《清史稿·后妃传》载“都统桂祥女。”

② 德龄:《瀛台泣血记》105页。

③ 德龄:《瀛台泣血记》181页。

然而,光绪帝精神上的痛苦比隆裕更甚,他除了要跟他所讨厌的女子厮守以外,他更感到西太后“强迫指定”这件婚配大事,不仅从感情上是莫大的触犯,而且是西太后视他为傀儡皇帝的一个标志,所以他决不愿意去同隆裕皇后亲近,这也是对西太后专权独断的一种消极反抗形式。

光绪皇帝在皇宫里面是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除帝师翁同龢及近侍太监王商以外,别无他人与他亲近。然,光绪帝也是一个有血有肉,需要异性感情的青年人,所以他把精神生活,全倾心于妃子——珍妃身上。

珍妃和她的姐瑾妃都是在光绪十四年十月初五日(1888年11月8日)慈禧太后选定皇后时同一天被选为嫔的,光绪二十年(1894年)进为妃。珍妃是侍郎长叙的次女,姓他他拉氏,当时年仅十三岁,比光绪帝小五岁。光绪十五年正月“大婚”以后不久,由钦天监选了吉日,宫中派出大轿,接他他拉氏姐妹俩入宫。她们配光绪帝为嫔的仪式,自然没有大婚那样隆重铺张,典礼也不在太和殿举行,不必祭告天地,而在光绪帝的便殿里恭恭敬敬地向光绪帝和隆裕皇后磕头就行了。即着慈禧太后传懿旨召她们至慈宁宫,向“老佛爷”磕头行礼,仪式告成。

瑾妃与珍妃,都出身在满洲贵族家庭,然姐妹俩的气质却有极大的差异。珍妃,“貌既端庄,性尤机警”^①自幼好学“颇通文史”,^②对事对物有自己的主见,她性格开朗,志趣广泛,“写得一手好字,能左右同时开弓写字,也能作画”。^③瑾妃入宫时十五岁,比光绪帝小三岁。不仅貌不及珍妃,而气

① 白蕉:《珍妃之悲剧》,《人文月刊》第6卷第6期第3页。

② 《清代轶文》第3卷第32页。

③ 唐海瞭:《珍妃的侄女他他拉海瞭》1982年4月27日《北京晚报》。

质平庸,性格脆弱,入宫以后依附隆裕皇后,妒忌自己的妹妹珍妃。当时熟悉宫里情况的德龄曾对瑾妃与珍妃作过这样的评论:“珍妃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物,玲珑剔透,正和她姐姐愚蠢固执成一个绝对的反比例。”^①瑾妃、珍妃之所以能同时被慈禧太后选入皇宫为嫔,当时并无特殊的打算,无非是因为她选了自己的侄女作为皇后,为了遮盖“为将来母族秉政”的企图而作为皇后的陪衬而已。

既然是作为皇后的陪衬而选嫔入宫,所以瑾、珍两嫔入宫初期慈禧太后对她们姐妹俩无特殊的好恶可言。在皇宫里面,皇后、妃子各自分居寝宫,慈禧太后常召嫔妃入慈宁宫作伴消遣。所以瑾、珍两嫔常有机会接近西太后,慈禧太后披览臣下章奏她们无须回避。尤其珍妃“每侍慈禧披览章奏,从旁窥阅,即能得其概要,预料太后将如何批答”。^②一段时期下来,珍妃逐渐萌发起对朝政的兴趣,因而在同光绪帝接触中所交流的感情,也就不局限于宫内琐事和文史书画的见解,而且越来越多地涉及政事。因为珍妃对朝政大事颇有自己的见解,并且与光绪帝主见往往不谋而合,情投意合,所以得到了光绪帝的赏识,渐渐为光绪皇帝所宠爱,这是隆裕皇后和瑾妃所不能及的。光绪帝宠爱珍妃,主要是彼此之间思想沟通,主见融洽,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遇重大事件能想到一起。人生难得一知己。对于十几年来孤寂地生活的光绪帝来说不能不是莫大的安慰与快乐。又据德龄在《瀛台泣血记》里的记载,说侍郎长叙的二个女儿所以能被选入宫,帝师翁同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她说:

① 《瀛台泣血记》200页。

② 白蕉:《珍妃之悲剧》《人文月刊》第6卷第6期第5页。

有一天,原任广州将军满洲亲贵长叙奉旨来京陛见,这位老先生向来跟翁同龢很熟悉,到了京里,少不得彼此总要有一番往还。大家闲话之余,翁同龢才知道他两个女儿已经长成了,大的十七岁,小的十六岁(年令不够确切——引者),并且都还不曾对亲,这一次也随父母一起来了。……第二天,他就打发夫人到长叙的寓所去探望他们的内眷,实际上就是要知道长叙的这两个女儿的相貌究竟长得好不好?行动端庄不端庄?以备荐引她们进宫去给光绪做妃子。当天,他的夫人回来告诉他,那两位小姐举止都非常大方,相貌也很端庄,尤其是小的一位长得更美丽。这样,自然是很使翁老先生高兴的了,他差不多就想立刻进宫去向太后建议。……他和一班皇族中人本来也有几个是很相知的,并且还知道那几个一向不得太后欢心,那几个时常出入禁苑,可以算得太后的耳目,因此他就找到了一个素来倾向太后的皇族,把言语打动他,劝他代替自己去向太后进言,把长叙的第二个女儿送进宫去做光绪的妃子。^①

德龄的记载,没有别的史料中能得到佐证,如果说珍妃入宫是由帝师翁同龢牵线搭桥,那么得到光绪帝的信任和宠爱,增加了几分原因。当然,光绪帝与珍妃的爱情,其基础应该说主要是珍妃的气质和才气以及共同的政治主见。他们的爱情在珍妃入宫不久,很快地建立起来了,并且也很快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为了维持皇帝的尊严,照例只能皇帝召后、妃入皇上的寝宫,可是出于对爱情笃切,光绪帝“后来却完全忘了顾忌,他几乎每隔三四天工夫就要亲自上珍妃宫里

^① 德龄：《瀛台泣血记》第194～195页。

去走一次,这和他每夜非召幸珍妃不可的事同样都成了宫中的绝妙谈助。”^①甚至每天光绪皇帝从慈禧太后宫里请过早安以后,总是嘱咐珍妃不要就回到自己的宫里去,他也放弃了原有的凉轿不坐,特地携着珍妃一同步行,有说有笑地走回皇帝便宫。光绪皇帝常向珍妃倾吐衷言:“咱们这里真太寂寞了,每天从朝上回来,再也没有一个可意的人能够陪伴我的。”^②自从“亲政”以来,光绪皇帝需要披览的章奏也日益增加,有时珍妃一连三四天留在他的宫里,帮助处理政务,简直成了光绪帝的“女秘书”。光绪帝与珍妃已经到了难分难舍,形影不离的程度,如果珍妃只在自己的宫里住了一夜,光绪帝便会担心她只身独处着太寂寞了。第二天下了早朝,便急急地亲自找到珍妃宫里去,置皇宫规矩于不顾。德龄对光绪帝爱珍妃的心情有过深刻的描绘,她说:

但他(光绪帝——引者)为了他心爱的女人,他是决计不惜领受人家背后的议论的。或者也可以说,在处理朝政和对付其他一切人的时候,他心上是很清楚的,知道自己是一个万乘之尊的皇帝,可是一想到珍妃的时候,天所赋予人类的好色的天性,已侵入了他浑身的神经系统,把那些自尊心、虚荣心等全赶走了,他几乎忘记他所处的地位和四周的环境了。^③

由于真挚的爱情,光绪皇帝内向的性格也渐渐为珍妃的开朗和广泛的志趣所感染。在寝宫品评书画,在御花园里观赏花木,他们真挚、乐快的爱情给枯寂了许久的皇宫,频频地添上几分春色。

① 德龄:《瀛台泣血记》第198页。

② 德龄:《瀛台泣血记》第201页。

③ 德龄:《瀛台泣血记》第204页。

光绪帝和珍妃炽烈的爱情 ,同大婚以后隆裕皇后黯淡的感情成了绝妙的对照。随着光绪帝对珍妃爱情的不断升华 ,在隆裕皇后、瑾妃、珍妃三人之间难免掀起一场醋海风波。慈禧太后“归政”以后 ,名义上搬至颐和园去“养性怡情” ,可是三天两天急不及待地回到皇宫 ,她对朝廷大事的控制从无放松过。不过也有例外的 ,光绪十七年(1891)春夏之交 ,她突然决定要驻蹕颐和园“颐养冲和”数月。四月初八日光绪皇帝发出谕旨 :“本月(四月)二十八日 ,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皇太后驻蹕颐和园。”^①从四月廿八日至六月廿八日整整住了三个月。这对光绪皇帝来说是求之不得的 ,至少可以暂时摆脱西太后的控制 ,做几个月的真正皇帝。其实 ,慈禧太后的耳目遍及皇宫 ,对宫里所发生的无论大小诸事 ,她当即悉知 ,隙如指掌 ,何况光绪帝仍要常诣颐和园请安 ,向这位“亲爸爸”报告一切。慈禧太后要暂住颐和园的消息传到隆裕和瑾妃那里 ,他们视为分隔光绪皇帝同珍妃的好机会。隆裕皇后首先发难 ,向慈禧太后提出要陪伴“老佛爷”同去颐和园 ,即着瑾妃也做了同样的请求 ,这意味着向珍妃施加压力。珍妃思想敏捷 ,察觉了她们的用心 ,也向西太后请求 ,愿陪伴“老佛爷”去颐和园 ,并且表示要服侍老人家尽“孩子们”的孝心。慈禧太后虽然以隆裕皇后为心腹 ,也听到过光绪帝淡漠皇后而亲昵珍妃的“小报告” ,为了给自己的亲生儿子同治皇帝生一个嗣子 ,既可兑现当初关于“俟嗣皇帝生有皇子 ,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②的诺言 ,了一笔心愿 ,又可防范“吴可读尸谏”风波再起 ,所以西太后盼得皇子的心比

① 《清德宗实录》第296卷第6页。

② 《清德宗实录》第10卷第6页。

光绪帝更切。只要谁能生皇子 ,不管是后是妃 ,她都无所谓 ,而且生皇子可能性最大的却是珍妃。所以慈禧太后看到三位后妃的“尽孝”态度 ,心里高兴之余作了如下表示 :

“很好 ,你们三个人的意思都是对的。不过要让皇上一个人留在宫里 ,也未免太寂寞了。……目前 ,暂留珍贵人在宫里伴侍皇上 ,你(指隆裕——引者)和瑾贵人可以先和我搬进颐和园去。”^①

“辛酉 ,上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皇太后幸颐和园。”^②四月廿八日在光绪皇帝和隆裕皇后以及瑾妃恭奉之下 ,慈禧太后去了颐和园驻蹕。

慈禧太后驻蹕颐和园的一段时间里 ,宫里就成了光绪帝和珍妃的两人世界 ,在这段舒舒服服的日子里 ,每天度着毫无后虑的愉快生活。珍妃是仕宦贵族家庭出身 ,从小受过良好的封建教育和贵族生活的熏陶 ,琴棋诗赋应酬自如。这对恋人尽情享受着他们一生中最幸福的温馨 ,甚至到了狂热的地步。“什么是做皇帝应有的尊严?怎样叫做皇家的礼仪?光绪差不多完全忘记了。”^③有时光绪皇帝把京里一个有名的戏子召进宫里唱戏作乐 ,还送给他华贵的衣料 ,那名旦也把自己的剧照带进宫里 ,让光绪帝和珍妃欣赏。光绪帝和珍妃在皇宫里的快活情形 ,不断地传到颐和园里陪着西太后的隆裕皇后和瑾妃那里 ,尤其隆裕皇后惹得满腔醋火 ,强烈的醋味麻木了她的心灵 ,她和瑾妃以及历来同光绪帝作对的总管太监李连英一起 ,放出“珍妃看中了那个年轻的漂亮戏

① 德龄 :《瀛台泣血记》第 222 ~ 223 页。

②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三)总第 2899 页。

③ 德龄 :《瀛台泣血记》第 223 页。

子”^①的流言蜚语来中伤珍妃的人格。这些谣传在颐和园内满园风雨,不免也传到西太后那里,可是西太后对光绪帝召戏子进宫演戏的事倒不那么认真,她自己也是个戏迷,所以对这事件并无多大的过问和严厉的处置。隆裕皇后见“老佛爷”对此无所发落,便亲自出马,回到皇宫小住企图寻机当面侮辱珍妃,从精神上折磨一番,发泄她久怀在心的怨愤。一次,隆裕、珍妃陪着光绪帝看戏,隆裕皇后指着那位戏子当着他们两位的面说:“不过皇上要小心,你身边还带着一位美丽的贵人咧!”^②光绪帝怒不可遏,他的呼叱声、击桌声以及珍妃的哭泣声闹成一片,一场醋海风波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虽然经光绪帝的一番体切的安慰,这场风波总算平息下去了,可是珍妃在人格上受到的伤痕是永远也消失不了的。

隆裕皇后所挑起的这场醋海风波,不但未能损害光绪帝和珍妃之间的爱情,相反,他们更加情深意切地相爱着,在以后的日子里珍妃为实现光绪帝维新变法宏图,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成为光绪帝政治上的得力助手,最后珍妃还以维新变法运动的牺牲者,载入史册。

① 德龄:《瀛台泣血记》225页。

② 德龄:《瀛台泣血记》233页。

第五章 甲午战争的严峻考验

第一节 从争君权到争国权的转变

光绪十五年正月皇帝“大婚”，二月亲政，慈禧太后名义“归政”，驻蹕颐和园，光绪帝常去颐和园请安，西太后也常至皇宫召见枢臣。根据《归政条目》的规定，重大的行政用人大权仍然操在皇太后手中，只不过是幕前退居幕后而已。然而不管怎么说，自亲政以后，光绪帝总归已经是大清王朝主持朝政的一国之主了。《清史稿·德宗本纪》评论说：“德宗亲政之时，春秋方富，抱有大志，欲张挞伐，以湔国耻。……^①”从光绪十五年到二十年中日战争前的五年间“抱有大志”的青年皇帝，致力于国是实现“欲张挞伐，以湔国耻”的雄心。随着年岁的成长和肩负的重任，促进了光绪帝在处理朝廷政务方面的能力得到日进月就的提高，而且他的政治思想也更加成熟起来，因之皇帝对臣下的威慑作用和凝聚力也与日俱增。此时的光绪帝“年渐长，图治之心渐切”，“欲亲擢一二通才以资驰驱”、“以揽大权”。^②虽然性格内向，很少慷慨激昂之辞，但是他力图摆脱慈禧太后的控制，独揽乾

^① 《清史稿》第4册，第956页。

^②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丛刊《戊戌变法》（一）第256页。

纲的雄心正在日渐加强着。正当光绪皇帝着手扩展力量,为加强皇权而进行种种努力的时候,光绪二十年(1894)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势力咄咄逼人的威胁之下,年轻的光绪帝为了捍卫祖宗“基业”,把自己的主要精力从争君权转变到争国权方面。这一转变在慈禧太后仍然操纵清朝大权的历史条件下,是很不容易的,可以说是反抗慈禧太后独裁专权的一个勇敢行动,也是光绪皇帝一生中最值得肯定的一个方面。他在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直接威胁祖国安全,侵犯国家主权的严重时刻,毅然挺身而出,“一意主战”,把争国权的斗争放在首要地位,使他把爱国思想见诸于行动。而慈禧太后、李鸿章之流的清朝的实权派,热衷于权力之争,在日本侵略势力面前步步妥协退让,竭力阻挠抗战,对照之下他们就显得相形见绌,不齿于后世。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争夺殖民地的竞争愈演愈烈,可是,地球上所有的自由土地都为列强占领殆尽,除了对已经被分割了的世界作周期性的再分割之外,争夺半独立国家成了殖民主义者的主要目标。到了八十年代初期,出现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争夺殖民地、重新分割世界的“大高潮”。于是名义上为独立国家,实际是半殖民地的中国,便是首当其冲地为资本主义列强争夺和分割的重要对象。法国捷足先登,于1884~1885年发动了旨在占领越南,打开中国南大门的中法战争。十年之后,1894年我国的近邻日本也“近水楼台先得月”,发动了旨在吞并朝鲜,打开中国东大门的中日甲午战争。

日本在1868年开始了明治维新,迅速地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明治维新是不彻底不完全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运动。因而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带着浓厚的封建性和军国

主义性 ,特别富于侵略野心。明治维新以后的天皇政权是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联合政权 ,农业仍保留着封建剥削关系 ,生产力得不到应有的发展 ,远跟不上工业发展的需要。原棉依赖从印度和中国输入 ,粮食依赖从朝鲜输入 ,入超情形非常严重 ,黄金大量外流。甲午战争前夕 ,日本正面临着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为了摆脱经济危机 ,日本明治政府急于发动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 ,企图以夺取殖民地来解决商品市场和原料、粮食的供应困难 ,并且还想在掠夺战争中获得赔款 ,继续扩大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

七十年代 ,日本政府就表现出对中国的侵略野心。

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派兵三千 ,突然在台湾南部的琅峤(今恒春半岛)登陆。清政府措手不及 ,不敢作武力抵抗 ,只能“赔款”五十万两 ,换取日本退兵 ;

光绪五年(1879)“闰三月 ,日本灭琉球 ,夷为冲绳县。”^①

光绪六年(1880)日本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写了一篇名为《邻邦兵备略》的扩军计划 ,呈明治天皇。这是一篇旨在为侵略中国作军事准备的十年计划 ,到 1892 年提前二年完成了扩军部署。1893 年即刻成立了“战时大本营” ,做好武力吞并朝鲜 ,进而同中国进行大规模战争的准备。

当时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各自为了争夺在中国的权利 ,相互之间的关系极为复杂 ,因而他们对于日本觊觎亚洲大陆 ,加紧军事部署所持的态度各不相同。

美国由于六十年代初期忙于国内的南北战争 ,于是对中国的侵略落后了一步 ,只得在“利益均沾”的旗号下 ,得到英、法、俄、德等资本主义列强的残羹剩粥 ,因而日本对亚洲的扩

^① 印鸾章 :《清鉴纲目》第 13 卷 ,第 732 页。

张活动 ,得到美国的支持 ,扮演了趁火打劫的角色。同治十三年日本侵略台湾的军事行动就有美国人做它的帮凶 ,得到一些美国军官的协助。自这以后 ,美国一直想利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机会 ,来扩大它在中国的权利 ,所以在中日战争中 ,美国是很明显地站在日本方面。

英国在中国夺取的权益最大 ,最占优势。由于沙俄不断对中国进行扩张活动 ,英俄在远东尤其在中国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因此 ,英国想把日本当做它在远东牵制俄国的走卒 ,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向着朝鲜和中国的东北部伸张采取鼓励的态度。

俄国同日本一样 ,都竭力地向中国东北部扩展势力 ,尔今日本帝国领先了一步 ,已经开始了对朝鲜和中国的军事行动 ,这对于俄国是很不利的。然而 ,由于沙俄在欧洲同德国、奥匈帝国及意大利的争夺也很紧张 ,无暇在远东以军事力量来牵制日本的扩张行动。俄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扮演“调停者”的角色 ,斡旋于中日之间 ,鼓动清政府向日本妥协让步 ,早日促成和局 ,尽量让日本在中国少得利益 ,剩些地盘留给沙俄。

日本军国主义者正是利用这种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 ,争得列强的支持 ,加快了它的侵略步伐 ,首先在朝鲜用兵 ,作为在亚洲大陆拓展殖民地的第一个目标。

光绪二十年春 ,朝鲜南部爆发了农民起义 ,日本军部预料到朝鲜政府无力镇压 ,必向清朝求援。而光绪十一年(1885)李鸿章和日相伊藤博文在天津签订过一个有关朝鲜的条约 ,规定遇重大事件 ,两国或一国要派兵须互相通知。日本就可以利用这个条约 ,是它出兵朝鲜和侵略中国的最好时机。果真在四月底朝鲜政府向清政府派驻朝鲜的总理交

涉通商事宜大臣袁世凯提出：“烦贵总理迅即电恳北洋大臣酌派遣数队，速来代剿。”^①朝鲜与中国由于历史原因，为中国之附属国，朝鲜爆发农民起义请求清政府出兵镇压，这是非正义的军事行动。李鸿章以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身份接受了朝鲜政府的请求，事先也没有奏请光绪皇帝，态度极为轻率，于五月初一日（6月3日）派兵进驻朝鲜。

饬丁汝昌派海军济远、扬威二舰赴仁川、汉城护商，并调直隶总提督叶志超率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选淮练旅一千五百名，配齐军装，分坐招商轮先后进发。^②

冒险主义和投降主义是孪生兄弟。在甲午战争爆发以后一直推行妥协投降政策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出兵朝鲜的时候，是十足的冒险主义者，完全不考虑当时虎视中国的日本政府将会作出如何反映！他一手与日本签订的《中日天津条约》已经给日本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提供了方便，而李鸿章以冒险主义的态度无视日本的野心。并且派出的清军竟是他的嫡系“淮练劲旅”，把自己的老本都押上了赌台。在清政府派兵赴朝以前，日本驻朝代理公使杉村派译员向袁世凯表示：“贵政府何不代韩戡乱？……我政府必无他意。”袁世凯为了发展个人势力，极力促成李鸿章出兵。李鸿章也信以为真，既然日本政府“必无他意”，就匆匆派出军队去帮助朝鲜封建政权镇压农民起义。殊不知，一个普通的使馆译员（又称书记生）岂能代表本国政府做出“政府必无他意”的保证？只是为了向袁世凯刺探清政府对朝鲜事件的态度而已，这是最起码的外交常识。而袁世凯、李鸿章却视此语为

①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三）总第3407页。

②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三总）第3408页。

日本政府向中国作出的保证 ,说明李鸿章态度何等之轻率冒险。

李鸿章一面派兵 ,一面指示清政府驻日公使汪凤藻照会日本政府 ,略谓 :

中国属邦朝鲜有内乱 ,朝鲜政府之力不能镇压 ,今应该政府之请求 ,发兵进讨 ,以尽保护属邦之职务。^①

清政府出兵朝鲜 ,日本军队突然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名于五月初四日(6月7日)大量进入朝鲜。至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日军不宣而战 ,在牙山口外的半岛海上击沉了装载着中国军队的一艘英国商轮 ,揭开了中日甲午(光绪二十年为干支的甲午年)战争的序幕。

中日甲午战争时期 ,资本主义列强在华的利害交错 ,关系复杂 ,这给年轻的光绪皇帝进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部署和策划 ,增加了诸多的难度。这次战争不同于中法战争 ,其时法国占领越南 ,打开通向中国广西、云南的孔道 ,对其他资本主义列强无大的利害牵连 ,以光绪皇帝为核心的主战派 ,只要军队调度得当 ,粮饷供给落实 ,加之法国侵略者远涉重洋 ,军事上处在很不利的地位 ,因此最终取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是完全可能的。而今对付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活动 ,在外交上要利用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互相矛盾 ,因势利导地处理复杂的关系以孤立日本 ,固然是很不容易的难题。而在清统治集团内部 ,光绪帝要充分运用皇权的威力 ,压倒主张对日妥协让步的顽固派 ,那更是难上加难。中日战争清朝的最高指挥统帅是李鸿章 ,他是慈禧太后一手提拔起来的以大学士任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 ,又是洋务派的头面人物。李鸿

^① 印鸾章 :《清鉴纲目》第14卷第787页。

章内有慈禧太后为后台 ,外以列强作靠山 ,他有恃无恐 ,对光绪皇帝关于作战部署处处消极抵制 ,阳奉阴违。加之日本帝国是中国“一依带水”的近邻 ,军事调度方便 ,军需品运输方便 ,供给及时。并且对侵略朝鲜和中国已经经过自明治维新以来的二十多年充分准备 ,因之 ,要有效地进行反侵略的斗争 ,确实是困难重重。中国这个泱泱大国 ,如若败于日本这个弹丸小国 ,势必对亲政不久的光绪皇帝在心理上将会造成难以承受的巨大压力。鉴于上述种种情形 ,光绪皇帝始终保持清醒头脑 ,谨慎从事。例如在战争爆发以前 ,光绪帝接到李鸿章已经向朝鲜派兵的电奏后 ,立即于五月初二日

上谕军机大臣等 :李鸿章电奏已悉 ,此次朝鲜乱匪聚党甚众 ,中朝派兵助剿 ,地势敌情均非素习 ,必须谋出万全 ,务操必胜之势 ,不可意存轻视 ,稍涉疏虞。并谕直隶提督叶志超擒获巨魁解散胁从后 ,仍著克日班师。^①

反映出光绪皇帝谨慎处事的心态 ,他不想把事态扩大 ,唯恐因韩战而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同袁世凯、李鸿章的轻率冒险行动形成鲜明的对照。

日本帝国主义觊觎亚洲大陆 ,以干涉朝鲜内政为导线 ,日本和中国的战争在即 ,光绪皇帝以坚定的主战立场和谨慎的战略部署 ,不遗余力地迎接这场为争国权的严峻考验。

第二节 力排妥协 ,“一力主战”

日本军国主义觊觎亚洲大陆 ,光绪二十年五月初(1894

^① 朱寿朋编 :《光绪朝东华录》(三)总第 3408 页。

年6月)已经派出了大量军队进入朝鲜。六月十一日(7月13日)日军冲击朝鲜王宫,幽禁国王,扶植傀儡政权,二十三日(7月25日)日本海军在牙山口丰岛海域击沉装载中国军队的英国“高升”号商轮,朝鲜形势步步吃紧。摆在光绪皇帝面前的首要问题是力排清廷内部的妥协主张,迅速作出主战抉择。

李鸿章派兵进驻朝鲜去帮助朝鲜封建统治者镇压农民起义,是站在大国主义立场上非正义性质的军事行动,这是无须为此作出任何辩解。其时,虽然按照中日《天津条约》的规定,通知了日本外务省,然而,李鸿章完全没有预料到此举给日本政府造成了趁机出兵朝鲜的借口,进而挑起中日军事冲突得寸进尺地把战火烧进中国门户。清廷出兵以后,日本军国主义者不但出动大军进入朝鲜,而且不宣而战,袭击中国军队,兵锋直接指向中国。形势的紧张发展,清朝最高统治集团中的顽固派,目光短浅,头脑麻木,以李鸿章为首的军事指挥当局,不但不作战争部署,反而准备草率收兵,他们以为只要撤回中国军队,日本方面也就没有借口驻兵朝鲜了。这时,列强必然会出面“调处”,达成中日双方共同撤兵朝鲜的协议,时局即可平息,所以采取的是消极等待的妥协态度。

顽固派对日本侵略者坚持妥协让步政策,究其原因有两个方面:

首先,清朝统治集团内部派系斗争的发展。中日战争时期是清朝内部“帝党”与“后党”两大派系的形成与斗争的关键时刻。一般的讲,主张妥协的多为“后党”骨干,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巩固权力和把持要职上面,所以无心对日作战。慈禧太后是清朝顽固势力的总后台,“归政”以后,虽然光绪帝理政尚无明显的离开垂帘听政时期铺设的运行轨道,她的

150 太上皇地位也无严重威胁。可是在慈禧太后“归政”前夕,光绪帝在中法战争中持主战态度,尔后又选定皇后、大婚、亲政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上隐约地显示出“母子不一”的苗头,慈禧太后对光绪帝开始感到不合心意。尤其在光绪帝亲政至甲午战争爆发前的五年间,皇帝对朝廷大臣的威慑作用与凝聚力得到迅速增长,引起慈禧太后的注意与不安,因之,她加紧培植亲信以便控制光绪帝力量的发展,这样“帝党”与“后党”的阵线日益明朗化了。至今,慈禧太后在政治宦海里行舟已有三十余年的经历,积累了丰富的争夺权力与巩固权力的经验和手段。“归政”以后她常跸驻颐和园。对光绪帝愈益放心不了,更加需要加强对朝廷的遥控能力,决不允许权力潜移。光绪二十年十月初十日(1894年11月8日)正是慈禧太后六十岁生日,她打算举行盛大的庆典活动,来巩固她的地位,树立“光辉”的形象。所以在中日战争爆发前后,筹办慈禧太后六十庆典活动作为清朝统治集团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正是在筹办寿辰庆典的密锣紧鼓声中,朝鲜发生了中日军事冲突,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清朝统治集团中的顽固派显然不希望扩大事态,分散清朝的精力和财力,影响庆典的隆重举行。所以他们极力主张对日妥协让步,草草收场,从而不使西太后六十寿辰的大庆活动蒙上一层阴影。

其次,是没有看到日本军国主义挑起事端的险恶用心。顽固派在处理重大国际事件时往往盲目自大,以天朝大国自居。他们无视东边近邻日本帝国自明治维新以来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看不到它的经济、军事实力。因而对朝鲜事件日本出兵,只认为是干涉朝鲜内政,没有预料到日本的最终目的是要侵略中国。清朝统治集团中的顽固派,以为象十年前中法战争那样,牺牲越南即可签订和约。所以这次故伎重

演,准备牺牲朝鲜来满足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这也是顽固派对日妥协让步的原因之一。

中日战争之前,光绪皇帝已经亲政五年,他的周围也形成了一些亲信近臣就是所谓的“帝党”,其核心人物如翁同龢、李鸿藻、志锐等人。他们的主要精力也都放在与慈禧太后争权上面,通过培植亲信,以不断加强皇权,把朝廷的最高权力潜移到光绪帝手中。当朝鲜事件发生之初,光绪帝虽然也没有明确地看到日本军国主义借此机会挑起事端,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野心。然他持以谨慎的态度,清朝出兵朝鲜的第二天,光绪帝立刻上谕李鸿章,“必须谋出万全,务操必胜之势”,认为仅派一千五百名之兵力不足“剿办祸乱”、“须厚集兵力,即著酌添调克期续发,以期一鼓荡平,用慰藩服至意。”^①帮助朝鲜封建政权镇压农民起义,作为宗主国的大清皇帝自然以为是“义不容辞”、“慰绥藩服”之举。可是光绪帝同李鸿章的不同之处在于,他采取稳扎稳打和速战速决的策略,命赴朝清将叶志超、聂士成一旦“擒获渠魁,解散胁从后,仍著克日班师,”^②不想扩大事态,在朝鲜用兵中牵制精力。

随着形势的步步紧逼,光绪帝和顽固派在对待日本军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和侵略野心的态度,逐渐形成根本性的对立。

顽固派的基本立场是:以牺牲朝鲜为条件,请求列强“调处”,采取妥协让步的办法来结束中日对峙局面。

光绪帝的基本立场是:“一意主战”,以遏制日本军国主

①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三)总第3408页。

②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三)总第3408页。

义的侵略步伐。他说：

现在日韩情事已将决裂 ,如势不可挽 ,朝廷一意主战。李鸿章身膺重寄 ,熟谙兵事 ,断不可意存畏葸 ,著慎遵前旨 ,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迅筹复奏 ,若顾虑不前 ,徒事延宕 ,驯致贻误事机 ,定惟该大臣是问。^①

光绪帝主战决策 ,在中日军事冲突发生以前六月十四日(7月16日)已经确定。据《翁同龢日记》载：

“是日(六月十四日)军机起见 ,上(光绪帝——引者)一力主战。……传知翁同龢、李鸿藻……又欲明发布告天下。”^②

年轻的光绪皇帝他的政治观察力是顽固派所不及的 ,他目光敏捷 ,锐气毕露。当日本政府大举出兵之时 ,顽固派仍幻想列强调停 ,坐视日军在朝鲜占据有利地势。而光绪帝则洞察出“该国不遵条约 ,不守公法 ,任意恃强 ,专行无忌”^③ ,对其野心开始予以极大的注意。出于捍卫祖宗“基业”的责任心 ,所以他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挑衅所持的态度是力排妥协 ,积极战备。

为了开创抗战局面 ,光绪帝首先必须阻止顽固派的撤兵活动。

五月初一日 ,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一千五百名清军进驻朝鲜京城(汉城)以南的牙山扎营。五月初四日(6月7日)日本政府也派兵朝鲜 ,两军对峙 ,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日军接踵而至这是袁世凯、李鸿章所未料及的 ,现在面临日本大兵压来 ,袁世凯、李鸿章以及前线率兵将

①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三)总第3429～3430页。

② 《翁同龢日记》二十年六月十四日。

③ 《清德宗实录》第344卷,第1—2页。

领叶志超、聂士成一片惊慌失措。曾经竭力促成李鸿章出兵的清政府派驻朝鲜的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袁世凯,看到日本不断增兵,事态日趋扩大,局面将不可收拾,企图离开朝鲜溜之大吉。六月初五日(7月7日)他“以事变日亟,致李鸿章恳召回面商和战各情,举唐绍仪自代。”^①由李鸿章电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转呈光绪帝。光绪帝立即上谕军机大臣,指出:

现在日韩情势未定,袁世凯在彼可以常通消息,且与各国驻韩使臣商议事件亦较熟习,著毋庸调回。^②光绪帝考虑到身为常驻朝鲜大臣的袁世凯如果“应召回国”,不仅近去朝鲜的军事将领失去响导,对作战极为不利,并且还会因此而扰乱军心,撤朝的口子一旦打开,必然军心不安,作战不力。事情不出光绪帝所料,六月十二日(7月14日)叶志超也电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请求朝廷派轮船接回在朝鲜的中国军队。他的理由是“盖我为剿匪来,匪既受抚,即撤回亦系正办。”^③光绪帝考虑到日本方面决不会因中国军队撤离朝鲜而偃旗息鼓,就此罢休,因而他在给李鸿章等的上谕中毫不含糊地阻止叶志超的撤兵之请。

电寄李鸿章等:叶志超电已悉,所等派轮赴牙山将我军撤回一节,彼顿兵不动,我先行撤退,既嫌示弱,且将来进战,徒劳往返,殊属非计。现在和商之计,迄无成说,恐大举出师,即在指顾。著李鸿章体察情形,如牙山地势不宜,即传谕叶志超,选择进退两便之地,扼要移

①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三)总第3424页。

②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三)总第3426页。

③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三)总第3426页。

扎,以期迅赴戎机,毋致延误。^①

光绪帝在上谕里讲得很明确,不抱有“和商之议”的期望,而是立足于“大举出师”与日本军队打一场硬仗。因为“彼顿兵不动而我先行撤退,既嫌示弱,”在侵略者面前示弱必然助长其嚣张气焰。当中日双方已置于战争边缘的时刻,侈谈撤兵,必延误事机。由于光绪帝“一力主战”的坚定态度,有效地阻止了袁世凯、叶志超妥协退却行动,可以说这是同顽固派斗争的第一个胜利。

为了开创抗战局面,光绪帝必须批驳顽固派鼓吹的“以夷制夷”论调。

顽固派鼓吹“以夷制夷”论调,其依据是仅靠本国的海陆兵力是绝对的不能取胜的。李鸿章认为中国能够作战的军队只有淮军和北洋海军。淮军虽有三万多人,驻扎于直隶辽阔之区,“经年扼要巡防,备多力分,断难抽调远役。”“现在倭兵备调者实有五万,必须力足相埒,至少亦须二三十营。若移缓就急,调出一营,即须添募一营,以补其缺,方免空虚无备。”^②至于北洋海军,能战的军舰仅八艘,均陈旧笨重,最快的“致远”、“靖远”两舰,时速不过十五、六海里,而日本的军舰有二十一艘,其中九艘都是最新的装备,时速为二十海里,所以“海上交锋,恐非胜算。……海战之艰危,较陆军为尤甚。”^③在顽固派看来结束中日之僵局,只能等待列强“调处”,幻想列强对日本施加压力,促其撤兵,收“以夷制夷”之效。据记载,此时在清统治集团内部关于“俄国出兵”,“英国调处”的传闻,甚嚣尘上。“英使欧格纳仍欲居中调处”;

① 《清德宗实录》第342卷,第12~13页。

②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丛刊《中日战争》(二)584页。

③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等78卷《酌定海军恤恤章程折》。

吉林电：“闻俄船八只集图们江口，将于二十日与日交战。”^①“北洋又谓，俄国有十船可调仁川，我海军可会办云云。”对于这股依赖英俄干涉的舆论，光绪帝极为气愤，“上（光绪帝——引者）盛怒，后一电，上不以为然，命不得倚仗俄人也。拟电旨致北洋达此意。”^②光绪帝在严肃批驳顽固派“以夷制夷”论的同时，发出上谕，添加重兵，立足自身力量与日本军国主义作战。

谕军机大臣等：现在日本以兵协议，……据现在形势看去，口舌争辩已属无济于事。前李鸿章不欲多派兵队，原以衅自我开，难于收束。现敌已多兵赴汉（城），势甚压迫，设协议已成，权归于彼，再度挽救，更落后着。此时机吃紧，应如何措置，李鸿章身膺重任，熟悉日韩情势，著即委筹办法迅速具奏。……俄使喀希呢留津商办，究竟彼国有无助我收场之策，抑另觊觎别谋？李鸿章当沈几审察，勿致堕其术中，是为至要。^③

正当李鸿章热衷于俄英出面调停的幻想之时，光绪帝作出非常及时的三项指示：

第一，命令李鸿章“委筹办法”做好战争准备；

第二，决不允许以牺牲朝鲜为条件同日本交易撤兵、订立“协议”；

第三，要警惕俄国“另有觊觎别谋”，中其圈套。

李鸿章置光绪帝的指示于脑后，仍我行我素，坐等英俄“调处”，非但勿作军事布置，而且还下令已处在日军包围中的中国军队静守待毙。六月初四日，他电叶志超说：“现在俄

①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一日。

②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一日。

③ 《清德宗实录》第341卷，第6页。

英正议和,暂宜驻牙山静守,切毋多事,”^①初六日又电叶志超,“仍望静守勿动。”^②李鸿章接二连三地发电朝鲜前线,命令清军“静守勿动”,分明是同光绪帝的作战指示唱反调,实际上已经堕入了俄国人所设置的迷魂阵。日本方面对沙俄举动比李鸿章看得更为清楚,日本政府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在给日驻朝公使大鸟圭介的电令中说:“关于俄国出兵朝鲜的事情,据本大臣和俄国公使的谈话及驻英公使的电报看来,似无此虑。”^③原来“俄国出兵干涉”的传闻,是愚蠢的顽固派吃了沙俄所给的空心圆子所致。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丰岛海域日军突然袭击中国军队事件的发生,证明光绪帝在谕旨中的判断是正确的。

无情的现实使顽固派一味依赖俄国出兵干涉的期望成为泡影,于是以李鸿章为代表的顽固派便把“调处”的希望投向英国,继续鼓吹“以夷制夷”论调。

五月二十七日(6月30日)李鸿章背着光绪帝擅自致电函英国驻华领事,请求英国政府派舰队赴日,“勒令撤兵”。李鸿章致英使的函件,于六月初二日(7月4日)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呈递光绪帝御览。立即遭到光绪帝的严厉指斥。

谕军机大臣等:前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呈递李鸿章二十七日电信。与英领事言及应由英外部令水师提督带铁快舰赴日询问,勒令撤兵一节。日人肇衅挟制朝鲜,尚致势难收束,中朝应自保藩封,不宜借助他邦,致巽日别生枝节。即如英国处此时势,如出自彼意,派兵

①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寄朝鲜成欢交叶提督》。

②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寄朝鲜成欢交叶提督》,丛刊《中日战争》(四)第261页。

③ 《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第176页。

护商 ,中国亦不过问。若此议由我而发 ,彼将以看护之举 托言助我 ,将来意以所托兵费 ,向我取偿 ,中国断不能允。李鸿章此议非但示弱于人 ,仍贻后患 ,殊属非计 ,著毋庸议。嗣后该大臣与洋人谈论务宜格外审慎 ,设轻率发端 ,致误事机 ,定惟该大臣是问。^①

光绪帝认为“中朝应自保藩封 ,不宜借助他邦” ,再次表示了他要用自己的力量来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决心。那么光绪帝为什么要坚决反对“借助他邦”之力呢?因为他对于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相互间的利害关系保持“格外审慎”的态度。在光绪帝看来 ,俄、日、英之间各怀鬼胎 ,都想在中日冲突中趁火打劫 ,英国托“调处”之辞 ,“致巽日别生枝节” ,俄国也是“另有觊觎别谋” ,所以“借助他邦”最终必是“仍贻后患”。事实证明光绪帝的认识是正确的 ,在李鸿章致函英使以后半个月 ,六月十四日(7月16日)英国不但没有“勒令撤兵” ,反而在伦敦同日本政府签订了条约 ,向日本表示无“以兵力干涉的决意。”^②一同以后六月二十一日(7月23日)英国又向日本提出要求 :“此后中日两国开战时 ,中国之上海为英国利益的中心 ,故望日本政府承认不在该港及其附近为战争的运动。”^③所以在日本政府答应了英国提出的要求两天之后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就采取了行动 ,日舰击沉了装载中国军队的英国商船“高升”号 ,证明英日之间已成默契 ,所以日本有恃无恐。顽固派鼓吹“英国欲予调处”的骗局也被日、英两国的作为所戳穿。光绪帝对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共同利益的认识 ,远远超过了以李鸿章为代表的顽固派 ,表现

① 《清德宗实录》第342卷 ,第2页。

② 《日本侵略中国外交秘史》第37页。

③ 《日本侵略中国外交秘史》第37页。

了他敏锐的观察能力和谨慎的处政作风。

光绪帝从五月初到六月底的一系列上谕中反复阐明他的主战立场,不断地批驳顽固派依赖列强干涉、调停而不作战备的妥协、让步政策。而把批驳、指斥的重点放在李鸿章身上,这是很英明的策略。顽固派推行妥协让步政策是秉承慈禧太后的旨意而行的,然中日战争爆发前后,她并没有公开发出对日让步的懿旨,并且在初期还表示“并传懿旨亦主战,不准借洋债”,^①“皇太后谕不准有示弱语”^②的主战态度。肩荷军事、外交重任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敢于消极抵制光绪帝的抗战部署,因为他有皇太后为后台,这是路人皆知的事。然而,光绪帝所以把指斥重点放在李鸿章身上,不仅是为抗战扫除阻力,而是故意把“帝党”和“后党”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原则分歧公布于众,以争取一些头脑清醒而态度暧昧的官僚站到抗战立场上来,进而扩大“帝党”的基础。到六月底,抗战派的力量在中枢机构中占了优势。在光绪帝的亲自主持下,翁同龢于六月廿七日草拟谕旨^③七月初一日(8月1日)布告天下,对日正式宣战。

谕内阁 朝鲜为我大清藩属,二百余年,岁修职贡为中外所共知。……本年四月间,朝鲜又有土匪变乱,该国请兵援助,情词迫切。当即谕令李鸿章拨兵赴援,甫抵牙山匪徒星散。乃日本无故派兵,突入汉城,嗣又增兵万余,迫令朝鲜更改国政,种种要挟难以理喻。我朝抚绥藩服,其国内政事,向令自理。日本与朝鲜立约,系属与国,更无以重兵欺压强令革政之理。各国公论,皆

①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年六月十四日。

②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年六月十五日。

③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七日。

以日本师出无名,不合情理,劝令撤兵和平商办。乃竟悍然不顾,迄无成说,及陆续添兵,朝鲜百姓及中国商民,日加惊扰。是以添兵前往保护,讵行至中途,突有倭船多只,乘我不备,在牙山口外海面开炮轰击,伤我运船,变诈情形,殊非意料所及。该国不遵条约,不守公法,任意恃强,专行无忌,衅开自彼,公论昭然。用特布告天下,俾晓然于朝廷办理此事,实已仁至义尽。而日人渝盟肇衅,无理已极,势难再予姑容。著李鸿章严飭派出各军,迅速进兵,厚集雄师,陆续进发,以拯韩民于涂炭。并著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及统兵大臣,整饬戎行,遇有日人轮船驶入各口,即行尽力进攻。胜败所关,毋得稍有退缩,致干罪戾,将此通谕知之。^①

清廷正式下诏对日宣战,这是光绪帝力排清统治集团内部顽固派妥协让步政策,“一力主战”的结果,也是以光绪皇帝为代表的抗战力量同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主和势力进行反复斗争所取得的胜利。然而,顽固派并没有因为这一失败而放弃妥协立场,停止兴风作浪,干扰抗战。相反,他们在中日战争最严酷岁月里,竟设置重重障碍,阻挠抗战进程,最后甚至滑到对日求和的投降主义泥坑里去。因此,光绪帝同顽固派斗争的惊涛骇浪还在后面。

^① 《清德宗实录》第344卷,第1~2页。

第三节 举起反侵略战争旗帜， 组成抗战联合阵线

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日(1894年8月1日)清廷下诏对日宣战,当天日本政府也正式向中国宣战,战争全面拉开。

作为一朝之主的光绪皇帝下诏对日宣战,对于主战的朝廷大臣以及具有爱国思想的清朝一般官员和一些封建士大夫,无疑是莫大的鼓舞。其间举国上下思想空前活跃,朝野爱国人士携手在光绪皇帝所举起的反侵略战争旗帜之下,大有众志成城,投身于抗战卫国的澎湃骇浪中去的势头。

光绪皇帝亲政以来,“帝党”基础已经形成,其核心人物如翁同龢、李鸿藻、志锐、文廷式等,现在成了抗战力量的中坚。清朝体制军机处乃是发号施令的中枢机构,中法战争以后,亲近光绪帝的主战大臣和西太后的异己者先后被逐出军机处,为慈禧太后亲信世铎、孙毓文、徐桐、奕訢等人所把持。尔今要推进抗战,首先是要改造军机处,调整其成员构成,进而通过这个中枢机构向全国发号施令。这点光绪帝看得很清楚,他尽力让两位德高望重的老臣翁同龢、李鸿藻进入军机处,参与商议和决策战事、草拟谕旨、审阅臣下章奏等重要机务。六月十三日(7月15日),翁同龢“奉派会议朝鲜事。军机大臣面奉谕旨,”此时“奕訢面奏,朝鲜之事,关系重大,亟须集思广益,请简派老成练达之大臣数员会商等语。”^①光绪帝顺着奕訢面奏的思路,立即命军机大臣面奉谕旨:

^① 《翁同龢日记》光绪十年六月十三日。

著派翁同龢、李鸿藻与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详议，将如何办理之处，妥筹具奏。^①

翁同龢、李鸿藻是光绪帝最可靠的近臣，曾经都在军机大臣行走，前因中法战争中主战，不合慈禧太后心意，而被罢黜军机处。现在朝鲜形势紧张，而军机处又为顽固派孙毓文、李鸿章所控制，干扰光绪帝抗战部署，亟须请入两位老臣参与军机，同顽固势力抗衡。然而，如果马上授命为军机大臣，等于否定慈禧太后以前的懿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免得惹怒了太上皇更不利于抗战的进行。光绪帝做得很巧妙，暂不直接授命，而是“与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详议”，让他们参予军机事务，以便测探慈禧太后对此的反响。从五月初至此时，翁同龢只能在“成均”（南书房）同光绪帝议论朝鲜战事，为了回避顽固派之嫌不便正面上奏疏陈述战事。翁同龢是一位恪守封建典章制度的老臣，唯恐引起慈禧太后的猜忌而增加光绪帝的压力。现在光绪帝“上谕军机大臣等”让他正式参与军机，于是翁同龢走马上任。十四日“军机来请，乃至值房，庆邸（庆亲王奕訢——引者）及译署诸军皆集。看电报，看奏折。主战者五折，议无所决。”十五日“军机始来请，阅志锐折片各一，北洋拨兵电一，英使欧格讷问答一，如是而已。”^②“寻翁同龢等奏：‘日兵驻韩日久，和议未成，自当速筹战事。’”^③如今他可以理直气壮地向光绪帝呈奏折，陈述抗战主张，成为光绪帝“每事必问同龢，眷倚尤重”^④的助手和顾问。至当年十月，韩战进入紧张时刻，己酉（初六日）“命翁

① 《清德宗实录》第342卷，第13页。

②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四。十五日。

③ 《清德宗实录》第342卷，第13页。

④ 《清史稿·翁同龢传》第41册，第12369页。

同樟、李鸿藻、刚毅为军机大臣。”^①在李鸿藻、翁同樟的建议之下，光绪帝还授“命恭亲王督办军务，所有各路大军统兵大员，均归节制。……庆亲王奕訢，著帮办军务。”^②又于十一月“庚辰，命恭亲王奕訢为军机大臣。”^③这一系列新的任命，除翁同樟、李鸿藻两位极力主张抗战的帝党核心以外，还任命能附和主战的满洲贵族大员奕訢、奕訢和刚毅参与军务指挥，这样做不仅在中枢机构中成员结构有了明显的变化，并且还扩大了“帝党”在朝廷中的同盟者。

恭亲王奕訢在“祺祥”政变以后，集行政、外交、洋务于一身，是朝廷内外颇有影响的宗室贵族，因权力之争被慈禧太后罢黜于中枢之外。尔今光绪帝请出奕訢督办军务，目的是要在宗室内扩大抗战影响，因为他在中法战争中是主战力量，中日战争开始以后光绪帝奉太后懿旨召见恭亲王奕訢，“著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务”并“著在内廷行走”^④，同慈禧太后的关系有了改善，光绪帝希图通过奕訢能减少来自太后方面的抗战阻力，进而争取他站到抗战力量一边。

刚毅满洲镶蓝旗人，多年任广东、云南、山西、江苏等地方疆吏。朝鲜战事爆发以后他附和主战，光绪帝便把他从广东调至京师，“署礼部右侍郎”并授命为军机大臣，这样也有助于扩大抗战联合阵线。当然，刚毅其人附和主战，并非是出于爱国抗日思想，而是为了讨好皇帝，以主战为步入青云之途径，是投机钻营的两面派。后来刚毅在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时又投入西太后怀抱，力主废黜光绪帝并罢新

①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三）总第 3485 页。

②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三）总第 3488 ~ 3489 页。

③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三）总第 3504 页。

④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三）总第 3466 页。

政。这样的投机分子被授命军机大臣,不能认为是光绪帝的失算,因为两面派嘴脸的彻底暴露是有一个过程的。

奕䜣是爱新觉罗宗室成员,光绪十六年(1890)醇亲王奕訢去世以后,军机处大权就落在他的手中,此人贪鄙昏庸,是慈禧太后的亲信。然在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的矛盾急剧发展之时,他身居军机要职为了避开舆论,也摆出一副主张抗战的姿态。平壤战役失败以后,奕䜣向光绪帝请求,表示要“统带劲旅出关征剿”,光绪帝表彰他“具见忠爱勇往之忱甚属可嘉”^①。所以委他“帮协办军务”,有意把他拉入抗战阵线,以分化“后党”,扩大抗战势力在朝廷中的影响。

总之,光绪皇帝在对日宣战以后,着手调整军机处班子,兼收并蓄各方面的头面人物,冲破了慈禧太后一手遮天的局面,尤其接纳宗室和满洲贵族要员参与军机,实际上把军机处改造成抗战联合阵线,这是极英明之举,表明光绪皇帝的政治艺术已经到了很成熟的程度。以光绪皇帝为元首的抗战联合阵线的形成,扩大了抗战力量。尽管组成联合阵线的成员非常复杂,难免夹杂着清统治集团内部的派系斗争,但具有爱国思想而又最拥护光绪皇帝抗战的近臣要员,如翁同龢、李鸿藻等人是联合阵线的中坚力量,使军机处发挥了抗战的参谋部和指挥部的作用。在这一意义上说,当时被联合在抗战阵线里的官僚,是清王朝统治集团中最有生气和活力的一股势力,并在一段时期里对其统治机制的运行起着主导作用。

中日双方正式宣战以后,中华民族同日本军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急剧发展,光绪皇帝发出上谕,“朝廷一意主战”,

^① 《清德宗实录》第347卷,第12页。

在封建社会里面,人们的皇权主义同爱国精神的奋发交织在一起,激起了强烈的抗战热潮。一些封建官僚怀着“忧国之愤”纷纷上奏言战,声讨日本的侵略暴行,抨击李鸿章妥协让步的“误国”行为。朝廷上下出现了“欲开言路”的活跃场局。礼部右侍郎志锐频频“上疏划战守策累万言”,^①痛责李鸿章主持战事“一味因循玩误,辄藉口于衅端不自我开,希图敷衍了事。”同时提出了以战弭战的主张,他说:

我若急治军旅,力敌势均,犹冀彼有所惮,不敢猝发;是示以必战之势,转可为弭衅之端。不然,则我退而彼进,……我愈退则彼愈进;我益让则彼益骄。养痍貽患,以至今日。……一误再误,则我中国从此无安枕之日,可不虑哉?^②

志锐“以战弭战”主张是很有见地的抗战理论。侍读学士文廷式在《奏朝鲜事机危迫条陈应办事宜折》里,以更广阔的视野提出四条建议:“一曰明赏罚”,“一曰增海军”,“一曰审邦交”,“一曰戒观望”^③。其内容所涉,不只是抗战的应急措施,而已经触及进行政治制度改革的范畴。这个奏折也是他萌发政治、军事制度改革的粗略设想。由此可见,军事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光绪帝在朝鲜事变发生之初,把他的精力从向慈禧太后争君权毅然转变为向日本侵略者争国权。然而,随着抗战的推进,君权的加强又显得十分重要,若无皇帝的权威,就不可能发挥君权的功能,争国权也就无从可谈了。文廷式看到了光绪皇帝权威的幅射力受到重重阻挠,尤其是军权方面遭到李鸿章的抗拒,所以他建议:

① 《清史稿·志锐传》第42册,第12797页。

②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丛刊《中日战争》(二)第623~624页。

③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丛刊《中日战争》(二)第606~607页。

令李鸿章慎择将弁中忠勇朴诚者列保一二十人,送部引见,候旨录用,或即分统各营,或令身临前敌,庶使将士皆知共戴天恩,感奋思报,亦驭将之一术也。^①

由光绪皇帝直接任命海陆军将领,使将领“感奋思报”,忠于皇帝,把军权从李鸿章手中转到皇帝手中,从而确立光绪帝的权威,由军事制度的改革来促进政治制度的改革。文廷式后来在维新运动初期大力宣传变法,组织强学会,成为一位出色的维新志士,他的思想基础是在中日战争中奠定的。

上面所述礼部右侍郎志锐和侍读学士文廷式都是“帝党”成员。一般说“帝党”主战,“后党”主和。那末,就是在一般的廷臣疆吏当中上疏朝廷言战者也不少见。河南道监察御史易俊在奏折中大声疾呼:“朝鲜近在肘腋……唇亡齿寒,大局何堪设想!”“不能必举国争之,以固藩篱。”^②国子监司业瑞洵在奏折里更是满腔爱国热情跃然纸上。

我皇上宸衷独断……宵旰焦劳,忧深东顾,凡有血气,罔弗攘袂思奋,敌忾同仇。言事诸臣,忠愤填膺,迫值主忧臣辱之时,争献御侮折冲之策,虽皆激于公义,实允协于舆情,众口一辞,毫无异议。^③

瑞洵所说“迫值主忧臣辱之时,争献御侮折冲之策”,是当时一部分具有爱国思想的清朝官僚力主抗战心情的确切写照。七月十五日(8月15日)“湖南巡抚吴大澂:电奏请统率湘军赴韩督战”,^④光绪帝赞扬他“奋勇可嘉,著照所请”^⑤立刻批

①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丛刊《中日战争》(二)第608页。

②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丛刊《中日战争》(三)第41页。

③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丛刊《中日战争》(三)第154页。

④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三)总第3447页。

⑤ 《清德宗实录》第345卷,第5页。

准他率三万湘军赴辽抗战。虽然吴大澂在次年三月牛庄等地作战败于日军,但他在中华民族遭到日本军国主义武力侵略,而顽固派又委缩避战的情况下,主动请战,这是爱国精神奋发的表现,应该誉载史册。再如在地方疆吏中颇有影响的两江总督刘坤一,他对于朝鲜战事日趋紧张,日本侵略者向中国军队步步紧逼的形势深为忧虑,“日本终为我患,令人每饭不忘”。于是他上奏疏给光绪帝明确地表示了主战立场,他指出:“现在兵端已开,务在痛予惩前,即使刻难得手,亦可以坚忍持之。”他还提出了对日持久作战的设想,认为中国幅员广阔,可以与日本进行长期作战,而“日本国小民贫,并力一举,其势断难支久,将来待其困毙,自易就我范围。”^①刘坤一对日持久作战的设想为光绪帝所重视,先是委以“兼署江宁将军”^②,防止日军“窜入南洋,以图分扰”。后来于十二月初“日本犯辽东,九连城、凤凰城、金州、旅顺悉陷,北洋海军皆失利。召坤一至京,命为钦差大臣,督关内外防剿诸军。”^③光绪帝寄扭转败局的希望于刘坤一。刘坤一其人“老成持重”,又是洋务派之要员,处事瞻前顾后,对日作战也有举棋不决,甚至动摇退却之处,然他能站到抗战行列中来,不能看到这是民族危亡的威胁和光绪皇帝为代表的抗战派“急速筹划战备”所推动的结果。

抗战卫国,人心所向。此时派赴朝鲜的将领聂士成、叶志超驻守牙山,在日军紧逼之下逃往平壤,途至成欢驿,在朝武备学生于光煦、周宣章等一面劝阻聂、叶抗日;一面深夜伏

①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丛刊《中日战争》(三)第49~50页。

②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三)总第3442页。

③ 《清史稿·刘坤一传》第39册,第12049页。

击日军取得小胜。^① 总之,在光绪帝“一力主战”的号召之下,全国各个阶层奋起抗敌的热情日益高涨,抗战形势出现可喜的征兆。

光绪二十年五月至八月(1894年6月~9月),在光绪帝亲自主持下,“朝廷一意主战”,枢臣草拟谕旨,审阅章奏,或“明发”或“廷寄”,清朝中央的统治机制功能,从腐败、麻木中得到某些苏醒。笔者略览《实录》、《翁文恭公日记》等史料,每日发出上谕少则十篇,多则十数篇(平时每日二三篇),而内容多为抗战方面的部署和指令。所以光绪帝“一力主战”并非是“一种空论”,而是他处在“日理万机”的战时紧张状态。在这短短几个月间,可谓是清朝从鸦片战争以后,其统治史上光辉的一瞬间。

对日宣战以后,清朝统治集团中主战势力迅速发展,并在中枢机构——军机处中积极发挥作用,全国上下抗战舆论已经形成。战争是政治和经济的集中表现。光绪帝在部署抗战的同时,也在努力筹集战争所需的粮饷装备费用,进行经济上的战备。光绪年间,清政府历年财政入不敷出,每年出超递增,光绪十五年(1889)出口货值银为96947832两,进口货值银为110884355两;入超为13936523两。至光绪十九年(1893)出口货值银为11663231两;进口货值银为151362819两;出超为34730508两。^② 入超主要原因是清政府兴办海军,从国外购进军舰、枪炮弹药以及其他军需装备。出超逐年增加,本来就很不景气的财政状况,现在又需巨大消耗,户部府库更是匮乏难支。近年来光绪帝大婚、修建颐

^① 此战,叶志超通过李鸿章向光绪帝谎报军情,声称:“鏖战六时之久,倭兵死者千七百余人”。朝廷恩赏叶志超军银两万两,并命叶志超为诸军总统。

^②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三)总第2702、3304页。

和园等等费资千万两之巨。光绪二十年(1894)又值慈禧太后六十寿辰大庆,以“铺张扬厉”来粉饰“升平”景象,光从户部府库准备拨款一百五十万两^①,其实各地疆臣进贡礼品一并在内远不止此数。中日战争爆发前夕,清政府的财政已濒于枯竭。中日战争开仗,更需大量银钱来支撑战争,李鸿章为了推行他的妥协让步政策,便用金钱来要挟光绪帝。光绪帝命他加强赴朝兵力,他就伸手向光绪帝要钱,“两次陈奏,均以筹款为先”^②,五月底,光绪帝发出上谕,令他“必须豫筹战备”^③,李鸿章又向朝廷提出:“远征必以近防为本,行军尤以筹饷为先”,^④一开口就是“先筹二三百万两的饷,方可战”^⑤。战争需要花钱本不足非议,然,几年来李鸿章用在北洋海军之费用,“糜帑千数百万两”,“现在北洋兵力军储甲于天下”^⑥,是年四月,李鸿章校阅海陆军后,夸耀海军“技艺纯熟,行阵整齐”^⑦。养兵千日,用兵一朝。该用兵之时李鸿章却提出先决条件,筹资二三百万两方可战,分明是对光绪帝施加压力,企图以筹款之难来迫使光绪帝放弃抗战主张。光绪帝抗战方针已定,决不因筹款困难而向日本侵略者妥协让步。他立即命户部尚书翁同龢、军机大臣庆亲王奕訢以及海军衙门“会同妥议”,尽力筹办。结果议“定海军、户部各任一半,共三百万之数”^⑧,具体落实是:“北洋生息款内提拨

①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年六月初三日。

②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丛刊《中日战争》(二)第597页。

③ 《清德宗实录》第341卷,第12页。

④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丛刊《中日战争》(二)第584页。

⑤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年六月初四日。

⑥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丛刊《中日战争》(三)第52页。

⑦ 印鸾章:《清鉴纲目》第14卷,第787页。

⑧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年六月初四日。

银一百五十万两,户部拟于东北边防经费及筹备饷需本年京饷等款内共拨银一百五十万两,由李鸿章分别提用。”^①光绪帝为筹集战费,可以说是千方百计费尽心机。

开源必须节流,当时唯一可以节流项目就是“请停颐和园工程以充军费。”^②这是很不容易的,犹如与虎谋皮冒着极大的风险。前面说过,光绪二十年清朝统治集团的一切都必须绕着慈禧太后六十岁庆典转动,以停颐和园工程来充军费,触犯了已经“归政”了的太上皇的尊严和威风,必然引出难以预料的后果。以往光绪帝在慈禧太后面前表现得较为懦弱,逆来顺受,不敢稍有抗争。这件事竟然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慈禧太后为此而“大怒”,^③从此耿耿于怀,加深了对光绪帝的疑忌。为了抗战,光绪帝冒了被赶下皇帝宝座的危险,说明他的性格外柔内刚,为捍卫祖宗“基业”他断然不顾个人安危。二十年的宫廷生活,光绪皇帝对西太后专断横行不可一世是非常清楚的,现在他断然决定“停颐和园工程”贻患非浅。可是从根本上讲,光绪帝此举是很得人心的,更加奋发了人们的爱国抗战热情。正象有的官吏在给光绪帝的奏折中所表达的那样:“皇上宵旰焦劳,实足以感动天下臣民,敌忾同仇之志”。^④皇帝对臣下的凝聚力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如果没有以慈禧太后为后台的顽固势力的种种干扰,光绪帝的战略方针和抗战部署能够切实贯彻执行,中日战争可能会以另一种局面告终。日本人大久平治郎也有过比较客观的评论:

①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丛刊《中日战争》(二)第599页。

②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1954年中华书局出版第58页。

③ 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1921年文明书局出版第56卷,第9页。

④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丛刊《中日战争》(三)第55页。

日清开衅之初,帝日意主战,观其请停颐和园工程以充军费,意亦可见矣。诚使支那君臣一心,上下协力,目的专注于战,则我国之能胜与否,诚来可知也。^①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光绪帝的抗战决心和主战派的极力响应,确实给人们看到了胜利的一丝曙光,并寄希望于作为一朝之主的光绪皇帝身上。

第四节 阻力重重 贻误战机

慈禧太后的亲信密布朝廷内外,其势力盘根错节,光绪帝的抗战部署和作战命令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靠山的顽固派所对抗,阻力重重,战机贻误,导致清军在几个重大战役中受挫败北,局面不可收拾。阻力主要来自慈禧太后的心腹重臣,操纵陆海军权的北洋大臣李鸿章。

光绪二十年五月初一日,李鸿章命叶志超、聂士成率兵一千五百人进驻朝鲜首都汉城以南的牙山。光绪帝命李鸿章“厚集兵力,即若酌量添调。”^②而李鸿章却以“虑衅自我开难于收拾”为由,“不欲多派兵力”,^③坐等列强“调处”,对抗光绪帝的命令。而日本方面则不断增兵达一万余人,先后占领仁川、汉城等战略要地,致使驻牙山的清军处在孤军被围境地。鉴于日本大军入朝的紧急形势,六月十四日(7月16

① 大久平治郎:《光绪帝》,明治三十五年十月东京横内会社出版。第7页。

②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三)总第3408页。

③ 《清德宗实录》第341卷,第6页。

日)光绪帝再次谕李鸿章“布置进兵”,增援牙山。^①可是李鸿章一意孤行,公然抗拒光绪帝的上谕,于六月十八日(7月20日)电示驻朝将令叶志超:“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切记勿忘,汝勿性急。”^②六月二十二日(7月24日)光绪帝又上谕李鸿章警告他“毋误时机”。上谕指出:

日人要挟太甚,但有豫筹战备。李鸿章所派各军到防后如何相机应敌,著严饬诸将领,妥慎办理,毋误事机。……倘有观望不前,致有贻误,定将该大臣等重惩。^③

在光绪皇帝几次三番的促催之下,李鸿章被迫以重价租用英国商轮“高升号”运载中国军队两千多人赴朝,另派军舰三艘护航。然而,战争之取胜,贵在用兵之神速。尔今战机已经贻误,日本方面领先一步,在“汉江水雷遍布,海道断绝”^④;陆路日军已向中国军队驻地牙山东北五十里的成欢驿逼近,形成水陆包围圈。至六月二十三日中国军队还未到防,在丰岛海域,遭到日本海军不宣战的突然袭击,“高升号”商轮被击沉海底,溺死中国军队一千数百人。护航的三艘中国军舰,一艘被俘,一艘重创,一艘临阵脱逃。在此同时,聂士成、叶志超的军队亦在成欢驿遭日军袭击,狼狈败退,绕道北走至平壤城,中日开仗后的第一个回合,海陆战均因军机贻误而遭惨败。六月初,光绪帝已筹集军费三百万两,“由李鸿章

① 《清德宗实录》第342卷,第14页。

② 《李文史公全集·电稿》《复叶提督》丛刊《中日战争》(四)第264页。

③ 《清德宗实录》第343卷,第7页。

④ 印鸾章,《清鉴纲目》第14卷,第789页。

分别提用”^①。李鸿章理应在六月中旬接到光绪帝“布置进兵”的谕旨以后,认真“豫筹战备”。旅顺、大连同朝鲜平壤隔海相望,中国军队完全可避开汉江水雷封锁区域早日与牙山中国驻军合师,就不可能有丰岛海域的不宣而战,更不会造成牙山孤军被围的局面。初期的战争形势很有可能改观,拒敌于国门之外,是甲午战争胜负之关键。

日军袭击中国运兵船只,溺死士兵一千数百人和日军向牙山中国驻军发动攻击的严重事件发生以后,社会上激起了强烈的反响。有诸多的官吏上奏折声讨日本军国主义挑起战争的侵略行动;同时也纷纷指责李鸿章“欺朝廷”、“抗廷议”、“深畏敌人”、“屡失事机”等等罪责。^② 光绪帝早有谕旨:“倘有观望不前,致有贻误,定将该大臣等重惩”,李鸿章对抗皇命坐失事机,罪责难宥。在中国军队遭受严重损失以后,八月十八日(9月17日)发出上谕,给李鸿章应有的处分。

北洋大臣李鸿章,总统师干,统筹全局,是其专责,乃未能迅赴戎机,以致日久无功,殊负委任。著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以示薄惩。该大臣务当力图振作,督催各路将领,实力追剿,以赎前愆。^③

论李鸿章失责误事的严重后果,光绪帝给他仅以“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的处分,应该说是微不足道的“薄惩”。然而,光绪帝有他的为难之处,对李鸿章的处分包涵了两个方面的用意。因为其时陆路平壤战役,海路黄海战役正在鏖战,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光绪帝处分李鸿章,目的是要他“督

①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丛刊《中日战争》(二)第599页。

②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丛刊《中日战争》(三)第60页。

③ 《清德宗实录》第347卷,第5页。

催各将领“实力追剿”，惩前毖后，挽回战局，这是其一；另外，李鸿章所以能有恃无恐，对抗光绪帝的抗战指令，因为他有皇太后为后台，消极妥协出于慈禧太后的心思。而他在海陆军中亲信分掌要职，有尾大不掉之势，光绪帝对他也奈何不得。这次光绪帝予以“薄惩”就是不想同李鸿章的关系彻底闹翻，只是摸一下老虎屁股，探测慈禧太后对此有何反映，这是其二。

日本侵略军紧接在牙山陆战和丰岛海战之后，又从陆海两路发起新的战略攻势，陆路围攻驻在平壤的中国军队，海路以攻击北洋海军为目标的黄海海战。七月初一日，光绪帝在下诏对日宣战的上谕里明确指示要“厚集雄师，陆续进发”，而李鸿章却阳奉阴违，拼凑由各派系军阀组成的一万四千多兵力聚集平壤。分别有：卫汝贵统率的盛军十三营；马玉昆的毅军四营；左宝贵的奉军六营、丰伸阿的奉天盛军六营，加上叶志超的残兵共三十五营，并任命牙山战斗中逃奔平壤的叶志超为诸军统帅。三十五个营的兵力，分属淮系和奉系，派系之间相互倾轧，矛盾重重，叶志超无力指挥调度各营将领。尤其李鸿章的亲信，“卫汝贵碌怯无能，性情卑鄙，平日克扣军饷，不得军心，沿途骚扰，必致败事。”^①到了平壤以后更是骄傲跋扈，不服调度，驻平壤一万多清军的战斗力尽毁于内耗。叶志超所统之诸将“日置酒高会”，“军士残掠”，“韩民大失所望”。^②聂士成借口到天津募兵，溜回本国。各路兵马聚集平壤以后，既不作战布阵，又不侦察敌情，任凭各派军阀“惟于城内外筑垒为自守”，“诸将划界分

①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三）总第3457页。

② 印鸾章：《清鉴纲目》第14卷，第792页。

守。”^①同时还向朝廷封锁布防情况,军情与君命梗塞不通,皇权的辐射力严重受阻。光绪帝于七月二十二、二十三日连续直接向李鸿章发出上谕,布置和查询前线军情:

丙申(二十二日)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李鸿章:平壤前敌各军到者计及万余,日人闻我进兵,亦屡有添兵北赴平壤之信,自应迅图进战,先发制人。况各军到彼休息,亦已旬余,后路未到之兵,亦应陆续全到。若迁延不进,坐失事机,致彼汉城之守益固,各处险隘布置益周,办理亦为棘手。著电飭各军统将,克期进发,直指汉城,沿途探听敌踪所在,或闯隘踞守之处,奋力攻防。倘敢退缩逗留,即以军法从事,并将进兵情形,迅速电复。^②

丁酉(二十三日)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李鸿章:叶志超一军,前线电称已抵平康,俟军移何处再禀等语。现在是否合军平壤,抑另扎平壤就近处所,著李鸿章电飭奏复。^③

此后光绪帝又多次向李鸿章发出海军护送援兵赴朝和军粮转运等电谕,对平壤战事作了各方面的部署。可是李鸿章都没有认真贯彻执行,亦无详细电奏,直至八月初五日(9月6日)光绪帝御览经李鸿章转呈叶志超的电奏后指出:

据叶志超电称,日兵万余人,由元山登岸,前队已抵阳德。看此情势,战事在即,而如何布置迎击分守之处,叶志超既未电知,李鸿章于电后亦未置一语。^④

① 印鸾章:《清鉴纲目》第14卷,第791页。

② 《清德宗实录》第345卷,第7页。是时,汉城已为日军所占并作为进攻平壤之基地。

③ 《清德宗实录》第345卷,第8页。

④ 《清德宗实录》第346卷,第6页。

就是这样敷衍搪塞 ,坐失战机 ,导致平壤战役败北。

李鸿章的亲信叶志超、卫汝贵等清军将领 ,对光绪帝的谕旨置若罔闻 ,既无“克期进发” ,又没有“奋力攻防” ,株守孤城 ,听任日军“分兵修道” ,一步一步地形成对平壤的包围圈 ,等着挨打。日军分四路围攻平壤 ,八月十三日(9月12日)双方前锋开仗 ,十四日日军发动总攻势 ,马玉昆统率的毅军扼守大同江东岸 ,拚死抵抗。盛军也渡江支援 ,激战八、九小时 ,在抗战卫国精神的激励下 ,马玉昆、丰伸阿以及广大盛军士兵均能奋勇杀敌。两军鏖战 ,胜负未决之时 ,叶志超突然发布命令撤兵后退。左宝贵亲临玄武门指挥作战 ,士兵英勇杀敌 ,日军死伤惨重。由于敌人炮火猛烈 ,左宝贵中弹阵亡。因为叶志超无全面作战布置 ,分兵把守 ,被敌人各个击溃 ,八月十七日(9月16日)叶志超竖起白旗乞降 ,弃平壤城北逃 ,路遇日军伏击 ,中国军队阵亡二千多人 ,被俘数百人 ,城内储存枪械、粮食都丢弃资敌。到八月二十三日 ,叶志超、卫汝贵率残兵败将先后渡过鸭绿江 ,撤回国境 ,平壤战役以折兵伤将弃械的惨败结束。

平壤战役证明中国士兵英勇善战 ,发扬了反侵略斗争的光荣传统 ,个别将领如左宝贵也表现出坚贞的爱国精神 ,如果光绪帝的战略部署能够得到切实遵行 ,对于日军的进攻清军还是有力量可予以打退的。平壤失守的第二天 ,翁同龢抨击说 :“合肥(指李鸿章——引者)事事落后 ,不得谓非贻误”。^① 李鸿章消极抗战贻误军机 ,叶志超统兵庸儒无能是造成平壤战役溃败的主要原因。

由于坐失事机 ,给敌人有充分的时间调度军队 ,产生了

^①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年八月十八日。

连锁反应的后果。平壤战役以后,八月十八日(9月17日)日本海军即刻在黄海袭击北洋舰队,爆发了黄海战役。也因李鸿章没有执行光绪帝命令而使北洋海军遭重大损失。

七月底,光绪帝的战略部署是“平壤后路空虚,亟须添兵填扎。”^①李鸿章提出由丁汝昌率领北洋海军担负护送清军的任务。光绪帝认为“丁汝昌畏葸无能,巧滑避敌,……断难胜统带之任。……丁汝昌庸懦至此,万不可用。”^②而李鸿章却大肆吹嘘“丁汝昌前剿粤擒,累著战功。创办海军,情形熟悉,日前海军将才,尚无出其右者。”^③于八月十三日(9月12日)派丁汝昌率领北洋海军主力大小十八艘战舰,护送商船五艘,载运淮军十二营,十六日夜从大连港出发,十七日抵达鸭绿江西面的大东沟口外。当天夜间陆军全部登岸,次日(十八日)上午北洋舰队在回航途中遇日海军阻击,双方发生激战。丁汝昌登上“定远号”的飞桥指挥作战,才打出第一炮,因年久失修的飞桥被震断,丁汝昌自空中坠落,负重伤。右翼总兵兼“定远号”管带的刘步蟾代替丁汝昌负起指挥作战的任务。这次海战进行了一个下午,北洋海军参战的大小十三艘船中有两艘在战斗激烈时逃走,其中一艘还撞沉了自己的一艘船只,有三艘被敌人击沉,其余七艘都遭到程度不同的创伤。虽然如此而败,然不少官兵作战表现得很英勇,以邓世昌为舰长的“致远号”,在船只重伤的情况下,下令拚死决斗,开足马力,向日本战斗力最强的“吉野号”撞去,誓与敌人同归于尽。不幸船中敌方鱼雷,全舰二百五十人官兵全部壮烈殉国,“致远号”管带林永升下令追击一艘受伤敌舰亦

① 《清德宗实录》第345卷,第15页。

② 《清德宗实录》第345卷,第15~16页。

③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79卷,第34~35页。

中鱼雷 船逐渐下沉 ,然官兵仍开炮击敌 ,决一死战。除十六人得救外 ,其余均为国捐躯 ;“ 来远号 ”中弹起火 ,伤势极重 ,全体官兵合力扑火 ,最终带着沉重的伤势返航祖国 ,许多观战洋人看此情景 ,无不钦佩之至 ;主力舰“ 定远号 ”、“ 镇远号 ”在不利的形势下坚持到底 ,终于使敌舰不得不退却而归。日本共十二艘船的舰队在这次战役中没有得到全胜 ,损失沉重。这次声震中外的“ 甲午海战 ”证明了许多中国的海军官兵具有为保卫祖国而不怕牺牲的无畏精神 ,由于清朝海军机构的腐败 ,才没有收到较大的战果。

平壤、黄海两役至关重要。平壤败北以后 ,光绪帝看到了形势的严重性 ,即于八月二十日(9月19日)“ 饬张锡銓带领两营前往鸭江 ,并举办乡团 ,添募丁壮炮手 ” ,又派“ 刘盛休带铭军四千进驻义州 ,并令宋庆带所部前赴九连城驻守 ,”^①采取紧急措施 ,以堵击日军北进。八月二十三日又指示李鸿章 :“ 现在日军狡谋日甚 ,我军须步步严防 ,稳慎进攻 ,安设粮台处所 ,为前敌各军命脉所关 ,尤应详加审释。”^②可是平壤战役以后 ,清军将领叶志超等 ,已无再战信心 ,兵败如山倒 ,一口气溃退至鸭绿江之北 ,实际上成了把日军引入国内的“ 响导 ” ,军机再次贻误。不久 ,日军大兵压境 ,战争即在中国本土内开展。

黄海战役日军虽无全胜 ,可是李鸿章却被日军的嚣张气焰吓破了胆 ,认为“ 以保船制敌之计 ,不敢轻于一掷 ,”^③命令北洋舰队全部躲进威海卫港内 ,殊不知 ,就是他的“ 保船制之计 ”导致不久旅顺、威海卫海战中北洋舰队的全军覆灭。

① 《清德宗实录》第347卷 ,第9页。

② 《清德宗实录》第347卷 ,第17页。

③ 《清德宗实录》第346卷 ,第1页。

黄海战役以后,海战即由大东沟海域转入辽东半岛展开。时间是在光绪二十年九月至十月(1894年10月至11月)。

经过大东沟洋面的激战,光绪帝已经洞察到日本海军必图深入内犯,旅顺、威海卫形势日趋吃紧,于是八月二十日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李鸿章,命他加强旅顺、威海卫防务。他指出:

敌船数多于我,并图深入内犯,此时威、旅门户及沿边山海关各口,十分吃紧,应饬分防驻守各兵弁,昼夜细察,严密防范。……并著李鸿章悉心筹划,严密布置,毋稍疏虞。^①

五天以后(八月二十五日)光绪帝又电谕李鸿章指出日军可能海道载兵至山海关登岸,配合进攻奉天日军,形成前后钳制之势。他说:

日人素有北进之谋,现在奉天边防图形吃紧,更恐其由海道载兵,突至山海关一带,伺隙登岸,极为可虑。威、旅为渤海门户。然海面相距其宽,海军兵舰又多损伤,彼若以大队兵船乘夜前进,为炮台轰击所不及,一经驶入,则北洋沿海口岸皆属可危。^②

可是李鸿章对光绪帝关于战事形势的分析置若罔闻,无动于衷,北洋舰队仍龟缩躲藏威海卫港内不敢露于洋面。对于通向旅顺、大连的花园口岸,更无一兵一卒防守,战机一误再误,又是被动挨打。

旅顺港是北洋海军的一个基地,它与山东的威海卫对

^① 《清德宗实录》第347卷,第9页。

^② 《清德宗实录》第347卷,第23页。

峙,是扼守着渤海的大门,地势极为险要。李鸿章于光绪六年(1880)就在这里修筑炮台,光绪十一年(1885)后在旅顺口花费了几千万两白银修建了一个大型船坞和一系列的炮台,其装备多数是德国买进较为先进武器,旅顺大连互为犄角,只要严阵以待,日本海军完全可以被拒之于内海之外。日本军方知道从海上正面攻击是很难得手的,便用海军运兵至花园口登岸,从后路抄袭旅大。日军约三万人从九月二十六日(10月24日)开始,经过十二天时间才全部登岸,因为花园口没有清军设防,任便日军运兵登陆。光绪帝事先已经估计到日军“伺隙登岸,极为可虑,……一经驶入,则北洋沿海口岸皆属可危。”现在日军果真在花园口登岸,证明光绪帝的战略远见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李鸿章能够认真执行光绪帝的命令“严密防范”、“严密布置”,日军在花园口登陆是不可能得逞的,就是登岸也不可能孤军深入数百里之遥。然而,日军在长达十二天的运兵登陆时间里,竟然没有受到清军的任何截击和阻挠。日军经由皮子窝而直扑金州,再从金州攻占大连,时间是在十月初九日(11月9日)。日军在大连平安无事地休整了十天以后,仅用四天时间(十月二十四日)占领了旅顺,手无寸铁的平民遭到日寇的血腥屠杀。

179

旅顺、大连被日军所占,完全是由于李鸿章违抗谕旨,贻误战机所致,清朝败局已定,形势难以挽回。李鸿章也知道旅顺、大连失守是战略上的失败,后果严重,他在事后的奏报中竭力推卸责任说:

查旅顺一岛,孤悬海中,所筑炮台,专为备击洋面敌船而设。若论防守周密,必须于后路金州一带设立重兵。当无事时,莫不以为过计,且实无此财力。此次倭兵于金州东北之皮子窝登岸,本非旅顺口守台兵

将所能远防。贼已袭据金州,则大连湾和旅顺俱成绝地。^①

其实,金州和旅大清军有相当的实力,单是旅顺一地集清军一万三千多人,而清军毫无战争布置,遇上日军不战即溃。日军攻陷旅大必袭威海卫,光绪帝已有明确谕旨,命李鸿章放弃“保船”方针,做好迎击敌舰准备,而他仍按兵不动,龟缩港内,白白地丧失了两个月的准备时间,坐待敌击。

日军攻陷旅大之后,准备进攻威海卫港,调集海军云集渤海洋面。光绪帝已察觉日本战计,命李鸿章把北洋舰队调出港口“相机迎击,以免坐困”。十二月十八日(1895年1月13日)上谕指出:

庚申,谕军机大臣等 昨因倭寇欲犯威海,已谕李鸿章等飞飭严防。第念海军战舰数已无多,岂可稍有疏失。若遇敌舰逼近,株守口内,转致进退不得自由,应如何设法调度,相机迎击,以免坐困。著李鸿章悉心筹酌,飭令海军诸将妥慎办理,并先行复奏。^②

光绪二十一年正月(1895年2月)日军又采取后路抄袭战术,由海军护送两万多日本兵于威海卫东面的成山登陆,向威海卫港发动攻势。光绪帝又命李鸿章“将定远等船齐出冲击,必可毁其多船,断其退路”,^③丁汝昌也要求出师,“迎头痛击”日舰。但李鸿章上拒朝命,下压官兵,命令北洋舰队“不许出战,不得轻离威海一步”,“如有违命出战,虽胜亦

①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79卷,第34~35页。

②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三)总第3527页。

③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丛刊《中日战争》(三)第340页。

罪。”^①又一次贻误战机,躲在威海卫港内的全部北洋舰队(大小兵舰十五艘和鱼雷舰十三艘)死死地守着“保船”宗旨,不出来迎战。十天后日军从后路攻占了威海卫港口南北两岸的所有炮台,守卫之清军不战而溃逃,日军在控制两岸炮台以后,又用海军封锁港口,北洋舰队成了瓮中之鳖。最后,日军攻陷刘公岛,统帅丁汝昌服毒自杀,北洋海军将领纷纷投降,尚存的一切舰船军资器械全落入日军手中。到光绪二十一年正月(1895年2月)李鸿章苦心经营十多年的北洋海军全被日军覆灭,由他自食了贻误战机的苦果。

第五节 艰难的处境

自旅、大陷落以后,日军海陆两路向中原逼进。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八日(1895年2月12日)日本海军攻占刘公岛,北洋舰队全军覆灭。由于日方兵力有限,无力侵占山东全省,于是占据荣城、文登各地日军相继退往威海卫,抽出兵力,集中进犯辽东。

渡过鸭绿江的日军分途向辽阳进发。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光绪帝任命湘军老将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付以指挥关内外军事的全权,并“命四川提督宋庆、湖南巡抚吴大澂帮办刘坤一军务。”^②湘军陆续出关,此时集驻山海关内外清军约有七八万之多,实力强于进犯辽东的日军。如果各军在统一指挥下协力抗敌,至少可以阻截日军的进攻确保中原。

^① 《时事新编》初集,《论丁军门掣肘愤恨事》。

^②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三)总第3529页。

可是,清朝军事制度腐败,各军将领多为懦怯无用之辈,多数士兵也是新募而至,战斗力极为差弱,最多也只能在敌人进攻时作些消极防御而已。从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到二十一年二月,日军在辽东先后攻占了海城、盖平、牛庄、营口,几万清军纷纷向锦州、山海关溃退,如果日军继续长驱直入,山海关、锦州必陷,这样京师门户洞开,直接受到日本侵略者的兵锋所胁,清朝政府惊慌失措,一片混乱。

前线频频败北,光绪帝的处境越来越艰难。

前一阶段由于光绪帝“一力主战”,朝野纷纷言战,“天下皆闻风思奋”,抗战气氛热烈,主战派在清统治集团的中枢机构里暂时占了优势。可是,尔今海陆战场节节战败,日本军国主义大有进入中原攻陷京师之逼人气势。其实,当时日军已把澎湖台湾列入它的战略进攻目标,也无更多的兵力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攻势。清军且战且败,京师动摇,清统治者犹似惊弓之鸟,恐慌万分。咸丰年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京师陷落,皇帝携带皇室避难热河承德,英法侵略军火烧圆明园等暴行,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清朝统治集团,逃难之狼狈相,历历在目,心有余悸。战争一败涂地,主和论调又有了市场,清统治集团内部乞求和谈言行便纷纷出笼。中日战争发展到今日大溃败局面是抗战派和顽固派都,没有料想到的。主战派只看到朝廷上下普遍高涨的抗敌热情,没有看到清朝军事制度的腐败无能,而主战官僚多数不是营伍出身的将才,手中也不握有军权,他们的抗战主张和部署缺少实际军事力量的基础。至于顽固派主和倒也不是因为已经估计到日本军国主义的实力,料到日军得寸进尺的侵略野心。他们主要是苟且偷安,迎合慈禧太后“颐养天年”的心理,唯恐与日本打仗,影响慈禧太后六十寿辰盛大庆典,破坏封建社会

的“升平”景象。慈禧太后在韩战爆发前也作过“主战”表示,但对“战”“和”争论不休,她旁若无事热衷于寿辰庆典策划,她代表了清朝封建统治者麻木不仁的精神状态。

中日战争爆发初期,尽管海域遭日军袭击,北洋海军第一次开仗就以败北载入史册,陆路平壤失守,叶志超竖白旗弃城丢械逃回鸭绿江以北,给大清军事史上又添了一大污迹,可是战争都发生在国门之外,在抗战派和顽固派看来,至多把朝鲜让给日本为殖民地就可结束战事。所以在这一阶段里,清统治集团内部主和的顽固派除了掌握实际兵权的李鸿章消极抗战,以对抗光绪帝作战指示外,其他官员如军机大臣孙毓汶、徐桐等人,也只能在背后吹吹阴风,没有掀起激烈的论争。是时,“皇上明诏下颁,天下皆闻风思奋,孙毓汶独怏怏不乐,退后有言,若以皇上为少年喜事者。”^①有的如奕訢、奕訖、刚毅等满洲贵族还附和主战,应付舆论。清统治集团以为韩战不致于动摇“大清基业”,这是抗战派和顽固派的共识。

旅顺、大连失守,日军渡鸭绿江攻入中国境内,战争形势急剧逆转。这时候清统治集团开始觉察到日本挑起韩战,目的不仅是要吞并朝鲜,而且还“素有北进之谋”,“现在倭寇扰及奉境,畿境吃紧”,^②约在十月至十二月间,才感到局势的严重。战火已经在祖国疆域燃烧的严峻局势下,主战派和顽固派采取截然不同的立场。以光绪帝为代表的抗战派则积极调兵遣将加强辽东防线,把支持主战的将领如刘坤一、吴大澂、宋庆等委以统兵指挥作战的重任,力争扭转败局。

①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丛刊《中日战争》(三)第37页。

②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三)总第3488页。

并命李鸿章把北洋舰队“相机迎击以免坐围”，亡羊补牢不致造成更大的损失。在强敌面前，败局之下，主战派抗战态度是积极的，精神是振作的。顽固派则不然，以为旅大失守，战争中国必败，而以败结局倒不如未败前乞和。慈禧太后对抗战的态度随着战争一次一次的失败，越来越急转求和。平壤失守和大东沟海战失败，她侥幸主战心理逐渐破灭，但是她仍持沉默静观，一心在颐和园坐待六十寿辰庆典的盛大举行。无巧不成书，西太后生辰即临之际正是日本军队发起海陆攻势之时，包括她本人在内朝廷对寿辰庆典大为扫兴，被迫降低庆典规格。

八月廿六日(9月25日)发出懿旨：

自六月后倭人肇衅，侵于藩封，寻复毁我舟船，不得已兴师致讨。刻下干戈戢，征调频仍，两国生灵均罹锋镝，每一念及，惻悼何穷。前因念士卒临陈之苦，特颁内帑三百万金俾资饱腾。兹者庆辰将届，予亦何心侈耳目之观，受台莱之祝耶！所有庆辰典礼，著仍在宫中举行，其颐和园受贺事宜，即行停办，欽此。

这道懿旨，说出了慈禧太后内心的不安，也反映出清朝统治集团因战争而乱了手脚。降低寿辰庆典规格，是慈禧太后对中日战争由静观到干预，由主战到乞和的一个转折点。

慈禧太后发出懿旨以后二天，八月廿八日(9月27)召集枢臣议论战争，以议和姿态干预韩战。

皇太后曰：‘有一事，翁某可往天津面告李某，此不能书廷寄，不能发电旨者也。’……‘俄人喀希尼前有三条同保朝鲜语，今喀使将回津，李某能设法否？’^①

①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三)总第3465页。

慈禧太后派翁同龢到天津,传旨李鸿章托俄使出面调处与日本议和。李鸿章曾积极活动,电俄使调处,俄使喀希尼也作过几次调处表示,但遭到光绪帝的竭力反对而未如愿。在此以前慈禧太后对于朝鲜战争很少表态,现在出来表态了,她的态度很明确是主张议和。翁同龢是抗战派的中坚,多次指责李鸿章一味依赖俄国出面调处对日妥协,如今竟由他传旨,翁同龢当然不愿接受这项差使,再三推辞,西太后不允,只能勉强为之。但临行前翁同龢再次向西太后说明自己的立场,“此节只有李某复词,臣为传述,不加论断。臣为天子近臣,不敢以和局为举世唾骂也。”^①翁同龢问西太后声明二则:一是,作为天子近臣,不做天子所不欲之事,因此只“传述”不“论断”,表示主战立场不因此举而有所改变;二是,和局一旦实现,他是不负“举世唾骂”的罪责。慈禧太后这一举动,实际上是向李鸿章示意,现在可以放肆策划议和活动了,我是站在主和这一边的。过去朝野激烈的主战气氛下,一些人暂时保持沉默,现今主和已成气候,于是“互相因应”串通一气。“军机大臣徐用仪使其同乡联名上书,意主求和而罢战。”^②李鸿章在光绪二十年五月初一日派叶志超、聂士成率兵赴朝镇压农民起义之后,一直主和,请俄求英调处,希望早日缔成和约,以结束中日军事冲突。光绪帝对李鸿章依赖英俄调解多次予以严厉批评,平壤失守以后又指责李鸿章“未能迅赴戎机”,“殊负委任”,予以“著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的处分。李鸿章所以坚持主和立场,主要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清朝以李鸿章一手创建的淮军和北洋舰队为

①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年八月廿八日。

②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年八月廿八日。

支柱,因为军权在握,因而他在清廷中的地位显赫,权力倾世。他深知,保持军队实力,就是保持权力与地位,故而绝对不甘心把苦心经营几十年的淮军和北洋舰队全部押在中日战争上面。李鸿章“无战志”^①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李鸿章老谋深算,自平壤失守和黄海战役的失败,受到光绪帝“拔去三眼花翎,褫黄马褂”的处分以后至旅、大沦陷这近两月之间,他基本上回避“议和”,我行我素以沉默来消极对抗光绪帝关于抗战的指令。他的主和言行都在平壤战役以前,战争败北,若再高谈“和议”阔论,难免会落得“畏敌投降”之罪名,必遭“举世唾骂”,可见当时抗战舆论威力之大。慈禧太后了解顽固派的心理,她命翁同龢传旨时,抓着李鸿章辫子带有威胁的口气说:

吾非欲议和也,欲暂缓兵耳。汝既不肯转此语,则经宣旨责李某何以贻误至此!朝廷不治罪,此后作何收束?且退衄者,淮军也,李某能置不问乎?^②

慈禧太后请俄调处的态度比顽固派中任何一位都要坚决,还特地命翁同龢转告李鸿章说:“出京时,曾奉慈谕,现在断不讲和,亦无可讲和。喀使既有前说,亦不决绝。今不必顾忌,据实回奏。”^③西太后此处所言“今不必顾忌”,有两层意思,首先是俄使在这几天前一直策划调处,而清朝最高当局终未明确表示可否,如今海陆败北后再去请求俄使顾忌有损大清面子;其次,过去李鸿章“以夷制夷”方针,受到光绪帝的坚决反对和严厉指责,如今再去活动俄使,可能又要遭光绪帝的反对和指责了。所以慈禧太后要李鸿章“不必顾忌”,实际上

①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丛刊《日中战争》(三)第145页。

②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丛刊《中日战争》(三)第62页。

③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

就是告诉“李某”你现在可别害怕了,因为是我的主张。李鸿章立即领会,听了翁同龢传旨以后精神振奋,满有把握地说:“若能发一专使与商,则中俄之交固,必出好讲说。”^①慈禧太后命李鸿章请俄使出面调停议和,她的主和和活动迈出了第一步。慈禧太后公开亮出了主和旗帜在清朝统治集团中是举足轻重的一着,一些主和大臣显得格外活跃起来,甚至到了有恃无恐的地步。九月十六日(10月14日)枢臣讨论英使欧格纳提出的议和“日本索兵费”问题,此时主战派与主和派又发生了剧烈的争论,主战派翁同龢、李鸿藻“谓英使不应要挟催逼”,认为英国显然袒护日本;主和派“孙(毓汶),徐(桐)璣璣,以为不如此不能保陪都、护山陵。”^②十月初四日(11月1日),慈禧太后召见枢臣,在场的有庆亲王奕訢、恭亲王奕訢、军机大臣翁同龢、李鸿藻、孙毓汶。慈禧太后“问诸臣计将安出?孙毓汶首陈各国调处事”,翁同龢立即表示了反对意见,“余对此事不可成,亦不欲与,盖将来无以为国也。”^③枢臣会议上两派公开冲突,说明由于慈禧太后公开了主和立场,主战派原来的优势开始丧失,而主和的顽固派对局势的发展起了主导作用。

187

慈禧太后所以命李鸿章联络俄使出面调停,因为俄国最早企图插手中日对抗形势,也曾放出空气要以武力令日本撤兵。随着战争形势的日渐恶化,列强之间对中日战争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英俄各有自己的打算,并不急于使日本停战,故对调停表现出不十分积极的态度。刚被慈禧太后重新起用的恭亲王奕訢,他有丰富的政治经验,不想在重新

①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年九月初二日。

②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年九月初二日。

③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年九月十六日。

主持总署之后再次得罪慈禧太后,所以他另辟门径,请美国出面调停。他看出了美国同日本关系最为密切,于是在十月初通过美国驻华公使田贝与美国驻日公使谭思着手在中日之间进行传话活动,主要是要摸清楚日本方面对停战议和的态度与要求。这两位外交掮客,他们知道清朝统治集团中一国之主的光绪皇帝主张抗战,并且在朝廷内外举国上下已经形成抗战热潮,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慈禧太后亮出了和议旗帜,然而要达成和议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所以他们选择了中国败局已定的关键时刻。十月廿五日旅大失守的前一天,田贝跑到总署给中日和议开出了一张帐单:

因昨天美使田贝到总署,自称奉其国电,为中倭调处,拟一文书,言大清国大皇帝、大美国大皇帝同派田贝讲解日本事。以朝鲜为主,并议赔偿兵费,议定再定数目,先令停战,若议不成,仍开战云云。^①

自从慈禧太后过问韩战以来,光绪皇帝的处境越来越艰难。起初,慈禧太后派翁同龢去天津向李鸿章传旨,请俄使出面调停中日战事。此时,光绪帝极为不欲,然翁同龢虽勉强受命但向慈禧太后表示了针锋相对的态度,很合光绪帝的心意,所以他对此举保持沉默,没有出来制止。即着在枢臣会议上主战主和发生了剧烈的争论,有时光绪帝并不在场,故也没有作出鲜明的姿态。可是在旅大失守之后顽固派认为败局已定,求和心切,美使又加紧活动,求和气氛充斥朝廷内外。当顽固派加快求乞议和步伐的紧要关头,光绪帝再次以坚定的抗战立场,对这股逆流予以痛击。他指出“冬三月

^①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年十月廿五日。

倭人畏寒,正我兵可进之时,而云停战,得毋以计误我耶?”^①光绪帝这番严辞指责是在慈禧太后召见恭亲王奕訢和庆亲王奕訢时发的,在场枢臣除翁同龢以外,有孙毓汶、徐桐等人,慈禧太后是主和派的后台,策划美使田贝进行求和活动的奕訢,那么光绪帝指责的矛头所向是针对清统治集团的最大实权派,这是非常明确的。当时“孙(毓汶)、徐(桐)对,万无此事”。虽然有慈禧太后撑腰,而光绪帝到底是君临天下的一朝之主,西太后已经“归政”,所以顽固派慌了手脚,连恭、庆两位亲王也吓得把话缩了回去,“语则旻莫闻也。”^②年青的光绪帝已经有了鲜明的个性,敢于同慈禧太后公开翻脸,尽管旅大失守,败局已定,以慈禧太后为后台的顽固派求和活动甚嚣尘上的气氛下,光绪帝顶住顽固派的压力,坚持抗战立场,这是难能可贵的勇敢精神。他这种坚定的抗战意志,力量来自捍卫祖业的责任性,也来自主战派的满腔热血的爱国精神。十月二十七日(11月24日)旅大失守战报传到京师,枢臣“见李抚电,有旅顺不守语,为之惊悸”,翁同龢更是夜“不能睡,默坐永叹”,“愤虑填膺,恨不速死”。^③旅大失守,祖国河山遭日寇蹂躏,大清朝臣民,应该敌忾同仇,奋起为保卫疆土而展开浴血奋战,可是那些身受皇恩的朝廷要员却热衷于托洋人走门路大搞乞和活动,用翁同龢的话来说“将来无以为国也”,为了打击顽固派求和的嚣张气焰,光绪帝当日对李鸿章作出了“革留摘顶”的处分。

电谕李鸿章:据电旅顺失守,览奏曷胜愤懑。该大臣调度乖方,救援不力,深堪痛恨。著革职留任,并摘去

①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年十月廿五日。

②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年十月廿五日。

③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年十月廿七日。

顶戴,以示薄惩,以观后效。^①

光绪帝的上谕,对李鸿章屡误战机,造成旅大失守的后果,所作出的“革留摘顶”的处分,应该是很轻的“薄惩”。然其用辞是很严厉的。“曷胜愤懣”、“深堪痛恨”,字里行间流露了他内心的难言之隐,即是对慈禧太后的不满心情。其时和战斗争,深入到皇帝与太后之间开展起来,两天之后,慈禧太后发出懿旨,指责瑾妃、珍妃“近来习尚浮华,屡有乞请之事……均著降为贵人,以示薄惩而肃内政。”^②据《翁同龢日记》云:“皇太后召见枢臣于仪鸾殿,先问旅顺事,次及宫闱事,谓瑾、珍二妃有祈请干预种种劣迹,即著缮旨降为贵人等因。”^③日记比懿旨讲得稍具体,瑾珍二妃有“祈请干预”行为,就是干预朝政,指的是有些人的主战建议和李鸿章等人对抗谕旨的信息是通过二妃的渠道传递给光绪帝。很明显,慈禧太后处分二妃,其用意是对光绪帝打击主和势力的一个回击,也是对帝党的一次警告,这是深层次的宫廷斗争同政治斗争相交织的表现形式。

旅大失守以后,慈禧太后的主和立场已经昭然若揭,因此朝廷主战舆论由指责李鸿章而转向慈禧太后。御史高燾曾首起而言之,他指责慈禧太后“挟私朋比,淆乱国是,若不精白乃心,则列祖列宗在天之灵,必诛殛之”,他还怒斥孙毓汶、徐桐之流“唯阿取容,无所匡救”,^④其言辞之尖锐,气得西太后“慈容弗色然”,大动肝火。可是高燾曾的奏折正是说出了包括光绪帝在内的主战派心声,所以翁同龢与光绪帝不

① 《清德宗实录》第352卷,第23页。

②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三)总第3498页。

③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年十月廿九日。

④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四日。

怕冒犯太后而站出来为高燮曾打圆场说好话了。翁同龢以劝慰的语调说：“明无弗照，圣无弗容。既调护于先，何必搜求于后？且军务倥偬，朝局嚣凌，宜以静摄之，毋为所动。”意思是大敌当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集中力量进行抗战为好。光绪帝领会其意，即刻表示：“姑从汝等请，后再有论列者，宜加惩创”。^①这样把主战直言的高燮曾保护下来了，一唱一和，很显然就是对慈禧太后旨意的抗拒。慈禧太后亲信主和派干将孙毓汶见光绪帝不处理高燮曾而气急败坏地攻击抗战派说：“言者结党陷害，夙习已然，请鉴悉”，^②当时抗战派与主和派针锋相对，互不退让斗争之剧烈可以想见。

按照慈禧太后的考虑，准备对高燮曾的奏折要加以严厉的口诛笔伐，“首指高折，以为离间，必加严驳，慈容弗色然。”^③可是得到翁同龢的帮腔，此事也就不了了之。孙毓汶是诡计多端的阴谋家，他所说“言者结党陷害，夙习已然”，矛头直指帝师翁同龢。几天之后，慈禧太后向抗战派反扑，采取二项措施：即把主战派中坚志锐发配边境乌里雅苏台，“次命撤满汉书房”^④，翁同龢虽据理力争，可是“无人和也”，孤掌难鸣。慈禧太后“撤满汉书房”的决定，正是为孙毓汶所说“结党”而发的打击措施，实际上向光绪帝猛然击来，书房是光绪帝与主战派商议战事的场所，撤书房，就是为了瓦解抗战力量，使光绪帝失去左右手。所以光绪帝对此寸步不让，“上色不怡，谓正典学，奈何灾讲。……以书房不欲撤”^⑤的

①

②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年一月初四日。

③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四日。

④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八日。

⑤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九日。

坚决态度,抵制了慈禧太后的决定。书房终算保住了,可是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关系由暗斗转向明争,光绪帝的处境也就更加艰难了。外面日寇的军事行动步步紧逼,李鸿章仍消极抵制光绪帝的谕旨,内廷则是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不断施加压力,企图压倒抗战力量。

在光绪帝处境越来越艰难的严重时刻,一些比较有勇气的御史对慈禧太后的反扑奋起还击,除高燮曾之外,御史安维峻上了一个言辞激烈的奏折,除了指责李鸿章“倒行逆施”、“丧心病狂”、“不但误国而且卖国”等破坏抗战的罪行之外,公开指责慈禧太后专权强行议和。他说:

又谓和议出自皇太后,太监李莲英实左右之。此等市井之谈,臣未敢深信,何者?皇太后既归政皇上,若仍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至李莲英是何人斯,敢干政事乎。如果属实,律以祖宗法制,李莲英岂复可容。^①

在安维峻笔下,慈禧太后、李鸿章、李莲英“后党”核心人物于国家和民族利益而不顾,屈辱求和的面貌暴露得淋漓尽致。安维峻奏折击中了慈禧太后假归政真专政的关节,因而激怒了慈禧太后,在她的威逼之下,光绪帝“仰承皇太后懿训”、“安维峻著即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②自甲午战争以来,李鸿章虽抵制光绪帝关于抗战部署与命令,然抗战最大的阻力却来自皇太后。在抗战派看来要有效地推进抗战,必须转移最高统治权力。安维峻在抗战的紧要时刻,主和派嚣张气焰刚刚抬头,战争还未彻底失败(威海卫战争爆发以前,北洋

①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三)总第3515~3516页。

② 《清德宗实录》第355卷,第3页。

海军尚有相当实力) ,此时此刻 ,对慈禧太后提出“皇太后遇事牵制”的指责 ,实际上是要求慈禧太后放弃权力 ,真归政于光绪帝 ,这个要求也是抗战派共同要求。然而 ,光绪帝集全部力量于推进抗战 ,没有转移权力的打算 ,一方面反映了光绪帝委曲求全不敢同慈禧太后最后闹翻的懦弱态度 ,另一方面 ,要从慈禧太后手中转移权力 ,谈何容易 ,她操纵清朝最高统治权力已达四十年之久 ,党羽、心腹密布朝廷上下 ,在廷臣武将中间也不乏其人 ,如果不进行政治、军事制度上的大刀阔斧的改革 ,转移权力是完全不可能的 ,当时一些主战激烈的官员 ,也曾经批评光绪帝在处理瑾、珍二妃和安维峻、志锐等事件中对慈禧太后的态度“过仁慈”^① ,他们预感到抗战前程将断送在慈禧太后之手 ,心里感到着急 ,但并非“为之心寒” ,在光绪帝处境越来越艰难的条件下 ,如果对他提出没有利用“大好时机”、“表现了惊人的软弱”、令人“为之心寒”等等指责 ,那是不客观的 ,是脱离历史实际条件的苛求。

193

第六节 挥泪签约

旅大失守以前 ,慈禧太后命李鸿章联络俄使喀希尼出面“调停” ,恭亲王奕訢通过美使田贝设法“调处” ,俄、英、美、德等为了各自的利益 ,扮演着“和事佬”的角色 ,向日本政府展开外交斡旋。日本侵略者挑起甲午战争 ,其目标不仅非常明确 ,而且也是十分坚定的 :一是要吞并朝鲜 ;二是要割让中国领土 ;三是要索取巨额赔款。光绪二十年十月十八日

^①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年十月初七日。

(1894年11月16日)英国驻日公使会见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奉英政府之训令向日转告,提出了二项停战条件,即朝鲜“独立”和中国赔偿日本军费,以探测日本政府的态度。日本政府认为“其主意颇为空漠,日本当难允应”。即着陆奥开出了停战要求,甲、乙、丙三个方案,除英使提出的两项之外,加上割地,或割让旅顺大连湾,或割让台湾全岛。^①日本政府提出的停战条款极为苛刻,清廷非到头破血流的时刻,是不会接受的。所以陆奥认为现在和议还为时过早,他说:“我国在连战连捷之时期”,而“熟察中国之情形,彼等非更受重大打击后未能真心悔悟,……故现在媾和时机尚早。”^②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清朝统治集团的实权派求和心切,十月初,李鸿章派出担任天津税务司的德国人德璀林代表清政府到日本去探商和议条件,但日本政府断然拒绝。不久,经过美国使节的一番斡旋,清政府改派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和曾任台湾巡抚的邵友濂为代表赴日和议。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初六日(1895年2月3日)中国代表到达广岛。是时,日本海陆军正在向中国发起大规模攻势,日军攻占威海卫军港,消灭全部北洋舰队,陆军也长驱辽东,向山海关、锦州等军事重镇进逼。清廷得悉威海卫、“刘公岛已失,……威海舰艇尽失矣”,诸大臣面对惨败局势,恐慌万状,“时事如此,战和皆无可恃”,光绪帝急得“汗流沾衣”,翁同龢亦“愤闷难言”,君臣“声泪并发”。^③以光绪帝为首的主战官员颇有“罔知所措”的失落感。

在日本方面,全歼北洋舰队以后,认为已经到了逼清廷

① 陆奥宗光:《蹇蹇录》第十四章 丛刊《中日战争》(七)第163~165页。

② 陆奥宗光:《蹇蹇录》第十五章 丛刊《中日战争》(七)第1167页。

③ 以上引文均见《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日。

就范的时候了。首先,日本政府由于战线太长,而且又要抽调兵力进犯已澎湖列岛,作为割据台湾的准备,因而感到兵力不足,国内兵源财政也难支撑巨额的战争耗费。其次,欧美列强不希望日本在中国伸展过大的势力,俟中日战争的发展,超越了列强互相利用日本牵制对方的极限,就难免要采取必要的干涉措施来限制日本势力的继续发展。早在1894年底,驻日的美国公使谭恩代表美国政府警告日本说:

然战斗弥久,若无限制日本军海陆进攻之法,则与东方局面有利害关系之欧洲强国,难免对日本国将来之安固、幸福为不利之要求,以促战争之终局。^①

鉴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日本政府考虑到“万一此种干涉到来,则斟酌该第三国之意向或致不能不变更我对中国之条件。”^②战争是手段,不是目的,如若这种手段用过了头,目的就不能达到。因之日本政府改变方针,企图用议和这一手段,来达到同样的目的。日本政府用非常狡猾的手法向清政府传递议和意向。清政府代表张荫桓和邵友濂到达日本广岛十天之后,日本以张、邵所带国书不是全权委任状为由,拒绝谈判,实际上是把中国代表驱逐回国。另外又通过美使田贝向清政府示意,“须另派十足全权,曾办大事,名位最尊,素有声望者方能开讲”。^③这样就是向清政府表达:一是日本方面愿意同中国进行议和停战;二是其条件是相当苛刻的,所以必须“须另派十足全权”并“素有声望者”的官员任代表“才能开讲”。此时,田贝还向“总署”透露,和谈条件可能涉

① 陆奥宗光《蹇蹇录》十五章丛刊《中日战争》(七)第167页。

② 陆奥宗光《蹇蹇录》十五章丛刊《中日战争》(七)第175页。

③ 《翁同龢日记》光绪十一年正月十六日。

及“割膏腴,偿巨款”^①。潜意很明确,日本政府心意中的和议代表非恭亲王奕訢和北洋大臣李鸿章莫属。

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六日(1895年2月13日)清政府得到由田贝传递的信息,至于是否接受日本政府的横蛮要求而另派代表,则由慈禧太后独自定论,光绪帝一无所知。正月十八日清晨,光绪帝召见翁同龢入内殿,“上(光绪帝——引者)询昨日定议否?对已定。”^②说明关于派代表事宜,慈禧太后独断专行,根本不同光绪帝商量而把他扯在一边。当天上午慈禧太后避开光绪帝于养性殿召见枢臣,她对日本政府的示意心领神会地说“田贝信所指自是李某,即著伊去,一切开复,即令来京请训。”恭亲王奕訢转达了光绪帝的意见,认为李鸿章不宜作为全权代表,“上意不令来京,如此恐与早间所奉谕旨不符”^③,可是慈禧太后根本不理睬光绪帝的意见,一意孤行地说:“我自面商,既请旨,我可作一半主张也。”^④并授意孙毓汶起草谕旨命李鸿章来京“请训”。慈禧太后在全权代表人选问题的态度与做法,是向朝廷内外发出了光绪帝被架空靠边的信号,因而顽固派更加有恃无恐,盛气凌人起来了。孙毓汶秉承西太后旨意起草的“上谕”于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九日(2月13日)颁布于朝,孙毓汶借题发挥,大肆吹捧李鸿章,主要内容为:

现在倭焰鸱张,畿疆危逼,只此权宜一策,但可解纷纾急。亟谋两害从轻,李鸿章勋绩久著,熟悉中外交涉,

①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丛刊《中日战争》(一)第82页。

②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八日。

③ 所谓“早间谕旨不符”,是指光绪帝曾对李鸿章作过“革留摘顶”处分不符。

④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八日。

为外洋各国所共倾服。今日本来文隐有所指 ,朝廷深维至计 ,此时全权之任 ,亦更无出该大臣之右者。李鸿章著尝还翎顶 ,开复革留处分 ,并尝还黄马褂。作为头等全权大臣 ,与日本商议和约。^①

这篇上谕“把光绪帝对李鸿章的两次处分一风吹掉 ,彻底翻了案。这是慈禧太后“作一半主张”中的第一个主张 ,表明顽固派向抗战派进行全面反扑的开始。时到今日 ,以光绪帝为元首的抗战联合阵线基本解体 ,在清统治集团内部的分歧已经不是战与和之争了 ,议和已成定局 ,中枢机构中以顽固派意见为是。在顽固派中孙毓汶气焰最为嚣张 ,和议调子唱得最起劲 ,一贯“力言战不可恃”^②是慈禧太后“最得意信任之人” ,他和李鸿章同为西太后的左右手 ,有内孙外李之谓。然而 ,孙毓汶某种程度上比李鸿章具有更大的破坏力 ,他“且与李莲英结为兰谱 ,得以侦探内宫消息 ,视皇上如虚器焉”^③。在中日战争成为败局 ,举国愤恨日寇蹂躏我大好河山之时 ,他却幸灾乐祸 ,“当中日事急 ,凤凰、九连城相继失陷 ,浸及登莱 ,毓汶日召梨园府中演戏。”^④其他顽固派也无视皇帝权威 ,一步一步地逼着光绪帝向日本侵略者屈服 ,按照日本政府设计的陷井就范。此时的光绪皇帝步履艰唯 ,他的命运同民族的命运 ,祖国的命运紧密地连在一起 ,面临着中日战争以来最大的考验。

严峻的形势 ,向着光绪帝步步逼近 ,他在主战大臣们“罔知所措”孤军奋战的困境下 ,继续同顽固派的投降活动进行

① 朱寿朋编 ,《光绪朝东华录》(四)总第 3540 页。

② 《清史稿·孙毓汶传》第 41 册第 12376 页。

③ 《清朝野史大观》清人逸事》卷八 ,第 47 页。

④ 《清朝野史大观》清人逸事》卷八 ,第 47 页。

了不调和的斗争。

其时,斗争的首要问题是是否割地。李鸿章在天津接到“星速来京请训”的谕旨以后,马上向朝廷上奏,提出“敌欲甚奢,注意尤在割地,现在事机紧迫,非此不能开议。”^①逼着光绪帝授予“割地之权”,并且以割地求和“古所恒有”,“但能力图自强之计,原不嫌暂屈以求伸”的胡言乱语来为对敌屈膝行为辩解。同时又以“停战期限已满,彼仍照旧进兵,直犯近畿,又当如何处置”^②的话来恫吓光绪帝,真是软硬兼施,无所不用其极。既然当时的光绪皇帝已被架空“靠边”,为什么李鸿章还要逼着他面授“割地之权”呢?尽管慈禧太后已站出来表示“作一半主张”,然她已归政,光绪帝毕竟在臣民的心目中为“一朝之主”,重大事件还是要用皇帝谕旨的名义来布告天下,而且自亲政以来,光绪帝政治上已经成熟,虽谈不上雄才大略但也想有所作为,把清朝治好,所以他是不愿任人摆布的。李鸿章也感到这位年轻皇帝越来越难对付了,况且慈禧太后“作一半主张”是圆滑之辞,以后可作灵活解释,因而“割地”这等重大事件,李鸿章若得不到皇帝“上谕”是不肯承担责任的。

割地是出卖祖国神圣领土的可耻事件,虽“古所恒有”,但是历史上凡割地求和的君臣,无不成为“举世唾骂”的千古罪人,白纸黑字载入史册,这是任何人抹煞不了的历史罪责。应该公允的评论,清朝统治集团之最高掌权者,从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到李鸿章都不敢承担“让地”的重大责任。光绪帝对李鸿章的奏折作了很巧妙的答复:

①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四)总第3551页。

②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四)总第3551页。

此次特派李鸿章与日本议约 ,原系万不得已之举 ,关系之大 ,转环之难 ,朝廷亦所洞鉴。该大臣膺兹巨任 ,惟当权衡于利害之轻重 ,情势之缓急 ,通筹全局 ,即与议定条约^①。

光绪帝在上谕中回避“割地”两字 ,而责李鸿章权衡利害轻重而行之。正月二十八日 ,李鸿章应召到京 ,光绪帝于乾清宫养心殿与军机大臣一起召见李鸿章时只是“温谕询途间安稳”的客套一番 ,仍未“面谕”授割地之权 ,仅作了“惟责成妥办而已” ,模棱两可的“训令” 。李鸿章无皇帝授权“让地” ,当然不会轻易赴日议和。过去他抵制光绪帝关于抗战的种种指令 ,有恃无恐 ,尔今赴日议和却非“遵谕旨”而不起程 ,可见他之老谋深算。“面谕”未得 ,苦衷难言 ,李鸿章在养心殿同翁同龢、孙毓汶、徐用仪、奕訢等军机大臣相互扯皮 ,在这些重臣要员的言辞中真实地反映了他们在割地这一重大问题上的不同心态。李鸿章首先唉叹苦衷 :“割地之说不敢承担 ,假如占地索银 ,亦殊难措 ,户部恐无此款。”^②应该指出 ,赴日议和并非美差 ,李鸿章不想戴上“割地卖国”的帽子 ,在其言辞中道出了他的矛盾心理。翁同龢认为“但得办到不割地 ,则多偿当努力”^③ ,意思是宁可多赔偿军费而争取不割让领土。这个主意无疑是上策 ,领土重于银钱这是他的价值观。然而 ,从日寇的野心来看 ,那是办不到的 ,实际上给李鸿章出了一道难题。李鸿章听出翁同龢的高调 ,便反唇相讥 ,企图拉翁同龢同赴日本 ,尝尝和议代表的滋味。“李欲要余(翁同龢——笔者)同往议和 ,予曰 :‘若余曾办过洋务 ,此行

① 朱寿朋编 :《光绪朝东华录》(四)总第 3552 页。

②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廿八日。

③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廿八日。

必不辞。今以生手办重事,胡可哉?’”翁同龢婉言拒绝。在座的孙毓汶、徐用仪立即帮腔,“孙、徐则但言‘不应割地,便不能开办’。最后李鸿章无可奈何地表示“割地不可行,议不成则归耳”。^①李鸿章尽管消极抗战,抵制光绪帝抗战部署,屡屡贻误战机,造成今天的败局。但在割地问题上其态度至少还存顾忌,从这一点上讲,当时曾极力主张“割地”的孙毓汶、徐用仪比李鸿章更应受到“举国唾骂”。

因割地问题“关系之重”,李鸿章坚持“请训”,非得到光绪帝“面谕”不可。二月初四日,光绪帝命恭亲王奕訢“汝等宜奏东朝,定使臣之权。”^②把授李鸿章“让地”之权推在慈禧太后身上。可是老奸巨滑的西太后也不想负“举世唾骂”的割地罪责,通过内监李莲英传懿旨:“慈体昨日肝气臂疼腹泄不能见,一切遵上(光绪帝——引者)旨可也。”^③用装病的办法再把这只割地皮球又踢给了光绪皇帝。李鸿章没有得到光绪帝授予“割地之权”的谕旨不肯起程赴日,一些主和“后党”唯恐“停战期限已满,彼仍照旧进兵,直犯近畿”,^④打乱他们养尊处优的安逸生活,急如火燎地联名上奏,“枢府王大臣亦公请懿旨促鸿章行”,他们声称:

臣等伏思倭奴乘胜骄恣,其奢望不可亿(臆)计。现在勉就和局,所最注意者,唯在让地一节。若驳斥不允,则都城之危,即在指顾。以今日情势而论,宗社为重,边徼为轻,利害相悬……李鸿章自应迅速起程,免致另生

①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廿八日。

②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四日。“东朝”指慈禧太后,因故宫乾清宫内西侧养心殿是光绪帝召见枢臣之所;东侧养性殿乃皇太后召见枢臣之所。

③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四日。

④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四)总第3551页。

枝节。^①

枢府王大臣联名“公请”，又给光绪帝加了一重压力，他们硬是要把光绪帝逼进割地求和的死胡同里去。此时，李鸿章更是纠缠着光绪帝不放，二月初八日（3月4日）光绪帝于书房密见李鸿章，“今日上（光绪帝——引者）见李鸿章不过一刻，语极简，又独对，不与枢臣同见，可异也。”^②这次密见，很可能光绪帝已“面谕”李鸿章授以“让地之权”。据记载李鸿章离京前光绪帝“予以商让土地之权，其斟酌轻重，与倭磋商定议。”^③所以第二夫（初九日）他离京回天津，准备起程赴日。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3月19日）李鸿章携带顾问科士达（美国人）、随员李经芳（李鸿章子）等到达日本马关。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及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为日本方面的全权代表。二十四日交换全权资格证明，即着开始谈判。日本方面拒绝先停战，再和约，强调中日仍处在战争状态，日本侵略者手里操着随时可以发起新的攻势之主动权，并以此来威胁李鸿章就范。由于日本浪人开枪打伤了李鸿章事件发生，谈判日程拖延了下来，李鸿章治伤期间由其子李经芳为钦差大臣，四天以后谈判继续进行。日本政府害怕因李鸿章负伤事件成为列强干涉的借口，故所以于二月廿九日（3月28日）先签停战条款，至三月二十三日（4月17日）签订了《马关条约》。

李鸿章赴日和议期间，光绪帝处于被“劫持”状态，主战派也“计无所出”，中枢机构完全被顽固派所把持，“军机大

①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丛刊《中日战争》（一）叫83页。

②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八日。

③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丛刊《中日战争》（一）第83页。

臣孙毓汶、徐用仪实主之。”^①凡朝廷与在日本的李鸿章联络电文,均由顽固派草拟,不经光绪帝签阅擅自发出。主战派翁同龢、李鸿藻虽然仍入值中枢,然权力已被剥夺,凡翁、李草拟的上谕均被扣下未能发出。三月初六日(3月31日)翁同龢眼看由孙毓汶草拟发给李鸿章的谕旨中“秉笔者直欲以海疆拱手让人”之句,他与李鸿藻“同词力争,删去数语”,也被孙毓汶、徐用仪所拒绝,气得翁同龢连声长叹“可恨可恨”!^②孙毓汶气焰更加嚣张,扬言以后“战字不能再提”^③。在《马关条约》的讨论过程中“三月中旬,合肥(指李鸿章——引者)屡电云,倭不受商。上(指光绪帝)震怒,有手谕一道云:‘倭人要挟无厌,朕当亲率六师,与贼决一死战。’”^④孙、徐之流所草拟的谕旨完全违背了光绪帝的抗战旨意。三月十九日(4月13日)李鸿章把和约(即《马关条约》)草拟条款电告“总署”,当时的“总署”也为顽固派所控制,未奏光绪帝擅自复电李鸿章说:“如竟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约”,^⑤意为全部接受日本政府提出的要求,即刻签约了事。由此可见《马关条约》是在背着光绪皇帝的情况下进行讨论和订立的。

三月二十三日(4月17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同日本政府代表草签了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并规定这个条约经两国政府批准后,于四月十四日(5月8日)在中国烟台换约生效。《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是:

①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丛刊《中日战争》(一)第87页。

②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初六日。

③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初十日。

④ 易顺鼎:《盾墨拾余》,丛刊《中日战争》(一)第126页。

⑤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丛刊《中日战争》(一)第86页。

中国要把辽东半岛和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包括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

赔偿日本军费二万万两；

添设湖北沙市、四川重庆、江苏苏州、浙江杭州为通商口岸。

还规定日本人在中国通商口岸，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并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日本在中国制造的货物享受与进口货物一样优待的权利。这一条，对当时的日本说来，并不是现实的需要。然根据列强“利益均沾”的原则，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借这一条款，进一步拓展他们在中国的投资，那是极为有利的。也可以说，这是日本政府对列强的支持与调处的一笔厚实的酬谢。

经李鸿章草签的《马关条约》以最快的速度于三月二十七日(4月21日)送到北京。第二天，“济宁(指孙毓汶——引者)捧约逼上(指光绪帝——引者)批准，海监(指徐用仪——引者)和之。上迟疑不允。”^①

《马关条约》的内容和光绪帝拒绝批准的消息传开以后，举国上下反响强烈，废约呼声高涨。“废约之议”的奏折“连日疏争者不绝，王公亦有之。上(光绪帝)意欲废约颇决。”^②光绪帝拒绝批约的第二天(三月二十九日)上疏官员多达一百二十余人。“有请廷议者，有驳条款者，有劾枢臣者。”^③其时，正在参加北京会试的各省举人，公推康有为执笔上书光绪皇帝，签名举人有一千三百余人，反对签订《马关条约》。他们还提出了改革政治的要求，建议以赔款作战费，迁都再

① 易顺鼎：《盾墨拾余》，丛刊《中日战争》(一)第126页。

② 易顺鼎：《盾墨拾余》，丛刊《中日战争》(一)第126页。

③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战,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运动,也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冲破清政府禁例,第一次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群众性运动,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马关条约》割地赔款的消息传至清朝军中,“诸将或号泣谏言,愿决死战,不肯以寸土与人。”^①台湾人民得知台湾割让日本,“男妇老少痛哭愤激,不甘自外于中国,”^②“绅民呈递血书,内云:台民誓不从倭”反对认贼作父。《马关条约》割地面积之大,赔款之多远超过当年的《南京条约》,引起了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最大震惊和痛心,连得在疆臣中颇有影响的洋务派头面人物刘坤一和张之洞也激起了爱国良知,上书朝廷要求废约再战。刘坤一在电奏中分析了敌我之间兵力财力之后再次提出了开展持久战的要求:

坤(刘坤一)于新定条约虽未尽悉,要之让地赔款多节,目前固难允行,后患更不堪设想,宜战不宜和,利害重轻,事理显然,此固天下所共知,亦在圣明洞鉴。惟一经决裂,倭必分拥猛攻,自以保京畿、固辽沈为第一要义。……万一京畿吃紧,坤必抽调劲旅,迅速入卫,以保无虞。……但倭奴远道来寇,主客之形,彼劳我逸。近得探报倭新卒从以老弱充数,饷亦不继。在我只须坚忍苦战,否则高垒深沟,严为守御。倭奴悬师远斗,何能久留。力尽势穷,彼将自为转环之计。况用兵两年,需饷不过数千万,较赔款尚不及半,而彼之所费愈多,‘持久’二字,实为现在制倭要著。诸将一闻和约,义愤填胸,必欲一决死战。坤职在兵戎,宗社所关,惟有殚竭血诚,力

① 刘侃:《犊鼻山房小稿》,丛刊《中日战争》(五)第192页。

②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丛刊《中日战争》(四)第13页。

任战事,此外非所敢知。^①

刘坤一关于进行持久战的主张,绝非空谈,当时从京津至山海关一带,清朝驻军达十几万人,如果继续开战,日军“悬师远斗”,“以老弱充数”,其战斗力必然锐减,而我军将士在民族处于危亡威胁的紧急关头,热血沸腾,“必欲一决死战”,战斗力也得倍增。然刘坤一出于“忠愤”,提出持久战主张只看到形势的一个方面,而要促成持久战的实现还须诸多方面的条件相辅相成。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使清朝封建统治的腐败无能有所改善,皇帝权威必须得到加强,这方面的条件暂不可及,光绪帝对持久战是力不从心的。

张之洞在电奏中更是字字血,声声泪,他以“先诛微臣而谢天下”的决心,向朝廷请战:

请求“明发谕旨,宣示中外,奉皇太后西幸,命恭亲王留守京师,如战而不胜,赔款割地尚为未迟。……如因或迁或守而贻误大局,请先诛微臣以谢天下。”^②

总之,全中国被激怒了,顿时掀起了反对侵略者的滚滚怒潮,给了光绪帝拒绝批约的决心与力量。

《马关条约》草签以后,清统治集团内部又展开了剧烈的争论和斗争,其内涵所涉超出了帝党后党之间的派系斗争范围,具有争国权反投降的积极意义。

以帝党为核心的抗战派主张废约,再次提出迁都以继续进行抗战的要求。如文廷式认为朝廷应该“不顾恋京师,则倭人无所挟持”,^③翁同龢提出“公论不可诬,人心不可失”,因而“批准之不可速”,“得台湾门人俞应震、邱逢甲电,字字

①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丛刊《中日战争》(四)。第42~43页。

②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四)总第3594页。

③ 文廷式:《闻尘偶记》丛刊《中日战争》(五)第497页。

血泪 ,使我无面目立于人世矣。”^①反映了主战派满腔的爱国情怀。光绪帝作为一国之主 ,更是“为和约事徘徊不能决天颜憔悴”^② ,怒叹“割台则天下人心皆去 ,朕何以为天下主 !”^③以坚定的立场废约。

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派 ,他们被战争吓破了胆 ,切望批约了结。“翁尚书亦主迁(都) ,孙尚书则主乞和” ,并以“岂有弃宗庙社稷之理”^④ ,来为保都批约辩护。正是双方激烈争论之际 ,四月初三日(4月27日)光绪帝亲诣颐和园请慈禧太后作出是否批约的最后决策 ,但仍不得要领 ,她含糊其词地表示 :“和战之局汝主之 ,此(即迁都——引者)则我主之。”^⑤光绪帝处在进退两难的困境之中 ,而顽固派签约锣鼓越敲越紧密 ,“孙毓汶与李联(莲)英内外恐吓 ,……请之太后 ,迫令皇上画押 ,于是大事去矣。……皇上之苦衷 ,迫逼之故 ,有难言之隐。”^⑥至四月八日 ,批约日期已至 ,光绪帝在顽固派的挟持之下 ,“上(光绪帝)意幡然有批约之谕” ,但在上书房同翁同龢等主战枢臣“君臣相顾挥涕”。^⑦眼看废约已无可望 ,光绪帝挥泪批准了《马关条约》 ,此时此景感人肺腑。易顺鼎在《盾墨拾余》一书里有具体的记载 :

四月“初八日(5月2日) ,四小枢(指恭亲王奕訢、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孙毓汶和徐用仪四人——引者)劫之上(光绪帝) ,合词请批准。上犹迟疑 ,问各国回电

①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三十日。

②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四日。

③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④ 文廷式《闻尘偶记》,丛刊《中日战争》(五)第497页。

⑤ 易顺鼎:《盾墨拾余》,丛刊《中日战争》(一)第126~127页。

⑥ 康有为:《自编年谱》,丛刊《戊戌变法》(四)第130页。

⑦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八日。

可稍候否？济宁坚以万不可恃为词，恭邸无语，乃议定。众枢在直立候，上绕殿急步约时许，乃顿足流泪，奋笔书之。……初九日（5月3日）和约用宝。”

逼迫光绪帝批约以后，《马关条约》终于在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四日（1895年5月8日）由中日双方代表于烟台换约正式生效。

《马关条约》的签订，在中国人民身上增加了一道沉重的枷锁，中国社会在半殖民地的陷井里又加深了一步。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是通过清朝封建政权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光绪帝批准的，在他的历史上沾上了一个不光彩的污迹，这是擦洗不掉的事实。然而，《马关条约》是中日战争清朝失败的纪录，光绪皇帝在这场反侵略的正义战争中，始终站在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立场上，“一力主战”。就是在战局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顶着顽固派对日妥协屈膝乞和的重重压力坚持抗战。最后清朝败局已定，在日本帝国主义威逼下签订了带有奴役性质的《马关条约》，光绪帝竭力拒绝批准条约，企望改变局势继续抗战。最后在内外力量的迫胁之下，光绪帝处在山穷水尽的困境中挥泪签字批准《马关条约》。对此光绪帝一直耿耿不快，心中怀着“朕何以为天下主”的自愧。中日换约以后，六月初九日（7月28日）李鸿章回到北京，入宫觐见，光绪帝顿生怒愤，诘责李鸿章：“‘身为重臣，两万万之款从何筹措，台湾一省送予外人，失民心，伤国体。’词甚严厉，鸿章亦引咎唯唯，即命先退，”^①再次表明光绪帝对签订《马关条约》的反对态度。考察中日战争之始终，光绪帝尽到最大的努力，其爱国主义的抗战立场从未发生过动摇。至于

①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一年元月初九日。

中日战争失败的原因,也不是由于他决策失误所致,而是清朝封建制腐败和以慈禧太后、李鸿章为代表的顽固派的种种干扰所铸成的败局。在批准《马关条约》的关键时刻,光绪帝还想方设法“废约”。其时,一些疆吏廷臣出于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恨和对慈禧太后、李鸿章等顽固派妥协议和的不满,提出“废约”、“迁都”、“持久”战的主张。然而,清朝统治政权的全面腐败,统治机制的功能严重丧失,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要实行“迁都再战”谈何容易!光绪帝也看到“将少宿选,兵非素练,纷纷招集,不殊乌合,以至水陆交绥,战无一胜。”所以他苦叹“朕办此事熟筹审处不获己之苦衷有未深悉者。”^①由于皇帝权威失灵,重新组织一场对日的持久战,条件是不具备的,光绪帝只得无可奈何,挥泪批约。笔者认为中日战争的失败,《马关条约》的签订其历史责任不应该落在光绪帝身上。

中日甲午战争使光绪帝得到锻炼,他经历了自亲政以来最险恶的风浪,接受了严峻的考验,不愧为晚清的一位最有作为的皇帝。在抗战过程中,光绪帝深深地体会到,虽然亲政但仍处在不操实权的地位;也看到了现行制度的腐败,官吏的无能,朝廷枢臣门户派系之争。他在失败中得到有益的教训与反思。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近代知识分子群体所进行的“公车上书”运动,发出了变法图强的时代强音,启迪了光绪帝的思想,萌发了他维新革旧意念。“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中日战争的失败成了光绪帝政治生涯的新起点。

^①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四)总第3595页。

第六章 萌发维新思想

第一节 失败中反省

中日战争的惨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中华民族面临亡国危险。中日战争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是一次大震动,大刺激,它向中国人民敲响了警钟,促进了民族的觉醒。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宗法帝国,人们的观念长期来依附于以家族为单元的宗法社会的古老范畴。自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侵入,给中国社会的陈腐观念增添了一些新的思想内容,中国人的思想开始有所转变。然而,这种意识形态上的转变,因为受到传统文化惰力的重重束缚,其步伐是非常缓慢的。只有在外部和内部的强烈冲击之下,才有可能使这个古老民族从长期沉睡中惊醒过来。中日战争对中国人猛击一掌,它的冲击力远远超过两次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中国人的近代民族意识在甲午战争以后才明显地萌发出来了。

甲午战争败得太惨,日本提出的条件太苛刻,而这次战争的对手,并不是英吉利、法兰西那样的超级大国,而是历来被中国人视之为“倭寇”的弹丸岛国日本。这就使得中国的各个阶级和各阶层感到震惊、愤慨和困惑。稍有头脑的中国人都在反省,都在思考中国战败的根本原因何在。大风暴洗刷了空气中的污浊,人们的头脑显得格外清醒,视野更加清

晰宽广,此时可以说是近代民族觉醒的真正发端。它的标志,一方面是战后资产阶级作为政治势力在中国出现,代表资产阶级意识、观念的知识分子,无论是革命派还是改良派,他们关怀祖国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热烈地投身到救亡图存的洪流中去。为中国带来了新的希望;另一方面,以光绪皇帝为代表的清朝统治集团中的主战派,他们冷静地反省战争失败的症结在哪里?今后怎么办?是否还是同以往历次战争那样,随着战火烽烟的暂时平息,依旧文恬武嬉、歌舞升平。严酷的现实,作出了无情的答复,不行了!现在不行了!中日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中华民族面对殖民主义者严重威胁。一种亡国灭种的危机感、救死不遑的紧迫感和难于立足世界民族之林的耻辱感紧扣着中国人的心灵。中国近代知识群体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呼号呐喊,部分清朝官僚对国家命运产生无限忧虑,促进了光绪帝萌发维新变法思想。这是在塌天的亡国之灾即将临头的严重时刻,在漫漫长夜里闪烁出耀眼的曙光。

作为一朝之主的光绪帝没有因甲午惨败而灰心丧志,也没有因签订《马关条约》含恨受怨而消极后退,却是在失败中冷静反省,重新振作精神,继续进击,不做亡国之君。这就是光绪帝同他以前几位清朝皇帝品格的根本区别所在,也是值得被后世称颂的一个方面。他在《马关条约》换约的当天,四月十四日(5月8日)在张之洞奏折的批谕中做了如下的表示:

嗣后我君臣上下,惟其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实力研求、亟筹兴革。毋生懈怠,毋鹜虚名,毋忽远图,毋沿积习,务期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朕

于内外诸臣有厚望焉。^①

实际上是中日战争失败后的反省,其精神是奋发向上的,态度是务实的,反映了战后光绪帝的思想面貌。

上面所述,中日战争的失败,对中国人是一次大震动、大刺激。在这场大震动中,必然有人一筹莫展,消极颓废;有人在失败中猛醒,奋发进击,清朝走向何去?关键在于作为一朝之主的皇帝态度。安定人心,重新建树皇帝的权威,这是中日战争以后光绪帝首先所要反省的问题。安定人心之首要者是重整抗战派的士气,形成以皇帝为核心的近臣亲信圈子,进而增强对清政府整个官僚集团的凝聚力。为此,光绪帝于四月十七日(5月11日)向军机大臣等发了开诚布公的上谕,解释主战派提出的“废约”、“迁都”、“持久战”等积极主张未能实施的原由,明确表示了战后积极进取的态度。

谕军机大臣等:日本觊觎朝鲜,称兵犯顺,朕炎怀藩服,命将出师,原期迅扫敌氛,永弭边患。故凡有可以裨益军务者,不待臣工陈奏,皆以主见施行。……

……乃尔诸臣工于所议章约,或以割地为非,或以偿银为辱,或更以速与决战为至计,具见忠义奋发,果敢有为。然于时局安危得失之所关,皆未能通盘筹划,万一战而再败,为祸更难设想。今和约业已互换,必须颁发照行,昭示大信。……自今以后,深者愆尤,痛除积弊,……切实振兴,一新气象,不可因循废弛,再蹈前辙。诸臣等均为朕所倚畀,朕之艰苦,当共深知,朕之万不得已而出于和,当亦为天下臣民所共谅也。^②

①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四)总第3595页。

②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四)总第3595、3596页。

在光绪帝周围的一些近臣中有人因中日战争的惨败而气馁，皇帝权威的失灵也使一些人寒心。光绪帝在谕旨中开诚布公，希望诺臣“深知”他的“艰苦”，“共谅”他出于万不得已批准《马关条约》的做法，坦诚之心公布于众，对于维系人心，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国人有句俗语所谓“皇帝不急急太监”，而光绪帝急人民之急，他告诫臣工“不可因循废弛，再蹈前辙”，战后的光绪帝颇有卧薪尝胆之心态，无疑是对于企望中兴清朝，而被光绪帝视为“所倚”的诸臣，是莫大的鼓舞。

中日战争结束以后，光绪帝对清军从将领到士卒的腐败无能痛首恶疾，他在好几处的上谕中反省到这一问题。四月十四日的上谕指出：

朕办此事熟筹审处不获己之苦衷有未深悉者。自去岁仓卒开衅，征兵调饷不遗余力，而将少宿选，兵非素练。纷纷招集，不殊乌合，以至水陆交绥战无一胜。^①

又在四月十七日给军机大臣等的上谕里说：

何图将不知兵，士不用命，畀以统之任而愤事日深，予以召募之资而流民麇集，遂至海道陆路无不溃败，延及长城内外，险象环生。^②

封建社会的募兵制腐败不堪，导致流民麇集，尽是乌合之众，这样素质低劣之士兵，在战场上必然是风声鹤唳，一挫即溃。更为严重的是募兵制之将帅把家族、同乡的宗法制度移植到军队建制，成了地方军阀和高级将领的私兵，曾国藩募湘军，李鸿章募淮军便是他们实力的基础。在中日战争中李鸿章敢于抵制光绪帝的战略指令，除了有慈禧太后作为靠山之

①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总（四）第3595页。

②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总（四）第3595～3596页。

外,另一个原因,就是他所控制的北洋海军和淮军是他的私兵,唯李鸿章命令是从,只知李相而不知皇帝。殊不知,清朝军事制度的腐败,战斗功能的丧失仅是清朝封建统治制度腐败的一个缩影,这是作为清朝封建这段批谕,实制度的最高统治者的光绪皇帝当然是不可能反省到这一根本点子上去的,他只能从具体的,一个方面去反思,去考虑加以纠正与克服,他反复指出,要从“练兵筹饷两大端实力研求。”“咸知练兵筹饷为今日当务之急”,尽管对练兵筹饷的“实力研求”是治标不治本的措施,但总算涉及到制度的外圈,再深一层下去必将促使从制度上加以改革,所以改革军事制度也是后来戊戌变法中的一个方面。

《马关条约》的签订,李鸿章成了全国上下同声唾骂的众矢之的,“疏弹合肥章以百计。”^①把中日战争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归罪于李鸿章一身,光绪帝也是这样反省的。六月初八日,李鸿章回京请安,光绪帝当面指责他“失民心,伤国体”,这样“词甚骏厉”的斥责,不仅指的是他没有在日本为拒绝割台而据理力争,而是对他在中日战争中一意主和,贻误战机铸成败局而发出的愤怒。李鸿章一意避战求和的错误方针,成为战争失败的关键,这是历史事实。战前坐视日军在朝鲜布置阵营,占据有利形势而不采取相应对策,造成丰岛、成欢初战失利,战后平壤陷落、辽东败北,旅大拱手让敌,威海卫北洋舰队全毁。战局败定后,李鸿章竭力主张向日本屈辱求和,不惜巨额赔款和割地签订《马关条约》,所有这一切确实是他避战求和的错误方针所铸成的结果,然而,李鸿章所以始终推行这一错误方针,并非偶然,一是为了

^① 《盛档·甲午日战中争》(下)第482页。

保存他的政治资本——淮军和北洋海军,视军事为私事,结果碰上了凶恶的对手日本军国主义,他苦心经营几十年的军事力量尽付东流。二是,避战求和是慈禧太后在中日战争时期总的旨意,李鸿章在战争中的一切重大决策都按慈禧太后这一旨意运行,所以平心而论,李鸿章还不能算是导致这次战争失败的罪魁祸首,真正的罪魁祸首是掌握清朝最高实权的太上皇慈禧太后。战前挪用海军经费建造颐和园的是她。据考证这笔挪用总数达1200万至1400万两之巨,^①影响北洋海军1888年后未购一新船、未添一新炮。而日本当时拥有的二十一艘战舰,其中有九艘是1888年后新添购的,时速和炮火威力远胜中国海军,致使黄海激战时,败于敌手。战争爆发前后一心于寿辰庆典的筹划,力主避战唯恐寿辰扫兴的也是她。中日战争的关键时刻,光绪二十年的九、十月间,正是清廷以慈禧太后六十大寿的筹备和庆典压倒一切的重要时期。当日军已在花园口登岸正向旅顺逼进的时候,慈禧太后还在大事做寿,京内外王公大臣、督抚疆吏贡献寿礼,举行隆重的庆祝仪式,粉饰太平,极大地牵制和分散了清廷的精力和财力,涣散了军民斗志。九月初九日寿辰大典即将举行,官寿宫里演戏三天,从枢臣到部院京堂都要陪着她听戏,光绪帝对此极为反感。当天战情十万火急,光绪帝召枢臣指示战略,“审谕极急,并云不可早散,又云听戏三日,诸事延搁,仅可不到也。”^②后期力主屈辱求和的更是她。李鸿章官复原职,并召京面授机宜,作为清政府全权代表赴日本议和,都是由慈禧太后抛开光绪帝而独自作出的决定,最后她还支

① 邹兆琦:《慈禧挪用海军费造颐和园史实考》,《学术月刊》1984年第5期。

②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年九月初九日。

使孙毓汶、徐用仪逼着光绪帝批准和约。慈禧太后是避战求和方针的最高决策者,而李鸿章则是慈禧太后旨意的具体执行者,在某种程度上讲他遭举国唾骂,为众矢之的,是做了慈禧太后的替罪羔羊。光绪帝心里很明白,但又不敢公开谴责,这就是康有为所说的“皇上之苦衷迫逼之故,有难言之隐矣。”^①光绪帝的难言之隐,后来他在答复张之洞关于“迁都再战”的奏章中作了隐约的透露,他说:“廿余年来,慈闱颐养,备极尊崇,设使徒御有惊,则藐躬何堪自问。”^②因为二十余年来光绪帝一直是西太后手中的傀儡,这次更是害怕“有惊”皇太后六十庆典,所以光绪帝只得忍气吞声,听任她的独断专行,他在战后的反省中粗浅地触及到了清朝全部症结的要害。

在甲午战争中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在作出一些重大决策时发生了分歧,清廷重臣要员都在主战与主和两大问题上亮了相,有的还做了淋漓尽至的表现。就是一些原先附和主战的枢臣也在关键时刻倾倒在主和派一边。战争初期光绪帝调整了军机处班子,把它改变成为抗战联合阵线,在战争中发挥了指挥部和参谋部的积极作用。由于战争屡屡败北,军机处成员思想发生了动摇,在签订《马关条约》的时候,中枢机构为顽固派所把持,成了贯彻慈禧太后避战求和方针的策源地,光绪帝对中枢处于失控状态。战争结束以后,整顿军机处调整中枢班子是光绪帝反省过去,吸取教训的重要课题。军机大臣中对光绪帝抗战部署干扰最大,鬼点子最多的要算孙毓汶和徐用仪两人,他们一唱一和,压制主战派逼迫

① 《康南海自编年谱》,丛刊《戊戌变法》(四)第130页。

②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四)总第3595页。

光绪帝、慈禧太后通过这两个亲信向李鸿章传递她的旨意，所以光绪帝在中日战争以后采取了不同的方法把他们驱逐出军机处。光绪二十一年五月给孙毓汶“病假”一月，“以徐桐兼署兵部尚书”，^①先革去他的兵权，后又“称疾乞休”^②令他退出政治舞台，光绪二十五年孙毓汶快快死去，在中枢机构中拔去了一枚钉子。一个月以后，光绪帝又向徐用仪开刀，光绪二十一年六月乙酉，“谕内阁，吏部左侍郎徐用仪退出军机处，并毋庸在各国事务衙门行走”，^③把他从重要岗位上撤了下来。在军机大臣中还有恭亲王奕訢和庆亲王奕劻，虽在后期倒向主和，秉慈禧太后旨意逼光绪帝签约，然逐出顽固派铁桿孙毓汶和徐用仪之后，这两位满洲亲王留在中枢暂时亦无大的威胁，所以未作更易。光绪帝在驱逐异己的同时，“命礼部左侍郎钱应溥在军机大臣上行走”^④钱应溥其人，长期入值军机司务，笔下敏捷，“每承旨缮召，顷刻千言，曲当上意”，在中日战争时期他已任礼部左侍郎，“廷议主战，应溥造膝敷陈，多人所不敢言。”光绪帝慧眼识才，把这样一位有才气而又能直言的廷臣不仅提拔任军机大臣，而且“再迁工部尚书”^⑤加以重用，无疑增强了帝党力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地位越来越显得重要，军机处决策，“总署”贯彻，在中日甲午战争时期为李鸿章及慈禧太后的亲信所把持，光绪帝的亲信成员几乎无一人涉足，经过中日战争的反思，光绪帝为了加强对“总署”的控制，命“户部尚书翁同龢，礼部

①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四）总第3604页。

② 《清史稿·孙毓汶传》第41册，第12371页。

③ 《清德宗实录》第371卷，第1页。

④ 《清德宗实录》第371卷，第2页。

⑤ 《清史稿·钱应溥传》第41册，第12399页。

尚书李鸿藻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①把两位最忠于皇帝最得力的重臣进入“总署”，今后内政外交的各个脉络君权皇命不致梗塞，光绪帝的谕旨可得以畅通。至于李鸿章虽然光绪帝在甲午战争中对他的两次处分都被慈禧太后一次吹掉。战后又作为清政府全权代表派往俄国，祝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是时还秘密地同俄国签订了，《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又称《中俄密约》。光绪帝在李鸿章身上饱含怨恨，并对他有所限制不可。李鸿章集军、政、外交于一身，又有慈禧太后为后盾，故对他的权力限制，光绪帝采取十分慎重的处置办法。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初八日（8月28日），“命李鸿章入阁办事。调王文韶为直隶总督兼办理通商事务北洋大臣。”^②王文韶在中日战争期间，他的立场基本上倾向主战，在签约关键时刻，态度也无突出表现，然王文韶其人颇有外交、理政之才能。^③故光绪帝以王代李，把李鸿章调离天津留京入阁，实际上是名升实降，一定程度上削去了他的部分军权和外交之权，但一调动也为李鸿章同慈禧太后的直接联络提供了方便。为了削弱李鸿章的影响，光绪帝即着上谕王文韶整顿直隶地方。

直隶地方，积弊已深，凡吏治军政一切事宜均应极力整顿，至外洋交涉事件，尤关紧要，如从前有办理未协，应行更改之处，务当悉心筹划，不避嫌怨，因时变通，……洗从前积习，方为不负委任，将此谕令知之。^④

① 《清德宗实录》第371卷，第2页。

②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四）总第3640页。

③ 戊戌变法时期王文韶受命办理新政，暗中阻挠，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主张对外妥协。

④ 《清德宗实录》第372卷，第7~8页。

这道谕旨,要王文韶“不避嫌怨”,“洗从前积习”,很显然是针对着李鸿章而发的,实际上全盘否定了他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期内的“政绩”,这不能不是对李鸿章的一个重大的打击,某种意义上讲,比过去对他两次处分更为有力,为以后剪除李鸿章势力埋下伏笔。

甲午战后,光绪帝犹如在一场恶梦中惊醒过来,从反省中得到有益的教训;从反省中理顺思路振作精神,充实了他的抱负,为后来在历史舞台上演出的那出有声有色的维新变法活剧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

第二节 “卧薪尝胆”雪国耻

中日战争以后,列强瓜分中国的黑云密布在神州大地上空,中国人民面临着更沉重的灾难。在1894年11月甲午战争败局初定的时候,资产阶级革命派对祖国将遭宰割趋势感到万分忧虑。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起草的《兴中会宣言》中表达了他们的郁郁心情:

近之辱国丧师,翦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灾堪虑于目前。^①

中日战争以前,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朝的腐败统

^① 《兴中会宣言》,《孙中山全集》195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上卷,第19页。

治,中国封建社会已经千疮百孔,民不聊生。然而,中国封建官僚和士大夫,昧于世界形势,沉湎在中华大国、华夏圣朝的盲目自大的迷梦之中。就在中国战争初期,封建统治者还瞧不起日本这个东邻岛国,说什么:“倭不度德量力,敢与上国抗衡,实以螳臂挡车。以中国临之,直如摧枯拉朽。”^①战前一些帝国主义者对中国这个古老大帝国的虚弱程度也没有完全看透,英国一直把中国看作英俄之间在远东的缓冲力量,甚至一度提议缔结英中联盟,以对抗俄国势力的伸展。法国在中法战争前曾把中国视之为亚洲四强之一,同法、英、俄相为并列。^②一场中日战争把古老帝国的纸窗戳穿了,这个肥大巨人已经奄奄一息,完全暴露于世界。帝国主义列强垂涎欲滴饿狼般地扑面而来,争相折骨剔肉,瓜分宰割。中日战争以后,在中国呈现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豆剖的争夺高潮。

219

一个名叫必麒麟的“中国通”投书伦敦《每日新闻》鼓吹英法俄可达成协议,“商定各国接管的范围”。“英国应索取从华南珠江到华北山东省南部之间的全部地区”,割去这块肥肉以后,英国告诉法俄,“欢迎你们各取你们的一份。”^③德国首相毕鲁在帝国议会的一次演说中表示:“有人提出要瓜分中国。这种瓜分无论如何将不由我们来促其实现。我们要做的事就是准备好,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决不空手而返。”^④沙俄财政大臣维特在《马关条约》尚未签订时就打算:“则令我国舰队不必占领任何据点,即开始对日本海军作敌

① 王炳耀:《甲午中日战辑》,第9页。

② 《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卷第319页。

③ W·A·Pickering: *Pioneering in Fomosa*, 1898。

④ 引自 P·H·Clements: *Boxer Rebellion*, p. 128。

对行动,并轰击日本港口,这样我们就成为中国的救星,中国会尊重我们的效劳,因而会同意用和平方式修改我们的国界。”^①从而获得中国南满的大片领土。帝国主义者都为自己盘算着如何在中国肢解哪一个部位。《马关条约》签订的第六天,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1895年4月23日)俄国联络德法两国,向日本政府正式提出,要求日本放弃辽东半岛,以武力为后盾强迫日本让出已经到嘴边的这块肥肉,这便是所谓“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日本政府考虑到中日战争以后无力在军事上与三国对抗,所以只好接受三国要求。不过中国必须为此再支出一笔巨额的赎金,在与俄、德、法三国磋商以后,日本政府才同清政府进行还辽问题的谈判。李鸿章仍为清政府谈判大臣,结果中国付出三千万两银子赎回辽东半岛。为了酬谢俄国干涉还辽,光绪二十二年三月,清政府派李鸿章赴俄祝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四月二十二日(6月3日)又与俄国签订《中俄密约》,俄国取得黑龙江、吉林直达海参崴修筑铁路和“中国所有口岸,均准俄国兵船驶入”的特权。根据这个密约,后来俄国就建筑了由俄国人控制的“东清铁路”。一年以后,俄国出兵占领了旅大,德国也以武力占领胶州湾。清政府用三千万两银子赎回的辽东半岛轻易地落在俄国手中,还赔嫁胶州湾给德国。因此,所谓“三国干涉还辽”,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一个信号,从此,其他帝国主义接踵沓来,纷纷争相宰割中国的主权与领土。

帝国主义者瓜分中国以奴役性的贷款和掠夺筑路权为先导。

^① 《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择》,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57页。

中日甲午战争前的三十年间,清政府向外国借过二十五次外债,总额为四千一百多万两。以海关收入为担保,年息为6%~7%,中日战争前已经还清。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的外债猛增,《马关条约》规定赔款二万万两,批约后半年内先付五千万两,又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三千万两也限在半年内付出,这样在光绪二十一年之内清政府要付出八千万两之巨款。当时清政府的财政全年收入不到九千万两,为了交付赔款必须继续大量地向外国借债。

《马关条约》订立以后的四年间,清政府向帝国主义列强进行了七次外债贷款,其中有三次数额最大。即光绪二十一年的俄法借款;二十二年的英德借款和二十四年的英德续借款,每次都是一万万两白银。每一笔大借款,帝国主义都有政治奴役性的条件,以此作为瓜分中国、确立在中国势力范围的一种手段。例如1895年的俄法贷款,就为沙俄势力南下满洲,法国势力深入两广、云贵诸省开通了道路。1896年、1897年英德贷款,清政府承认长江沿岸为英国的势力范围。向帝国主义列强每一次大借款,清政府都以海关收入作为抵押,当时海关税收每年约二千万两,为清政府主要的一项财政收入。海关收入押给债权国家,不仅使清政府财政收入更加枯竭,而且帝国主义列强通过控制海关大权,以保证和加速向中国进行资本输出以及对中国资源的掠夺,中国经济被卷入了世界殖民经济的旋涡之中。

帝国主义列强把修筑铁路当作剥削和侵略落后国家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手段。列强以贷款形式为清朝修筑铁路,附有种种条件。修筑一条铁路便能控制沿线地区,纳入他们的势力范围之内,况且投资修筑铁路本身还可获巨大经济利益。所以,中日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展开了相互争夺在

中国建筑铁路权益的斗争。

铁路修建权,有的是用强制手段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而取得的;更多的则是采取贷款的形式,取得某一筑路权益。

列强对中国的铁路贷款次数很多,数量也很大。光是1898~1900年三年内,贷款总额高达一亿三千七百多万元。^①在这几年内俄、法、英、德激烈地争夺对芦汉铁路(从芦沟桥到汉口)、津镇铁路(从天津到镇江)的修建权;英、法则争夺粤沪汉铁路的修筑权。因为这三条铁路都穿过中国的心脏地带。

中日战争以后,欧美帝国主义列强在瓜分豆剖的浪潮中各得其所,俄国的势力范围由原来在我国东北南满地区伸展到旅顺大连进而控制华北;德国强占了胶州湾;英国势力范围主要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并向华北的威海卫、山海关步步深入;法国取得了云南、广西商务特权和矿山开采权,并把它在越南的铁路延伸到广西境内。法国还取得了帮助清政府重建福州船政局的特权,清政府承认了法国在海南岛的特殊权利。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的短短几年间,中国沿海重要港湾如旅大、威海卫、胶州湾、九龙、广州湾等都树起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旗帜;许多重要的铁路干线的筑路权为帝国主义列强所攫夺;中国几乎全部土地被划分为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范围。中国社会自甲午战争以后,进一步地陷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

甲午战争以后如何看待亡国灭族的严重危机,在清统治集团内部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① 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统计资料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190页。

清朝最高统治权仍然控制在慈禧太后手中,她是近代中国封建社会黑暗势力一个集中点,封建统治者的腐朽、昏庸、无能在她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如果说她在控制政权初期自“祺祥”政变以后,尚有所作为,通过调整统治机制的办法清王朝出现了“同治中兴”局面,那么至甲午战争前后,她完全成为清朝最落后、最反动势力的总后台。在国家遭到帝国主义列强“瓜分豆剖”的苦难时期,在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险时刻,她为了维持其清朝太上皇的地位和穷奢极欲的享受之外,无所事事置国家和民族的严重危机于不顾,仍然挥金如土,无视数万两白银的巨额赔款和“国库空虚,民力凋敝”的财政困境,“又将大兴土木,修圆明园,以纵娱乐。”^①上行下效,慈禧太后穷奢极欲无度享受,朝廷一批腐朽透顶的王公大臣也随之尽情挥霍,内廷、颐和园歌舞不绝,演戏如常,每逢内廷演戏,召王公大臣入座听戏者时间以六小时为限,王公大臣之有烟癖者,瘾发辄不自禁,内监乃得因为利,度其瘾将发,即送茶一杯,放入“烟泡三枚”,“每茶索犒千金”,“计听戏三日,而一人茶尝乃至一万八千金,都下谓第一阔烟茶也。”^②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清朝腐朽集团,甲午战争以后仍然处在醉生梦死,麻木不仁之中。

光绪帝在甲午战争以后,虽然仍不操朝廷实权,但他不甘心做傀儡皇帝,更不愿当亡国之君。甲午战争对他来说是一场腥风血雨的恶梦。堂堂中华大国竟然败于一个“弹丸岛国”之手,颇有作为的光绪帝,身为一国之主,万乘之尊,确实是蒙受了奇耻大辱,战后其精神上一直处在极度的痛苦之

① 《清朝野史大观·清宫遗闻》第1册,第94页。

② 《清朝野史大观·清宫遗闻》第1册,第103页。

中。光绪帝对于帝国主义列强纷纷沓至宰割祖国领土主权更是无限的忧虑。熟悉光绪帝的德龄女士对中日战争以后光绪帝的心境有着这样的记载：

光绪为着想挽救他的国家，使他在国际上得到一个较好的地位。——至少是他心里所想望的那种地位，——几乎连饮食睡眠也忘掉了，他恨不能立刻就使他的国家一跃而为世界上的一等强国。^①

对于“失民心，丧国体”的《马关条约》，他耿耿不乐，总想设法对《马关条约》的恶果能有所补救。当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得到给事中吴光奎在奏折中说到苏杭各省已于本地设立公司，同日商竞争一项，他颇感兴趣，立即上谕军机大臣等：“马关条约于华民生计大有关系，亟应设法补救，以保利权。”^②光绪帝眼看国家遭宰割，心急如焚，他这里提出“保利权”，就是在当时条件下抵制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一种力所能及的努力，也是一些爱国人士为了尽量补救《马关条约》带来的损害，以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共同要求。

甲午战争中，日本军国主义者手舞屠刀，在沉睡着的中国巨人身上割去了一大块肥肉。然而，另一些把屠刀藏在背面的屠夫，装出一副“调停者”的脸孔，在这在那指点者，准备宰割他们所需要的那一块肥肉，光绪帝看清了俄、英、法、德、美等帝国主义列强的用心，指出他们是“强邻狡焉思启，合以谋我”。^③面对列强“合以谋我”的危机，光绪帝既没有因被日本这个“弹丸岛国”所败而自暴自弃，更没有象慈禧太后那样麻木不仁，听人宰割。而是卧薪尝胆以雪前耻。他在光绪

① 德龄：《瀛台泣血记》第251页。

② 《清德宗实录》第387卷，第17页。

③ 丛刊《戊戌变法》（二）第6页。

二十一年闰五月丁卯(二十七日)的上谕里对今后振兴中华,奋发自强做了大致规划,现录如下:

谕军机大臣等:自来求治之道,必当因时制宜,况当国事艰难,尤应上下一心,图自强而弭隐患。朕宵旰忧勤,惩前毖后,惟以蠲除痼习,力行实政为先。叠据中外臣工条陈时务,详加披览,采择施行。如修铁路,铸银币,造机器,开矿产,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大抵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皆应及时举办。至整顿厘金,严核关税,稽查荒田,汰除冗员各节,但能破情面,实力讲求,必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著各直省将军督抚,将以上诸条,各就本省情形,与藩臬两司暨各地方官悉心筹划,酌度办法,限文到一月内分晰复奏。当此创巨痛深之日,正我君臣卧薪尝胆之时,各将军督抚,受恩深重,具有天良,谅不至畏难苟安、空言塞责。原折片均著抄给阅看,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①

光绪帝的上谕,虽然还谈不上是一幅改革蓝图,但反映了他在战后“奋发图强”的迫切心情。对于全国政治、经济、军事补救作了全面的规划并且要求落实到各直省,限令一月之内,各级地方也作出相应筹划复奏。光绪帝在战后这种卧薪尝胆,雪国耻的迫切感,便是他很快萌发维新变法的思想基础。

总之,光绪帝在中日战争以后,顶着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滚滚恶浪和清统治集团内部所煽起的“以夷制夷”阵阵阴风,披荆斩棘为挽救危局而“宵旰忧勤”,在他的一生中又写

^① 《清德宗实录》第369卷第23页。

下了可颂的一页。

第三节 “恤商惠工”推进洋务运动

全面考察光绪帝的君主生涯，他始终顺应历史潮流而进行各项重大活动，这是晚清列位帝王所不及的，也是值得誉载史册的可贵之处。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它以清王朝的自救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同时，洋务运动又是采取近代生产技术的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洋务运动的方向符合历史发展潮流，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中日甲午战争给予洋务运动中建立起来的北洋舰队以毁灭性的打击，诸多学者因此而得出“甲午战争失败宣告洋务运动彻底破产”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未免有失偏颇。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全军覆灭，不等于洋务运动中军事工业被彻底毁灭，更不等于洋务运动中民用工业也就彻底破产了。历史事实却是上述结论的逆向。中日战争以后洋务运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标志之一是民用工业取代了军事工业的主体地位；之二是商办企业在洋务运动中异军突起，并且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洋务运动发展的新趋向不能不同当时的一朝之主，而又处在“卧薪尝胆”境地急于图治的光绪帝的经济思想以及经济政策有关连。

尔今时隔一个世纪，中国历史走过了曲折的道路以后，回顾往昔，完全可以说，洋务运动不能挽救国家的危亡和消除民族的苦难，也不可能把中国社会引上独立自主的资本主义道路。然而，在当时包括光绪帝在内的清朝封建统治者

不可能认识到这一历史发展的终极 ;中国人民包括一些具有先进思想的民族精英也必须经历一段历史进程以后才能逐步地认识这个真谛 ,从而抛弃洋务运动所标榜“自强新政”的乌托邦空想 ,另辟蹊径寻求救国拯民的真理 ,开创救亡图治的新局面。资产阶级改良派就是在批判洋务运动的基础上主张通过维新变法来实行自强自主的资本主义制度。

自甲午战争的失败到戊戌变法实施 ,在这一空间里 ,清统治集团中不甘心屈辱求和而订立《马关条约》 ,痛惜祖国被列强瓜分宰割的一部分官僚 ,他们的观念不能冲破洋务派在六十年代鼓吹的“自强新政”的框框 ,他们还是把清王朝的自救 ,封建社会的中兴期希望于洋务运动。光绪皇帝就是这一部分清朝官僚中的代表 ,他在甲午战争失败以后 ,对洋务运动给予极大的关注和支持。顺应历史潮流 ,推进洋务运动的新发展。

227

甲午战争失败以后 ,洋务派首领李鸿章声名狼藉 ,遭到“朝野上下的唾骂”。^①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特别是清统治集团中的主战派骨干象有些论著中所说的那样“对洋务派搞了几十年的‘洋务’ ,活动产生了更大的怀疑。”事实证明“朝野上下”所唾骂的是洋务派中的某一代表人物 ,并非对洋务运动的唾弃 ,相反 ,人们却对于在中日战争时期主张抗战的洋务代表刘坤一、张之洞等产生了好的印象 ,光绪帝对他们也愈益器重 ,刘坤一、张之洞也就成了甲午战争以后洋务派的首领。《马关条约》墨汁未干 ,光绪帝于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发出谕旨 ,号召君臣上下一致 ,“卧薪尝胆”、“图自强而弭隐患” ,在一个月先后又发出上谕 ,对“卧薪尝胆”的努力作了

^① 曾自 :《书李翁相倾事》 ,《国闻周报》第 12 卷 ,第 27 期。

粗略规划。闰五月癸丑十三日(7月5日)

谕:为政之要,首在得人,前中外臣工保荐人才,业经次第擢用。当兹时事多艰,尤应遴选真才,藉资干济。著各部院堂官及各直省将军督抚等,于平日真知灼见器识闳通才猷卓越究心时务体用兼备者、胪列事实,专习保奏。其有奇才异能、精于天文地舆算法格致制造诸学,必试有明效,不涉空谈,各举专长、俾资节取。^①

自古君王求贤,必以“博学宏儒”为先,而光绪帝则以“精于天文、地舆、算法格致制造诸学”为重。所谓之“诸学”乃是近代工业发展的根底,即谓之西学,也是洋务派所经营的兴办学校、聘用洋师、派员出国留学“师以长技”的主要内容。光绪帝号召地方疆臣大力保举推荐,一经“试有明效”,“俾资节取”,很显然,他对兴办洋务胸怀宏图。当月二十七日(7月19日)光绪帝又发出上谕:

谕军机大臣等:……叠据中外臣工条陈时务,详加披览,采择施行。如修铁路、铸银币、造机器、开各矿、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大约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理应及时举办。^②

光绪帝在上谕中阐明了他的经济思想即“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也就是发展洋务运动中的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两个方面。在他看来这两个方面,是“因时制宜”地“图自强而弭隐患”的最好手段,可见甲午战争以后,光绪帝和洋务派都处在“夷务救国”的同一认识水准线上。那么我们再考察一下,当时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在《马

① 《清德宗实录》第369卷,第12页。

②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四)总第3631页。

关条约》签订以后,面对严重民族危机所持态度。闰五月二十七日(7月19日)战后取代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地位的两江总督张之洞上了一份《吁请修备储材折》其主要内容 - 与光绪帝的上谕基本上是同属一个思想轨道。这份奏折指出:

倭人断无永好之心,且西各大国从此尽窥中国虚实,更将肆意要挟。事事曲从则无以立国,稍一枝梧则立见决裂,是日本之和不可恃矣。

为此,张之洞提出了九条图自强措施。一曰“宜练陆军”,二曰“宜亟练海军”,三曰“宜亟造铁路”,四曰“宜分设枪炮厂”,五曰“宜广开学堂”,六曰“宜速讲商务”,七曰“宜讲求工政”(即发展格致、化学、机械制造等近代工业——引者),八曰“宜多派游历人员”,九曰“宜豫备巡幸之所”。^① 张之洞这篇奏折,是对光绪帝闰五月十三日上谕的响应和具体办法的建议,足见当时君臣政见之共识。

229

“恤商惠工”是光绪帝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因而在甲午战争以后,积极支持商人集资,参与创造和发展近代企业,以推进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六日(7月18日)给事中褚成博上奏:“各直省船械、机器等局,请饬各督抚招商劝办,以开制源。”光绪帝的批示“著户部议奏。”^②户部复奏认为“如能仿照西例,改归商办,弊少利多”,基本上赞成褚成博的建议。光绪帝批谕中对“招商劝办”制造实业的见解大加赞赏,他说:

制造船械,实为自强要图。中国原有局厂,经营累岁,所费不貲,办理并无大效。极应从速变计,招商承

① 《张文襄公全集》,“奏议”第37卷。

② 《清德宗实录》第369卷第22页。

办,方不致有名无实。^①

在批谕中光绪帝还对开辟资源做了各方面的设想,他指出:“南洋各岛及新、旧金山等处中国富商,在彼侨寄者甚众,劝令集股,必多乐从。”^②光绪帝关于招集海外华侨投资祖国的设想,这是很有远见的超前意识,他还责令疆吏指派“廉干妥实之员,迅赴各该处,宣布朝廷意旨,劝谕首事绅董,可以投股官商合办”或“另集股本,择地造厂”,“或纳资认充旧有局厂”等多种形式争取集资,多多益善。同时向投资者申明清政府的政策是“仿照西例,商总其事,官为保护。”^③光绪帝“招商劝办”这一经济政策的颁行,有助于推进洋务运动重心的转变和走上新的发展道路。

在甲午战争以前到戊戌变法的几年间,凡地方疆吏有关办招商集股,投资近代企业的奏折,光绪帝一般批谕是“从之”,或著×××等“妥速筹商复奏”,均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光绪帝认为:“在江浙等省招商多设织布织等局,广为制造。又筹款购置小轮船十余只,专在内河运货,以收利权。”^④把发展华商近代工业,视为向帝国主义列强“以收利权”的一种手段,这实际上是他在经济政策方面竞争意识的反映。甲午战争以后,光绪帝对发展商办民用企业的重视和所采取的保护政策,对于兴办实业的洋务派和民间实业家不仅有助于消除他们的种种疑虑,而且也是莫大的鼓舞。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有了一个初步的发展。据不完全的统计,在中日甲午战争后几年,即光绪二十一年

① 《清德宗实录》第371卷,第6页。

② 《清德宗实录》第371卷,第7页。

③ 《清德宗实录》第371卷,第7页。

④ 《清德宗实录》第369卷,第13页。

到二十六年(1895~1900)间,全国各地新办的私人资本工矿企业,其创办时资金在一万元以上的(中日战争以后,中国开始以元为计算单位即一银元)共104个,资本总额为二千三百多万元。在战前二十多年间,私人资本办的工厂不到八十家,其资本总额为七百三十万元。战后的六年间比战前二十多年,增加二、三倍。^①甲午战争以后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出现了一个兴旺的局面。这个新局面的开创,是光绪帝采取务实、保护、促进政策的结果。有一个商人曾生动地描绘说:“民间自为兴办,则闾市相习,无患欺诈,事权自操,无患侵没,大利所在,万众所趋,不召自来,不求自至,踊跃赴利,惟恐后时,患不举事,奚虑不集哉!”^②

光绪帝对于国计民生关系重大的矿产、铁路等交通运输企业更为重视,予以极大的关注。

光绪二十年九月(1894年10月)御史钟德祥上奏“条陈粤矿”,“请将煤铁免厘轻税”。光绪帝立即上谕军机大臣等,指出:“近年煤铁之用,所需最广,亟应讲究开采,惟度地兴工,必须踏勘确实”。“实系可用,百应妥立章程设法开办,以兴矿务而利开源。”^③兴矿务开利源,把矿产业放到发展近代企业的基础工业的地位加以重视。一年以后(二十一年六月)光绪帝在另一篇披览有关四川省矿务情形的奏折时,上谕军机大臣等提出“应由该督设法招商”,“飭令集资举办,毋任官吏阻挠。”^④允许民间富绅投资矿产业以弥补清政府

① 参阅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82年,第608页。

② 麦孟华文,见《时务报》第34册,第3~4页。

③ 《清德宗实录》第350卷,第13页。

④ 《清德宗实录》第385卷,第8页。

财政匮乏无资矿务的困难,视矿务为“方今济急要图”。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初九日(1896年3月22日)上谕军机大臣等,命各省督抚对本省矿务进行全面规划,“按照所指各地名,逐一认真履勘,拟定办法,据实具奏。”搞一次全国性的矿务大普查。为了促使疆吏重视矿务,光绪帝在上谕中阐明道理:

当此国用匮乏,非大兴矿务,别无开源良策。叠寄谕旨,业已剴切详明。各该督抚,身膺重寄,与国家休戚相关,倘徇于故见,仍以空言搪塞,扪心自问,其何以仰对朝廷耶!^①

所述道理简明透彻,表明光绪帝对于发展矿务决心之大,措施之具体。所以在这几年间各地矿务业有了初步的发展,由于矿务一般具有投资大、工人众、周期长的特点,所以它的发展速度不如其他部门。各地创办的采煤和金属采矿企业共有二十五家,其中包括一些官办招商集股和官督商办的矿场。纯属商办的比较重要的矿业有:湖北阳新的炭山湾煤矿,福建政和的南太武山煤矿,广东北海口的北海煤矿,江苏南京的青龙山幕府山煤矿,四川冕宁的麻哈金矿,广西贵县的三岔银矿等。这二十五家采矿企业创办时的资金合计五百八十多万元。

对于铁路兴修,光绪帝也予以应有的重视。光绪二十一年十月(1894年11月)谕内阁:“铁路为通商惠工要务,朝廷定议,必欲举行。前谕王大臣等令将近畿一带先拟办法。……至由庐沟南抵汉口干路一条,道里较长,经费亦巨。各省富商如有能集股至千万两以上者,著准其设立公司,实力兴筑。事归商办,一切赢绌,官不与闻。如有成效可观,必当

^① 《清德宗实录》第385卷,第8页。

加以奖励。”^①

尽管光绪帝重视近代工矿企业和交通邮电的兴办,洋务运动中的民用工业得到一定的发展。然而这些近代工业是在不触动封建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它的活力还不能同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匹敌,更不能实现清统治者“求富自强”理想。它只是为接踵而起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掀起维新变法运动造成一定的经济基础。光绪帝励精图治的经济思想也没有在“恤商惠工”的地平线上踏步不前,随着维新变法舆论的掀起,他的经济政策也就突破了洋务运动的框架,朝向更深的层次发展。

第四节 关于“帝党”与“后党”

233

自中法战争以来,光绪皇帝对朝廷产生越来越直接的影响,尤其在光绪十五年“亲政”以后,随着光绪帝政治思想的成熟和对自己不操实权地位的不满,因而同当时清朝政权的实际掌握者慈禧太后关系日渐紧张起来,帝后离心,矛盾显露。这样在清统治集团内部皇帝与太后周围隐约地形成了两个圈子。他们之间属于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是在维护清朝统治政权基础上的派系斗争。

后来,因为帝国主义列强武装侵略中国的严重事件屡屡发生,中国封建社会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泥坑中愈陷越深,国家横遭瓜分,民族面临危亡的威胁面前,这两大圈子成员所持的态度、方针、政策大相径庭,两大派系的矛盾起先是在中

^① 《清德宗实录》第378卷,第7页。

法战争中,由于在对法战和问题上出现“母子不一”的分歧,清统治集团发生分化,矛盾也随之由潜在而趋向表面,战争更加剧烈起来。

慈禧太后是通过宫廷政变而掌握清朝大权的,在她周围早已形成亲信集团,“同、光以来,内外重臣,皆孝钦所亲拔。”^①她的势力遍布朝廷与地方,可谓盘根错节。然她的亲信集团主要成员,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形势下,也经常取甲舍乙不断地调整。加之西太后的性格粗暴专断,喜怒无常,在其亲信中稍不称心就被一脚踢开,亦有成为阶下之囚,刀下之鬼者。

光绪十五年,光绪帝“亲政”,“凡太后所用之人,皆不安之意,恐帝亲政之后,不能保其权位。”^②一朝天子一朝臣,这是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历史现象,因而,凡慈禧太后所器重者,他们必然更向西太后靠紧,帝后两党逐步明朗化起来。在甲午战争时期,由于对日本侵略者的态度两派政见截然不同,“帝党”、“后党”正式形成,一般是“帝党”主战,“后党”主和。

“帝党”与“后党”的成员与斗争的内涵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其成员有的是派系骨干,有的是派系外圈,有的是脚踏两头的看风驶舵分子。其斗争内容有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也有关系民族存亡、国家兴衰的原则之争。总之,对帝后两党不能用凝固的标准来论断。

“帝党”和“后党”是清统治集团内的两大派系,在中日战争以前,只是在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周围各有一些亲信,乃

① 胡思敬:《国闻备乘》,丛刊《戊戌变法》(四),第278页。

② (英)濮兰德、白克浩司:《慈禧外记》第112页。

雏形时期。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帝后两党各树旗帜,各摆开阵营,其政见分野线就以抗战与妥协为标志。然而,尽管争论的内容已超出派系利益而涉及国家和民族的存亡,但其参与主战与主和的成员,基本上还未超出帝后两党的范围,故笔者以主和主战这个尺度来评论帝后两党骨干在中日战争中的活动和影响。

首先分析“后党”成员在中日战争中的活动情况。

恭亲王奕訢(1832~1898),是慈禧太后“祺祥”政变的有力支持者,慈禧太后取得政权后对奕訢以特殊的器重。先后授子议政王、军机大臣、“内廷行走管理各国事务衙门”等要职,并“命王爵世袭、食亲王双俸”等一系列殊荣。^①在以后的多年里,奕訢一直主持清廷的内政、外交、军机处事务,成为慈禧太后最得力的一个“臂助”。奕訢还是最早兴办洋务的元勋,加上他在外交上处处向列强妥协让步,所以颇受帝国主义列强的青睐。由于权力的不断扩大,奕訢的政治野心也随之膨胀起来,与西太后的权力之争日渐显露。特别在慈安东太后支持山东巡抚丁宝桢杀安德海事件发生后,奕訢站在东太后一边,东太后死后,西太后“深有恨于恭王。”^②同治帝驾崩时奕訢觊觎皇权,中法战争初期又支持光绪帝对法作战,成了帝后的外圈人物。在这一系列重大事件中,越来越引起慈禧太后的疑虑和不满,于光绪十年三月十三日(1884年4月8日)发出懿旨,指责奕訢“近年爵禄日荣,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③等等,被驱逐出清朝中枢,“开去一切差使,并撤去恩加

① 《清史稿·奕訢传》第30册、第9106页。

② (英)濮兰德,白克浩司,《慈禧外记》第107页。

③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二)总第1675页。

双俸”，责其“家居养疾”^①。中日战争开始以后，为了扩大抗战力量，李鸿藻、翁同龢“合词吁请派恭亲王差使”^②。九月初一日（9月29日），光绪帝奉西太后的懿旨，命奕訢“著管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务，并添派海军事务，同办理军务”，并“在内廷行走”。^③不久又授命为军机大臣，“著派恭亲王督办军务，所有各路统兵大员，均归节制。”^④奕訢重新主持清廷大政以后，因曾遭慈禧太后的严谴并罢黜权力机构，更不敢违背太后旨意，迎合主和。光绪帝、翁同龢等主战派对奕訢大为失望，“上始向之殷，久之乃竟不足恃天下之望，亦愈孤。”^⑤奕訢上台以后，进行了一系列的主和活动，十月初七日（11月5日）约各国驻华公使至总理事务衙门，请求列强“调处”中日战争；二十五日（11月22日），约见美国公使田贝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请求美国出面“调停”，田贝向他提出条件是“朝鲜为自主，并议赔偿兵费。”^⑥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初六日（1895年2月1日）威海卫南台失守，各枢臣“商威海事，竟不能发一策。”^⑦十八日（2月12日）威海卫刘公岛失陷，慈禧太后求和心切，命李鸿章来京“请训”，并且决定“一切开复”作为清政府全权代表赴日求和。奕訢转达光绪帝意见谓：“上意不令来京，如此恐与早间所奉谕旨不符。”慈禧太后表示“我可作一半主张。”^⑧对光绪帝意见置于一边，奕訢

①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二）总第1676页。

②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八日。

③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三）总第3489页。

④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三）总第3466页。

⑤ 文廷式：《闻麈偶记》，丛刊《中日战争》（五）第498页。

⑥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五日。

⑦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初七日。

⑧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八日。

秉承西太后旨意,赞成李鸿章为全权代表赴日和议并签订《马关条约》。四月初八日(5月2日)奕訢与奕訖、孙毓汶、徐用仪“四小枢劫之上(光绪帝——引者)合词请批准”,逼着光绪帝批准《马关条约》。光绪帝“犹迟疑,问各国回电可稍候”?孙毓汶坚持“万不可恃”,而奕訢在旁“不语”,默不表态。^①光绪帝挥泪批准《马关条约》。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变法初期,奕訢“疾作,闰三月增剧”,“四月薨。”^②

恭亲王奕訢“祺祥”政变以后,为慈禧太后之重要心腹,至光绪朝,他虽曾与西太后有过权力之争,甚至一度为“帝党”外圈。然基本点是“后党”重要成员,自光绪帝生父醇亲王死后,他是“后党”中唯一的皇族成员在满洲贵族中颇有威望,故慈禧太后对奕訢既存疑虑而又寄以重任,他能黜而复出就是同他在皇族宗室中的地位有关。

“后党”成员中,除了恭亲王奕訢之外,还有三位满洲亲王,他们是醇亲王奕詝、礼亲王世铎、庆亲王奕訖。

醇亲王奕詝,光绪帝的生父,在“祺祥”政变中出了大力,成了慈禧太后亲信重臣,奕訖的福晋叶赫那拉氏乃西太后的胞妹,鉴于上述的亲密关系,所以慈禧太后立载湉为嗣皇帝。关于奕詝与慈禧太后的特殊关系及奕詝在后党中的地位本书一章三节里面已有详细论述。在这里要指出的是,光绪帝亲政以后,奕詝处处“避本生擅权嫌”^③,更疏光绪帝而亲西太后。光绪十一年九月(1885年10月),慈禧太后懿旨“著派醇亲王总理海军事务,所有沿海水师悉节制调遣。”^④他利

① 易顺鼎:《盾墨拾余》,丛刊《中日战争》(一)第127~128页。

② 《清史稿·奕訢传》第30册,第9107页。

③ 《清史稿·奕詝传》第30册第9110页。

④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二)总第2009页。

用总理海军事务的权力竟动用经费数千万两,替西太后修饰颐和园。据记载:“醇亲王之掌海军衙门也,太后提用筹备海军之积款以大兴土木,王不敢违。”^①“营颐和园,水衡钱不供,醇亲王乃移海军费奉之。”^②这些记载都说奕訢不顾中国海军装备的落后状况,挪用大量经费去讨好慈禧太后,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中日战争时北洋海军被日军一击即溃的严重后果。光绪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91年1月1日)奕訢病死,在中日战争和戊戌变法两件重大事件中未涉及奕訢。历史的发展是不能随意假设的,不过从奕訢同西太后的特殊关系和他对西太后那种一贯的“小心翼翼”态度,可以断定即使奕訢在世再长一些时间,也不会有助光绪帝从西太后手中转移权力的。

礼亲王世铎是努尔哈赤次子代善的后代,也是《啸亭杂录》作者昭槁的儿子。“同治间,授内大臣,右宗正。”光绪十年慈禧太后改组清朝最高中枢班子,罢奕訢以后由奕訢向慈禧太后推举,“乃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诏紧要事体会同奕訢商办。”^③世铎投入慈禧太后圈子以后,受宠若惊,事事揣摩西太后的心思,以投欢心。光绪十二年(1886)光绪帝十六岁已临亲政时期,慈禧太后也故作姿态装出一副归政模样,召见奕訢、世铎等议论“归政”事宜,世铎观察出西太后的意图以后,串通奕訢上了一道“合词吁恳太后训政”的章奏。^④世铎事后又草拟了《训政细则》,全面肯定了慈禧太后在“训政时期”的最高权力,这样世铎更受慈禧太后的器重,参与清

① 王照口述,王树栅记《德宗遗事》第5页。

② 恽毓鼎:《荣陵传信录》,左舜生辑《中国近百年史资料初稿》481页。

③ 《清史稿·世铎传》第30册,第8980页。

④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二)总第2123页。

朝重大事件的决策。光绪十四年(1888)光绪帝明年即将“亲裁大政”,世铎头脑灵活目光极为敏锐,他上了西太后这只破船以后,必须与她同舟共济,共保权力。因之,他一方面为了继续讨好慈禧太后,另一方面为自己以后的切身利益,也要竭力维护慈禧太后的绝对权威,故在光绪亲政前一年,迫不及待地上奏,抛出了一个《太后归政条目》,规定朝廷永远遵行西太后垂帘听政时期的一套处事原则,肯定了慈禧太后凌驾于光绪帝之上的地位,置皇帝于太后手中的傀儡。世铎可谓是“后党”里面一个诡计多端的投机分子,在重大关节上都由他先预谋出鬼点子。光绪帝亲政以后,他自知得罪皇帝,心怀余悸,在“德宗亲政,世铎请解军机大臣,奉太后旨,不许。”^①企图滑脚溜之,退出中枢。然世铎其人,不同于其他鼠目寸光的投机分子,也不同于其他妄自尊大的满洲亲王,他进行上述重大投机活动时,总是拖着光绪帝的父亲醇亲王奕訢一同进行。在奕訢死后,他就采用金蝉脱壳之法,逐步冷却与慈禧太后的关系,在中日战争时期,他几乎局外旁观,没有介入主战、主和之争。光绪二十年,慈禧太后六十庆典,他按例得到的是“赐亲王双俸,且增护卫”^②恩典,无其他特殊好处。戊戌政变以后,他的政治态度更加消沉,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进攻北京,西太后挟光绪帝出逃,“上奉太后西幸,世铎不及从召赴行在,复以病未至”^③与慈禧太后完全分手。宣统“逊位”后世铎呜呼归天。

奕訢 光绪十年慈禧太后改组清朝中枢机构,“命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十一年九月,会同醇亲王办理海军事

① 《清史稿·世铎传》第30册,总第8980页。

② 《清史稿·世铎传》第30册,第8980页。

③ 《清史稿·世铎传》第30册,第8980页。

务”、“十二年二月,命在内廷行走。”^①从此进入清朝最高统治集团,为慈禧太后所器重,成为“后党”的要员,光绪十六年醇亲王奕訢去世以后,奕訢主持军机处,代替了恭、醇两亲王在清廷中的操实权地位。中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与日本军国主义的民族矛盾空前激化,奕訢迫于抗战舆论,一度摆出主战姿态,表示要“统带劲旅出关征剿”^②直接赴前线抗战,得到光绪帝的嘉赞。可是到了关键时刻,慈禧太后亲自出面主持对日妥协和,奕訢便剥去“主战”外衣,积极参与主和活动,并同奕訢、孙毓汶、徐用仪一起逼着光绪帝批准《马关条约》,取得了慈禧太后更大的信任。后来在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慈禧太后挟持光绪帝出京西逃时,由奕訢留守北京与李鸿章一起同各国议和,签订《辛丑条约》,奕訢成为晚清最后一任集行政、外交于一人的总理大臣。

孙毓汶,字莱山,山东济宁州人。咸丰六年(1856)以一甲二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光绪初年擢内阁学士,授工部左侍郎。光绪十年慈禧太后罢奕訢,改组军机处,入直军机,兼总理事务大臣,成为后党中的骨干。孙毓汶授枢臣以后,备受慈禧太后恩宠,迁刑部尚书,旋调兵部尚书,为慈禧太后“最得意信任之人,且与李莲英结兰谱,得以侦探内宫消息,视皇上如虚器焉。”^③在甲午战争时期,孙毓汶主和调子唱得最响,“力言战不可恃。”^④与李鸿章、徐用仪抱成一团竭力反对光绪帝的抗战方针。“当中日事急,凤凰、九连城相继失

① 《清史稿·奕訢传》第30册,第9097页。

② 《清德宗实录》第347卷。第12页。

③ 《清朝野史大观》《情人逸事》卷八。

④ 《清史稿·孙毓汶传》第41册,第12371页。

陷,浸及登莱,毓汶日召梨园府中渲剧”^①,丧心病狂,幸灾乐祸。李鸿章作为清朝全权谈判期间,孙毓汶、徐用仪把持中枢,置主战派翁同龢于一边,直接拟谕旨指使李鸿章在谈判时向日本妥协让步,速成和约。孙毓汶竟不顾翁同龢、李鸿藻等主战军机大臣的竭力反对“秉笔者直欲以海疆拱手让人”^②还扬言“战字不能再提”^③,投降卖国的气焰嚣张程度到了极点。《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军机大臣翁同龢、李鸿藻主张暂缓批准条约,而孙毓汶力主早日批约。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4月23日),军机大臣起见论及割台事,光绪帝反对割台,谓“台割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孙毓汶以前敌屡败对。”^④四月初二日(4月27日)光绪帝召见枢臣,意欲废约再战。孙毓汶又力言“战万无把握,而和则确有握”^⑤反对光绪帝再战主张。四月初八日(5月2日),孙毓汶等又以天津海啸为借口,逼迫光绪帝批约,其“词色俱厉,各枢不敢有异词”^⑥光绪帝不得已“乃顿足流涕”挥泪批约。在《马关条约》的签订和批准过程中,“外李内孙”一拉一唱,做出了淋漓尽致的卖国表演。光绪帝对他极为憎恨,中日战争以后,孙毓汶被光绪帝驱逐出中枢机构,慈禧太后也以为孙毓汶在官场已声名狼藉,其地位又不及李鸿章之重要,故只好丢卒保帅,不加干预。孙毓汶称疾乞休以后,郁郁不快,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死去。

徐用仪,字吉甫,浙江海盐人。同治初年充军机章京,累

① 《清朝野史大观》《情人逸事》卷八。

②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初六日。

③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十日。

④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⑤ 易顺鼎：《盾墨拾余》，丛刊《中日战争》（一）第126页。

⑥ 易顺鼎：《盾墨拾余》，丛刊《中日战争》（一）第127页。

迁工部、刑部、吏部侍郎和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光绪二十年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成为“后党”一员。中日战争时期,徐用仪是孙毓汶在军机处里的最好搭档。每当主战派翁同龢、李鸿藻提出抗战建议时,徐用仪则以“未可轻敌”为由,反对备战迎敌。平壤失守和黄海战败以后,徐用仪与孙毓汶急切求和,亲自拜见总税务司赫德,请求各国调停,“自下午四点钟谈到六点钟,他们两个几乎痛哭流涕,愿意听受任何好的建议,答应以后办怎样办那样,”^①丑态百出,大失国格。光绪二十一年初清政府赴日求和代表张荫桓等被拒,徐用仪与孙毓汶去见美国公使田贝,请求斡旋。清廷以“使臣被逐,势难迁就,竟撤使回国,免得挫辱。”^②徐用仪与孙毓汶两人认为“慑懦委婉,谓宜留此线路,不可决绝。”^③正月二十八日(2月22日),光绪帝于乾清宫召见李鸿章,军机大臣均在座,谈及割地,翁同龢反对割地,徐用仪、孙毓汶言“不应割地,便不能开办”^④,竭力主张割地求和。三月二十三日(4月17日)李鸿章在日签订《马关条约》,二十八日(4月22日)徐用仪、孙毓汶即将条约送交光绪帝,“逼上批准”,光绪帝“不允”^⑤。四月初八日(5月2日),徐用仪、孙毓汶、奕訢、奕訖“四小枢”逼光绪帝批约,次日在《马关条约》上用宝。翁同龢提出展期换约的建议,徐用仪与孙毓汶“坚不可,至于攘袂。”^⑥中日战争以后,光绪帝“命徐用仪退出军机处,并毋庸在总理各

① 《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七编《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第36页。

②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二日。

③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二日。

④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

⑤ 易顺鼎《盾墨拾余》,丛刊《中日战争》日(一)第126页。

⑥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二日。

国事务衙门行走”^①戊戌政变以后顽固派掌权,徐用仪复出,值总署,迁都察院左都御史、擢兵部尚书。义和团起事,徐用仪赴各国使馆请求援兵,清廷以私通洋人罪,斩首弃市。多行不义必自毙,徐用仪的下场可谓是“后党”中最可悲的一位。

上述是“后党”成员的主要表现。另外还有两人是否算得上“后党”成员者,即李鸿章与李莲英。李鸿章一般近代史论著均以洋务派首领、地方实力派代表人物论之。笔者考察他的发迹和一系列重大事件上的态度均同慈禧太后的利益休戚相关,其归属不仅应在“后党”之列,而且是“后党”中除西太后之外的第二号人物。至于李莲英尽管他充当慈禧太后的耳目与打手,坏事做绝,然李莲英必竟是区内监,只不过是慈禧太后豢养的一条走狗,还够不上与满洲亲王、军机大臣、六部尚书、侍郎结党纳派的资格,故不作“后党”成员评论。

243

接着再分析“帝党”主要成员在中日战争期间的表现。

翁同龢是光绪帝的启蒙老师,师生关系非常亲密。中日战争时期,极力主战,支持光绪帝的抗战方针和部署,光绪帝先后委以军机大臣兼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的重任,是光绪帝身边最得力的助手和参谋。光绪二十年五月一日,清军进驻朝鲜,日本亦调大军入朝,双方开始兵锋相接,六月十二日(7月22日)李鸿章的亲信叶志超电请从朝鲜撤兵,光绪帝不允。翁同龢力主添兵,“调东三省及旅顺兵速赴朝鲜。”^②八月十七日平壤失守,翁同龢抨击:“合肥(指李鸿章)事事落

①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四)总第3636页。

②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年元月十四日。

后,不得谓非贻误。”^①光绪帝颁谕:“著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②处理了李鸿章贻误之罪。八月十八日(9月17日),黄海战役爆发,翁同龢感到“鸭绿江一线可危,即渤海亦可危”,他立即向光绪帝建议:“宜调东三省兵,而急设大粮台,派大员经理,又于鸭绿江岸筑炮台等数事”^③力陈加强东北边境的防务。光绪帝为了加强对军机处的控制,于十月初六日(11月3日),授命翁同龢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他进入军机处以后,尽力贯彻光绪帝的抗日方针,执行光绪帝的抗战部署,与主和派孙毓汶、徐用仪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十月二十五日(11月21日)旅顺失守,翁同龢对于局势的恶化,深感不安,夜“不能睡,默坐永叹”,“愤虑填膺,恨不速死”,^④表现了为国忧虑的沉痛心情。他当即向光绪帝提出征集湘军,用刘坤一为统帅以挽救时局,这个意见为光绪帝接受,命刘坤一为钦差大臣,节制关内外各军。次年,威海卫陷落,北洋海军全军覆灭,翁同龢怒不可遏,发出“愤极愧极!寇深矣,若之何!”^⑤的叹息。在枢臣议论割地时,他坚决反对割让台湾予日本,认为“台湾万无议及之理。”^⑥《马关条约》签订以后,翁同龢“极言批约之不可速”^⑦。当他收到丘逢甲等自台来电,认为“字字血泪”,“无面自立于人世”^⑧痛

①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年八月十八日。

②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三)总第3457页。

③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年八月。

④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初九日。

⑤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初九日。

⑥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六日。

⑦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⑧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感内疚,再次“力陈批准宜缓。”^①《马关条约》批准以后,翁同龢“见台民公电,为之流涕。”^②翁同龢在甲午战争时期,他的主战主张对光绪帝抗战思想产生很大的影响,而光绪帝的积极抗战态度,也促进了翁同龢的抗战立场更加坚定,在光绪帝处境最艰难时刻,他始终与光绪帝同甘共苦,维护光绪帝的最高权威。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翁同龢政治观点发生了新的转变,把康有为等维新志士推荐给光绪帝,对戊戌变法发挥了很大的推进作用。

李鸿藻(1820~1897)字兰孙,直隶高阳人。咸丰二年进士,曾为同治帝师,官至兵部、礼部、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李鸿藻是典型的封建士大夫中的守旧人物,他反对李鸿章进行洋务活动。然他和翁同龢一样,把自己置于“贤相”地位,在中日战争时期积极支持光绪帝抗战主张。他同翁同龢一起,在中枢决策时,反对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等人的妥协让步主张。《马关条约》签订以后,李鸿藻和翁同龢反对割台,主张暂缓批约。李鸿藻为两朝帝师,在清朝官僚中德高望重,他支持光绪帝主战,与翁同龢二人可谓光绪帝的左右帮手。中日战争以后不久去世。

志锐,他塔拉氏,满洲镶红旗人,光绪帝珍、瑾二妃堂兄。“幼颖异”^③,光绪二年举人,六年进入授翰林院编修入仕途。志锐才华横溢,有进取心“究心经世之学,思有所建白”。^④他关心政局,加之珍妃的关系,得到光绪帝的器重,光绪十八

①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②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③ 闵尔昌《碑传集补》第34卷,《清代碑传全集》第146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碑传集补》为镶红旗,《清史稿》《志锐传》为隶“正红旗”。

④ 闵尔昌:《碑传集补》《清代碑传全集》第34卷,第1460页。

年(1892)由詹事擢礼部右侍郎逐步成了“帝党”中坚。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以后,志锐多次上疏言事,筹划战守,弹劾主和“后党”孙毓汶、徐用仪、李鸿章等执行西太后旨意对日妥协让步活动,对主战舆论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日宣战以后,光绪帝抗战部署遭到朝廷内外顽固派的重重阻力,志锐加以有力抨击,他在七月十六日的奏折中指出:

方日人肇衅之时,天下皆知,李鸿章措置之失,独孙毓汶悍然不顾,力排众议,迎合北洋,及皇上明诏下颁,赫然致付,天下皆闻风思奋,孙毓汶哓哓不乐,退有后言,著以皇上为少年喜事者。……查该大臣于中外情形,华洋交涉,素不留心,而专愎成性,任意指挥,不顾后患。……徐用仪起自章京,性情柔猾,事事仰承其意。……可倘蒙宸断,立将孙毓汶罢斥,退出军机,朝政必有起色,军事必有转机。^①

志锐的参奏向“后党”心脏投以利剑切中要害,即着御史安维峻上疏参劾李鸿章、李莲英等词连太后,向“后党”发起全面攻击。孙毓汶是慈禧太后安插在军机处的得力心腹,慈禧太后便迁怒于珍妃,革妃号,并滴戍志锐于乌里雅苏台,向“帝党”反击,达到了“清君侧”的目的。

文廷式,字道希,江西萍乡人,生于广东。光绪十六年进士,授编修。甲午大考翰詹,阅卷大臣拟第三,光绪帝特拔第一,擢翰林院侍读学士,兼日讲起居注官。他“博学多闻,才名藉甚”^②素以评论时政的“清流”著称。文廷式曾为珍妃幼年老师,“珍妃幼尝问学于文,因奏谓此人,为江西才子,夙有

①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丛刊《中日战争》(三)第37~38页。

② 王嵩儒:《掌故零拾》丛刊《戊戌变法》(四)第294页。

时名,翌日帝以问翁,翁更揄扬备至,于是上心简在。……翌年,举行大考,帝出一朱条示阅卷大臣谓文廷式可置一等。第一升侍讲学士,“从此成为“帝党”中坚。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以后,文廷式多次上书主战,弹劾李鸿章,以为战争“屡败者,李鸿章及其党为之耳。”^①在顽固派进行妥协和活动的紧张时刻,文廷式又多次上书反对议和,反对割台,他向朝廷提出:“若割敌兵力未到之地,及偿款至万万以上,皆使中国一蹶不振,不可许也。”^②爱国之心跃然纸上。但他的主战言论为“后党”所疾,被革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戊戌变法时参加强学会,支持康有为等人的变法主张。维新运动失败后东走日本,光绪三十年(1904)抑郁以死。

上列四位以外,有亲光绪帝者,但均为一时一事之辈,不在“帝党”之列,有的著作中珍妃也列为“帝党”,笔者认为,珍妃作为光绪帝宠爱妃子,原因之一是政见相同,心心相印,珍妃常在光绪帝身边,帮他披览臣工章奏,遇重大事件的发生,她即提出自己的主见,而往往同光绪帝想到一起,成为皇帝的“贤内助”,这样必然对朝廷政事发生影响。然而,后妃参政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故珍妃不列“帝党”。

戊戌变法时期,“帝党”与“后党”的斗争发展为改革与守旧两大势力的搏斗,两派成员也有较大的变化,其性质自然是进步力量同反动腐朽势力的交锋,光绪帝就是清朝进步力量的旗手,变法维新的元首。

①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丛刊《中日战争》(三)第331页。

②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丛刊《中日战争》(三)第578页。

第五节 萌发维新变法思想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一书中指出：“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我皇上赫然发愤，排众议，冒疑难，以实行变法自强之策，实自失胶州、旅顺、大连湾、威海卫以后始也。”^①中、日战争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把中国人民投入更深的苦海，四万万同胞陷入巨大的悲愤之中。此时此景，正如谭嗣同在诗文中描绘的那样：“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②然而，中华民族在“齐下泪”的悲愤中觉醒起来了，图存救亡的意识与日俱增。空前高涨的爱国呼声惊动了清朝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的思想，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感受到“时势所逼”，“国事艰难”，纷纷向朝廷“竟言自强之术”。洋务派所陈“自强之术”仍以“洋务救国”为宗旨，以“开矿、练兵、筹饷、通商、制械”为要务。可是也有一些官僚，他们陈奏“自强之术”，突破了洋务派已经鼓吹了二十余年的“自强新政”框架，向着维新变法贴近。最先以日本明治维新和法国资本主义制度的活力鼓励清廷变法的是顺天府尹胡湧翠，他在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1895年7月）上了一道题为《条陈变法自强事宜》的奏折，其主要内容是：

日本一弹丸岛国耳，自明治维新以来，力行西法，亦仅三十余年，而其工作之巧，出产之多，矿政、邮政、商政

① 丛刊：《戊戌变法》（一）第249页。

② 《谭嗣同全集》上册，第276页，《题江建霞东邻巧关园诗》。

之兴旺 ,国家岁入租赋 ,共约八千余万元 ,此以西法致富之明效也。……然时势所逼 ,无可如何 ,则唯有急求雪耻之方 ,以坐致强之效耳。昔普法之战 ,法之名城残破几尽 ,电线、铁路处处毁裂 ,赔偿兵费 ,计五千兆弗兰克 ,其数且十倍今日之二万万两。然法人自定约后 ,上下一心 ,孜孜求治 ,从前弊政 ,一体蠲除 ,不及十年 ,又致富强 ,仍为欧洲雄大之国。……今中国以二十二行省之地 ,四(百余)兆之民 ,所失陷者不过六七州县 ,而谓不能复仇洗耻 ,建我声威 ,必无是理。但求皇上一心振作 ,破除成例 ,改弦更张 ,咸与维新 ,事苟有益 ,虽朝野之所惊疑 ,臣工之所执难 ,亦毅然而行之 ;事苟无益 ,虽成法之所在 ,耳目之所习 ,亦决然而更之。实心实力 ,行之十年 ,将见雄长海上 ,方驾欧洲 ,旧邦新命之基 ,自此而益巩 ,岂徒一雪割地赔费之耻而已。……纵观世运 ,抚念时艰 ,痛定思痛 ,诚恐朝野上下 ,高谈理学者 ,狃于清议 ,鄙功利为不足言 ;习于便安者 ,又以为和局已定 ,泄沓相仍。……今日即孔孟复生 ,舍富强外 ,亦无立国之道 ,而舍仿行西法一途 ,更无富强之术。用敢不揣冒昧 ,就管见所及 ,举筹饷练兵 ,重工器 ,兴学校数大事 ,敬为我皇上缕析陈之。……^①

249

胡澍 认为仿效日本明治维新力行西法是清朝唯一的“富强之术”。他所奏的具体仿效内容虽然仍是开铁路、筹银币、开民厂以造机器、开矿产、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等洋务范畴 ,然而 ,他赞扬明治维新 ,仿行西法 ,并向光绪帝提出 :“一心振作 ,破除成例 ,改弦更张 ,咸与新法”的变法要求 ,反

^① 丛刊《戊戌变法》(二)279~280页。

映了统治集团内部确有一些官僚已经萌发出朦胧的维新变法的新思想。

其时,刑部侍郎李端^①在光绪二十二年五月(1896年6月)上了名为《请推广学校折》的奏折,他从办学校这个侧面,向光绪帝提出了维新企图,这是清朝官僚中典型的从洋务运动中脱颖而出的变法图强思想。他在奏折中说:

夫二十年来,都中设同文馆,各省立实学馆、方言馆、水师武备学堂、自强学堂,皆合中外学术相与讲习,所在皆有。而臣顾谓教之道未尽,何也?诸学皆徒习西学、西语、西文,而于治国之道,富强之原一切要书多未肆及。……^①

在李端^①看来,洋务派兴办西学,治标不治本,“治国之道,富强之原”均未“肆及”,所以他在奏折中提出:设官书局于京畿,自京师及省、府、州、县皆设学堂,并设藏书楼、创仪器院、开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游历等五个方面,“有官书局大学堂之经,复有此五者以为之纬”。^② 尽管李端^①的教育思想还深深地保留着洋务教育的痕迹,而他的主张已向近代学校靠近了一步。由于萌发出维新思想,所以他后来积极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主张,并向光绪帝推举,成为维新派同清廷建立联络的媒介。

知识分子阶层中,在甲午战争的刺激下维新变法的热潮也澎湃掀起。“自中东一役我师败绩,割地偿款,创巨痛深,于是慷慨爱国之士渐起,谋保国之策者,所在多有。”^③ 正象著名史学家陈旭鹿先生所指出的那样,甲午战败是对“维新

①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四)总第3791。

②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四)总第3793页。

③ 梁启超:《爱国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第67页。

运动的动员,而《马关条约》也可以说是动员令。”^①不久就掀起了知识分子的《公车上书》运动,他们作为一支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处在“卧薪尝胆”苦境中的光绪帝,“甲午、乙未兵败地割,求和偿款,皇上日夜忧愤,益明中国致败之故,若不变法图强,社稷难资保守,每维新宗旨商询于枢臣。”^②甲午兵败促进了光绪帝政治思想的新转变,在这以前,光绪帝初登皇位,其主要精力放在熟悉处理朝政事务,考察臣工的办事效率。虽然对慈禧太后的严密控制极为反感,但基本上还是“小心翼翼”地在皇太后手掌上做傀儡皇帝,对于“垂帘听政”时期的既定方针不敢有所逾越和偏离。尔今,光绪帝经过甲午战争的洗礼,中兴祖宗基业之心更加强烈了。继甲午之役以后,赔款割地,面临帝国主义列强的瓜分豆剖,亡国之君的危险日复一日地向他逼近,因而在他的思想上奋起了难以抑止的“图强雪耻”的紧迫感。美国作家卡尔女士对甲午战后光绪帝的心态有过生动的叙述:

自日一战而后,中国割地赔款,蒙莫大之耻辱。光绪帝方如梦之初觉,慨然以发愤自强为己任。故中日战前与战后之光绪帝不啻判若二人也。^③

甲午战争结束不久,光绪帝连连发出上谕,要求臣工“上下一心,图自强而弥祸患”,并表示“惩前毖后,惟以蠲除积习力行实政为先。”^④他所说的实政,具体的就是“修铁路、铸钞弊、造机器、开各矿、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等等,“大约以筹饷

① 《陈旭鹿学术文存》,第80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出版。

②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丛刊《戊戌变法》(一)第330页。

③ 卡尔女士:《慈禧写照记》第157~158页。

④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四)总第3631页。

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①光绪帝的“图强”观和寻找的“雪耻之方”仍在洋务派“自强新政”的圈子里。所以甲午战争以后,光绪帝对洋务运动中的民用工业和民办企业备加关注,以推进洋务运动的新发展。

光绪帝政治思想发展的新起点是在运用洋务手段图强的同时,萌发了维新变法的意向。他维新变法思想的萌芽,是受到朝野变法图强热流的启迪所致。有些官僚上书言事的视野比洋务派“自强新政”的框架有了新的拓宽,对于这方面疏奏,光绪帝均“详加披览”,他强烈地意识到“强邻狡焉思启,合以谋我”,^②同臣工奏疏中所阐发的图强要求发生了共鸣。清朝官僚关于维新变法的呼吁,尽管他们开出的维新内容还很笼统肤浅,但其实际效果却是把光绪帝的目光引向执意探索欧美各国的治国之道。曾经出使外洋,不久前从日本回国的户部侍郎张荫桓,被光绪帝召见进宫,请他讲述欧美、日本的治国之道。张荫桓“晓然欧美富强之机”,“每为皇上讲述,上喜闻之”,“启秀圣聪,多赖其力”。^③清朝官僚朦胧地向光绪帝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日本明治维新运动,列国变政的春风不断地吹进了他的心坎,扩大了他的视野,开启了他向西方国家讨教自强之术的心扉。

光绪帝维新变法思想的萌芽,最重要的触发剂是受康有为等维新派的影响。

甲午战争刚结束,光绪帝多次发上谕,提出了一揽子的“新政项目”,虽然其主要内容还没有超出洋务派所策划的范围,可是在很短的时间里什么修铁路、铸银币、造机械、开矿

①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四)总第3631页。

② 《清德宗实录》第412卷,第14页。

③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丛刊《戊戌变法》(一)第331页。

产、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校、整顿厘金、严核关税等等,如此繁多的新政一齐涌在光绪帝脑子里,并加以积极催办,可见他“图强”的迫切心情已经升华到如饥似渴的程度。久旱逢滋雨,康有为等的维新主张一旦直接为光绪帝所见,必然使他发生浓厚的兴趣。

1895年5月《马关条约》签订时刻,康有为发动一千二百多个举人联名“公车上书”,主张拒和、变法、迁都,震动了海内外,由于顽固派的封锁,光绪帝没能看到这份“公车上书”。二十多天以后,康有为又写了一万三千多字的上皇帝书即第三次上书。^①新近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发现了康有为《上清帝第三书》的呈进本,又称《请及时变法富国养民教士治兵呈》。这次上书比《公车上书》的内容更加具体和广泛,备陈变法着手之方和先后缓急之序,条理清楚考虑周密。他向光绪帝建议,《马关条约》刚签订,朝野图强雪耻之志有不可遏止之势,此时即下哀痛之诏,以鼓士民之气,举贤士参政,以备顾问,转败为胜,重建国基为时未晚。康有为写道:

伏乞特诏行海内,令士民公举博古今,通中外,明政律,方正直言之士,略分府县,约十万户而举一人,不论已仕未仕,皆得充选。因用汉制,名曰议郎。皇上开武英殿,广悬图书,俾轮班入直,以备顾问。并准其随时请对,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凡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皆令会议,三占从二,下部施行。所有人员,岁一更换,若民心推服,留者领班,著为定例,宣示天下。上广皇上之圣聪,可坐一定,而照四海;下启天下之心志,可同忧

^① 从1808年10月至1898年6月十年间,康有为先后七次上书光绪帝。

乐而忘公私。^①

康有为除了建议光绪帝广选贤才之外,他还提出了自强雪耻的大方案,即富国、养民、教士、练兵四策。这次上书在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十一日(1895年6月3月),由都察院转呈,冲破了许多阻力,光绪帝终于第一次看到了康有为的上书。他读了以后,思想上得到了很大的启迪,耳目为之一新。光绪帝对康有为的建议极为重视,即命誉录副本三份,一份是送慈禧太后,一份发军机处,一份放存乾清宫,原件留勤政殿以备参考。这一次上书使光绪帝透过紫禁城的封建禁区,在思想上同朝野维新力量开始沟通。不久于闰五月初八日(6月30日)康有为又以工部主事的名义,第四次向光绪帝上书。提出了“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变法建议又深入了一层,触及政治体制的改革。可惜这次上书又横遭顽固派的阻格,未能呈至光绪帝手中,康有为投书无门只得离京返回广东。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冬,德国强占胶州湾,瓜分豆剖,危机四伏,康有为了十一月十三日(12月5日)赶到北京,向光绪帝进呈第五次上书。这次上书又被工部尚书崧焜压扣下来,康有为上书受挫,准备启赴回籍,给事中高燮曾“乃抗疏荐之”。军机大臣翁同龢得到消息,立即赶到他的住舍南海会馆,会见康有为说:“毋行,吾今晨力荐君于上矣,谓‘康有为之才过臣百倍,请举国以听’。上将大用君矣,不可行。”^②康有为第五次上书经高燮曾、翁同龢转呈,总算到了光绪帝眼前。《光绪朝东华录》载: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有为第三次上请帝书原本》,《历史档案》1986年第1期。

② 康同家:《康有为与戊戌变法》,香港环球文化服务社,1959年版,第64~65页。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间康有为抗论德据胶州亟宜
变法自强呈请工部堂官代奏之书进。^①

《东华录》还详录其内容。在这次上书里康有为向光绪帝提出变法三策：“第一策曰采法、俄、日以定国是”；“第二策曰大集群才而谋变政”；“第三策曰听任疆臣自行变法”。“凡此三策，能行其上则可以强，能其中则犹可以弱，仅行其下则不至于尽亡，惟皇上择而行之，宗社存亡之机，在于今日，皇上发愤与否在于此时。”康有为坦然直言曰：“职（康氏自称）诚不忍见煤山前事也。”看了康有为的上书，光绪帝的心为之打动，“上嘉纳之”^②，准备召见面论变法机宜。可是恭亲王奕訢以“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能召见，今康有为乃小臣，皇上若欲有所询问，命大臣传语可也，”^③阻止了光绪帝亲见康有为。结果，光绪帝只好“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接见康有为询问天下大计，变法之宜。并令如有所见及有著述论政治者，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进呈”。^④又“命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进工部主事康有为所著日本变政考、俄皇大彼得变政考等书”。^⑤此间，康有为先后向光绪帝呈进的论著有：“缀成《俄皇彼得传》、《日本变政考》、《英国变政记》、《普国作内政寄军令考》、《列国统计比较表》、《列国官制宪法表》、《法兰西革命记》、《波兰灭亡记》等等。”^⑥光绪帝读了康有为呈进变法新著，茅塞顿开，拓阔了政治视线，于是他广购新书，企望变法维新之举能在外国变法的历史经验中得到借

255

①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四），总第4023～4024页。

②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四），总第4022～4024页。

③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全集》专集之一，第10页。

④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四），总第4017页。

⑤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四），总第4024页。

⑥ 胡思敬：《戊戌履霜录》第二卷 丛刊《戊戌变法》（一）第375页。

鉴。据梁启超说：光绪帝“昔岁无事，旁及宋之版本，皆置懋勤殿左右，以及汉学经说，并加浏览。及胶旅变起，上怒甚，谓此皆无用之物，命左右焚之，太监跪请不许。大购西人政书，遂决变政。”^①光绪帝自见到康有为第三次上皇帝书以后，萌发了维新变法思想，尔后又多次接到康有为的上书，变法之念越来越强烈。又是命总理衙门问话康有为；又是阅读日本、欧美各国变法著作；又是焚烧宋元版本的汉学经书；又是广购西人政书，维新变法之举的开场锣鼓已经敲响，并且一阵阵地传至在颐和园静养的慈禧太后耳中。“在廷守旧诸臣”，“恶新政”之辈不断地谗言新法，“将不利颐和园激太后之怒”^②。这时，光绪帝已“锐意变法”，当他得悉西太后不欲，就对顽固派庆亲王奕訢说：“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奕訢便向慈禧太后报告光绪帝变法决心，西太后怒气冲冲地说：“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③一语道出杀机，把光绪帝逼到了破釜沉舟的地步。

寻求“图强之术”，萌发维新变法思想是光绪帝政治生涯中可贵的转变，因而他“不仅是满洲皇族中比较能接受新思想的人，也是清朝统治的上层人物中比较能接受新思想的人。”^④新思想从何而来？从康有为的上皇帝书中和他上呈的论著中来，从西人政书中来，说明光绪帝是一位怀着寻求新知识的强烈要求而勇于向西方学习的年轻皇帝；为了变法，他必须从慈禧太后手中争得事权，“不甘作亡国之君”，反

① 《光绪政德记》第12章，丛刊《戊戌变法》（一）第313页。

②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丛刊《戊戌变法》（一）第329页。

③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丛刊《戊戌变法》（一）第331页。

④ 《陈旭鹿学术文存》，第808页。

映了光绪帝的无畏情怀 ,因此他也是一位有所作为的青年皇帝。

第七章 锐意变法

第一节 思想界的新面貌

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耻辱和深重的灾难,同时也促进了中华民族救亡运动的高涨。中国资产阶级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他们的代表人物思想空前活跃,思想界面貌焕然一新,形成了维新变法的大气候。

维新派人士站在救亡运动的最前列,高举维新旗帜,为变政革新奔走呼号,推波助澜。人们长期醒酿着的爱国御侮心潮开启了川河的闸门,汇成一股气势磅礴的宣传维新变法、救亡图存的舆论洪流,这是中国思想界新面貌的第一个标志。

人们对帝国主义列强认识的不断深刻,救亡图存成了时代的强音。甲午战争以前维新派的先驱如郑应观、王韬等人,他们认为帝国主义列强的经济掠夺是中国“精华消竭,敝国无形”的主要根源,所以主张实行“商战”,提出“先富而后强”的理论。他们一般还未能看到帝国主义的亡我之心,更不能发出从政治上抵御列强侵略的呐喊。甲午战争以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他们目睹了战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领土,宰割中国主权的严重形势,认识到列强鄙视中国人民,最终是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要把中

国人民作为他们的奴隶。认为“自东师辱后,泰西蔑视,以野蛮待我,以愚顽鄙我。昔视我为半教之国者,今等我于非洲黑奴矣,昔憎我为倨傲自尊者,今则侮为聋瞽蠢冥矣。”这样“若不及时图治,数年之后,四邻交逼,不能立国,”^①列强亡我之心昭然若揭。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本性认识的不断加深这是维新派掀起图存救亡运动的基本点和促进力。

用进化论来论证变法图存,是近代思想界别开生面的新思维。在甲午战争以前,已经有人开始接受西方传来的进化理论,他们用进化论来解释和动摇清朝统治者传统的、保守的儒家治国、齐家、平天下的伦理观念。康有为曾以公羊家的“通三统”说论正夏商周三代随时因革,递嬗而进的道理。并且还在撰写《孔子改制考》时借托进化论附会孔子学说,为变法改制造成理论依据。他又在光绪二十一年的《公车上书》(即《上清帝第三书》)中援引《孔子改制考》中涵及进化理论的“公羊之义”来奏请光绪帝审时度势,涤除旧弊,维新气象。他说:

伏念国朝法度,因沿明制数百年矣,物久则废,器久则坏,法久则弊;“值四千年之变局,盛暑已至,而不释重裘,病症已变,而犹用旧方,未有不焚死而重危者也。”^②康有为希图用进化论来启迪光绪帝的变法维新思想,可惜光绪帝未能直接“披览”他的进化论思想,然而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所阐发的进化观理论,却在思想界中得到极为广泛的传播。

光绪二十二年(1896)康有为读了严复的译作《天演论》

^① 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丛刊《戊戌变法》(二),第188~189页。

^② 《公车上书》,丛刊《戊戌变法》(二),第139~140页。

(当时《天演论》还未公开印行)以后,拓展了原来《孔子改制考》一文中的进化理论,把进化论注入于“公羊三世说”,用来改造传统的历史循环论,论证了历史由低级不断向高级发展,祖宗之法必须因时变递,废旧维新的历史必然性。梁启超称康有为“之哲学,进化派哲学也”,他“独发明春秋三世之义以为文明世界在于他日,日进而日盛。盖中国有创意言进化学者以此嚆矢焉。”^①康有为在后来的几次上皇帝书中,经常阐发他的进化论哲学观,如《上清帝第四书》里,运用进化论优胜劣败,在竞争中求生存的道理向光绪帝呼吁“通知情势”,变法自强。他写道:

今当以开创治天下,不当以守成治天下,当以列国
 并争治天下,不当以一统无为治天下。诚以积习既深,
 时势大异,非尽弃旧习,再立堂构,无以涤除旧弊,维新
 气象。若仅补苴罅漏,弥缝缺失,则千疮百孔,顾此失
 彼,连类并败,必至无功。^②

又如在《上清帝第六书》中说:“观大地诸国皆以变法而强,守旧而亡。然则守旧开新之效,已所可观矣”;“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不变则亡。”^③反复向光绪帝论述变法是前进的动力,守旧是亡国的原由。

另一位维新派的主将梁启超,在他的名著《变法通议》一文中也运用进化论的观点,说明自然界处在万变之中,进而推论人类社会也无永恒不变的制度。他例举中国历史上的赋役制度,由贡助之法一变为租庸调法,再变为两税法、一条鞭法。进而引伸历代军事制度和教育制度等等,也都是“无

① 梁启超:《康有为传》,丛书《戊戌变法》(四),第20页。

② 丛刊《戊戌变法》(二),第178页。

③ 丛刊《戊戌变法》(二),第197页。

时不变,无事不变”。他认为各种制度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这是“古今之公理”,历史之趋势。

康有为、梁启超寓进化论于维新救亡运动,鼓动清廷变法,可谓是近代思想界的一面标新立异的旗帜,影响了一代维新志士。

甲午战争前后,严复是一位系统地宣传进化论和介绍西方进化论著作的泰斗。

严复(1854~1921)福建侯官(今闽侯)人。光绪三年(1877)赴英国留学,入格林尼次海军大学,亲身观察了英国社会制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并潜心研究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赫胥黎的《天演论》、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论》等资产阶级哲学著作,尤其对进化论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光绪五年(1879)严复学成回国,在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执教二十年。他用进化论的观点考察中国历史,先后撰写《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等史学理论著作,斥历代帝王为“大盗穷国者”,反对顽固守旧,主张向西方学习,实行改良,废专制政治而实行君主立宪。甲午战争以后,严复译述赫胥黎的《天演论》,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观来唤起国人救亡图存,呼吁清廷顺天演规律进行维新变法。《天演论》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公开印行,迅速风行海内,为思想界所瞩目赞赏,给他们提供一个观察祖国命运的新的思想方法,不仅向思想界敲响了警钟,也为维新派指明了学习西方进行变法的道路。

维新派提倡向西方学习,介绍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蔚成风气,这是甲午战争以后,思想界新面貌的标志之二。

严复不仅是宣传进化论的先驱,而且也是甲午战争以

后,大力向国人介绍西方,提倡学习西方的杰出代表。从英国学成归国到中日战争失败的几年间,严复不仅译述了赫胥黎的《天演论》,系统地向思想界推荐西方哲学界的进化理论,为维新派供给思想养料,并且还翻译了许多种西方学者关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逻辑学等书籍。严复认为“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①”从而他竭力主张“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②中国要有效地抵抗列强瓜分豆剖,首先重要的是使国家富强起来,国家要富强又必须“用西洋之术”不可。^③这种观点,同早期思想家魏源、龚自珍等所提倡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想一脉相承,有异曲同工之妙。

维新派用西方国家的文明作为变法图强的模式,对照中国封建社会,痛感封建统治制度的落后和腐朽。他们以“西学”为武器,向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官僚制度挑战,礼赞西方国家的治国之术。在维新派笔下,西方国家是尽善尽美的理想社会。

梁启超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撰写的《经世文新编序》一文中说封建主义的中国是“不新之国”,而赞美西方国家为“求新之国”。他说:

“求新之国,其君明以仁,其臣忠以毅,其民智以雄,其政通,其事精,其器莹,其气则华郁缤纷,其屋室城池郭邑官府委巷街衢园囿台治椽采,皆瑰玮丽飞,朱华高骧,平夷洞达,光焰照烂。徘徊其乡,则心旷神怡,乐以忘返矣,遑问其国之治否之何若矣。”^④

① 《原强》丛刊《戊戌变法》(三),第57页。

② 《救亡决论》丛刊《戊戌变法》第63页。

③ 《论世变之亟》丛刊《戊戌变法》(三)第74页。

④ 《饮冰室文集》之二,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47页。

又在《西政丛书序》一文中,梁启超写道:“欧洲各国,百年以来,更新庶政,整顿百废。议政之权,逮于氓庶。故其所以立国之本末,每合于公理,而不戾于吾三代圣人平天下之议。”^①康有为也颇为赞颂“今泰西诸国以治法相竞,以智学相上,此诚从古诸夷之所无也。”^②对于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法制,维新派更是赞美之至。谭嗣同说:“惜中国自己求亡,为外洋所不齿,曾不足于公法,非法不足恃也。”又说:“万国公法,为西人仁至义尽之书。”^③把中国与西方国家作了对比,在法制方面相形见绌,其结论是“惜中国自己求亡”,寓意之深刻,令人吃惊。维新派美化西方国家的法制,来论证中国变法之必要,在他们看来,中国只有自己先进行变法,才有可能引援“万国公法”同列强争论改约,从而使国家渐富日强。谭嗣同认为:

凡利必兴,凡害必除,如此十年,少可自立,不须保护,人自不敢轻视矣。每逢换约之年,渐改订约章中之大有损者,援万国公法,止许海口及边口通商,不得阑入腹地。……但使一国能改约,余皆可议改。如此十年,始可由富而强,始可名之曰国。^④

用“万国之法”来改变甚至废除帝国主义列强与清政府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显然是与虎谋皮的幻想。然而,维新派抬出“万国公法”作为国际关系的准则,来鼓励清政府变法“始可由富而强”,从一个侧面推动变法运动,无疑也是一种善良的愿望。

① 《饮冰室文集》之二、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63页。

② 《上清帝第四书》,丛刊《戊戌变法》(二),第175页。

③ 《报贝元徵》,《谭嗣同全集》第423页。

④ 《报贝元徵》,《谭嗣同全集》第412~413页。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日益贫弱而西方国家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思想活跃文化繁荣,引起一部分关心祖国命运的先进分子的羡慕和向往,因而兴起了一股学习西方的热流。维新派人士把学习西方,介绍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作为推进救亡运动发展的舆论和实行变法的兰本。他们从西方国家寻找救国之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尝试,后世没有加以指责的理由。

维新派猛烈冲击封建社会的传统文化,大力提倡资产阶级的新文化,这是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思想界新面貌的第三个标志。

“欧风美雨”的西方文化,伴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的洋枪洋炮和鸦片阵阵袭来,启开了中国封建士大夫的思想门户,清统治者堵之不成,放之不安,只得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在不动摇封建伦理纲常的前提下,用西学辅之中学,为维护统治秩序服务。甲午战争的惨败,一部分封建士大夫中的先知者,他们除了对顽固派的腐败无能、妥协投降行为感到痛首恶疾之外,还从思想文化领域里去探索国家贫弱的根源何在?在他们看来代表封建文化的旧学,是社会进步,国家强盛的思想大敌。维新派这种观念更为强烈,他们列数封建传统文化即旧学的种种弊端,加以鞭挞:

首先,封建主义的传统文化,闭塞民智,坑害人才,误国殃民。

今日之患,在吾民智不开,故虽多而不可用,而民智不开之故,皆以八股试士为之。学八股者,不读秦汉以后之书,更不考地球各国之事,然可以通籍累致大官。今群臣济济,然无以任事变者,皆由八股致大位之故。故台辽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万万之款,不

赔于朝廷 ,而赔于八股。^①

他们把集中表现封建文化的八股文视之为中日战争失败的思想原因 ,以为旧学者 ,即亡国之学也。

其次 ,封建传统文化使文臣百官闭目塞耳 ,不明了世界事变。

他们“以贵倨未近通人讲求 ,至西政新书 ,多出近岁 ,诸臣类皆咸同旧学 ,……未暇更新考求 ;或竟不知万国情状 ,其蔽于耳目 ,狃于旧说 ;以同自证 ,以习自安。故贤者心思智虑 ,无非一统之旧说 ,愚者骄傲自喜 ,实便其尸位之私图。……语新法之可以兴利 ,则矐目而诘难 ,语变政之可以自强 ,则掩耳而走避。老吏舞文 ,称历朝之成法 ,悚然听之者盖十之六七矣。迂儒帖括 ,诋正学之昌言 ,瞿然从之者又十而八九矣。”^②

把顽固派的迂态刻划得淋漓尽致 ,他们摇头晃脑舞文弄墨 ,故旧学者即盲聋之学也。

265

再次 ,封建传统文化使武将不能通晓近代兵法 ,士兵不识近代器械。

日本步武泰西 ,敢来侵犯 ,我仍以大一统之旧视之 ,不训兵备。……天文地理、盖复茫茫 ,即能勇敢 ,已不能当此世变矣。……我师之败 ,虽将士不力 ,以器械不精 ,故胆气不壮 ,有以致之。^③

旧学熏陶出来的军队 ,将兵皆成乌合 ,旧学者即愚昧之学也。

基于上述种种弊端 ,甲午战争以后维新派以开拓者的锐气 ,向封建主义传统文化展开了猛烈的挑战 ,无情的批判。

① 康有为 :《康南海自编年谱》,丛刊《戊戌变法》(四),第146页。

② 康有为 :《上清帝第五书》,丛刊《戊戌变法》(二),第191~192页。

③ 康有为 :《上清帝第三书》,丛刊《戊戌变法》(二),第169页。

谭嗣同在南京任江苏候补知府期间,于光绪二十三年著《仁学》一书,对传统文化发起了全面的攻击。谭嗣同痛斥中国二千年来封建专制主义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残暴统治。他说:

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相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①

短短数语把封建统治者与传统文化相互利用,奴役人民的关系全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激起人们对封建传统文化的鄙视和憎恨。谭嗣同不仅是一位富有牺牲精神的维新志士,而且也是一位批判封建传统文化的勇敢斗士。

刊物丛生,学会林立,这是甲午战争以后思想界新面貌的第四个标志。

266

据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一书中的记载,甲午战争以后至戊戌变法期间,国内外设立的学会、学堂及报馆共五十一所,其中学会二十四所,学堂十八所,报馆七所,书局二所。另据李提摩太在《留华四十五年记》一书中说,在光绪二十一年到二十三年(1895—1897)的二年间,中国各地出现的报纸由十九种增至七十种。

在众多的学会和报纸刊物中,以强学会和《中外纪闻》影响最为深广。康有为在发动《公车上书》以后,为了交流维新变法思想,介绍西方国家情况,于光绪二十一年六月(1895年7月),他自己出资在北京创办了《中外纪闻》报,由梁启超、麦孟华协同主笔。《中外纪闻》报的形式类似“邸报”(清

^① 《谭嗣同全集》第337页。

廷官报 载谕旨、奏章) ,二日出一册(木刻版)^①。康有为托发送“邸报”人挟入《中外纪闻》,分送在京官员,不收报费。最初,守旧派官僚不知《中外纪闻》报之由来,有人揣测出自总理事务衙门,也有人揣测出自外国使馆。后来他们知道出自康有为在京寓所南海会馆,无不大为震惊。《中外纪闻》报以编译西电西报,介绍西方国家政治、经济情况为主要内容,意在广开知识视野,以帮助封建士大夫了解国外政事风俗。每次约发行二三千份,至光绪二十二年被封禁。

康有为一面创办报纸,一面组织学会,作为维新派人士宣传和交流变法的阵地。光绪二十一年七月,他同文廷式、陈炽组织强学会,推举陈炽为强学会负责人,张孝谦副之。参与者除了维新派之外,也有一些官僚大员者,成员比较复杂。由康有为起草序文和章程,在序文中首叙国际形势,继而指出守旧必遭亡国灭种之惨祸,号召仁人志士积极推进变法以救国家。序文言辞激昂,爱国之心催人落泪。强学会每十日集会一次,每次均有人演讲,介绍推荐新译西方书刊,并筹备北京琉璃厂开办一个大图书馆。强学会活动频繁,内容丰富,思想活跃,成了维新派推进变法活动的重要场所。

《中外纪闻》的出版和强学会的成立并且影响越来越大,守旧派官僚大为震动,京城谣言四起,攻诬奏章接二连三。陈炽、沈曾植等劝康有为离京暂避,以免遭受不测之祸。这样北京的报纸和学会由梁启超主持,康有为于八月二十九日(10月17日)离开北京到达上海。他到了上海以后,便积极

^① 《中外纪闻》报,初名为《万国公报》,因与外国传教士在上海所办的《万国公报》同名,被诘后乃从四十六期起改为《中外纪闻》报。

开展维新变法的宣传活动,着手建立上海强学会,并发布章程,指出:“本会专为中国自强而立。以中国之弱,由于学会之不讲,教之未修,故政法不举,今者鉴万国强盛弱亡之故,以求中国自强之学。”^①章程规定了译印图书、刊布报纸、设图书馆及开博物院四项任务。一些维新名士如张謇、陈三立、章炳麟、汪康年、黄遵宪等纷纷入会,还出版《强学报》,会务日益发达。

学会组织的建立、报刊的创办,维新舆论日炽一日,引起了顽固派官僚的不安。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1896年1月)李鸿章的亲家御使杨崇伊上奏章攻击强学会“植党营私”;《中外纪闻》报贩卖西学,请旨查禁。慈禧太后强迫光绪帝发谕旨下令封闭强学会,《中外纪闻》报也被禁止发行。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也被两江总督张之洞查禁。

上海强学会被解散以后,康有为回到广州,先后游历香港、澳门。在澳门创办了《知新报》、在广西桂林组织了“圣学会”,维新变法的宣传鼓动在南方活跃起来。

光绪二十二年,黄遵宪、汪康年等以上海强学会的余款筹办《时务报》(旬刊),电邀梁启超赴沪任主笔。是年七月《时务报》在上海发刊,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以敏捷的眼光,新颖的风格、犀利的笔调大力宣传维新变法的主张,受到社会各方面人士的欢迎,几个月间《时务报》销行达万余份,对于造成变法舆论和维新气氛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光绪二十三年(1897)谭嗣同在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等倾向维新变法的方官僚支持下,先后设立了时务学堂、南学会、武备学堂等维新派组织,还创办了

^① 《皇朝经世文新编》第26卷,第7页。

《湘学新报》、《湘报》,湖南地区的新政也逐渐推行起来,变法维新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成为全国维新气氛最热烈的省份。

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1898年1月5日),康有为为了继续强学会的未竟之业,在北京邀请广东旅京人士二十余人组织粤学会。即着林旭组织闽学会、宋伯鲁组织关学会、杨锐组织蜀学会、杨深秀组织陕学会。其他如湖南、浙江、江西、直隶、云南、贵州等省旅京人士也纷纷组织学会。首都北京维新变法气氛日趋浓厚,新思想、新观念流行时尚。是年春夏之交,康有为召集赴京会试的各省举人,组织保国会,大事宣传维新思想,“爱国之忱,当为天下所共与”。^①三月二十七日(4月17日)保国会在北京南横街粤东会馆召开首次大会,与会者有京官及各省举人二三百人,康有为在会上慷慨演讲,痛陈国家遭灾,人民受难的种种现状。他指出:

吾中国四万万人民,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割宰,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加以圣教式微,种族沦亡,奇惨大痛,真不能言者也。^②

这次集会上还通过了康有为起草的保国会章程,明确宣布成立保国会的原由:

本会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以冀保全,名为保国会。^③

① 《京中士大夫开保国会》,《国闻报》1898年5月7日。

② 康有为:《三月二十七日保国会上演讲会辞》,《国闻报》1898年5月29日。

③ 《康有为:保国会章程》,《国闻报》1898年5月7日。

保国会的宗旨是：保国、保种、保教，即保全国家之政权土地，保人民种类之自主，保中国圣教之不失。在保国会的影响下，保浙会、保川会、保滇会等等似雨后春笋地在各地出现，“乃汇集同志，聘请豪勇军师，以研究体育之学，其能备资者，或入外国海陆军学堂。”^①学会、报刊林立丛生，标志着近代知识分子群体政治上的成熟，他们由分散的各抒己见发展为有组织有目标的进行维新变法的准备活动。全国各地维新变法的川流河渠汇聚成澎湃波澜，推行变法，革新政治已成为不可阻挡之势。

甲午战争以后，政治危机的加深与思想的活跃，成为反比，在思想界的太空群星灿烂，维新变法乃是聚群星之银河，新思维、新观念，层出不穷，形成中国近代史上知识分子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在维新派人士的推动下，变法舆论已经造成，变政革新为万众之呼声，黎民之愿望。光绪帝所以能在短短的一百零三天时间里，迅雷般地推出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的一揽子改革项目，这是由于日益高涨的救亡图存运动的有力促进所致。维新派人士所发出的种种呼吁和建议，以及介绍西方国家的治国之术，变政之道，极大地丰富和充实了光绪帝颁布变法诏令的内容。全国思想界的新面貌，是百日维新的强劲动力，也是光绪皇帝新思想的源泉。

第二节 支持变法要求，保护维新派

中日战争以后，关于维新变法的宣传在思想界蔚成风

^① 欧矩甲：《论政变为中国不亡之关系》丛刊《戊戌变法》（三），第157页。

气。对于维新派的变法要求,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两位最高主宰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慈禧太后代表顽固派势力,持以压制和打击的态度;光绪帝代表改革派势力,持以支持和保护的态度。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的签名运动,标志着变法革新进入了酝酿阶段,维新派空前活跃。这时,光绪帝的变法意识也在不断增强,他同维新派思想上越来越合拍,维新派的变法要求不仅得到光绪帝的支持,而且许多方面被光绪帝接受和采纳。

康有为是维新派的首领,他从光绪十四年至光绪二十四年四月(1888年10月~1898年6月)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前的十年间,先后七次上书光绪帝,系统地、完整地提出了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的政治纲领和经济措施以及变法步骤,凡光绪帝能够见到的《上皇帝书》,他都给以热情赞扬和支持。

271

光绪十四年五月(1888年6月)康有为应朋友张廷秋之约,游览京师(是年正值顺天乡试)。九月(10月)第一次向光绪帝上书,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政治主张,要求清政府变法图强。布衣书生“上皇帝书”乃史无先列,一些官僚莫敢代呈传递,因而阻格不得上达。

光绪二十一年(1895)康有为赴京参加会试,正逢中日谈判签订《马关条约》的时候,康有为联络各省举人,发动了著名的《公车上书》运动,有一千三百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请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提出了维新派的政治主张,也因被阻格,未能呈上。

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以后,清统治集团并没有吸取教训,更不想改弦更张,“和议既定,肉食衮衮,举若无事,其一、二稍有人心者,亦以为积弱至此,天运使然,无可如何,太息

而已。”^①然慈禧太后对清统治政权更加严密控制，“皇帝每遇国事之重要者，必先禀商太后，然后降谕”。^②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清朝实权派“静居”深宫，麻木不仁。维新派目睹战后的瓜分浪潮，认为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中国速图自强仍有救亡图存之望。为此，康有为再次于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十一日（1895年6月3日）以进士身份写了一万三千多字的《上皇帝书》（即《上清帝第三书》），提出了自强雪耻的富国、养民、教士、治兵四策，并且要求光绪帝破格提拔人才，充实清朝统治机构。“所以审端致力者，则在乎求人才而擢不次，慎左右而广其选，通下情而合其力。”^③建议光绪帝组成和扩大亲信圈子，作为维新图强助手进而推行变法措施，表达了维新派人士要求参预政事的渴望。这次上书由都察院转呈，终于冲破了守旧官僚的阻格，光绪帝第一次见到了维新派的上书，思想上深受感触。康有为向光绪帝痛心疾呼！

近者朝鲜之衅，日人内犯，致割地赔饷，此圣清二百余年未有之大辱，天下臣民所发愤痛心者也。然辱国之事小，外国皆启觊觎，则瓜分之患大；割地之事小，边民皆不自保，则瓦解之患大，社稷之危未有若今日。然殷忧所以启圣，外患所以兴邦，为安为危，仍视皇上之措置而已。^④

字字句句肺腑衷言，扣住了光绪帝的心弦，过去曾在朝廷官僚的章奏中光绪帝见到过言辞慷慨的变法呼吁，“中外臣工

① 徐勤：《杂记》，《南海先生四上书记》上海时务报馆1895年版，第3页。

② （英）濮兰德，白克浩司：《慈禧外记》第123～124页。

③ 康有为：《上清帝第三书》，丛刊《戊戌变法》（二）第171页。

④ 《上清帝第三书》，丛刊《戊戌变法》（二）第166～167页。

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①而今康有为涵义深刻的上书,出自一位刚举进士的民间布衣之手,表达了大清臣民的心声,光绪帝为之增强了变法图强的紧迫感,所以他对这份上书采取了明确的支持态度,表示“嘉许”之外,且命阁臣录副三份,分别送至慈禧太后、各省督抚、军机处、勤政殿。光绪皇帝同维新派在思想上开始沟通起来了。不久,光绪帝于闰五月十三日(7月5日)发出了“举人才”的上谕:“著各部院堂官,及各直省将军督抚等,于平日真知灼见,器识搢通,才猷卓越,究心时务,体用兼备者,胪列事实,专折保奏。”^②很显然,光绪帝“举人才诏”是接受了康有为“求人才而擢不次”的请求而发的,意在开通维新变法的仁人志士议政参政的道路,这是光绪帝同维新派从思想上的沟通进而转为组织上的结合的一个重要步骤。其时,帝师翁同龢对于光绪帝处于无权地位非常不安,而朝廷要员在甲午战争和签订《马关条约》这两大事件中均亮出了他们的立场,可以信赖的帝党成员剩下无几,光绪帝是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所以也希望朝廷能够在改革国政中充实一些“真知灼见,器识搢通”的人才,以扩大光绪帝的权力。当翁同龢得知光绪帝“嘉许”康有为的上书,他非常高兴,特意走访这位新的进士,不巧未遇。康有为受宠若惊,立即造翁府回拜,两人反复议论变法事宜,康有为“极陈列国并争,非改革不能立国之理”,^③并要求翁同龢“力任变法、推见贤才”。经过这一席谈话,翁同龢对这位维新派首领的才识十分称颂:“与君虽新见,然相知十年,

①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四),总第4094页。

② 《清德宗实录》第369卷,第12页。

③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丛刊《戊戌变法》(一)第250页。

实如故人，姑为子言，宜密之。上实无权，太后极猜忌。”^①推心置腹，一见如故。翁同龢从康有为那里获得许多变法维新的理论，思想大为开窍，“自是翁议论专主变法，比前若两人焉。”^②并且当即把康有为的著作拿去仔细研究。翁同龢筑起了光绪帝与维新派之间的联络桥梁，这条热线的建立，光绪帝精神为之振奋，维新派的变法宣传备受鼓舞，爱国热情更加高涨。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康有为又来到北京，进呈了《上清帝第五书》，^③言辞比以前几次尤为激烈，择其要点如下：

“为外衅危迫，分割将至，急宜及时发愤，革旧图新。……”以为若不及时图治，数年之后，四邻交逼不能立国。已而东师大辱，遂有割台赔款之事，于是外国蔑视，海内离心，职（康有为自称，下同——引者）忧愤迫切，谬陈大计，及时变法，图保疆图，妄谓及今为之犹可补牢。如再作徘徊迟疑，苟且度日，因循守旧，坐失事机，则外患内讷，间不容发。迟至期月，事变之患，且及可致，后欲悔改不可收拾。……

“三年来泰西专以分中国为说，报章论议，公托义声，其分割之图，传遍大地。……英国太晤士报论德国胶事，处置中国极其得宜，譬犹地雷四伏，药线交通，一处火燃，四面皆应，胶警乃其借端，德国固其嚆矢耳。

……

“蚁穴溃堤，衅不在大。职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

① 《康南海自编年谱》丛刊《戊戌变法》（四）第132页。

②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丛刊《戊戌变法》（一）第250页。

③ 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是在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初八日上呈，被守旧官僚阻格。

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

“殷忧所以启圣,外患所以兴邦,不胜大愿。伏愿皇上因胶警之变,下发愤之诏,先罪己以励人心,次明耻以激士气,集群材咨问以广圣听,求天下上书以通下情,明定国是,与海内更始。……

“夫今日在列大竞争之中,图保自存之策,舍变法外别无他图。”^①

这份上书充分表达了他要求光绪帝迅速变法图强的迫切心情,也是当时维新派的共同呼声和对光绪帝的殷切期望。以变法求自强,以自强求生存,这是爱国思想的具体要求,可是这份充满爱国热忱的“上书”,又遭守旧官僚的压制,未能及时地呈递给光绪皇帝。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虽被阻格未能到光绪帝手中,然却为京师许多官员转相传抄,天津、上海的报纸也把它透露出来,上海大同译书局很快印了单行本,长沙《湘报》全文刊载。由康有为所阐发出来的维新派变法思想,顿时传遍各地,凡是读过《第五书》的爱国人士都为之深受感动。有人记述当时情景说:“康工部有为五次上书,为大僚所格,未达九重。原文传布,登沪报章,展阅一周,言有过于痛哭者。”^②上书的主要内容通过主张变法的在京官吏传到光绪帝那里,对此引起了极大的注意,表示要召见康有为,亲自听听他关于变法的见解。墨守“祖宗成法”的恭亲王奕訢则以“本朝成例”把康有为挡住。甲午战争以后,奕訢复出掌握军机处、总理事务衙门大权,是慈禧太后控制光绪帝

① 丛刊《戊戌变法》(二),第188~195页。

② 谭献:《复堂记续录》,丛刊《戊戌变法》(一),第536页。

的一只黑手,严重地阻碍着变法运动的展开。因为奕訢的阻挡,光绪帝只好改变方式,命总理衙门大臣传话康有为,询问变法救亡事宜。光绪帝采取这一变通办法,一方面表明他不敢打破旧制的软弱态度;另一方面以“传话”形式,同维新派建立起直接的联络,说明他变法决心已经下定,没有因顽固派抬出“本朝成例”而发生动摇。

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的内容传到光绪帝那里,已经是年终岁末了,次年正月初三日(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1月24日)康有为就被召至总理衙门“问话”,这是很不寻常的事情。照例,朝廷公事均在正月初五日以后才开始办理,而今却打破“成例”,新年伊始在年假期间光绪帝就命总理衙门“问话”,不仅表现出他对维新派变法要求的重视和支持,而且也是对阻挡他召见康有为的恭亲王奕訢的回击和对“本朝成例”的挑战。

“问话”是在总理衙门西花厅里进行。主持“问话”者有总理大臣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廖寿恒和张荫桓五人,恭亲王奕訢、庆亲王奕劻没有到场。这五位大臣均是清廷第一流要员,“问话”级别应该讲是相当高的了,可见光绪帝一开始就以慎重其事的态度对待维新派人士。

这次“问话”实际上是一场变法与反变法的辩论,五大员中顽固派占了优势,但由翁同龢在场,光绪帝就能及时听到康有为关于变法的见解。

荣禄先发制人曰:“祖宗之法不能变”。

康有为即以尖刻的言辞对之曰:“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祖宗之法乎?即如此为外交之署,亦非祖宗之所有也。因时制宜,诚非得已。”康有为反唇相讥这些口口声声“守祖宗成法”的不肖满洲子孙,丢了祖

宗之地 , 还有何脸可谈 “守祖宗成法 ” 呢 ? 顽固派头子荣禄被猛击一闷棍之后 , 哑口无言 , 旁若木鸡。

接着是廖寿恒问 : “ 宜何变法 ? ”

康有为胸有成竹地对曰 : “ 宜变法律、官制为先 ”。把政治体制的改革放在变法的首位 , 深深地刺痛了顽固派的要害 , 如此变法 , 依仗慈禧太后势力的一帮子顽固派大官僚当首先被新政所废汰。

另一位顽固派主将李鸿章气急败坏地质问康有为说 : “ 然则六部尽撤 , 则例尽弃乎 ? ” 则例乃是封建王朝的宪章 , “ 尽弃则例 ” 就是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制度 , 这顶帽子可谓大矣 , 维新派真是罪该万死 !

康有为针锋相对 , 寸步不让地反驳说 : “ 今为列国并立之时 , 非复一统之世 , 今之法律官制 , 皆一统之法 , 弱亡中国皆此物也 , 诚宜尽撤。即一时不能尽去 , 亦当斟酌改定 , 新政乃可推行。康有为认为旧法弊端种种 , 不弃旧法 , 何行新政。李鸿章被驳得无话可再问了。

翁同龢对变法颇感兴趣 , 但他关心的是变法必须解决清政府枯竭的财政状况 , 所以他提出的是实际问题 , 发问曰 : “ 筹款之法如何 ? ”

康有为答曰 : “ 日本之银行纸币 , 法国印花 , 印度田税 , 以中国之大 , 若制度既变 , 可比今十倍。意思是只要改革赋税制度 , 必能广开财源。

最后 , 康有为把酝酿已久的变法方案向总理事务大臣全面阐述 , 亮出了维新派对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进行变法的系列意见。^①

^① 《唐南海自编年谱》, 丛刊《戊戌变法》(四), 第140页。

这次“问活”是维新派人士直接向朝廷陈述政见的好机会,康有为满怀新政,侃侃而谈,表现出维新派人士的胆略和才识,顽固派在他面前现出了一副庸臣守旧的蠢相,相形之下说明维新派代表的是一股充满生机的社会思潮。

“问活”的第二天,翁同龢马上把问话情形向光绪帝作了详细的报告,并把自己对康有为才识的钦佩向光绪帝推荐说:“康有为之才过臣百倍,请皇上举国以听。”^①这次“问活”不久,光绪帝见到了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的正文疏折,“书上,上嘉纳之。”^②由于帝师翁同龢在光绪帝面前对康有为才识的称颂,光绪帝对维新派人士产生了信任感,表示要向他们随时“询问天下大计,变法之宜,并令如有所见及有著述论政治者,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进呈。”^③康有为便将他的近著《日本变政考》、《俄皇大彼得变政考》等书,通过总理衙门,进呈给光绪皇帝。

通过这次“问活”,开通了光绪帝同维新派人士的联络渠道,使光绪帝的维新意识得到长进,从此不断地接受维新派介绍西方国家的治国富民之术,采纳维新变法的要求,为日后推出变法项目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和养料。同时,这次“问活”也为维新派人士步入政坛开启了门户。总之,这次“问活”以及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无论对于光绪帝还是对于维新派都是一件大事情,它加速了维新变法的进程。

事后,光绪帝潜心研读了康有为的上书,尤其对于其中的一些警句,如,“四邻交逼不能立国”,“外患内讧,间不容发”,“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煤山前

①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10页。

②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四),第4017页。

③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四),第4017页。

事”等话语,使光绪帝颇受感触,“忧危之心”油然而生,图强之念“肃然动容”。他当即对着军机大臣发出感叹:“非忠肝义胆,不顾生死之人,安敢以此直言陈于朕前乎!”因而光绪帝对康有为等维新人士“倾心向用”,^①决心依靠他们加速推进变法图强运动。

正因为光绪帝支持维新派的变法要求,经过康有为等人的不懈努力,以及主张变法的清朝官僚翁同龢等人的大力帮助,皇帝同维新派之间不仅思想沟通,政见共识,而且建立了一条联络热线。在光绪帝的支持下,光绪二十三、二十四年之际,鼓动变法的各种学会和报纸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维新图强的宣传运动如火如荼地广泛展开。群众性的变法热潮对顽固派是一场无情的挑战,实行变法推行新政,必将动摇他们的地位与权势。面临维新浪涛的冲击,顽固派惶惶不可终日,他们纷纷跳将出来攻击维新运动和“保国会”等变法学会,妄图把维新变法势头遏制下去。他们弹劾“保国会”是“聚众不道”的非法组织,御史文悌上奏折弹劾康有为“专主西学,欲将中国数千年相承大经大法一扫刮绝”。攻击“保国会”“名为保国,势必乱国”,“欲保中国四万万人而置我大清国于度外。”^②大学士刚毅也认为“改革者汉人之利而满人之害也。”^③这些满洲贵族,顽固地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上来观察维新变法运动,故持以与新法誓不两立的态度,咬牙切齿地表示要对维新派人士加以严励镇压。在变法运动刚刚推开的关键时刻,顽固派掀起了一股疯狂攻击维新运动的逆流。光绪帝支持变法的立场非常鲜明,针对顽固派

①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丛刊《戊戌变法》(一),第250页。

②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四)第4118页。

③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丛刊《戊戌变法》(一),第268页。

的种种攻击,明确表示“会为保国,岂不甚善”。^①接着又把顽固派的弹劾奏折驳了回去,顶住了这股遏制维新运动的逆流,保护了维新派人士免遭镇压,推进了变法运动的发展。

第三节 颁布《明定国是诏》 揭开维新变法的序幕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日康有为总理衙门“问话”至四月二十四日(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的四个多月期间,朝廷上下,维新变法的锣鼓越敲越响亮,越敲越激烈,光绪帝锐意变法,已是不可阻挡的趋势。

自从总理衙门“问活”以后,康有为备受鼓舞,精神振奋。他以为一个布衣书生(不久前举进士)、“万里浮海”,来到京师“荷蒙皇上不弃佩莩,特命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传询,问以大计,复命具折上陈”,这是“万朝未有之异数,而大圣人采及葑菲之盛德也”,^②因而对变法更是踌躇满腔,大有受宠若惊的势头。接着他频频上书,不断给光绪帝施加维新变法的力度。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八日(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向光绪帝上了《应诏统筹全局折》(即《上清帝第六书》),在这个奏疏中康有为阐述了中国必须变法的道理,他例举世界上守旧不变的国家如波兰、土耳其、埃及等没有一个不沦于亡国的事实,痛陈当前的中国“虽无亡之形,而有亡之实,”与

^① 《康南海自编年谱》,丛刊《戊戌变法》(四),第143页。后来在四月二十八日(6月16日)光绪帝接见康有为时康“谢保国会被疎,上为保全之恩,上皆点首称是。”(同上书第147页)

^② 《应诏统筹全局折》,丛刊《戊戌变法》(二),第197页。

亡国无异。他指出世界各国的趋势是“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康有为以近邻日本为例,认为他们的变法最“易于临摹”,希望光绪帝“莫如取鉴于日本之维新”。以日本为中国维新变法的楷模,走明治维新的道路,国家就有图强自立的希望。他即着向光绪帝介绍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基本方法:

日本之始也,其守旧攘夷与我同,其幕府封建与我异,其国君守府,变法更难。然而成功甚速者,则以变法之始,趋向之方针定,措置之条理得也。考其维新之始,百度甚多,惟要义有三:一曰大誓群臣以定国是;二曰立对策所以征贤才;三曰开创制度局而定宪法。

那末中国得怎样“鉴于日本之维新”呢?康有为向光绪帝建议:

皇上若定变法,请先举三者:大集群臣于天坛太庙,或御乾清门,诏定国是,躬申誓戒,除旧布新,与民更始;……一定定舆论论设上书所于午门,……许天下士民,皆得上书。其群僚传言事,或许自达,无得由堂官代递,以致阻挠。有称旨者,召见察问,量才擢用,设制度局于内廷,选天下通才数十人,入直其中,……皇上每日亲临商榷。……重定章程,然后敷布施行,乃不谬紊。”

以上建议中,康有为认为设立制度局尤为重要,现今六部九卿司道大多是守旧官吏,如果依靠他们主持新政,必将窒碍难行。因之,设立制度局为总揽新政的枢纽,“既立制度局总其纲,宜立十二局分其事。”^①一曰法律局、二曰度支局、三曰

^① 以上引文均见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丛刊《戊戌变法》(二),第179~201页。

学校局、四曰农局、五曰工局、六曰商局、七曰铁路局、八曰邮政局、九曰矿务局、十曰游会局、十一曰陆军局、十二曰海军局。

康有为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中,指出了中国维新变法的方向和变法的基本内容,可谓是光绪帝“百日维新”时期的变法纲领。在进呈《统筹全局折》的同时,一并呈递了他的近著《日本变政考》和《俄大彼得变政考》两书,供光绪帝参照变法。光绪帝对于《统筹全局折》极为重视,尤其对日本明治维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国体民情与中国有许多相似之处。鉴于日本之明治维新,乃是近水救近火的方便之举,因而他决定把日本作为中国进行变法的模式。求知似渴的光绪帝便着手研究日本国的历史和现状。他得知湖南按察使黄遵宪著有《日本国志》一书,便两次催促翁同龢进呈该书。翁同龢在日记里写道:“廿三日……见起二刻余,上向臣索黄遵宪日本国志,臣对未洽,颇致诘难。”第二天又记着:“廿四日……是以日本志两部进呈。”^①此外,张元济在回忆当时情况时也说:“光绪喜欢看新书,……那时候黄遵宪做了一部《日本国志》,光绪指名要这部书看,也是由我送进去的。”^②与翁同龢日记所载完全吻合。光绪帝把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同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参照研究,试图从日本明治维新中找到清朝维新变法的道路。根据学者的考证,康有为先后著有《日本变政考》和《日本变政记》两书,首先向光绪帝进呈的是《日本变政考》一书。^③笔者认为

①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廿三、廿四日。

② 张元济:《戊戌政变的回忆》,丛刊《戊戌变法》(四),第324页。

③ 王晓秋:《康有为的一部未刊印的重要著作——日本变政考评价》,载《历史研究》1980年3期。

第一次进呈的那部《日本变政考》就是康有为在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八日的《上清帝第六书》中所说的“命宣取臣所著日本变政考”。据《翁同龢日记》云：“(三月)二十三日……总署代康有为条陈折：变法片一件，岁科试考改去八股。并书三部：日本变政记、泰西新政摘要，各国振兴记命将康折……并及前两次折，并俄彼得变政记，皆呈慈(西太后——引者)览。”^①第一次进呈本《日本变政考》未经刊印，反收入1933年刊行的《故宫博物院殿本书库现存目录》中。^②至于第二次三月二十三日(4月13日)进呈的《日本变政记》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说：

时(指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引者)上频命枢臣催所著各国变政书乃昼夜将日本变政考加案于其上。凡日本事自明治元年至二十四年其十二卷，更为撮要一卷，政表一卷附之。每日本一新政，皆发一义于案语中。凡中国变法之曲折条理，无不借此书发之，兼该详尽，网罗宏大，一卷甫成即进上，上复催又进一卷。^③

康有为进呈的《日本变政记(考)》对“百日维新”有直接的影响，许多变法项目是康有为根据明治维新的内容结合中国的情况在按语中“发义”而提出的。所以光绪帝对康、黄所著关于日本的著作，爱不释手，“上皆深然之”，^④对颁布《明定国是》诏起了推动作用。

上面所讲康有为和黄遵宪的著作，加强了光绪帝锐意变法的力度，此时，在清统治集团的最高层中关于变法与反变

①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

② 马洪林：《康有为大传》，1988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第291页。

③ 《康南海自编年谱》丛刊《戊戌变法》(四)，第150页。

④ 《康南海自编年谱》丛刊《戊戌变法》(四)，第150页。

法的斗争也由潜在趋向表层。光绪帝日益感到“若不变法图强,社稷难资保守,”但每次向枢臣提出维新变法,顽固派“辄以祖宗成法不可改,夷法不足效”加以反对。“惟大学士翁常熟(同龢)近年省吾大局,非变法难以图存”,坚决地支持光绪帝变法图强的各项部署,他草拟了变法“诏敕”十二条同恭亲王奕訢商量,可是遭到奕訢的抵制,并且还到慈禧太后那里抵毁翁同龢,“取悦于皇上,妄思改变成法,此肇乱之道,恐其蛊惑皇上,宜早防范。”^①引起了慈禧太后对翁同龢的猜忌与不满,等待时机准备用“清君侧”的办法,收拾这位光绪帝信赖的帝师。

四月十日(5月29日)恭亲王奕訢病死,清朝统治集团上层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奕訢是清宗室中辈份最高、地位最崇、权势最大的皇叔,他在世时,一方面站在满洲贵族的立场上顽固地反对光绪帝维新变法,是清朝推行新政的最大阻力之一;另一方面又反对慈禧太后废光绪帝的阴谋,“废立之举,恭王力持不可,西后亦无如何也”,^②无形中成了光绪帝皇位有力的维护者。奕訢之死,对光绪帝来讲,他推行变法减去了第一层障碍;对慈禧太后来讲,她可以更加为所欲为,采取废立之举,在这种情况下,皇帝与太后的斗争也就更加剧烈起来了。

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既是两种国家命运、前途的原则之争,也是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争夺最高统治权力之斗。奕訢死后,慈禧太后连日召见荣禄、奕訖、刚毅等满洲贵族,策划废立阴谋。光绪帝也同翁同龢、康有为等不断进行磋商,推

^① 注:以上引文均见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政记》,丛刊《戊戌变法》(一),第330~331页。

^②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丛刊《戊戌变法》(一),第260页。

行变法事宜,从变法中加强皇帝权力。因为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直接关系到光绪帝的政治命运,这一点他已经有强烈的意识,所以一贯对慈禧太后望而生畏的光绪帝,竟然以最大的勇气,亮出了向慈禧太后争权的姿态。他对当时实际主持清廷日常政务的庆亲王奕訢说:“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奕訢马上传话慈禧太后。鉴于全国维新变法的舆论,慈禧太后被迫向光绪帝作了有限度的退让,她怒冲冲地说:“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后来又无可奈何地表示:“由他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奕訢便以“太后不禁皇上办事”^①回复光绪帝。慈禧太后这种矛盾态度,反映了当时清廷内部变法斗争与争权斗争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局面。处在这种局面中的光绪帝的心态是冒险变法,破釜沉舟。对处在复杂局面下的光绪帝的心情,梁启超作过比较确切的分析。他说:

盖以坐听西后之纵肆守旧,地必尽割,而国偕亡。

与其亡国而为轶道之降,煤山之续,既丧国辱身,貽谤千古,不如姑冒险变法,幸则犹可望收政权而保国土,不幸亦可大开民智,而待之将来,中国或可存一线焉。^②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光绪帝不是把变法活动纳入他向慈禧太后收回权力的轨道,而是把收回权力作为推进变法的一个重要手段,致使这场斗争突破了清朝统治集团内部权力之争的内涵,毫无疑问,这是正义的斗争,有进步意义。

由于光绪帝锐意变法,态度坚决,总算从慈禧太后那里争得了有限的“事权”,为他一生中作出最显赫政绩提供了活

①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丛刊《戊戌变法》(一),第331页。

②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第147页。

动的舞台。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颁布了《明定国是》诏,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

谕内阁: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迨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槟除,众喁咷咷,空言无。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挺以挹坚甲利兵乎!

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竟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

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肄业,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特此通谕知之。^①

^① 《清德宗实录》第418卷,第15页。

从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四月二十三日)开始到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为止(6月11日到9月21日),变法活动进行了一百另三天,历史上称之为“百日维新”。

《明定国是》诏的颁布,标志着清政府推行新政的开始。“国是”者,国家大计方针也。“明定国是”,就是向朝廷内外、举国上下公布清政府的大计方针,因而《明定国是》诏实际上是光绪帝维新变法的宣言书。然而,《明定国是》诏的颁布既是光绪帝采纳维新派变法要求的产物,又是光绪帝向西太后争取部分“事权”的结果。所以《明定国是》诏首先表示光绪帝维新变法的决心,公布新政纲领,但是它又要能够通过慈禧太后“许假事权”^①的关卡以及不动摇满洲贵族的根本权利,因而“国是”诏其语辞不能有太剧烈的刺激性以免刺痛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派的心理,而且“国是”应限制在“不违背祖宗大法”的范围之内。

《明定国是》诏反映了光绪帝推行变法新政的指导方针:

1. 以维新变法为基本国策。“迺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上述诏令均为变法之举,“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如墨守旧章,“岂真能制挺以撻坚甲利兵乎?”中国非变法不可。

2. “变”是不可违背的历史趋势。中国的大经大法是可变的,“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变法乃古今有之。

3. 变法新政仍须遵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以圣贤之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

^①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丛刊《戊戌变法》(一),第331页。

者”。在这一原则下起用“通经济变”的人才,加强各级统治机构。

4. 变法新政自办好京师大学堂开始。大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及武职后裔,“其愿入学者,均准入学肄业,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

《明定国是》诏明确地表现出光绪帝推行新政的决心,他号召“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对维新派来说是莫大的鼓舞,因为他们酝酿已久的变法要求,从此正式作为国家的基本国策,维新变法取得了合法地位,维新派人人步入政坛,报效国家的门户已经开放。所以维新派说:“举明定国是之谕,举国欢欣”,^①凡有爱国思想的中国人,也从《国是诏》中看到改变国家面貌的一丝阳光,“臣民捧读感泣,想望中兴”。^②总之,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无论是维新派还是主张变法的清朝官僚,或者凡是具有爱国思想的“士庶”,全国上下,大喜所望,以欢欣鼓舞的热情注视着这位维新元首——光绪皇帝亲手揭开维新变法的序幕,与维新派的志士仁人共济时艰,谱写历史的新篇章。

第四节 频频召见维新派

《明定国是》诏的颁布刺痛了顽固派的中枢神经,因而反对变法的阴风阵阵袭来,扼杀维新运动的恶浪已经掀起。然

① 《康南海自编年谱》,丛刊《戊戌变法》(四),第144页。

② 国家档案馆:《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3页。

而,光绪亲自主持的维新变法运动处在背水一战的境地,他只有顶着逆流推进变法,施行新政,才能“可望收权而保国土”。光绪帝十分珍惜从慈禧太后那里争取得到的变法“事权”,决心要新政办出个“模样”来,以回敬顽固派的挑战。他在“百日维新”期间,频频召见维新派人士,共商变法大计,四月戊申(二十六日6月14日)发出上谕:

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奏保荐通达时务人才一折,工部主事康有为、刑部主事张元济,著于本月二十八日预备召见。湖南盐法长宝道黄遵宪、江苏补用知府谭嗣同,著该督抚送部召见。广东举人梁启超,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查看具奏。”^①

上谕中所列被召见者都是六品以下的小臣,梁启超还只是无品无职的布衣举人,光绪帝求贤若渴,不顾清朝皇帝不接见小臣的“家法”,毅然将这些小人物指名“预备召见”,这也是他变祖宗家法的一个方面。

首先被召见的是六品工部主事康有为和刑部主事张元济(此时张已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职)两人。四月二十八日(6月16日)光绪帝把召见两人的地点放在慈禧太后的眼皮底下颐和园的勤政殿,^②这是很微妙的安排,有其二种用意:一是表明皇帝堂堂正正召见维新派人士,不是搞“蛊惑皇上”的阴谋活动,以便消除慈禧太后的“猜忌”,也无须她的亲信劳驾去西太后那里打“小报告”。实际上也是为了康有为的安全考虑,因为他是清廷顽固派所注意的敏感人物,而且其时,帝师翁同龢因支持光绪帝变法而被慈禧太后革职

①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四),总第4096~4097页。

② 勤政殿于1903年改名为仁寿殿。

“开缺回籍”朝廷气氛已经非常紧张,为了让康有为不再遭到翁同龢的同样下场,所以作了这样的安排;二是光绪帝存心要在朝廷大小工臣面前显示出皇帝的“事权”和胆略,以示维新变法的信心。

这天康有为迎着熹微的晨光,清早来到颐和园在朝房听候召见。他知道这次召见至关重要,这是第一次面对面地向光绪帝陈述变法建议,无论对变法运动的进程还是对他本人的政治生涯都会产生极重大的影响,因而对所要陈述的意见,都做了充分的准备,所以当他步入森严的朝房显得踌躇满怀,精神格外振奋。在朝房康有为与顽固派荣禄不期而遇,这是不祥的征兆。“荣禄入对,即面劾吾辩言乱政矣”,荣禄抢先一步,于康有为召见前就在光绪帝面前发了一通抵毁康的言论。可是光绪帝对康有为的变法主见与才气已有了解,而荣禄对变法所持的反对立场光绪帝也很反感,所以荣禄的毁语没能改变光绪帝对康有为的印象。荣禄退出朝房之后,太监立即传康有为入对。现据《康南海自编年谱》,召见时的对话择其要点如下:

召见之初,光绪帝切询问康有为“年岁出身”,接着康有为向光绪帝陈辞,变法乃是当务之急要,“四夷交迫,分割洊至,覆亡无日”。在列强压迫和分割之下,中国随时都有亡国的危险。

光绪帝曰:“皆守旧者致之耳”。在康有为面前亮出了他厌恶顽固派的立场,表明他除旧布新,变法决心已不可动摇。

康有为顺着光绪帝的思路说:“上之圣明,洞悉病源,既知病源,则药即在此,既知守旧之祸败,则非尽变旧法与之维新不能自强”。指出医治守旧官吏疾病的良药就是维新变法,否则国家怎能自强呢!

光绪帝很有同感地说：“今日诚非变法不可”。

康有为接着说：“近岁非不言变法，然少变而不全变，举其一而不改其二，连类并败，必至无功。……今数十年诸臣所言变法者，率皆略变其一端，而未尝筹及全体，又所谓变法者，须门制度法律为改定。……臣请皇上变法，须先统筹全局而全变之，又请先开制度局而变法律，乃有益也”。把变法要领和盘托出。

光绪帝对康有为的变法建议，连连点头“上然之”、“上以为然”。表明在必须变法、必须全方位的变法，而变法先从制度法律的改革着手等一系列原则问题上，君臣取得了共识。

至于变法的部署，康有为胸有成竹地向光绪帝建议说：“臣于变法之事，尝辑考各国变法之故，曲折立宜，择其可施行于中国者，斟酌而损益之，令其可施行，章程条理皆已备具。若皇上决意变法，可备采择，但待推行耳。……”

光绪帝认为康有为所说：“然，汝条理甚详”。此时，光绪帝转目环视帘外，唯恐有人监视他与康有为的对话，并叹息地表示了自己的苦衷：“奈掣肘何！”

康有为很理解光绪帝事事受慈禧太后的掣肘而处于无实权的地位，又建议说：“就皇上现在之权，行可变之事，虽不能尽变，而扼要以图，亦足以救中国矣。”他认为光绪帝当前应该充分利用手中有限的权力，能变的先变，启开变法风气，足能使国家日臻自强自立起来。但是，现今的官僚大臣都是闭塞耳目不通外国情形的顽固分子，“皇上欲倚以变法，犹缘木求鱼也。”倚靠守旧官吏变法断断不能成功。

光绪帝很同意康有为对现今掌权大臣的看法说：“伊等皆不留心办事”。

康有为便应势利导地把话题引向破格擢用无权而又有才能的小人物方面，“……皇上欲变法，惟有擢用小臣，广其登荐，予之召对，察其才否？皇上亲拔之，不吝爵赏，破格擢用。方今军机总署，并已用差，但用京卿御史两官，分任内外诸差，则已无事不办，其旧人且姑听之，惟彼等事事守旧，请皇上多下诏书示以意旨所在。凡变法之事，皆特下诏书，彼等无从议驳”。意思是给现今朝臣旧僚以高官厚禄，使他们无失位的恐惧，他们也就不会阻挠新政的实施了，这样可减少变法的阻力。

光绪帝曰：“然”。

既然变法必须“全变”，那么康有为紧接着提出了废八股的要求，他说：“今日之患，在吾民智不开，故虽多而不可用，而民智不开之故，皆以八股试士为之。学八股者，不读秦汉以后之书，更不考地球各国之事，然可以通籍累致大官。今群臣济济，然无以任事变者，皆由八股致大位之故。……”

光绪帝觉得康有为说得有理，“上曰：然，西人皆为有用之学，而吾中国皆为无用之学，故致此。”

康有为又说：“上既知八股之害，废之可乎？”上曰：“可。”康对曰：“上既以为可废，请上自下明诏，勿交部议，若交部议，部臣必驳矣。”上曰：“可”。对于废八股，光绪帝连声称“可”，得出完全一致的看法，君臣愈谈愈契机，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光绪帝非常担心中国贫穷，变法筹款何从，他询问说：“方今患贫，筹款如何？”

康有为向光绪帝介绍说：日本开设银行，发行纸币，印度征收田税，都为国家筹到巨款。而中国地大物博，藏富于地，主要不是患贫，所患民智未开，更患变法不得其根本。若大

举筹款数万万,遍地筑铁路,训练民兵百万,购买铁舰百艘,建立水师学堂和船坞,在全国各地开设各类学堂,则一举而致国家富强。

然后,又谈了关于翻译外国书籍、派遣留学生、大臣出洋游历等等。顺此,康有为“因谢保国会被劾,上为保全之恩”。

最后,光绪帝以亲切的言辞叫康有为“汝下去歇歇”。

光绪帝召见康有为,进行了长时间的,涉及变法的方方面面的商榷。当康有为即要退下时,光绪帝仍有语不尽之意,又特地关照说:“汝尚有言,可具折条陈来。”并“目送之”。关于光绪帝召见康有为的时间,《康南海自编年谱》说:“逾十刻时”,为两个半小时。而与康有为同一天被召见的张元济在回忆当时情景时说:“大约一刻钟光景”。^①两人所说的召见时间差距悬殊,笔者认为两人所说的时间均有可疑之点。首先,康有为《自编年谱》是在光绪二十四年九月逃往日本后写成的,康氏为了把自己同光绪帝的关系写得更加密切一些,所以有意把召见时间说得长一点以显示他们君臣商谈内容广泛、认识默契,在通篇《年谱》中类似的笔法时有所见。其次,张元济所说召见时间“约一刻钟光景”也不够确切。谈话内容之多,一刻钟有何可谈。然张元济的回忆是在时隔半多世纪之后,时间难免含糊。而当时人们的时间观念也不象现人那样明确。所以两人所记的时间都不可确信。

光绪帝召见康有为的对话,是一次关于制订开展维新变法运动的方针和策略的商议,在这次对话中表明光绪帝是维新变法方针的制订者和推行者,而康有为则是维新变法的策划者,他们之间在“百日维新”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地位与

^① 张元济:《戊戌政变的回忆》,丛刊《戊戌变法》(四),第324页。

作用,主次分明,对话内容可以佐证。另外,在对活中也可看出光绪帝同维新派的密切关系,可谓是推心置腹,言无不尽。这次召见使光绪帝和维新派建立起直接的联系,并且给维新派有了“有言可具折条陈来”的方便,这样在光绪帝身边便形成了一个维新变法的“智囊团”,对后来变法运动的开展发挥了直接的作用。

关于光绪帝召见康有为事宜,《清德宗实录》仅简略一条,而《光绪朝东华录》稍有记载,对照之下《康南海自编年谱》所记之内容基本可信,现录以下:

(庚戌二十八日)“召见工部主事康有为了仁寿殿,上深以廷臣守旧阻疑变法为忧。康有为面奏,请皇上勿去旧衙门而惟增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惟擢小臣。多召见才俊志士,不必加其官,而惟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折奏足矣。彼大臣向来本无事可办,今但仍其旧,听其尊位重禄,而新政之事别责之子小臣,则彼守旧大臣既无办事劳,复无失位之惧,怨谤自息。即皇上果有黜陟之全权,而待此辈之大臣亦祇当如日本待藩侯故事,设为华族,立五等之爵以处之,厚禄以养之,不必尽去也。上然其言”。^①

就是从《光绪朝东华录》所载的内容来看,这是一次策略性很强的对话。康有为建议光绪帝对清廷守旧势力的策略是“勿去旧衙门”、“勿黜革旧大臣”、“厚禄以养之”,表面上看似向旧势力妥协让步,但在盘根错节的旧势力统治之下,这种妥协是必要的,也是积极的,目的是为了减少变法的阻力。然而,殊不知清朝旧势力决不会得到这些“优惠”政策而对维

^①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四),总第4097页。

新变法袖手旁观,他们的总后台慈禧太后却利用了守旧力量向维新派疯狂反扑,扼杀了维新运动,这是善良的人们所没有预料到的。

接康有为退下朝房之后,光绪帝又召见了刑部主事张元济,据他本人的回忆:

“在勤政殿旁边一个小屋里召见。……当时滇越边境发生划界的争执,光绪对我说:‘我们如果派人到云南去,要二个月才会走到,但外国人只要十天八天就会到达。我们中国道路不通,一切落后,甚么事都赶不上外国,怎么好和人家办交涉呢?’我说:‘皇上现在励精图治,力求改革,总希望国家能够一天比一天进步。’他听了之后,叹口气说:‘可是他们都不赞成呀!’我当时听他说这句话,心里觉得这位皇帝也够可怜了,也不便再说什么。光绪帝就把话头转到我们所办的通艺学堂上去。

……光绪帝对外边的事很熟悉,知道我们在办学堂。那天他就问到学堂的情形,我就把学生人数及所学科目告诉他,后勉励我几句说:‘要学生好好的学,将来可以替国家做点事’。他还问我一些关于总理衙门的事”。^①

康有为和张元济于同日召见以后,光绪帝即命康有为“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②总理衙门章京和他原来的工部主事其品秩均为六品官,无所升迁。其原由:一是在召见对话时康有为曾向光绪帝建议过“惟擢小臣”,“不必加其官”,所以在同一品秩内转用;二是荣禄在光绪帝前对

① 张元济:《戊戌变法的回忆》,丛刊《戊戌变法》(四),第324~325页。

② 《清德宗实录》第418卷,第19页。

康有为谤毁了一番,光绪帝考虑到避免引起顽固派的“怨谤”,故不授以更高的官衔。然而,从工部主事转至总署章京,从其衙门职掌来讲,这一变位,让康有为向光绪帝靠近了一大步。尤为要紧的是光绪帝授其“专折奏事”的权力,为康有为随时均可顺理成章地向光绪帝献计献策和沟通各方信息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这是光绪帝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决策,实际上是对清朝惯例的一个突破,照例六品以下的小官,不能直接向皇帝上疏,其奏疏必须经过四品以上本部院京堂呈递。所以梁启超说:“康有为以主事被召见,已为咸丰以来四十余年未有之创举。若以主事专折奏事,尤为国朝旷典所无”。^①

光绪帝在召见康有为、张元济之后不到二十天的时间,于五月十五日(7月3日)在故宫乾清宫养心殿东暖阁又召见了另一位维新派的知名人士梁启超。按照清朝典章四品以上的官员才有资格被皇帝召见,尔今梁启超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布衣举人受宠被召,光绪帝锐意变法求贤若渴的迫切心情可以想见。五月十五日清晨梁启超来到紫禁城等候召见,早朝以后由太监引入东暖阁。光绪帝对梁氏的杰出才华和维新变法政见已经在他的论著中有所了解,侍读学士徐致靖的奏折里也盛赞梁启超“英才亮拔,志虑精纯,学贯天人,识周中外”^②,所以他对梁氏也期重望。可惜梁启超较浓厚的广东乡音影响了与光绪帝的思想交流,梁氏事先也估计到这一不便,故随身携带了他的论著《变法通议》,面呈光绪帝。《变法通议》是梁启超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陆续在上海

① 梁启超:《戊戌变政记》第153页。

② 转引自陈占标等《一代奇才》,花城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141页。

《时务报》上发表的论文,有《自序》、《论不变法之害》等十二编,以进化论观点论证人类社会的变革,提出变法先“变人”和实行君主立宪制等主张,文字生动,寓意深刻,是维新运动中的重要著作,对光绪帝筹划维新,部署变法也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召见之后,光绪帝“赏给举人梁启超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① 光绪帝不仅破例地召见布衣举人,并且还赏给六品衔,相当于会试二甲进士或六部主事的官职,这又是一次“为国朝旷典所无”的创举。光绪帝对维新派的信赖和器重,确有“不具一格用人才”的气魄。

七月,谭嗣同“扶病入勤,奏对称旨,擢四品卿军机章京”。^②

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发出上谕,“预备召见”或“来京引见”的维新派人士有:康有为、张元济、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陈宝琛、杨锐、刘光第、严复、林旭等人,对这些维新派人士光绪帝均赏以品衔或委以办理变法事务、或派驻国外为清廷使节。

光绪帝自四月二十三日颁布《明定国是》诏以后,频频召见维新派人士,视维新志士仁人为变法中坚力量,并且准备逐渐形成一套推行变法的班底,将来为清朝中枢要员以取代那些守旧官僚。对此,梁启超也有高度评价,他说:

“国朝立法,每日必召群臣,不问寒暑,皇上求才若渴,海内豪俊,日有荐举。每日除枢臣大臣及值员外,召见荐举人才,垂问勤勤,或过一二时许,称旨擢用,拟开懋勤殿以谋议制度,用外国通才以备充顾问。考数月内

① 梁启超:《戊戌变法纪事本末》丛刊《戊戌变法》(四),第316页。

② 陈乃乾:《谭嗣同年谱》丛刊《戊戌变法》(四),第180页。

荐举之多,为国朝所未见。”^①

尽管被召见者所赏的品衔较低,这是因为旧势力的阻力不易被顷刻冲破,而光绪帝身边又无得力的德高望重的朝廷要员为助手,在中央支持变法的官员寥寥无几。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光绪帝仍敢于冲破成例,同慈禧太后反对变法的逆流对着干,频频召见维新派人士表明他对施行新政,胸有全局,从长计议。

第五节 推出一揽子变法项目

自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颁布《明定国是》诏的那一天起,光绪帝连连推出了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方面的一揽子变法项目。几年来维新派的变法舆论,终于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从舆论转变为运动的关键在于光绪帝“深观时变,力图自强”^②的坚定态度。他作为君临天下的一国之主,站在这场运动的前列,指挥着这一伟大的历史变革,他是巨舰航海中的舵手,维新变法的实际主持者。

在短短二、三个月时间里,维新变法的诏令,谕旨雪片似地飞出皇宫飘向全国各地。阴森森的紫禁城里卷起了“除旧更新”的热潮,光绪帝身居深宫,胸怀全国,他日理万机“日昃勤政”,“鸡鸣而起,日晡乃罢。……端坐穆思前日之折,斟酌施行,退朝则考读西法新政之书,日昃不遑”。^③清王朝的神经中枢重新放射出振奋人心的异彩,其影响冲击着几千年来

① 梁启超:《光绪圣德记》,丛刊《戊戌变法》(一),第310页。

②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戊戌变法档案材料》第164页。

③ 梁启超:《光绪政德记》,丛刊《戊戌变法》(一),第310页。

不断加固的封建壁垒,使人们看到了一丝晨曦的阳光。

“百日维新”期间,据《清德宗实录》所载,光绪帝颁布的变法诏令、谕旨达一百八、九十条之多,如果以日计算,少则一日一诏,多则一日发出十余条谕旨。不平常的一百另三天,确是光绪帝施展图强雄心和变法才能的历史大舞台。

现将光绪帝颁布的变法诏令、谕旨分类辑录于一下:^①

(一)关于选用人才方面

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谕各直省督抚保荐品学端正、通达时务,无论官职大小数人,以备“考验”通使各国。

四月二十四日(6月12日),谕令宗人府在该王公贝勒中,选拔“留心时事,志趣向上者”听候任用。

五月初九日(6月27日),降谕重申,“用人一道,最为当务之急”。各大臣等“尤须举贤任能”,罢斥“瞻顾因循”者。

五月二十五日(7月13日),谕,“以广登进而励人才”,命三品以上京官及各省督抚学政,在三个月内各举人才数名,随请随试,“用副朝廷侧席求贤至意”。

同日,令京外人员保荐精专制造及驾驶声、光、化、电诸学之才,考验得实,因材施教。

六月十二日(7月30日),命刘坤一、张之洞,立即饬令黄遵宪、谭嗣同来京引见。

七月十三日(8月29日),谕命杨锐、刘光第、严复、林旭等,一体预备召见。

七月二十日(9月5日),授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四人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事宜。

^① 分类之诏令,谕旨辑录于:《清德宗实录》,参阅孙孝恩:《光绪评传》一书第198~208页,段昌同:《戊戌百日维新运动大事年表》,丛刊《戊戌变法》(四),第557~572页。

七月二十二日(9月7日),命各直省督抚,留心访察,如有通达时务勤政爱民之员,随时保送引见,以备录用。

八月初一日(9月16日),电谕出使各国大臣,在寓居国外华侨中,无论士商工匠,选其可用者,随时送回国内,“以备任使”。

(二)关于发展近代教育方面

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命筹办京师大学堂。所有各部院司员及候补、候选道、府、州、县各官之子弟等,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

五月初二日(6月20日),谕总理衙门议设矿务学堂,并现有学堂一律增设矿务学。拟由各省督抚选派“年幼聪颖学生”赴日本练习矿务。

五月初五日(6月23日),谕令自下科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废除八股文,一律改试策论。

五月十二日(6月30日),令将经济岁科归并正科,同样改试策论。

五月十五日(7月3日),颁谕宣布,为“广育人才讲求时务”,参用西方学规正式创办京师大学堂,派孙家鼐管理大学堂事务。

五月二十二日(7月10日),谕各省府、厅、州、县之大小书院及民间的祠庙,“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省位设高等学校,郡城设中等学校,州县设小学校。各地方捐办之义学、社学,也一并“中西兼习”。各地绅民如能捐建学堂,给予奖励,“实力振兴”教育。

五月二十五日(7月13日),颁谕重申,各省士民“捐办学堂各事,给予奖励”,准予对上述士民“给予世职实官虚衔”,“鼓励人才,不靳破格之赏”。

六月初一日(7月19日),公布科举新章,乡会试仍分为三场:一场试历史及清代政治;二场试时务策;三场试四书五经。并决定,“嗣后一场考试,均以讲求实学实政为主,不得凭楷法之优劣为高下”。

六月十七日(8月4日),以期与京师大学堂“相辅而行”,谕令京师广立小学堂。

七月初三日(8月19日),颁谕正式宣布,“各项考试,改试策论”,并废朝考制。又“一切考试诗赋,概行停罢”,“造就人才,惟务振兴实学”。

七月初五日(8月21日),命驻外使臣,在国外华侨集居各埠设华侨学堂,兼学中西文字,“以广教育”。

七月十四日(8月30日),再次颁谕宣告:开办“学堂造就人才,实为急务”,命切实劝导。

七月二十四日(9月9日),准设医学堂,“考求中西医理”,发展近代医学事业。

七月二十七日(9月12日),命改各省中小学堂的任教职称为教习。

同日,谕令、奖励试办速成学堂,逐步推广以期尽速“收效”。

八月初四日(9月19日),应请旨,命内务府,将该处官房拨给顺天府设立中学堂,并准予在顺天府属各州县选拔学生就学,以“广育人才”。

(三)、关于整顿吏治,改革行政规则方面

六月十一日(7月29日),命将各衙门旧则中“实多窒碍者,概行删去,另定简明则例。”

六月十五日(8月2日),电谕伍廷芳,“博考各国律例”,拟制条款,严斥“墨守旧章”阻挠改革庶政。

七月十四日(8月30日),旨令各督抚,认真清理吏治,杜绝“种种殃民之事”,以利“民生”。

同日,因“旧制相沿”,机构重迭,冗员充塞。诏令裁撤为宗室服务的詹事府、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以及中央衙门大理寺、通政司等。地方督、抚同城的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闲置的河东总督;不办运务的粮道及无盐场的盐道均予裁并。同时,申明各级官员“不准藉口体制攸关,多方阻格,并不得以无可再裁,敷衍了事”。

七月十六日(9月1日),旨令已裁撤的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等衙门的一切事宜,均并归内阁六部分办;并归事项由大学士及六部尚书、侍郎于五日内具奏。

七月十七日(9月2日),谕令所有衙门,均当依照吏部、户部删定的则例办理“以归划一”。

七月二十四日(9月9日),为使无官职的“通才”参与议政,准予作为定制设散卿、散学之职。

七月二十五日(9月10日),再谕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及各省督抚,对尚未进行裁、减、归并的事宜,尽速切实筹议。

八月初五日(9月20日),旨令各省督抚,“必当以吏治民生为重”,不得出自徇私,滥任州县等官吏。

(四)、关于鼓励上书言事,广开言路方面

六月十五日(8月2日),谕大小臣工广泛言事“以备采择”;并宣布“士民”有上书言事者,由都察院呈递,“毋得拘牵忌讳”。

七月十六日(9月1日),命将“藉端”阻挠主事王照条陈言事的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霈等交部议处,并命嗣后代递条陈,原封呈进,堂官不得拆开。

七月十七日(9月2日),降谕宣布,“士民有上书言事者,亦应按原封进呈”,并“随到随递,不准稽压,倘有阻格,即以违旨惩处”。

七月十九日(9月4日),颁朱谕宣告,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骏及侍郎瑩岫、徐会沣、溥粹、曾广汉等六堂官,因一再阻挠主事王照言事予以革职。王照“不畏强御”勇于进言,给予嘉奖,赏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激励言事。

七月二十七日(9月12日),命将推行新政之谕旨和鼓励上书言事的诏令一并照样抄录,悬挂各省督抚衙门大堂,以期“家喻户晓”,破除“壅隔”。

七月二十八日(9月13日),电谕各省督抚及藩臬道府官员,凡有上书言事者,均可自行专折县奏,“毋庸代递”;州县等官言事者,仍由督抚将原封呈递;士民有上书言事者,由本省道府随时代奏。对于所有奏疏“均不准稍有抑格,如敢抗违或别经发觉,定将该省地方官严行惩处。”

(五)、关于提倡办报、译书和出国游学方面

四月二十四日(6月12日),为“开通风气”,选派宗室王公出国“游学”。

五月初十日(6月28日),谕令筹款兴办译书局。

五月十五日(7月3日),授梁启超六品衔,管理译书局事务。

五月十八日(7月6日),准予奏请,在南洋公学内设立译书院,翻译各国书籍。

五月二十九日(7月17日),准将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

六月初八日(7月26日),正式改上海时务报为官报,命康有为督办其事。各报“自应以牖陈时弊,开广见闻为主,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用副朝廷明日达聪,

勤求治理。”

六月十五日(8月2日),谕令从同文馆和各省学堂选派学生“出洋游学”。各部院“如有讲求实务愿往游学人员”,方可一并咨送。

六月二十二日(8月9日),谕令各省督抚,筹拨银款资助官报。重申各报馆立说,“总以昌明大义,袪去壅蔽为要义,不必拘牵忌讳,致多窒碍。”

六月二十九日(8月16日),谕令,梁启超主办译书局,要立足于“经久之计”,必须“宽筹经费”速见成效。

七月初二日(8月18日),命各省督抚,从各学堂中挑选“聪颖学生,有志上进”者去日本留学。

七月初十日(8月26日),准梁启超所请,在上海设立翻译学堂,承认学生出身,编译之书籍报纸一律免税。

七月二十七日(9月12日),准请,作为上海官报之续,在京城设立报馆,翻译新报,并提倡各地“官绅士民”一律举办,以期开风气而扩见闻。

八月初二日(9月17日),谕准“推广游学办法”。应请,准令“绅富之家,各选子弟”送往外国就学。各生毕业后回国“引见录用,以期选拔真才”。

(六)关于发展经济方面

四月二十四日(6月12日),谕“商务为富强要图,自应及时举办”。命名省会设商务局,公举“殷实绅商,派充局董。”

五月初八日(6月26日),命盛宣怀立即“兴工赶办”芦汉铁路,并命承办各员加速开办粤汉、宁沪各铁路。

六月十六日(7月4日),谕令各地方官劝谕绅民,兼采中西各法振兴农业;并倡导设立农学会,翻译外国的农学诸

书。

五月十七日(7月5日),颁谕宣布,为鼓励私人发明制造,各省士民著有新书、创行新法、制成新器确有“实用者”,给予奖赏,并“准其专利售卖”。有兴造枪炮者“给予特赏,以昭激励。”

五月二十四日(7月12日),颁布奖励振兴工艺章程十二条。

五月二十五日(7月13日),为发展工商颁布经济特科六条。

同日,筹办中国通商银行,谕令以“振兴商务”为本。

五月二十六日(7月14日),谕各直省将军督抚,严饬各该地方官“务须体察商情,尽心保护”。严禁胥吏勒索商贾,凡有铺商倒闭、亏空,“应即讯查追断还”。

同日,谕,“振兴商务,为富强至计,必须讲求工艺,设厂制造,始足以保我利权。”

六月初七日(7月25日),谕称,中国地大物博,极宜讲求制造“不致利权外溢”。命先在沿海、沿江一带试办商务局、商会及出版商报,促进设厂兴工,逐渐推广。

六月十一日(7月29日),谕总理衙门大臣,“鼓励”各省商办铁路、矿务。

六月十五日(8月2日)谕各省督抚“认真劝导绅民,兼采中西各法”,振兴务政。

同日,宣布京师设矿务铁路总局,各省开矿、筑路事宜“俱归统辖”,大力推广开矿、筑路。

六月二十三日(8月10日),谕曰:在“强邻环伺”之下,沿边各将军督抚咨商总理衙门详定节目,在口岸“不准划作租界,以均利益,而保事权。”

同日,应杨深秀奏请将津镇(江)铁路招商承办,谕令矿铁路总局督办王文韶、张荫桓“酌覆办理”。

七月初五日(8月21日),宣布在京师设立农工商总局,各直省设分局,总理全国及各省农工商事宜。各省府、州、县皆办农务学堂,广开农会,创办农报,购置农器。“考求新法”,改革和发展农工商业。

七月十五日(8月31日),为使农工商总局“以持久远”,命端方等认真筹办经费。

七月二十三日(9月8日),再次旨令各省督抚积极筹集款项,迅设局所,广兴机器制造“以扩利源而资民用”。

七月二十五日(9月10日),命胡馥芬筹款兴办京西煤矿至芦沟桥的运煤铁路。

七月二十六日(9月11日),谕令通商口岸及出产丝茶省份的督抚,迅速筹设茶务学堂及蚕桑公院,大力发展供出口的丝茶业。以阜民生而保利权。

同日,谕令将与各国签订的通商约章汇编成书,以备酌改和遵行。

同日,对黄思永建议铁路矿务由国家设立公司任听外国商人入股一事。降谕指出:“现时国家不特无此财力,且流弊百出”,未予采纳。

七月二十七日(9月12日),为便于“商民”,“以广流通”,谕令裁撤驿站,在京师和各省、府、州、县广设邮政分局。

七月二十八日(9月13日),再谕重申“农务为中国大利根本”,必须参用西法,购置机器,多设农会、广出农刊,讲求农学,“劝富民集资”切实兴办,发展新式农业。又强调,为维护“中国利权”,对商务之大宗丝茶,亦应“广置机器,推广种植制造,以利行销”。

(七)关于整顿民事,改革财政方面

六月二十六日(8月13日),康有为上奏疏请禁止天下妇女缠足,谕各督抚推行。

七月二十日(9月5日),谕“国家振兴庶务,尤以通达民隐为先”。令各省、州、县及时清理各种积案,严禁各级官吏“藉端讹索”百姓,“以除积弊而恤壅塞”,命工部会同管理河道大臣等修整疏通京师街道、沟渠。

七月二十二日(9月7日),为制止地方官吏通过发行“昭信股票”而“苛派扰民”,旨令在民间现办之“昭信股票”立即停止,“与民休息”。

七月二十三日(9月8日),鉴于过去遇到灾荒,只以拨款救济,致使经办官吏“侵渔冒领,弊窦百出”,灾民得不到“实惠”,谕令仿效外国加以改革,实行“以工代赈”,“养赡穷民”。

七月二十九日(9月14日),诏准八旗人“各习四民之业”自谋生计。并旨令,改订旗民“徙户开屯计口授田成案”。

同日,命两江、湖广、浙江各督抚,彻底清理已成虚悬的卫所屯田旧制,改行征税,以充国用。

同日,谕令各海关制定约章,严禁兴安岭一带金砂及各省制钱流入外洋。

同日,鉴于厘令行久,“遂致弊端丛集”,“徒滋纷扰”,命户部速筹“兴利除弊”之策。并云“理财之道,取之农不若取之商,用吏役不若用士人”,以达“裕国阜民”之效。

八月初一日(9月16日),为仿照外国“豫筹用度之法”,命户部编制每年的财政预算表,按月刊报,公诸于天下。

(八)、关于军事方面

五月初九日(6月29日),谕令军机大臣及督办军务王大臣等,参用西法编练军队。

五月二十一日(7月9日),谕命对八旗及绿营练勇进行裁并,汰弱留强,仿照西方兵制,改习洋枪,加以编练。

五月二十八日(7月16日),谕促各省将军督抚,切实裁兵整军,力行保甲,整顿厘金,严杜中饱,以达富国强兵。

六月初十日(7月28日),颁谕重申,“力求振作,思御外侮,则整军经武,难再视为缓图”。再次责令各将军督抚,剔除中饱,集中财力,“添设海军,筹造兵轮。”

六月二十三日(8月10日),谕:欲整建水师,以达“制胜”之效,“必以习堂为根本。”令南、北洋大臣及沿海各将军督抚,应设各类专门学堂“预备人才”。

七月十四日(8月30日),责成专办之员,出洋采办军火。

七月十七日(9月2日),命兵部妥议改定武科事宜。

七月二十一日(9月6日),恽毓鼎奏请于京师设武备大学堂,旨令孙家鼐妥议。

八月初一日(9月16日),应请,谕令刘树堂,将据实削减河工之款“创办海军”。

光绪帝连续颁布了一百八、九十条变法谕旨,表明他“日昃勤政”对于变法的迫切心情,同时也可以证明维新派是光绪帝推行变法的得力助手。何以此说?因为当“时言新政,皆小臣耳,无大臣言之者,”^①枢臣中已无支持变法的要员,本来帝师翁同龢竭力赞成变法,是光绪帝的高级顾问和帮手,可是在颁布《明定国是》以后的第四天(四月二十七日),

^① 《康南海自编年谱》,丛刊《戊戌变法》(四),第153页。

被慈禧太后开缺回籍,光绪帝处在孤掌难鸣的不利地位。在这样极度艰难的情况下发出雪片似的谕旨,只能依靠维新派草拟。我们从光绪帝的变法谕诏的内容来看,主要出自于维新派的奏折,而且笔法语气也有不少相似之处,可以断定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是“百日维新”的策划者,康有为曾经说过:“皇帝已经采取了很多我的奏折中的建议。”^①

光绪帝推出的一揽子变法项目,其内容涉及诸多方面,“百日维新”是有一定深度的全方位的改革运动。

首先看政治领域的改革深度,“博考各国律”,在中央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门,在地方督抚同城的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闲置的河东总督以及不办运务的粮道和无盐场的盐道均予裁撤。谕令驻外使臣,在寓居国外的华侨中无论士商工匠,选其可用者,随时送回国内,“以备任使”;命督抚留仿察“通达时务勤政爱民之员,随时保送引见,以备录用”,“士民”有上书言事者,由都察院呈递,“毋得拘牵忌讳”,“按原封进呈,随到随递,不准稽压。”从法制和政治体制上有大动手术的势头,并且有的改革措施还损害了满洲贵族的特权和利益,作为一个满族皇帝有此等改革魄力那是难能可贵的。

其次看经济领域的改革深度。谕令地方官劝导绅民,兼采中西各法振兴农业,并倡导设立农学会,翻译外国农学诸书,鼓励发明创造,各省士民著有新书、创行新法、制成新器确有“实用者”给予奖赏和“准其专利卖买”,颁布振兴工艺章程十二条,经济特科六条;严饬地方官“务须体察商情,尽心保护”,鼓励各省商办铁路、矿务,沿江、沿海广开口岸;不

^① 丛刊《戊戌变法》(三),第506页。

准划作租界,以均利益而保事权”;令各省督抚筹集款项,迅设局所,广兴机器制造“以扩利源而资民用”;筹办中国通商银行,广设邮政分局等等。这一系列的经济政策的出台,从深度和广度方面不仅超出了洋务运动的范围,而且光绪帝运用统治权力,驻高临下地命令、鼓励、保护发展近代工农商业,这是洋务派所望尘莫及的。

其三看文化教育领域的改革深度。筹办京师大学堂“以期人才辈出”,命各省选派“年幼聪颖学生”赴日本学习矿务;乡会试及生童岁科考试,废八股文一律改试策论,各省、府、州、县之大小书院及民间祠庙,“一律改为兼及中学西学之学校”,各省士民“捐办学堂各事,给予奖励”,实力振兴教育;准设医学堂,“考求中西医理”,发展近代医学事业;为“开通风气”,选派宗室王公出国“游历”;兴办译书局,翻译各国书籍,在京设立报馆,改上海时务报为官报,以广开言路。文化教育方面的改革措施,列在维新变法之首位,这是光绪帝的远见卓识。其深度集中地表现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清统治者一贯坚持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废八股文取士这是关键,八股文是旧学的核心,以八股文取士也就牵系着文化教育的各个网络,读书做官,孔孟儒学所提倡的道德行为范规就是封建论理的“体”,神圣不可犯。尔今各级考试废八股而用策论。中学的“体”必然发生动摇,近代西学、应用文体必将成为各级各类学校的主要课程。

总之,光绪帝在“百日维新”时期推出的一揽子变法项目,在许多方面违背了清朝的“大经大法”,如果能够得到切实贯彻和认真执行,必能收到预期的效果,那么中国的前景将会是另一种新的局面。

第八章 变法纵深推进和戊戌政变

第一节 维新变法步履艰难

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揭开了维新变法运动的序幕,接着频频召见维新派人士和变法革新的谕旨连连而出,他亲手铺展了一幅走向近代化的蓝图。“直省闻风争言农商之学,争译农商之书,好事争捐地以为农会,盖上行下效,风气大开,”^①人们为祖国的初醒感到欢欣鼓舞。然而,这仅是形势发展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清朝顽固势力,他们站在维新变法的对立面,时时设置障碍,导致变法步履艰难,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贯穿在“百日维新”的始终。

311

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的第四天,慈禧太后威逼光绪帝发出上谕,声称:

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近来办事多未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机之任,本应查明究办,予以重惩。翁同龢著即开缺

^① 丛刊《戊戌变法》(二),第87页。

回籍,以示保全。^①

顽固派首先从翁同龢身上下手,因为他在清廷对光绪帝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他为帝师二十余年,对于光绪帝居危思变的心情非常“仰体”,不仅全力支持变法维新,并且“筹划新政,仅其一人”,“一切只有翁同龢能承皇上意旨”,^②他是光绪帝最可信赖的近臣,而且还是沟通维新派与皇帝之间的中心人物,“保荐康有为,才堪大用,为满朝忌而恶之”。^③现在慈禧太后将翁同龢“开缺回籍”,等于斩断了光绪帝的一只得力助手。其时,虽然有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和御史宋伯鲁等人积极支持光绪帝变法,但他们俱为微职文臣,起不到参与决策的重大作用。这样,光绪帝就处在“上扼于西后,下扼于顽固臣”^④的孤立地位。慈禧太后这一“清君侧”,是顽固派有计划地扼杀维新运动第一个信号,对维新派是个重大的打击。光绪帝也深感西太后这一着的棘手,所以当他接到“懿旨”时,“惊魂万里,涕泪千行,竟日不食”^⑤为之悲痛欲极。

同时,慈禧太后还向维新运动布下了秋后算账的罗网。

一是从光绪帝手中揽去对重要官员的赏赐和授任大权。在处分翁同龢的同一谕旨中又谕:

嗣后在廷臣工,仰蒙……皇太后赏项及补授文武一品、既满汉侍郎均著于具折后恭诣皇太后前谢恩。各省将军都统督抚等官,亦一体具奏谢。^⑥

① 《清德宗实录》第418卷,第18页。

② 以上引文均见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丛刊《戊戌变法》(一),第332页。

③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丛刊《戊戌变法》(一),第332页。

④ 《康南海自编年谱》,丛刊《戊戌变法》(四),第148页。

⑤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丛刊《戊戌变法》(一),第332页。

⑥ 《清德宗实录》第418卷,第18页。

二是把亲信王文韶调入军机处,安插在光绪帝身边,以填补翁同龢的空缺;还授她的嫡系荣禄为直隶总督,统辖警卫京津的北洋三军,以便进一步控制军权。谕:“命直隶总督王文韶迅即入觐,以大学士荣禄暂署直隶总督”。五月初五日又命王文韶“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实授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充北洋通商大臣”。^①

三是安排光绪帝于当年秋“恭奉太后巡幸”荣禄控制的“天津阅操”,实际上向维新派发出警告,皇帝的命运仍掌握在她手中。

慈禧太后采取这一系列措施,很明显的是向光绪帝和维新派人士布下天罗地网,“俟到时候”便可把他们一网打尽。

西太后的阴谋活动,光绪帝心里自然是很明白的,可是帝后之间的矛盾已经是由暗争发展为明斗,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光绪帝在变法道路上的步伐决不能停滞下来,只有顶着慈禧太后掀起的阵阵恶浪,披荆斩棘,勇往直前才能在变法运动中把权力从西太后手中“变”过来,否则权失位废的日子必将降临。为此,光绪帝加快变法步子,改革措施倾盆泼出,同慈禧太后针锋相对,颇有“不成功便成仁”的气魄。

光绪帝发出的变法谕旨象针一般地刺痛着顽固派的神经脉络,他们则以消极的或公开的方式进行抵制。所以有的改革措施光绪帝没有交“该部议奏”或“著该王大臣议奏”而尽量运用手中的权力,直接发下,形成事实。可是关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方案,因为牵涉面广,影响深远,故不得不交枢臣议奏。最突出的是关于设制度局一案,维新派与顽固派白刃

^① 《清德宗实录》第419卷,第19页。

相见,展开了激烈的争斗。

设制度局本是康有为的建议,是一项根本性的体制改革。在中央设制度局等于朝廷另设中枢,可以安插维新派人士“入直其中”,或主持分局,成为推行新政的指挥部,这样,被顽固派把持的军机处、总理事务衙门等部院都可用在一边而放开手脚推行变法。光绪帝对设制度局极为重视,在颁布《明定国是》诏以前就开始酝酿筹划。由于此事触动到各级官吏的切身权势,同时也不能过于刺激慈禧太后,所以光绪帝持慎重的态度,“盖知西后之相忌,故欲藉众议以行之,……飭下总理衙门议行。”^①光绪帝企图通过“众议”来推行这一重大的改革措施,向慈禧太后施加压力,以顺利设置制度局。是时,翁同龢还未被革职,他“欲开制度局”,并且主张康有为入“直其中”,同光绪帝的考虑完全合拍。康有为关于设制度局的建议,在京师已广为传播,御史杨深秀、宋伯鲁、王鹏运及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等人“皆以制度局为然”,并奏请光绪帝“御乾门以誓群臣”,^②造成置制度局的声势。然这次光绪帝责令枢臣“众议”大失所望。枢臣以“事关创制”为由,对“众议”旨令采取拖沓搪塞的态度。顽固派敏捷地感到一旦制度局设立,他们的权势就会转移到维新派手中,因而用消极态度进行抵制。光绪帝对枢臣敷衍性的“会议”极为气愤,“穆拟责以无得浮词搪塞,倘仍敷衍塞责,定必严办。”^③迫于光绪帝一再催促,于五月十四日(7月2日)主持总理事务衙门慈禧太后亲信奕訢等人联名上奏,对设制度局和十二分局同原来的六部职掌套在一起,以所谓“成宪召垂,

① 梁启超:《戊戌变政记》第71页。

② 《康南海自编年谱》,丛刊《戊戌变法》(四),第141页。

③ 《康南海自编年谱》,丛刊《戊戌变法》(四),第153页。

法制大备”的理由,提出了“不必另开制度局”,^①的否定意见。此时朝廷上下流言纷纭:说什么开制度局是“尽废内阁六部及督抚藩臬司道矣”。军机大臣认为“开制度局是废我军机也。”王文韶唆使顽固派说:“上意已定,必从康言,我全驳之。则明发上谕,我等无权矣,不如略敷衍而行之,”^②用狡猾的阳奉阴违手法敷衍抵制。一时开设制度局成了清统治集团中顽固派和守旧官吏攻击的主要目标,光绪帝在非常孤立的情况下也不便强令开设,只好搁置一边。到六月十五日(8月2日),光绪帝亲自主持的变法运动已成一定的声势,顽固派害怕光绪帝运用有利形势,强令设置制度局,那位一贯在紧要关头出鬼点子的礼亲王世铎,又冒出来纠集了一些顽固分子上奏折“修正”康有为设制度局和十二分局的建议,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变通办法”^③,抽去制度局和十二分局的核心,塞进王文韶与枢臣达成的“定义”,使康有为开制度局建议的本意面目全非。

康有为曾把他的建议同世铎的“变通办法”其要点做了一番对照,他指出:

所请选天下通才二十人置左右议制度一条,乃改为选翰詹科道十二人,轮日召见,备顾问,于是制度一条了矣。”……我所请开法律局,定为每部派司员,改定律例。夫司员无权无才,无从定之,又非采万国宪法,与我本意大相反矣。……此折又皆成虚文矣。^④

开制度局是光绪帝筹划维新变法的核心问题,也是决定

①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7页。

② 《康南海自编年谱》,丛刊《戊戌变法》(四),第153页。

③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10页。

④ 《康南海自编年谱》,丛刊《戊戌变法》(四),第154页。

变法深度的中心内容,光绪帝竭尽全力希图付诸实行,以慈禧太后为总后台的大小顽固派和守旧官吏纷纷站出来抵制,以流产告终。因为维新派处于无权地位,光绪帝皇权的力度还达不到冲破顽固派的壁垒使其脱颖而出,为此,一系列的改革项目也因为没有开制度局和十二分局作为支柱而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维新变法运动每迈出一步,都遭到守旧势力的重重阻挠,不仅在中央遇到顽固派大官僚所掀起的阵阵恶浪;在地方贯彻光绪帝的变法谕旨诏令也充满着反弹力。有的地方官吏“藉新政以扰民”,^①抵制变法条例的推行,其中洋务派也是干扰变法运动的一股重要的地方势力。光绪帝推行的变法措施,在经济和文化教育方面,有些内容也是洋务派曾经竭力鼓吹的“夷务”范围,诸如设厂、开矿、兴商、创办铁路、航运、邮电以及译书局、海军学堂等等。但是洋务派在鼓吹“夷务”的同时,根本不认为清朝封建制度有进行改革的必要性,说什么“今朝政清明”^②来粉饰腐败的封建统治。在甲午战争以后,光绪帝曾经发出过不少发展近代工业、交通、商业方面的上谕,推进了洋务运动。所以洋务派对维新变法的舆论宣传,基本上无明显的对抗表现。而从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以后,变法项目纷纷出台,其深度和广度都超出了洋务运动的范围。光绪帝动了真格,洋务派的“夷务”活动与维新派的变法内容距离越来越大,各行其道矛盾显露,因而洋务派就明显地站在维新运动的反面,干扰新政的实施。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就是后起的洋务派首脑张之洞和刘坤一等人。

①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88页。

② 张之洞:《劝学篇》、《张文襄公全集》第202卷,第26页。

湖广总督张之洞于光绪二十四年三月抛出了《劝学篇》,从理论上与维新变法唱反调。到“百日维新”进入高潮的时候,六月七日(7月25日)“本日翰林院奏,侍讲黄绍箕呈进张之洞所著《劝学篇》。”^①顽固派为之如获至宝,十日内三易版本,一月之后“排印三百部,煽起了一阵反对变法的阴风,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影响很坏。

《劝学篇》一书凡二十四篇四万言,分内外篇。“序言”标榜为“正人心”,“开风气”而作,攻击前一阵子在舆论界出现的维新思想,是“邪说暴行,横流天下”,乃“中国之祸”。开卷明义,《劝学篇》公开亮出了反对维新变法运动的旗帜。在“内篇”里,张之洞竭力美化腐败的清朝统治政权,说“今朝政清明”,“深仁厚泽”,已经施行了“薄赋”、“宽民”、“恤商”等十五项“仁政”,为二千年来所未有,所以完全没有变法的必要了。接着在内外篇里从三个方面反对维新变法:首先,他反对维新派宣传的民权学说。说什么“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无一益而有百害”,中国绝对不能搞“民权”政治,也不能再宣传“民权”思想。其次,攻击废八股文是“不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弱者为奴”,必然祸国殃民。他鼓吹“中学”,“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圣人,中国所以中国,实在于此”。而八股文体“代圣人立言”,是神圣不可动摇的“根柢”,是不能废止的。

其后,也是最关键的问题,《劝学篇》列出了“可变”与“不可变”的原则:“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所谓“伦纪”、“圣道”、

^① 《清德宗实录》第421卷,第6页。

“心术”就是封建社会的宗法制度,是绝对的不可变的,若变之就是“欲举世放恣黷乱而后快”的大坏事,所以他认为变法维新应该以“必无悖于经义”为准则。很清楚,张之洞就是要用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来束缚维新派的手脚,同顽固派从政治上遏制维新运动相呼应。

另一位洋务派官僚,两江总督刘坤一,对光绪帝的变法谕旨,也采取“可办办之,否则静候参处”^①的消极观望态度加以抵制。两广总督谭钟麟,对光绪帝发布的诏令“因循玩揭,”“于本年(光绪二十四年)五六月间谕令筹办之事,无一字复奏,”^②公然搪塞对抗。洋务派应该讲不同于顽固派,多少有些“自强图新”的主张,他们对维新变法运动也持以干扰、消极观望态度,那么地方的顽固守旧官吏阻挠新政,反对变法的立场也就可想而知了。

总之,从中央到地方反对或消极观望对待维新变法者,在清官僚队伍中占多数,支持变法的官吏是少数派,所以光绪帝推行新政步履艰难,变法最终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节 顶着逆流推进变法

变法的道路是坎坷多险的,光绪帝每出台一项变法措施,都会遇到顽固派和守旧官僚的抵制。维新变法揭开序幕之时,也是慈禧太后张开扼杀新政罗网之日,顽固派掀起反

① 《刘坤一遗集》第5册,第2229页。

② 《清德宗实录》第423卷,第15页。

对变法运动的逆流恶浪 ,不停地向着光绪帝迎头击来。光绪帝是维新运动的舵手 ,他顶逆流 ,战恶浪 ,冒着风险把维新变法向纵深推进。

变法与反变法的较量 ,首战是从设制度局一案拉开 ,时间还在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之前。因为设制度局是对清王朝封建统治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 ,涉及面广 ,难度极大 ,由于朝廷上下的顽固派和守旧势力竭力反抗 ,终于未能按预期的方案推出。慈禧太后还未干预就败下阵来 ,表明光绪帝有限的“事权”还能力挽狂澜 ,战胜对手。此战败北 ,顽固派反对变法的气焰更加嚣张 ,他们除了对变法放出一些流言蜚语之外 ,其中影响较大根本性的变法条目则全力抵制。继设制度局一案被抵制搁浅以后 ,变法与反变法斗争的集结点落在废八股文这一重大革新项目上面。

319

八股式是明清科举考试的一种文体 ,也称四书文。八股文体不仅有一套固定的作文程式 ,而且其内容也只许“代圣人立言” ,不许超出宋代学者朱熹《四书章句》的注释范围而自由发挥。读书做官必须以揣摩八股为根柢 ,所以八股文成了封建社会文化教育的纲 ,一切围着八股文体运转 ,严重地束缚人们的思想。维新派人士善长策论时务 ,八股文成了他们仕途中的障碍物 ;维新派主张发展资本政治、经济、文化 ,必须冲破陈腐的旧学 ,而八股文是旧学的中心。因而维新派人士在宣传维新变法过程中大声疾呼要求废除八股文体 ,并且视之为维新运动的一个重要环节。康有为曾在光绪帝面前痛斥八股文之危害 ,深得支持。光绪帝召见康有为的第二天 ,四月廿九日(6月17日) ,康有为“草定”了《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 ,通过御史宋伯鲁上呈到光绪帝那

里。光绪帝果断决定“即令枢臣拟旨”，^①准备不经“部议”直接推行。废八股的舆论为时很久，已经成为顽固派所密切注视的敏感题目，现今眼看废八股的舆论将要成为现实，军机大臣刚毅迫不及待地站出来反对，他要光绪帝“请下部议”，企图用“部议”来阻止废八股诏令的发出。光绪坚执地同刚毅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上曰：‘若下礼部，彼等必驳我矣’。刚又曰：‘此事重大，行之数百年，不可遂废，请上细想’。上厉声曰：‘汝欲阻我耶！’刚乃不敢言。及将散，刚毅又曰：‘此事重大，愿皇上请懿旨’，上乃不作声。既而曰：‘可请知’。”^②

刚毅在不能动摇光绪帝废八股决心的情况下，只好搬出后台作为挡箭盾牌，把抵制废八股的希望寄托在慈禧太后身上。光绪帝为废八股文的决心是升华到一不做二不休的地步，于五月初二日（6月20日）去颐和园请示“懿旨”，有丰富政治经验的慈禧太后，她不急于出面阻止光绪帝的变法行动，她认为现在还不是“俟到时候”，况且废八股对她无直接威胁，所以很顺利地通过了“请太后懿旨”这道关卡。于是光绪帝在五月初五日（6月23日）发出了废八股文的上谕。

“谕内阁：我朝沿宋明旧制，以四书文取士，康熙年间曾经停止八股，改试策论，未久旋复旧制。……乃近来风尚日漓，文体日敝，试场献艺，大都循题敷衍，于经义罕有发明，而谄陋空疏者，每获滥竽充选，若不因时通

① 《康南海自编年谱》，丛刊《戊戌变法》（四），第147页。

② 《康南海自编年谱》，丛刊《戊戌变法》（四），第147～148页。

变,何以励实学而拔真才?著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发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①

同时,光绪帝也考虑到八股文同旧式府、州、县学教育直接连在一起的实际情况,在新式学堂尚未普遍建立起来的条件下,暂时可采取过渡性的办法,所以谕旨又指出:

“此次特降谕旨,实因时文积弊太深,不得不改弦更张,以破拘墟之习。至于士子为学自当以四子六经为根柢,策论与制义殊流同源,仍不外通经史以达事务,总期体用兼备,人皆勉为通儒,毋得竞逞博辩,复蹈空言,致负朝廷破格求才至意。”^②

废八股文和改试策论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策论注重“时务”,容易汲取新思想,但也可容纳四书五经中阐发的伦理观念,比较灵活,可应时制宜地强调某一方面,是在当时条件下“体用兼备”的一种过渡办法,有利于士子逐渐摆脱儒家经论的迷网,推进新学堂的建立和教育改革。光绪帝排除顽固派的干扰,毅然发布废八股的上谕,是对整个变法运动的有力推动,同时也反映了光绪帝厌恶积弊、开拓新观念的思想基础。废八股文体旨在“朝廷破格求才至意”,所以不单是一项考试方法的改革,而是有广泛影响的思想革新,对多数追求新思想的年轻知识分子是莫大的鼓舞。因为废八股而“专试策论,海内人士,乃恍然今是而昨非,莫不争自濯磨,以求通达时务”。^③

废八股诏下,社会风气呈显新貌。

① 《清德宗实录》第419卷,第5~6页。

② 《清德宗实录》第417卷,第6页。

③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100页。

八股既废 ,数月以来 ,天下移风 ,数千万之士人 ,皆不得不舍其兔园册子帖括讲章 ,而争讲万国之故 ,及各种新学 ,争阅地图 ,争讲译出之西书。昔之梦梦然不知有大地 ,以中国世界上独一无二之国者 ,今则忽然开目 ,憬然知中国以外 ,尚有许多国 ,而顽陋倨傲之意见 ,可以顿释矣。……耳目既开 ,民智骤进 ,……故此数月废八股之效 ,其于他日黄种之存亡 ,实大有关系也。①

光绪帝推行这项改革 ,有力地促进了知识界改变学风 ,更新观念 ,扩大视野 ,无疑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尽管贯彻执行过程中仍然阻力重重 ,七折八扣 ,如两广总督谭钟麟在光绪帝发出废八股文的诏令以后 ,仍“故出八股题” ,受到光绪帝严词训斥。然而 ,这一改革其潜在的影响力是阻止不了的 ,在以后的岁月里不管八股文披上什么时髦的外衣 ,人们对其束缚思想的内核无不痛首恶疾 ,弃置于粪土。

同废八股试策论相配套的变法项目 ,就是创办各类新式学堂和鼓励出国游学。光绪帝在发出废八股文的谕令以后 ,马上于五月十五日(7月3日)又发上谕创办京师大学堂 ,作为教育改革之首要议题。上谕指出 :

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 ,必须规模闳远 ,始足以隆观。听而育人才。现据该王大臣详议章程 ,参用泰西学规 ,纲举目张 ,当属周备 ,即著照所议办理 ,派孙家鼐管理大学堂事务。②

创办京师大学堂当然不是一帆风顺的事情 ,也遭到顽固派的

① 丛刊《戊戌变法》(二)第25页。

② 《清德宗实录》第419卷,第13页。

抵制,光绪帝决心已经下定,他亲自插手,全力筹促,京师大学堂终于在当年六月廿二日(1898年8月9日)宣告成立,以美籍传教士丁韪良为西学总教习。虽然创办初期学员寥寥,门庭冷落,同光绪帝原来“规模闳远”的设想差距甚大,但第一座新式高等学府的成立,在中国教育制度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举。由于创办京师大学堂的带动,各地各类新式学堂似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近代教育改革从此开始进入了实质性的启动阶段。

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一书中提出了变法先“变人”的主张,顽固派也懂得事在人为的道理,因而他们反对变法首先把目标放在积极宣传维新运动的维新派身上。康有为是维新派人士的领袖,自倡议维新,主张变法以来,他成了顽固派和守旧官僚攻击诬陷的众矢之的。

首先,礼部尚书许应詠在五月四日(6月22日)上奏折攻击康有为,

逞厥横议,广通声气,袭西报之陈说,轻中朝之典章。其言既不可行,其居心尤不可测,若非罢斥驱逐回籍,将久居总署必刺探机密,漏言生事,长住京邸,必勾结朋党,快意排挤,摇惑人心,混淆国事,关系非浅。^①

光绪帝不但没有理睬许应詠的弹劾,反而责他“该尚书嗣后遇事务当盖加勉励”,“毋负委任”。^②即着顽固派头目军机大臣刚毅指使许应驥去收买御史文悌上奏折,再次弹劾康有为。五月二十日(7月8日)文悌写了疏奏呈进光绪帝,“军

①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四)总第4101页。

②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四)总第4101页。

机(刚毅)得折喜甚,以为必去我(康有为)矣。上阅折大怒,谓文悌受许应詠指使,将革职,刚毅求之,乃令回原衙门行走。”^①幸亏有光绪帝的保护,康有为才免遭顽固派的陷害。

顽固派抓住康有为大做文章,光绪帝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方针。六月十五日(8月2日)发生了许应詠阻挠主事王照上书言事事件,为了扫除维新运动的障碍,光绪帝也抓住许应詠开刀,煞煞顽固派的嚣张气焰。

许应詠,广东番禺人,任礼部尚书,掌握科举大权。他竭力反对新政,阻挠变法,曾遭御史宋伯鲁、杨深秀的参劾,光绪帝命他按照所参各款明白回奏。许应詠在是年(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四日的回奏中,混淆视听,借题做文章,大肆诋毁康有为。六月十五日,礼部主事王照上书陈事,请光绪帝游历日本等内容,此折交礼部尚书怀塔布和许应詠代为呈递,为许应詠、怀塔布所拒绝。王照复交礼部侍郎瑩岫、溥琇代递又遭拒绝,他又具呈劾堂官阻遏,声言如不予代递即往都察院亲递,怀塔布、许应詠才勉强允诺呈递。许应詠又劾王照“咆哮公堂,藉端挟制”,并声称日本多刺客,请皇上游历日本是置皇上于险地,请加惩治。王照乃礼部小官,他倾向变法,其上书内容除请光绪帝奉皇太后巡幸中外,其他内容不甚紧要。然光绪帝抓住这事件做文章,显然是为打击顽固派找一借口而已。七月十六日(9月1日)上谕军机大臣:

朝廷开言路,本期明目达聪,迺言必察,前经降旨部院司员有条陈言事件者,著由各堂官代奏,毋得拘牵忌讳,稍有阻格。诚以是非得失,朕心自有权衡,无烦该堂

^① 《康南海自编年谱》,丛刊《戊戌变法》(四)第149页。

官等鳃鳃过虑也……怀塔布等均著交部议处,此后各衙门司员等,条陈事件,呈清堂官代递,即由各该堂官,将原封呈进,毋庸拆看。王照原呈著留览。^①

顽固派也知道光绪帝把怀塔布和许应谔“著交部议处”,是杀鸡儆猴,作为打击阻挠变法行为的突破口,进而由此带出一连串事件,把阻格势力压下去。老奸巨滑的军机大臣徐桐纠集一些守旧官僚上奏折,企图堵塞缺口,避重就轻,不了了之。他们“应议”后在七月十九日奏称:

查律载,应奏而不奏者杖八十,系私罪降三级调用等语。此案礼部尚书怀塔布等,于司员呈请代递条陈,徇于积习,钦奏谕旨均交部议处。应将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谔、左侍郎瑩岫、署左侍郎臣部右侍郎徐浚沅、右侍郎宗室溥粹,署右侍郎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曾广汉,均照事应奏而不奏者私罪降三级调用例,议以降三级调用。^②

徐桐等人以为只要“杖八十……降三级调用”就混蒙过去,不料光绪帝不肯草草收场,他朱批说:“礼部尚书怀塔布等,竟敢首先抗违”,“若不予以严惩,无以儆戒将来”,“凡参与压制的官员”均著即行革职。至该部主事王照,不畏强御,勇猛可嘉,著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外,用昭激励。”^③礼部是顽固派势力对抗变法运动的桥头堡,光绪帝抓住战机,猛烈轰击,顽固堡垒终于被攻破,两位尚书连同他们的一伙爪牙左右侍郎等人一窝端,“均行革职”。这一事件光绪帝处理

① 《清德宗实录》第424卷,第11~12页。

②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四)总第4176页。

③ 《清德宗实录》第424卷,第17~18页。

得干净利落,他的政治斗争艺术在维新变法的实践中得到锻炼和提高。光绪帝拿礼部顽固势力开刀的另一目的是为了鼓励“士民”上书言事,撑维新派人士的腰杆子,所以他表彰王照“不畏强御,勇猛可嘉”,并赏给“三品顶戴”。这一震撼朝廷上下的断然处置,煞了顽固派的威风,长了维新派的志气,“维新者无不称快”。^①

光绪帝把顶住顽固派对抗变法的逆流与推进变法同步进行。在捅礼部马蜂窝之举的前两天,七月十四日(8月30日)发出上谕,将在中央的“闲曹”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等衙门“著即行裁撤”,还裁撤了地方督抚同城以及“事务甚简”的粮道、盐道。并严正警告“内外诸臣……不准藉口体制攸关,多方阻格”^②。对中央和地方“闲曹”的裁撤,是光绪帝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一次尝试。清朝的衙门和官缺的设置是载入《会典》的“祖制”,决不能轻易改变,尔今光绪帝发谕旨裁撤这些衙门,虽然对整个官僚体制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这一举动意味着向“祖制”挑战,其深刻的影响力是不能低估的,所以康有为称颂光绪帝这一果断决策是“变政勇决”的行动。

光绪帝裁撤“闲曹”和处理礼部尚书、侍郎阻格王照上书言事两案以后,决心把变法运动推向高峰。七月二十一日(9月6日)光绪帝“诣颐和园乐寿堂问……皇太后安”^③。慈禧太后当面责问光绪帝:“九列重臣,非有大故,不可弃,今以远间亲,新闻旧,徇一人而乱家法,祖宗其谓我何?”光绪帝也不

①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第72页。

② 《清德宗实录》第424卷,第6~7页。

③ 《清德宗实录》第425卷,第22页。

示弱,执意地回答说:“祖宗而在今日,其法必不若是,儿宁忍坏祖宗之法,不忍弃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为天下后世笑也。”^①光绪帝公开同慈禧太后顶嘴翻脸还是首次,因为他正在准备推出更重要的变法项目,估计到西太后是不会允许的,终归有一天矛盾激化,所以他不惜与太上皇闹翻,再一次表现出光绪帝为推进变法而不顾个人安危的勇气。

不久,光绪帝又推出两项重大的变法措施;一是宣布“内阁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著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予新政事宜”。^②二是准备设立“议院”和开懋勤殿以议制度。

光绪帝把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选入中枢之后,又分别授予朱笔谕旨,命其“凡有所见及应行开办等事,即行据实条列,……万不准稍有顾忌欺饰”^③。光绪帝身边有了一个辅佐“新政事宜”的秘书班子,因翁同龢去职中断了的联络维新派的桥梁,现在得以恢复。他们四位军机章京在光绪帝身边左辅右弼,使新政沿着维新变法的轨道正常运行。“所有新政奏折,皆令(四章京)阅看,谕旨皆特令撰拟,……以国政系于四卿,名为章京,实则宰相也。”^④光绪帝命四卿入中枢,同当初赏康有为、梁启超六品章京衔“上畏西后,下行其志”相比较,说明他在维新变法征途上又跨出了一大步。

光绪帝为了把变法运动向纵深推进,准备仿模西方国家

① 胡思敬:《戊戌履霜录》,丛刊《戊戌变法》(一)第376页。

② 《清德宗实录》第424卷,第20页。

③ 杨锐:《杨参政公家书》,丛刊《戊戌变法》(二)第572页。

④ 丛刊《戊戌变法》(二)第75页。

的体制,设立“议院”和开懋勤殿“以议制度”。这两件大事是一次清朝政治体制的重大改革,均遭到顽固派的坚决抵制而搁浅未能实现。事实证明,随着变法运动的纵深发展,不可避免地会触及带有根本性的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而政体改革就是革顽固派的命,他们必然全力维护封建壁垒加以对抗。尽管光绪帝和维新派人士以破釜沉舟的勇气进行最后的拚搏,然清朝大权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这种拚搏是不能收到效果的。

纵观“百日维新”的变法步骤,光绪帝站在变法与反变法斗争前列,顶着逆流险浪推进变法运动。正当维新变法运动向更深的程度发展的关键时刻,慈禧太后以为“俟到了时候”,动用权力,向光绪帝和他主持的变法运动发起了疯狂的反扑,一场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即将面临着顽固派的残酷镇压。

第三节 顽固派发动政变

“百日维新”期间的形势是:一方面光绪帝“锐意变法”,设计新政,连连颁布变法诏令,把维新运动向纵深推进;另一方面慈禧太后麇集顽固势力,加紧政变部署。荣禄、奕訢、刚毅等顽固派干将频繁地出入颐和园同西太后秘密策画阻止变法和反对光绪帝的阴谋活动。

随着维新运动的发展,顽固派反对光绪帝的活动越来越嚣张,最关键的一步是阴谋废光绪帝而另立新帝。先是慈禧太后授命其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统率北洋三军,直接控制了

卫戍京津的军权。荣禄对于西太后的安排心领神会,他说:“皇上任用匪党,难保日久不生变乱,京、津咫尺,以北洋陆军可资镇制”,^①荣禄出任以前,慈禧太后已布置了废立计划,唆使御史李盛铎奏请光绪帝恭奉皇太后“天津阅兵”,防谋在阅兵时,用武力威迫光绪帝“让位”另立新君。同时,慈禧太后还发出一系列任命,进行废立的各方面准备:五月初六日任命怀塔布管理圆明园八旗及鸟枪营事务;任命刚毅管理健锐营事务,加强了对首都和紫禁城的军事控制;任命裕禄在军机大臣上行走,配合刚毅、奕訢在中枢机构内的活动,以牵制光绪帝发布变法谕旨。此外,慈禧太后还派出大批爪牙,对光绪帝的一举一动加以监视,内廷布置她的心腹太监,稽查各宫门的出入人员,紫禁城各门也有步军统领所派的八旗官兵把守,严厉盘问行人,遇有疑虑即刻向西太后禀报。通过各方面的布置,到七月底八月初(9月间),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顽固派携手联合,完成了发动政变的部署。荣禄一语道破了天机,他说:“姑俟其乱闹数月,使天下共愤,罪恶贯盈,不亦可乎?”^②顽固派虎视眈眈地张开扼杀新政的罗网,等待着他们的最高统帅慈禧太后发出宫廷政变的命令。

首都上空黑云密布,雷鸣电闪,充斥着暴风雨前的恐怖气氛。

变法谕令不断发出,引起了社会上守旧势力对维新运动的不满和仇视,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的社会基础随着变法的深入而不断扩大着。废除八股文体应试,大批八股士子失去进

①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丛刊《戊戌变法》(一)第332页。

② 梁启超:《戊戌变法记》第63页。

身之阶,他们多年来揣摩四书的本领成为无用,因而对新政也有对抗情绪,这也是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的一股社会势力。书院及祠庙改为中西学兼习的学校,必然使乡间的一些土豪劣绅和奸僧恶巫失去赖以生活的依据,他们大肆散布诬蔑之词,危言耸听,说什么光绪帝加入了天主教,康有为在宫中设立礼拜堂等等。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等闲曹被撤之后,造成一些官吏失业,他们也对新政怀着怨恨,在宫里成了顽固派的耳目和间谍。此外,一些其他衙门的大小官僚他们看到变法诏令不断推出,也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

维新变法是一场有深刻意义的改革运动,必然触犯了一些人的切身利益,他们纷纷站到维新运动的对立面,成为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的社会基础。顽固派就是利用这股旧势力,在新政推行一百零三天的时候,发动了惊心动魄的宫廷政变。

天津“阅兵”的日期愈来愈临近,尽管光绪帝不愿意去天津,可是慈禧太后和荣禄已经商定好“阅兵”的日程和仪式,并擅自以上谕的形式宣布中外。形势发展的日益恶化,使维新派感到惊恐,康有为认为北洋三军的将领中袁世凯曾经驻扎朝鲜,略略知道日本明治维新情况,并且还加入过强学会,便把天津“阅兵”一旦发生险情时拯救光绪帝的希望期托在他身上。康有为派他的弟子徐仁禄前往小站游说袁世凯,希图争取他从顽固派营垒中分化出来。袁世凯是有丰富政治经验的两面派,在徐仁禄面前表示对康有为非常钦服,徐仁禄满以为游说成功,赶回北京向康有为报告了袁的态度。维新派书生气十足,上了大当还信以为真,康有为立即草拟密

折,向光绪帝建议“结袁以备不测”,^①光绪帝按照康有为的建议,七月廿六日(9月11日)发出上谕:“电寄荣禄,著传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②。廿九日袁世凯乘火车晋京,他首先拜访满洲权贵礼亲王世铎和庆亲王奕訢等以探听风声,窥测方向。因为他们两人正忙着奔走颐和园同慈禧太后密谋政变活动,袁世凯均未遇见。八月一日(9月16日)光绪帝召见袁世凯,并谕内阁:“现在练兵紧要,直隶按察使袁世凯……著开缺以侍郎候补,责成专办练兵事务”。^③出于形势的紧要,光绪帝在召见后立即授以侍郎候补衔,委他专办练兵事务,也中了袁世凯的迷魂阵。狡猾的袁世凯唯恐因光绪帝的授命而引起顽固派对他的怀疑,他马上去拜访刚毅、裕禄、王文韶等军机大臣,表示无功受赏,无意领受,向顽固派打了招呼以取得谅解。第二天光绪帝再次召见,袁世凯两面三刀在光绪帝面前谢恩重赏,使光绪帝对他失去提防,在陷井里愈陷愈深。袁世凯晋京,顽固派敏捷地觉察出光绪帝已作重大部署,迅速采取了应急措施;首先,荣禄把北洋三军之一的聂士成手中的武毅军由芦台调到天津,屯扎在陈家沟一带,截断北京和小站之间的交通,防止袁世凯军西行;其次,调董福祥的甘军移驻北京彰德门外的长辛店,“专供皇差弹压之用”。在北京的顽固派奕訢、怀塔布、李莲英等连日在颐和园见慈禧太后,“跪请训政”,御史杨宗伊于八月初二日“至颐和园递请训政折”^④。京、津一带风声鹤唳、气氛日益

① 张伯桢:《南海康先生传》第37页。

② 《清德宗实录》第425卷,第13页。

③ 《清德宗实录》第426卷,第1页。

④ 《康南海自编年谱》,丛刊《戊戌变法》(四)第160页。

紧张。

七月二十九日(9月14日),光绪帝诣颐和园乐寿堂向慈禧太后请安,请允开懋勤殿以议制度,“太后不答,神色异常,惧而未敢申说。”^①光绪帝从西太后阴森的神态中判断事态将有可能发生剧变。当日赐密诏给杨锐向维新派示意局势的逆转。密诏云:

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愿将此辈老谬昏庸大臣罢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尔等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审处,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紧急翘盼之至。特谕。^②

杨锐见了密诏惊惶不安,推说:“陛下家事,当谋宗室,小臣惧操刀而自割也。”^③因为恐惧而竟把密诏搁了几天之后才到其他三位维新派手中。

事态发展愈益紧逼,慈禧太后废立之谋,光绪帝也有察觉。他知道搞废立的主要罪状是听信康有为妄言而乱家法,所以光绪帝必须立刻催促康有为离京,以免被顽固派抓住口实。八月初二日(9月17日)谕内阁催康有为离京:

工部主事康有为,前命其督办官报局,此时闻尚未出京,实堪诧异,朕深念时艰,思得通达时务之人,与商治法。闻康有为素日讲求,是以召一次,令其督办官报。诚以报馆为开民智之本,职任不为不重,现筹有的款著

①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丛刊《戊戌变法》(一)第342页。

② 《赵伯严集光绪大事汇鉴》卷九。

③ 胡思敬:《戊戌履霜录》,丛刊《戊戌变法》(一)第377页。

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 ,母得迁延观望。^①

八月三日(9月18日)早晨 ,康有为接谕令 ,召集谭嗣同、梁启超、康广仁、徐仁禄等在南海会馆商讨应变对策。最后决定由谭嗣同去会见袁世凯 ,策动他“杀荣禄 ,除旧党”举兵勤王。

当日夜间 ,谭嗣同独往法华寺访袁世凯 ,梁启超前往金顶庙容阁寓所等候消息。会见时袁世凯再耍弄两面派手法 ,一面向谭嗣同慷慨表示“杀荣禄乃一狗耳” ;一面又叹苦衷 ;“吾营官皆旧人 ,枪弹火药皆在荣禄处 ,且小站去京二百余里 ,隔于铁路 ,虑不达事泄。若天津阅兵时 ,上驰入吾营 ,则可以上命诛贼臣也”。^② 袁世凯给维新派吃了一只模棱两可的空心汤圆 ,实际上不肯派兵“勤王”。八月初四日清晨 ,谭嗣同赶到金顶庙向梁启超等报告了昨夜访袁情况 ,一致断定袁世凯肯举兵相助 ,大家相对叹息 ,无可奈何。康有为离京前夕 ,走访李提摩太 ,要他请求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出面干预 ,复又求见来华游历的日本前任首相伊藤博文 ,请他去游说慈禧太后回心转意”。^③ 康有为的奔波亦无结果 ,八月初五日傍晚 ,匆匆乘火车离京 ,六日自天津搭英商太古公司的重庆号轮船取海道赴上海。

鉴于形势不断恶化 ,光绪帝进行了最后的努力 ,期望扭转危局。其一是八月初四日召集军机大臣 ,向他们摊牌说 :“朕不自惜 ,死生听天 ,汝等肯激天良 ,顾全祖宗基业 ,保全新

① 《清德宗实录》第426卷 ,第2页。

② 《康南海自编年谱》,丛刊《戊戌变法》(四)第161页。

③ 汤志钧 :《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下册 ,第288页。

政,朕死而无憾,”^①希望激起枢臣的正义感,借以保全新政。然而,这是不切实际的空想,枢臣中几乎全是西太后的死党和投机钻营分子,他们岂会改变顽固立场站到维护新政一边;其二是八月初五日召见袁世凯“朱笔密谕”,命他保护新政。这一着更是无稽之谈。袁世凯退朝时立刻变卦,他对人表示:“皇上若责我以练兵,我不敢不奉诏,若他事则非我之所知也”。^②公开表示了投靠慈禧太后的态度。其三是接见伊藤博文争取日本政府的支持,还传谕于初八日召见李提摩太,聘他为新政“顾问”。但是未到初八日,光绪帝已经成为慈禧太后的囚徒了。光绪帝的三项努力,结果全都落空,维新势力完全失去对抗顽固派发动政变的能力。

八月初五日,袁世凯向光绪帝“请训”之后就回到了天津,当夜向荣禄泄露了光绪帝的“朱笔密谕”和维新派策动兵变的机密,出卖了光绪帝和维新派。荣禄如获珍宝地乘专车直奔北京至颐和园向慈禧太后密报内情。西太后早已布张罗网,顽固派在紫禁城内外密切注视着光绪帝和维新派的任何举动,所以袁世凯的密告只是为他们发动政变提供“口实”,无别的重要价值。此时,慈禧太后认为镇压维新运动已经“俟到了时候”,用不着等到“天津阅兵”就可以动手了,所以她匆匆从颐和园赶回皇宫,八月六日(9月21日)发出“训政”旨令。这天清晨,光绪帝到中和殿阅癸文,一群侍卫太监和一队“荣禄之兵”闯入殿内,声称“奉太后命”,押光绪帝到慈禧太后的便殿。光绪帝跪在西太后面前,遭到一顿严厉的

①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丛刊《戊戌变法》(一)第345页。

②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丛刊《戊戌变法》(一)第263页。

训斥。

“是日,太后御便殿,召庆王、端王、军机御前大臣跪于案右,皇上跪于案左,设竹杖于座前。疾声厉色,讯问皇上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为,诸臣者皆我多年历选,留以辅汝,汝何敢任意不用!乃竟敢听信叛逆蛊惑,变乱典刑。何物康有为,能胜于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所立之法?汝何昏愤,不肖乃尔!’”^①

在训斥中慈禧太后和盘托出了她反对新政的理由,就是为了维护腐朽的祖宗大法和保持她在清朝的太上皇地位。训斥之后,就把光绪帝送至中南海的瀛台看管起来了。

慈禧太后一日间就完成了幽禁光绪帝的宫廷政变,当日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出上谕声称:

“现在国事艰难,庶务待理,朕勤劳宵旰,日综万几,兢业之余,时虞丛脞。恭溯同治年间以来,……慈禧皇太后两次垂帘听政,办理朝政,宏济时艰,无不尽美尽善。因念宗社为重,再之吁恳慈恩训政,仰蒙府如所请,此乃天下臣民之福,由今日始,在便殿办事,本月初八日,朕率王大臣在勤政殿行礼,一切应行礼节,著各衙门敬谨预备”。^②

盗用光绪帝名义发谕旨和用“吁恳慈恩”的借口是慈禧太后控制最高权力的一贯手法,从八月六日起,她由幕后跳到幕前,牢牢地掌握着清朝的统治大权。这一事件发生在光绪二

①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丛刊《戊戌变法》(一)第346页。

② 《清德宗实录》第426卷,第9~10。

十四年,干支为戊戌年,故史称“戊戌政变”。从四月二十三日《明定国是》诏的颁布到八月初六日“戊戌政变”为时一百零三天,这就是“百日维新”的由来。

“戊戌政变”之后,顽固派以百倍的疯狂绞杀新政镇压维新派人士及同情维新运动的清朝官吏。政变当日又发谕旨:

“工部候补主事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屡经被人参劾,著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著步军统领衙门拏交刑部,按律治罪。”^①

八月七日,荣禄派兵三千封闭北京城门。至九日,先后逮捕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徐致靖等人入狱。此时,康有为乘重庆号轮船至吴淞口,英国驻上海总领事白利南派小艇接应转入英国巴拉勒特号商船,在英国军舰护卫下驶往香港。梁启超避居日本使馆,在日驻天津领事郑永昌陪同下逃出北京,在天津乘日本军舰前往横滨。

八月十三日(9月28日)慈禧太后下令杀害维新派人士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六人于菜市口,人们称这六位维新运动的牺牲者为“戊戌六君子”。受牵连者甚多,或被流戍、或被监禁、或被罢官,除少数流亡海外,维新派被一网打尽。“在旧中国,讲改革是要犯罪的,要杀头,要坐班房”^②戊戌变法中的谭嗣同,是一个立志改革的人,他不怕杀头。政变发生的当日,他曾把自己的书稿诗文数册及家书一筐送入日本使馆,托梁启超带走,并且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③当时日本使馆官员极

① 《清德宗实录》第426卷,第10页。

②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会议上的讲话》。

③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第109页。

力劝谭嗣同逃往日本,然他视死如归地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他写绝命诗于狱壁曰:

望门投宿思张俭,
忍死须臾待社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①

“戊戌六君子”不愧为维新变法的英雄,他们视死如归,在狱中和刑场上表现出以祖国的命运为己任的浩然正气。杨深秀在狱中“有诗数十章,关怀国事,松念外患,忠诚之气,溢于言表”,刘光第“临刑太息曰:‘吾属死,正气尽’”,“康广仁在狱中言笑自若,高歌声出金石,临刑语嗣同曰:‘今八股已废,人才将辈出,我辈死,中国强矣。’”^②他们个个是好样的,为国捐躯,永励后人。“六君子”牺牲在顽固派的屠刀之下,在光绪帝亲自主持的维新变法史册上谱写了不朽的一页。

337

第四节 “衣带诏”之真伪

见于史籍记载,光绪帝先后在“百日维新”的后阶段,七月二十九日和八月初二日(9月14日、17日)向维新派人士发出四道谕旨,三道是密诏(也称衣带诏)分别由杨锐、林旭两人带出。三道密诏中有二道是赐给康有为的,一道是给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四人的。另一道上谕内阁,通过“明

① 梁启超:《谭嗣同传》丛刊《戊戌变法》(四)第53页。

② 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丛刊《戊戌变法》(四)第262~263页。

发”给康有为。在戊戌政变后流亡海外的康有为声称他奉有光绪帝的两道密诏(“衣带诏”),令他“迅速外出”,“设法相救”云云。但陈少白在《兴中会革命史要》一书中指出,密诏是康有为之伪作,他说:康有为“说是奉了光绪帝衣带诏,他又说临出京时,因某事之必要,已经烧掉了。”考释史料,陈少白关于康有为伪作密诏之说,有一定的道理。

据康有为自称,第一道密诏是光绪帝召见杨锐时赐给的,由杨锐带出转给康有为,时间一说为八月初一日,一说为七月二十九日,其内容见于《康南海先生墨迹》谓:

朕惟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谭嗣同、林旭、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①

说其此诏伪作,首先是光绪帝交给杨锐的日期,康有为、梁启超在不同的著作里有不同的说法,不能自圆其说。《康南海先生墨迹》云:“(八月)初一日交杨锐带来朱笔密渝”;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又说:“(七月)召袁世凯二十九日至京师,而是日上召见于颐和园,交密诏与杨锐带出。”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第二卷中说:“七月廿八日谕康有为、杨锐、林旭、刘光第五人,由杨锐带出。”在《谭嗣同传》中则说:“二十九日,皇上召见杨锐,遂赐衣带诏。”康有为是衣带诏的直接接受者,而且事关重大,时间应该是绝对清楚的。然他几处所说不一,显然是后来见到光绪帝赐给杨锐、谭嗣同等四人密诏而伪托。梁启超则以康著为依据,故也说不准确切日

^① 丛刊《戊戌变法》(二)第92页。辑自《康南海先生墨迹》。

期。

其次,更重要的是在衣带诏中所反映出光绪帝当时的心情同光绪帝当时仍在大力推进变法的进取精神不符。“密诏”云“今朕位几不保”、“汝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盼之至。”似乎光绪帝已乱了手脚准备逃跑退却,可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光绪帝仍一日数谕,大力推进变法。如果说他准备逃亡时刻装出镇定自若姿态来麻痹慈禧太后,那光绪政治上还未达到如此老练地步。下面辑几段上谕与“密诏”比较之。

七月二十八日(交密诏前一日)上谕:

督抚膺一方重案,粤省地滨海疆,弹压抚绥,尤关紧要。谭钟麟久历封圻,受恩深重,若如奏种种昏谬情形,实属大负委任,著陈宝箴按照所指各款严密访查,如果属实,速即参奏。^①

同日又谕:

农务为中国大利根本,业经谕令各行省开设分局,实力劝办,惟种植一切,必须参用西法,购买机器,聘订西师,非重资不能猝办。至多设支会,广刊农表,亦讲求农学之要端,应于省会地方筹款试办,逐渐推行,广为开导。或借官款倡始,或劝富民集资,总期地无余利,方足以收实效。著各直省督抚飭属各就地方情形,妥筹兴办,毋得视为迂图,以重农政。^②

同日又谕:

电寄各省督抚,昨已明降谕旨,令各省藩臬道府,均

① 《清德宗实录》第425卷,第20页。

② 《清德宗实录》第425卷,第20页。

得上书言事,其州县条陈事件,应由督抚将原书代递。即著各省督抚,传知藩臬道府,凡有条陈,均令其自行专折具奏,毋庸代递,其州县等官言事者,仍由督抚将原封呈递。至士民有上书言事者,即径由本省道府随时代奏,均不准稍有抑格,如敢抗违,或别经发觉定将该省地方官严行惩处。仍将遵办情形,迅速电奏。^①

梁启超对光绪帝这道谕旨予以极高的评价,他在案语中指出:

上之明目达聪,求通下情而恶壅蔽至矣。州县递折,本朝已无,至于士民上书,由道府代递,盖犹恐诣阙太远,士民不易,犹伏小人之箴而野有遗贤也。古人命众至庭嘉石肺石,皆待伏阙,此则中国四千年尧舜禹汤文武所未有者矣。呜呼!非圣主而能如是乎?^②

从上面三道谕旨中可以认为光绪帝在赐密诏前一二天的心态,同康有为所谓的“密诏”“设法相救”,“十分焦灼”云云大相径庭。

那末再比较一下光绪帝在七月二十九日(9月14日)赐给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的那份密诏的内容,就可鉴别出康氏所称“衣带诏”之真伪。密诏见罗洩《梁启超退随笔》一书,据罗氏所称:宣统元年(1909年),杨锐之子杨庆昶曾将光绪帝朱笔谕旨(赐给杨锐之密诏)呈缴都察院,为其父申冤,遭奕劻拒绝未成。当时任京畿道监御史的赵炳麟为之草拟“请昭雪折”而抄录谕旨全文,后编入《赵伯严集》《光绪大事汇鉴》,因而此诏书当为可信。其内容谓:

① 《清德宗实录》第425卷,第21~22页。

② 丛刊《戊戌变法》(二)第81页。

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 ,不意将法尽变 ,并不愿将此辈老谬昏庸大臣罢黜 ,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 ,令其议政 ,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降旨整饬 ,而并且有随时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 ,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即关于处分礼部尚书怀塔布和许应瑬等人的上谕——著者)皇太后已以为过重 ,故不得不徐留之 ,此近来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 ,至于阽危 ,皆由此辈所误 ,但不必欲朕一早痛切降旨 ,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 ,则朕之权力 ,实有未足。果使如此 ,则朕位且不能保 ,何况其他 ? 今朕问汝 ,可有何良策 ,俾旧法可以渐变 ,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 ,而登进英勇通达之人 ,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 ,化弱为强 ,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等与林旭 ,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 ,密善封奏 ,由军机大臣代递 ,候朕熟思审处 ,再行办理 ,朕实不胜紧急翘盼之至。特谕。①

此诏较确切地反映了“百日维新”后期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实况以及光绪帝当时的处境。光绪帝发此密诏的用意 ,一是向维新派征求“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 ,而登进英勇通达之人 ,令其议政”的良策。看来光绪帝还是准备在中枢机构中进行吐故纳新的大刀阔斧的改革 ;二是向维新派示意“朕之权力 ,实有未足 ,果使如此 ,则朕位且不得保”的处境 ,形势趋向恶化。可是光绪帝没有估计到即刻发生政变的可能性 ,所以他还是要求维新派通过正常途径“由军机大臣代递”他们的“良策” ;“候朕熟思审处 ,再行办理”。显然 ,光绪帝要求维新派献计献策还未达到“设法相救 ,十分焦灼”的

① 罗洩 《弢庵退随笔》丛刊《戊戌变法》(二)第91~92页。

程度。

两诏相比,可见康有为所云“衣带诏”实属伪作,是康氏依据光绪帝赐给杨锐、林旭等四人的密诏作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篡改炮制而成。

一是转变密诏的主要对象。密诏分明是赐给杨锐等四章京的,并未提到康有为,而他却篡改为“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四人变了五人,而康有为作为赐诏的主要对象。既另有一诏赐给其中四人,为何此诏还要列上名字呢?专诏赐康有为讲更为重要内容那不是更符合常情吗?

二是删去原诏罢黜和登进必须以“不致有拂圣意”为前提,即不触慈禧太后权威,因为当时光绪帝不想太过分地刺激西太后的神经。而康有为则不然,他已流亡海外,光绪帝被幽禁,六君子被杀害,所以他把保皇活动矛头首先指向慈禧太后,口口声声地骂她“妖后”,删去这一前提是为他在海外的政治活动张目。

三是把原诏“朕位几不保”的提法改为“设法相救”,那就加重了语气,而且还能体现出康氏与光绪帝的亲密关系,显然是为了他在海外的保皇活动披上“身受重托”的合法外衣。

至于第二道“密诏”据康氏宣称,是在八月初一日光绪帝召见林旭时交下的。见《康南海先生墨迹》,内容谓:

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①

^① 丛刊《戊戌变法》(二)第97页。

据实录所载,次日(八月二日)光绪帝通过“明发上谕”催促康有为离京(见本章第三节),密诏除了催促康有为“迅速出外”,无别的机密重托,尽是一些美言康有为“一片忠爱热肠”和“共建大业”之“厚望”,用密诏表彰康有为大可不必。在“戊戌政变”一年之后,当时直接参予变法活动曾受到光绪帝嘉奖的礼部主事王照,亡命日本时就指出此诏乃康氏伪作。

八月初二日,袁到京,太后已知之,皇上密谕章京谭嗣同等四人,谓朕位今将不保,尔等速为计划,保全朕躬,勿违太后之意云云。此皇上不欲抗太后以取祸之实在情形也。

另谕康有为祇令其速往上海,以待他日再用,无令其举动之文也。……

今康刊露布之密诏,非皇上之真密诏,乃康所伪作也。^①

王照所述合情合理,因此,第二道密诏也是伪作,昭然若揭。

康有为所以要伪作衣带密诏,因为在海外活动,要寻求英、日、美等国的援助,而他只是六品工部主事的微职小官,难以在外交上发生影响。为了提高身份,伪作光绪帝密诏,奉清朝合法皇帝“设法相救”的命令,并且光绪帝还期于他“共建大业”的“厚望”,这样康有为就由流亡海外的清廷“官犯”,俨然成为身怀密诏,奔走“救驾”的重臣,为他在海外的活动争得了有利地位和合法身份。

应该指出的是虽然人们自然会理解康有为处心积虑地伪作“密诏”是反映了拯救光绪的真切心情。可是,康氏为了

^① 《关于戊戌政变之新史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第332页。

抬高身份,却损害了光绪帝的形象,密诏里呈现出光绪帝乞求康有为“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盼之至”的可怜相,这种做法,对于一位有影响的政治活动家来讲是不足取的。因而,本章专题讨论“衣带诏”之真伪,目的就是要如实现反映光绪帝在戊戌政变发生前夕的处境和心境。尽管顽固势力咄咄逼人,而光绪帝仍在为推进变法做最后努力,他面临顽敌,毫无畏缩退却之意,而且安排对策,勇于进击,为维新运动奋斗到终点。

第五节 维新变法的实际决策者

344 谁是维新变法的实际决策者?诸多的史学论著着眼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所倡导的维新活动,而把光绪帝则放在被利用的位置。认为“百日维新”是康有为“利用皇帝的权力来推行他的主张”,“光绪皇帝并不能够真正实行维新派的政治路线。他所采纳的其实是洋务派的政治路线”。从而得出了“光绪皇帝很难真正成为一个维新派的皇帝,而倒是可能成为一个洋务派的皇帝^①”的结论。事实上,如果没有光绪帝“锐意变法”的坚定态度和“熟思审处”的实际决策作用,就不会有戊戌年间的维新运动。

颁布《明定国是》诏的当初,在光绪身边赞襄这项大计的亲信大臣只有翁同龢。而诏书颁布的第四天,就被慈禧太后以“言语狂悖,渐露跋扈”的罪名,赶回江苏原籍。翁同龢去

^①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第670、678、67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

职,虽使光绪帝“涕泪千行,惊魂万里”,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泄气,坚决地把一道道的新政诏令颁发下去。为了消除阻力,他愤然谴责那些“奉奏不谨”的守旧大臣,甚至撤了一些顽梗大臣的职,表现了他对革新变法的勇气。张元济说光绪帝“不惑于浮言,不挠于旧党”^①并不是溢美之词。光绪帝是维新运动的实际决策者,主要表现在能反映出维新运动广度和深度的几个方面:

第一,广开言路,打破只准少数大员上书言事的特权。光绪帝“既劝开报馆以求昌言,复许藩臬道府上折;即许群僚及州县递奏,并许士民上书。又恐诣阙为难,听在外由州县封递,”^②都要“随到随递,不许稽压,倘有阻格,即以违旨惩处”,^③对于书奏的格式和忌讳也一律不拘。清制,除尚书、侍郎和总督、巡抚以上大官可以直接向皇帝上奏书外,中级以下官员上书只能通过所在衙门的堂官或都察院代递。书奏中要是出格,犯了讳,常常会弄得降职、丢官,甚至杀头。光绪帝全不顾这些“祖宗成法”,居然让小官乃至士民上书言事,颇有“广闻见而决积壅,通下情而达民隐,坐一室而知四海,不窥户牖而知天下”的开明君主博宏胸怀的气魄。

第二,用人惟贤,打破按年资升迁,白发卿相的常规。还在诏定《国是》前夕,光绪帝即谕令内阁,著各省督抚从道、府、州、县基层荐拔“居心正大,才识闳通”之士和“尽心民事,通达时务”^④者,列举实迹上报。清制,非四品以上官员不得面见皇帝。康有为考取进士后授六品工部主事,光绪帝

①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2页。

② 梁启超:《光绪圣德记》第三章 丛刊《戊戌变法》(一)第309页。

③ 《清德宗实录》第424卷,第16页。

④ 《清德宗实录》413卷,第16页。

不仅召见共商变法大计,还委授他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给以专折奏事的大臣待遇。梁启超布衣举人,光绪帝也亲自召见问话。主事王照因上书受到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霈等人的阻挠,光绪帝便革了他们礼部尚书的职,赏给王照四品京官。尤能显示出光绪帝是维新变法的最高决策者作用的是把拥护新政而有才识的内阁侍读杨锐、刑部主事刘光第、内阁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四人拔为四品卿衔的军机章京,参与新政,执行宰辅职务,在维新运动中发挥了得心应手的作用。

第三,裁并机构,改革臃肿的封建官僚体制。光绪帝发布谕令,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闲曹机构,把它们所办的事务并入其他相应衙门;裁撤广东、湖北、云南三省督抚同城的巡抚,与其他各省城只驻总督或巡抚划一起来;裁撤在山东境内的虚衔河东总督、裁撤不办运务的粮道和仅管疏销的盐道;此外各省通同佐贰等官吏中的闲员、以及各省设立的骈技办公局所,均应查明裁汰。严令“内外诸臣,即行遵照切实办理,不准借口体制攸关,多方阻格,并不得以无可再裁,敷衍了事”^①。对于这些被裁的司员,指明“未便听其闲散”,“应于铁路矿务总局、农工商总局,酌设大小官员缺额,以备将来量能任吏”^②,作为对冗员安排使用。因为推行了这一项改革措施,光绪帝往颐和园向慈禧太后请安时,遭到一顿训斥。然他却斩钉截铁地回答说:“宁忍坏祖宗之法,不忍弃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为天下后世笑也。”^③可见他对变法维新已铁了心,公然同太上

① 《清德宗实录》第424卷,第7页。

② 《清德宗实录》第425卷,第4页。

③ 《清德宗实录》第419卷,第5~6页。

皇——慈禧太后顶撞翻脸。

第四 废八股文体 ,倡办京师大学堂。

光绪帝发布废八股文的诏令是不经“部议”“即令枢臣拟旨”,直接推行贯彻。他断然决策,并以巧妙的方法丢开刚毅等顽固派的纠缠阻挠,然后又通过慈禧太后的关卡,于五月初五日(6月23日)发出上谕宣布:“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这一改革,何止是考试方式的改变,而在一定程度上对封建士大夫阶层来说是具有思想解放意义,也有利于社会风尚的改造。与废八股文改革措施相配套的是倡办京师大学堂。光绪帝发出废八股文体的谕令不久,便趁热打铁,决定倡办京师大学堂,在他的催促之下,中国第一座近代高等学府终于办了起来,推动了全国教育制度的改革。

此外,光绪帝还决策“为民政”,设立“议院”,开懋勤殿以设制度等政治体制方面的重大改革,可惜因遭顽派的百般阻挠和“百日维新”短命夭折未能实现。如果这些变法项目能够得到贯彻执行,那就启开了通向君主立宪的大门,中国的政治制度随之焕然一新。所以不能说光绪帝没有充当中国的明治天皇素质和锐气,只是当时的中国不允许他做明治天皇,没有造就明治天皇的土壤。

以上几个方面的重大改革项目,虽然都是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所建议的,但是光绪帝不是盲目采纳,而是“候朕熟思审处,再行办理”,^①因而光绪帝接受维新派的建议和主张,并且发布谕令推行,丝毫也没有削弱他在维新变法运动中的实际决策作用。

^① 丛刊《戊戌变法》(二)第92页。

光绪帝是维新变法运动中的实际决策者是无可否定的历史事实。

“百日维新”的改革运动,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这一百零三天的重要性,不止于它是戊戌维新运动的集结点,也可以说自鸦片战争以来,人们要求改革的集结点,是近代中国人民觉醒的一个催促阶段,作为“百日维新”的实际决策者的光绪皇帝,历史上应有他的地位。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的,戊戌政变以后,“革命运动之得到大步迈进,还得感谢光绪皇帝。在他未被慈禧太后幽禁以前,曾准许千百年轻人离开中国,旅行世界,观摩欧洲风俗习尚,学习其文物制度,这些感染了革命思想,……当他们回国以后,很快就会发生全国性的影响力”。^① 孙中山从一个角度肯定光绪帝的历史作用,而准许中国人旅行世界扩大视野,这是诸多改革措施中的一个方面,也是维新运动的一个缩影,从总体上讲,“百日维新”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启开了中国人民“感染革命思想”的心扉,对以后历史革命运动都发生了“全国性的影响力”,这就是光绪帝对于近代中国的进步所作出的贡献。

^① 转引自台湾 1975 年版《研究中山先生的史料与史学》第 377 页。

第九章 身陷逆境

第一节 瀛台幽禁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以后,紫禁城内外呈现恐怖局面,光绪帝被幽禁瀛台,成了不带枷锁的囚徒。八月初六日早晨,光绪帝在中和殿被一队“荣禄之兵”押解至便殿,慈禧太后在一顿训斥之后,即“命引帝入西苑内之瀛台,乃南海中一岛也。四面环水,一面设板桥,通出入,台中约有十余室,太后挈李莲英随之。”^①光绪帝押送至瀛台以后即折去板桥以断出入,并派亲信太监监守。光绪帝幽禁在瀛台的涵元殿,此时,“以帝疾作,宣示中外”,^②清朝的统治大权完全为慈禧太后所垄断。

慈禧太后再度登台,美其名曰“慈恩训政”,她曾两次“垂帘听政”,光绪大婚以前也曾有过“训政”先例。无论是“听政”还是“训政”,照例均不得把皇帝抛在一边,由太后独断朝政。这次“训政”在上朝仪式上与“垂帘听政”不同的是:“两宫之垂帘也帝中坐,后蔽以纱幕,孝贞、孝钦左右对面

① 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丛刊《戊戌变法》(四)第261页。

② 费行简:《慈禧传信录》,丛刊《戊戌变法》(二)第466页。

坐,孝贞既崩,孝钦独坐于后,至戊戌训政,则太后与上(光绪帝——引者)并坐,若二君焉。”^①光绪帝仍须陪衬在慈禧太后身边,作为“训政”的装饰品,“每天早上他依旧还穿着全套极华贵的官服,巍巍地高坐在太后的右边,接受着群臣的朝拜。外表完全和先前一样,只是他从此再不发言了。”^②对于臣下的奏折,光绪帝还得做出“御览”的样子,不过“嘿不发言”,用沉默对抗西太后的横蛮专权。

被幽禁以后的傀儡地位对于政治思想已经相当成熟而又有作为的光绪帝来说,是精神上的极大摧残。在入承大统时期,他是不懂世事的黄毛小孩,听人摆布而无动于衷;而今他经历了一场披荆斩棘,日理万机的维新变法运动之后,又回到童孩时代的傀儡位置上,在他的心灵里是难以忍受的。早朝以后,他就象囚犯归号般被押解到这座四面环水的瀛台涵元楼,这样天天地重复着,光绪帝足有十几年的时间消磨在这个水牢似的孤岛上。这里和外界全都隔绝,处在“欲飞无羽翼,欲渡无舟楫”^③的苦境之中。“上(光绪帝——引者)常至一太监屋,几有书,取视之,三国演义也。阅数行,掷去,长叹曰:‘朕且不如汉献帝也’,”^④确实如此,汉献帝在曹操手中“挟天子以令不臣”,至少仍有“天子”之尊,自由自在,曹操还得声声称臣。而光绪帝身边坐着的却是操着天下生杀大权的“亲爸爸”,清王朝的太上皇,光绪帝在她手中的价值还不如曹操手中的汉献帝,他相信慈禧太后一旦不再需要这件装饰品的时候,那就连这般囚徒生活也会过不成了。

①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丛刊《戊戌变法》(一)第476页。

② 德龄:《瀛台泣血记》第290页。

③ 适园主人:《三海见闻志》,丛刊《戊戌变法》(四)第215页。

④ 徐珂:《清稗类钞》,丛刊《戊戌变法》(四)第273页。

尽管此刻的光绪帝的一切权力都被剥夺至尽,成了不带枷锁的囚徒。然而,他亲理朝政已近十年,朝廷上下,皇宫内外君临天下的权威已经确立,在封建社会“忠君保驾”者不乏其人。慈禧太后表面上她已从光绪帝手中收回了“事权”,新政已被取消,维新运动已经扑灭,可是这位饱经政治风险的强女人,她内心是空虚的,其本质是脆弱的。然而,对光绪帝来讲,他已经落到这等地步也就无所可畏惧了,而真正怀着恐惧不安心理的倒是慈禧太后本人。她害怕光绪帝一旦被劫出瀛台,必然号召天下,东山再起,因而她对独居涵元殿的光绪帝采取了绝对的防范措施,把过去侍奉光绪帝的太监,“或处死,或发往军台,无一存者”。^①又把监视光绪帝的权力交与她的心腹太监李莲英。这位作恶多端的总管太监把光绪帝监视得严严实实,密不漏风。瀛台“仁樾门南为翔鸾阁,……阁前有平阶数十级,斜迤而上,离阶十余丈有木吊桥”,这是唯一的通道。“西太后常派老监在此看护,送御膳时驾板以渡,膳毕,板仍抽起。”^②瀛台涵元殿竟成了光绪帝的独人世界,自从“太后夺去他政权的一天起,朝内朝外,以及宫中的一切动静,他就半点不知,便是跟康有为在一起的谭嗣同等六人的被害,他也直到斩官入朝覆旨的时候才知道的。”^③

光绪帝精神上最大的痛苦是得不到珍妃的消息。她的遭遇同光绪帝一样,受到慈禧太后的残酷迫害。戊戌政变不久,西太后对珍妃施以刑仗,撤去簪珥,囚于偏僻的钟粹宫北

① 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第66卷,第4页。

② 适园主人《三海见闻志》丛刊《戊戌变法》(四)第215页。

③ 德龄:《瀛台泣血记》第301页。

三所,并再也“不许进见”^①光绪帝。珍妃也成了打入冷宫的囚犯,由两个宫女监视,“门自外锁,饭食自槛下送进”,“窘苦备至”^②受尽折磨。珍妃倒挺坚强,“她从来没有向那一个太监作过什么询问或是请求,她始终是静默着。虽然她心里自必也极想知道光绪的近况,和他们俩以后有没有再见面的日子。”^③光绪帝通过小太监探听到珍妃的下落以后,多想与她互抒情怀,在几个太监的帮助之下,总算搞了几次“偷渡”。当光绪帝悄然走近关押着珍妃的那座冷宫,其情景是如何的凄凉,那三具大锁无情地横在两扇大门中间,把光绪帝与珍妃隔离为“咫尺天涯”的两个世界。每次他们只能攀着窗栅,凑在那横钉着木板的隙缝里说上几句心里话语,每次又各自带着一颗粉碎了的心依依而别。

光绪帝身陷囹圄,其复仇的怒火一直在他的心底里燃烧着,出自封建伦理纲常,他过去和现在都没有怀着伤害他的“亲爸爸”慈禧太后的念头,只是想从她的手里转移权力。而今光绪帝把一切怨恨都集在出卖新政的袁世凯和迫害他与珍妃的李莲英这两个恶魔身上,他多想待以后恢复权力的那一天,“把这两个可恶的叛奴斩首抄家”,出一口恶气。^④岂料光绪帝比袁、李的靠山慈禧太后早驾崩而未能实现他的复仇愿望。

前面已经指出,慈禧太后虽然权力盖世,“乾纲独断”,可是她的心态终日处在惶惶不安的过敏、多疑之中。虽然她控制清朝权力长达半个世纪,历经两次的“听政”和“训政”,在

① 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第66卷,第4页。

② 《故宫周刊》第30期“宫中人语”。

③ 德龄:《瀛台泣血记》第306页。

④ 德龄:《瀛台泣血记》第308页。

宦海航舟中也曾遇到过多次的风险,而她总能耍弄权术,化险为夷。可是这次“训政”,她的心态同以往截然不同了,过去“听政”、“训政”时期,她年富力强,精力充沛,又是同治帝的亲生母亲,光绪帝的亲手扶植人和领养母亲,太后临朝古已有之,她凌驾于皇帝头上,顺理成章,她的自我感觉十分优越,朝廷上下也无可非议。而现在,她步入暮年,不仅精力衰退难以支撑日理万机的朝廷大政,更为要紧的是她对臣民精神控制力日渐下降,人们对她的离心力与日俱增。尽管“百日维新”短命夭折,然这场维新运动启开了中国人的思想大门,特别是光绪帝发出的一道道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诏令,犹如一串打开门锁的钥匙,人们心灵的门户一旦开放,是再也不能重新锁闭的。维新运动也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其潜在影响力是巨大的,西方社会的民主观念,开始在一部分人中萌芽,他们对于名为“训政”实是“垂帘听政”的严酷事实极为反感,因而人们的逆反心理是慈禧太后独裁统治最大的思想阻力。今天被幽禁瀛台的光绪帝虽然是变法运动的失败者,但是经过这场维新变法运动,他在人们的心目中其形象是高大的,这也是慈禧太后的强权无能改变的现实。何况中国几千年来封建伦理的忠君思想根深蒂固,人们不仅对光绪帝身陷逆境寄予深深的同情之心,并且对光绪帝重掌朝政也期于强烈的企望。同慈禧太后相比之下,现在的光绪帝是二十八岁的年轻国君,他有抱负励精图治,他有勇气同顽固派继续斗争,人们相信光绪帝决不会屈服于强暴,甘心做旧势力的囚徒。戊戌变法以后,光绪帝的影响犹存。稍有头脑的人都知道强权可以扼杀新政,可以幽禁皇帝,然而强权是抵抗不住寿终正寝的自然法则。到那时,太上皇归天,光绪帝仍是名正言顺的大清皇帝,未来的天下属于光绪帝,这种

观念在洋务派中反映尤为明显。同时,资本主义列强对于新政的失败,不是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他们的政治天平明显地向着光绪帝和流亡海外的维新派人士一边倾斜。

年逾花甲的慈禧太后,精力虽不如往昔,可是她头脑清醒,思路敏捷,她不是“老谬昏庸”之辈。正因为如此,她认为光绪帝的存在是致命的威慑力量,在政变以前曾处心积虑地策划废立阴谋,戊戌政变“以帝疾作,宣示中外”,皇太后“慈恩训政”,只不过是推行废立阴谋的第一步。西太后把光绪帝囚禁瀛台以后,令太医“每日造脉案药方,传示各衙门”,^①制造“疾作”假象。并把光绪帝“患病”情况密电各省督抚,通报驻京外围使馆。皇帝“患病”消息传开马上引起朝野的种种怀疑和震惊,舆论哗然。“候选知府经元善在上海联合海外侨民,公电西朝,请保护圣躬(指光绪帝——引者)”^②;“南洋星架波、吉隆等埠,清国绅商,咸联名电请皇帝安。”^③慈禧太后刚刚敲响“废立”阴谋的锣鼓,就遭到各方面的怀疑与抵制,这不能不是对顽固势力的当头一棍。舆论的抵制,没能使慈禧太后放慢“废立”步子,她考虑到当前最重要的是取得地方实力派的支持,废立之谋才不会激起“天下之乱”,因而她不断地向一些颇有资历的地方总督“吹风”,以摸清他们的态度。“孝钦既定难,欲逐废德宗,手诏问刘坤一、张之洞。”^④然而,地方洋务派对“戊戌政变”的态度不同于顽固派,他们同维新运动多少有过一段同轨行车的路程,观念上也有不少的共识之处。尤其刘坤一、张之洞之辈,他

①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丛刊《戊戌变法》(一)第477页。

②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丛刊《戊戌变法》(一)第477页。

③ 《知新报》光绪二十五年九月二十一日。

④ 魏元旷:《魏氏全书》,丛刊《戊戌变法》(四)第313页。

们在五年以前的中日甲午战争时怨,曾主张抗战,并受到光绪帝的器重,委以要职。鉴于上述因素和洋务派自身的利益,他们对“废立”的态度较为慎重,不轻易的上慈禧太后的贼船。“张之洞依违不递答”持着沉默保留态度;“刘坤一力陈不可”,^①明确地表示了反对立场,他还复电劝荣禄说:“君臣之义已定,中外之口难防,坤一为国谋者以此,为公谋者亦以此。”^②刘坤一是世故极深的洋务派头子,他意识到废立光绪帝不得人心,若行此谋天下必乱,所以他说:“君臣之义已定,中外之口难防”,就是这层意思。刘坤一、张之洞的抵制,慈禧太后废立阴谋又碰到了钉子。同时,废立光绪帝的阴谋活动也遭到在华外国使馆的反对。资本主义列强他们不愿意看到在亚洲继日本之后又一个强国的出现,然他们更不愿看到中国“回复到四十年前排斥外国人的时代”,^③所以他们同慈禧太后镇压维新运动站在对立的立场上,一面极力设法护送康、梁出逃并为他们提供海外活动的条件;另一方面千方百计地力图摸清光绪帝的“病情”和下落,实际上是对慈禧太后的废立阴谋施加压力。由于“看到国内舆论人情的反抗”和资本主义列强的压力,所以慈禧太后与荣禄的废立密谋只“得暂不动”^④手。

不除掉光绪帝慈禧太后的最终威胁也就不能解释,因而“暂”了一年之后,慈禧太后“废立”之念复生,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899年12月28日)退早朝之后,荣禄同西太后独对:

① 魏元旷:《魏氏全书》,丛刊《戊戌变法》(四)第313页。

② 王照:《方家园杂咏十首并纪事》,丛刊《戊戌变法》(四)第360页。

③ 《字林西报周刊》,丛刊《戊戌变法》(三)第517页。

④ 《李提摩太传》,丛刊《戊戌变法》(四)第234页。

(荣禄)问太后曰:“传闻将有废立事,信乎?”太后曰:“无有也,事故可行乎?”荣曰:“太后行之谁敢谋其不可者?顾上罪不明,外国公使将起而干涉,此不可不慎也。”太后曰:“事且露奈何?”荣曰:“无妨也,上春秋已盛,无皇子,不如择近宗近支建为大阿哥为上嗣,兼祧穆宗,育之宫中,徐纂大统,则此举为有名矣。”太后沉吟久之曰:“汝言是也。”^①

这两位满洲贵族中老练的阴谋家秘密策画,以“建大阿哥”的方式来实现其“废立”阴谋。她们为了私利,竟不顾康熙皇帝颁立“永不建储”;“臣下有请者立斩”和雍正帝确立的秘密立储家法,经过物色权衡,决定立载漪之子溥仪为“大阿哥”。载漪其人,是嘉庆帝第三子洵庆王绵恺孙,咸丰年间出继端亲王绵忻,袭贝勒爵。光绪十五年(1889年)加郡王衔任御前大臣,封端郡王,其妻乃慈禧太后侄女,所以其子溥仪也有那拉氏的血统,这也是被慈禧太后立为“大阿哥”的原由之一。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00年1月24日)召集王公大臣,用光绪帝的名义颁布上谕:“仰遵慈训,封载漪之子溥仪为皇子,以绵统绪。”又谕:“明年正月初一日大高殿、奉发殿、寿皇殿三处著派大阿哥溥仪恭代为行礼。”^②即着溥仪被接进皇宫,从此这个贪婪厌学的满洲贵族子弟成了事实上的新皇帝,难怪内廷“苏拉”(小司员)称这一举动为“今日换皇上矣”。^③

慈禧太后与荣禄导演的一出“建大阿哥”闹剧,他们自以为演得天衣无缝,然而,闹剧刚开场,就成了舆论界的众矢之

①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丛刊《戊戌变法》(一)第478页。

② 《清德宗实录》第457卷,第11页。

③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丛刊《戊戌变法》(一)第478页。

的,人心一片混乱。“自下立嗣之谕后,都中人心大为震动”,认为“名为立嗣,实则废立”。上海得悉立“大阿哥”消息之后,“绅商士庶”,“人心沸腾”,有一千二百人“合词电奏”发出“我皇上二十五年励精图治,深入人心,论肌浹髓,皆有奋不顾身,与君存亡之志”^①的强烈抗议之声。两江总督刘坤一得到建储谕旨“愤甚,继以痛哭,言当即日入京,面见太后陈奏”^②。立“大阿哥”消息传至湖北,“各官绅之有血性者,闻此耗如空中下一霹雳,是夕即纠合同志,拟抗伪旨力争。”^③事实说明光绪帝在“百日维新”期间所发出的一道道变法诏令,绝非一纸空文,新政的影响已经成为不可抗拒力量。光绪帝作为维新运动的旗手,深得人心,正如当时的《知新报》所指出的那样:“清民归附皇帝如赤子之恋慈母,此清国不亡之象也。”^④这也是慈禧太后建了溥仪为“大阿哥”以后,不敢马上废光绪帝位的原因之一。

357

当时在华的主要资本主义列强对慈禧太后建储立“大阿哥”举动也采取了反对立场,并且不时地向顽固派施加压力。“各国公使拟决意出面干预此事”,“各国兵轮皆于(十二月)二十六日鼓轮北驶”,^⑤以牵制慈禧太后废光绪阴谋进一步展开。

虽然溥仪这位“大阿哥”只有当了两年的“未来皇帝”即被废除,可是慈禧太后和荣禄建储立“大阿哥”的阴谋活动,给光绪帝的心灵带来了莫大的创伤,加深了他内心痛苦,在

① 丛刊《戊戌变法》(三)第474页。

② 丛刊《戊戌变法》(三)第473页。

③ 丛刊《戊戌变法》(三)第475页。

④ 《知新报》光绪二十五年九月二十一日。

⑤ 《知新报》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

这样一次又一次的精神折磨之下 ,逼着光绪帝一步步走上中年驾崩的道路。

第二节 国难与君难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1900 年 7 月 22 日)是光绪帝的三十岁寿辰 ,照例应该大事庆贺。尽管目前光绪帝瀛台幽禁 ,实际上已被剥夺了帝位 ,但他还是名义上的大清朝皇帝 ,慈禧太后仍须要装饰门面 ,逢场作戏地庆贺一番。而今光绪帝的三十岁生日气象萧条 ,门庭冷落 ,据记载 ,这一天“东华门不启 ,群臣皆入神武门。冠裳寥落 ,仅成朝仪。红巾满都市 ,服饰诡异 ,持刃汹汹杀人 ,诸臣入贺者咸有戒心。”^①除了这般简单而又冷落的仪式之外 ,别无“沛恩”、“赏赐”之类的常例。光绪帝三十岁寿辰弄得如此萧条凄凉景象 ,便是国难与君难的真实写照。

光绪二十六年夏秋之交 ,我们的国家又遭受了一次严重的战祸兵灾。正值光绪帝生辰之际 ,德、英、俄 ,美、法、意、日、奥八个帝国主义列强组成的联军 ,占领了天津 ,并连日向北京逼近 ,北京城内局势也为义和团所控制。

光绪帝的命运和中国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 ,多灾多难 ,饱经创伤。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 ,光绪帝幽静地在瀛台度日如年 ,精神上受尽折磨 ,也是在这个时候 ,义和团运动的烽火在中原大地熊熊地燃烧起来。其时 ,慈禧太后同一些顽固派骨干忙着策划“废立”活动 ,而义和团运动迅速蔓延 ,

^① 恽毓鼎 :《崇陵传信录》丛刊《义和团》(一)第 52 页。

其组织遍及山东、直隶诸省，叛乱的星火燃烧到了朝廷的脚前。前些日子的维新变法运动以及近来的“废立”活动已经使慈禧太后烦躁不安，而今又发生了义和团运动，更使她感到焦头烂额，“剿”“抚”两难。慈禧太后仍热衷于“废立”活动，幻想用“抚”的手段尽快解散各地的义和团组织，一则可以不触犯帝国主义；二则可以不妨碍“废立”大计。五月初七日她叮嘱军机大臣荣禄说：“不得孟浪从事……激成变端，是为至要”^①，同时派出协办大学士刚毅和刑部尚书赵舒翹、顺天府尹何乃莹到涿州去“宣布朝廷德意”，“说服”义和团自行解散^②。刚毅等到涿州“劝导”的时候，北京城里义和团的活动也趋燎原之势，据史料记载：

自三四月间，都城即有聚习拳棒之事，犹属闾巷幼童，近则外来拳民，居然结党横行，深可骇异。……宣武门外炸子桥内有破庙名朝庆庵者，自五月初一日，忽来五六十人，供立神牌，演习符咒，日以砍刀炫惑市人。至初八日不知移住何处，仍有其党数人留在庵内。闻内城大佛寺，亦有此事。则其他旷僻之区，更可知矣。初十日清晨，又有拳会一百余人，分持刀、枪、棒，直出彰仪门，不知何往。尤可骇者，近时前门外打磨厂等处铁匠铺，日夜工作，铸刀甚多^③。

义和团是成份极为复杂的群众组织，他们的矛头主要指向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近来各省教堂林立，教民繁多，逐有不逞之徒，爇迹其间。……藉入教为名，欺压平民，武断乡曲”^④。

① 《荣文忠公集》卷3，第14页。

②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37页。

③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21～122页。

④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四）总第4515页。

因而各地义和团组织便把外国教会和依仗教会势力为非作歹的教徒为直接的斗争对象,他们捣毁教堂、捕捉教徒,拆除教堂集聚地区的铁路建筑,开展了朦胧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斗争。义和团的排外活动为帝国主义再次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找到了藉口,他们看到清政府对局势的发展已经失控,因而便打出了“保护使馆”、“保护教堂”的旗号,决定派出兵力直接动手镇压。

光绪二十六年三月间,英国派出兵船三艘,美国、德国、意大利各派兵船一艘开到了大沽口。四月间,英、美、德、法四国公使先后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要求清政府对义和团采取镇压措施,并声称将要“派兵自行保卫”^①。俄国公使向总理衙门通报说:“各国政府以为中国自己不能管辖其民,势必派兵来京,自行保护”^②。五月初一日(5月28日)各国公使会议,决定立即调兵进入北京“保护使馆”。五月底六月初,天津的义和团和部分清军一起同帝国主义联军展开了浴血奋战。北京面临着外国军队“纷至沓来,后患何堪设想”的直接威胁。当时在清政府统治的心脏地带,存在着两股威慑力量,就是义和团与帝国主义的联军。然而,这两股力量都有为清政府所利用的价值,即利用联军去镇压义和团运动;或者利用义和团力量去报复帝国主义列强对慈禧太后“废立”活动的干预。

为了权衡利弊,从五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6月16日至19日)慈禧太后召集朝廷大臣在仪鸾殿举行了四天的御前会议,商量应付局面的决策。

①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90页。

②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99页。

光绪帝也参加了御前会议。

此时的光绪帝,其处境稍微有所松动,慈禧太后“废立”光绪帝的阴谋和建储“大阿哥”活动遭到各方面的抵制,顽固派也意识到光绪帝在朝廷上下,国内国外潜在着巨大的影响力,故而他们不得不继续把光绪帝当作装饰品保留着。尔今清朝统治政权处在内忧外患的严重时刻,更需要推出光绪帝作为他们的挡箭盾牌。御前会议由慈禧太后亲自主持,以她的好恶定策,光绪帝在御前会议上自然只是被衬托而已。

参加御前会议的有王公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等一大群中枢衙门的主要长官,会上群臣纷纷陈词,主和主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吏部侍郎许景澄首先进言说:“中国与外交数十年矣,民教相仇之事,无訾无亡,然不过赔偿而止。惟攻杀使臣,中外皆无成案。东交民巷使馆,拳匪日窥伺之,几于朝不谋夕,倘不测,不知宗社生灵,置之何地?”^①太常寺卿袁旭也认为“衅不可开,纵容乱民,祸至不可收拾,他日内讷外患,相继而至,国何以堪?”^②他们主张把义和团运动坚决镇压下去,认为纵容民乱和拳匪是清朝统治的心腹之患,得罪了洋人“祸至不可收拾”。“官怕洋人”这是清朝官僚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贯思想,支持采取镇压义和团去讨好洋人政策的有军机大臣王文韶、兵部尚书徐用仪、内阁学士联元,户部尚书立山等。这伙大臣有的曾是中日战争时期的主和派,或是出使过国外者、或曾参与对外谈判签订条约者,他们被帝国主义的气势汹汹所吓倒。以为凭清朝的军事力量,只镇压手持大刀长矛

361

①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丛刊《义和团》(一)第13页。所云“攻杀使臣”指五月十五日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被日军士兵所杀一案。

② 袁旭:《乱中日记残稿》,丛刊《义和团》(一)第337页。

的义和团,而决不能同洋枪洋炮装备的联军作战。

持相反意见的是端王载漪、庄王载勋、辅国公载澜、贝勒载瀛、大学士徐桐、协办大学士刚毅等人。他们认为义和团势力已经不可遏止,如果强行剿办,必酿成大祸,不如利用义和团来对抗洋人。胜则“废立”大计得成,败则义和团被扑灭,清朝威胁当可解释,所以他们竭力鼓动义和团排外。说什么“义民可恃,其术甚神,可以报雪仇耻”,“时不可失,敢阻挠者请斩之”,^①主张义和团立即同联军开战。这伙大臣多数是顽固派中坚和慈禧太后亲信的内圈人物。他们煽动义和团同联军开战,一部分人是站在顽固满后的满洲贵族立场上,愚昧无知,他们相信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法”、可制胜洋人,例如协办大学士刚毅就是这样的顽固分子。然而,有人是别有用心者,如载漪、载勋之流,妄图利用义和团排外、制造混乱以推进“废立”光绪帝的阴谋。他们“颇怙揽权势,正觊国家有变,可以挤摈德宗,而令其子(溥仪——引者)速正大位。”^②经管溥仪学习事务的大学士徐桐、刑部尚书赵舒翘等人,看风驶舵,也“竭力阿附”^③。

御前会议一开场就展开了“抚”与“剿”、和与战的两种意见的争论。主持御前会议的慈禧太后虽然倾向于“宣战”一边,时以“目慑之”向载漪、载勋暗示,但却装出一副听从皇帝裁决的样子说:“此国家大事,当问皇帝”^④,逼着光绪帝表态。慈禧太后把光绪拉来参加御前会议,目的就是要在关键时刻利用光绪帝号召天下,收拾僵局,这也是她立“大阿哥”

①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丛刊《义和团》(一)第13页。

② 吴永口述、刘治襄记:《庚子西狩丛谈》第12页。

③ 吴永口述、刘治襄记:《庚子西狩丛谈》第12页。

④ 吴永口述、刘治襄记:《庚子西狩丛谈》第114页。

之后继续保留光绪帝位子的用心所在。当然这位老奸巨猾的女强人也曾经考虑到目前她面临的是非常严峻的局势,一旦出现不测仍可嫁祸于人,把光绪帝当做她的替罪羔羊。

光绪帝在中法、中日战争中都持主战立场,可是这次他静观事态,认真思考敌我力量悬殊的实际情况,抒述自己的态度。他说:“人心何足恃,祇益乱耳。今人喜言兵,然自朝鲜之役,创钜痛深,效亦可睹矣。况诸国之强,十倍于日本,合而谋我,何以御之?”^①“断无同时与各国开衅(之)理”^②。光绪帝明确表示反战立场,并非是他害怕列强,也不是对列强存在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是基于对当时中外实际情况的分析后所得出的态度。显然光绪帝的表态不合慈禧太后的要求,御前会议仍须继续进行。

慈禧太后的打算是利用义和团排外,为其实现“废立”阴谋扫除障碍。因为“康党既败,太后再出垂帘,外人颇有违言”,英国公使明确表示“遇有交涉,我英认定光绪二字,他非所知”,^③反对慈禧太后废光绪皇帝另立新君的阴谋。在御前会议期间,通过载漪、荣禄等人传来了一个不确的情报,即所谓“外交团照会”有四条要求,其中一条是“逼太后归政”^④。慈禧太后顿生“火气”,怒冲冲地说:“彼族竟敢干预我家事,此能忍,孰不可忍!外人无理至此,予誓必报之。”^⑤为了报复列强,她就下了冒险“宣战”的政治赌注。

在御前会议上袁旭“力言莫急于先自治乱民”,就是说,

①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丛刊《义和团》(一)第13页。

② 吴永口述、刘治襄记:《庚于西狩丛谈》第114页。

③ 《国朝事略》,丛刊《戊戌变法》(四)第278页。

④ 《国朝事略》,丛刊《戊戌变法》(四)第278页。

⑤ 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第67卷,第2页。

最急的是用自己的力量去消灭义和团,然后才能同外国公使商量,请他们不要再调兵入京。慈禧太后马上用“顺民心”的美言把袁旭的意见驳了回去。她说:“现在民已变,总以顺民心为最要,汝所奏不合”^①。她所谓的“顺民心为最要”,就是北京局势已经失控,清政府再也没有力量去“自治乱民”了,不如顺水推舟,利用义和团的力量去报复外国使团对清朝“家事”的干预。慈禧太后还在御前会议上打下推脱历史责任的埋伏,她说:“今日之事,诸大臣均闻之矣,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顾事未可知,有如战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我苦心,勿归咎予一人”^②。列强干预清朝“家事”,触犯了她的命根,头脑发热到不可遏制的地步,明知向联军“宣战”是极冒险的政治赌博,有倾家荡产的可能。而慈禧太后一面要众臣“勿归咎予一人”,一面却一意孤行而为之。

在“宣战”势力压倒优势的情况下,光绪帝不顾个人安危,再次阐明自己的主张,希望“劝说”西太后改变成见,慎重决策。他在御前会议上指出:“国家安危,在此一举”^③“战非不可言,顾中国积衰,兵又不足恃,用乱民以求一逞,宁有幸乎?”“乱民皆乌合,能血肉相搏耶?且人心徒空言耳,奈何以民命为儿戏?”^④光绪帝还进一步指出:“忠义之气,虚而不实,况未经训练,一旦临阵,枪林弹雨之中,徒前敌,其能久持乎?是以不叫民战,直是弃之”^⑤。光绪帝的“侃侃而谈”显

① 袁旭:《乱中日记残稿》,丛刊《义和团》(一)第337页。

②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丛刊《义和团》(一)第49页。

③ 吴永口述,刘治襄记:《庚子西狩丛谈》第18页。

④ 见丛刊《义和团》(一)第13页。

⑤ 《庚子记事》第81页。

然离开了慈禧太后的心谱 ,故而当即遭到责问 :“为今之计将安出 ?”光绪帝理直气壮地回答说 :“寡不可以敌众 ,弱不可以敌强 ,断未有以一国能敌七八国者。为今之计 ,惟有停战议和为上策 ,其次则迁都 ”^①。光绪帝议和、迁都之见 ,是当时唯一可以减少损失的选择 ,鉴于历史教训 ,现在国力比五年前中日战争时期更加衰弱 ,而今面临的又是众多帝国主义者组成的联军 ,“寡不可以敌众 ,弱不可以敌强 ” ,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所以光绪帝认为断不能冒险“宣战”。说明光绪帝虽然幽居瀛台与世界隔绝 ,但他仍然保持清醒头脑 ,凭着维护祖业的责任心和不忍看到“十八省数万万之生灵 ,将遭涂炭 ”^②悲剧的出现 ,公然同慈禧太后唱反调。同时 ,他还向众臣表白自己的心思说 :“朕岂惜一身 ,然如太后及宗庙 ?且古未有京城糜烂如此 ,尚能布置一切者 ”^③。光绪帝襟怀坦白 ,不顾慈禧太后的淫威 ,反对“以民命为儿戏”的冒险战争 ,在身陷逆境的情况下 ,是极为可贵的本质。他也不信迷信 ,正视实际。当时一些满洲贵族和清朝官僚把义和团的“法术”吹得神乎其神。协办大学士刚毅跑到涿州视察义和团状况 ,竟然相信学了“神拳”“能避刀避枪”的荒诞怪论。^④许多官僚在上书进言时也大肆渲染封建迷信 ,说什么“山东老团一扫光、金钟罩、九龙灯之属 ,能役鬼神 ,烧海中船尽坏 ,居一室斩首百里外 ,不以兵。”^⑤有一御史在奏折中说得更加奇离无稽 ,说 :“今皇天佑我大清 ,假以神力 ,殛彼异类 ,义民云集 ,抗

① 丛刊《义和团》(一)第253页。

② 袁旭 :《乱中日记残稿》丛刊《义和团》(一)第339~340页。

③ 丛刊《义和团》(一)第253页。

④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 ,第140页。

⑤ 李希圣 :《庚子国变记》丛刊《义和团》(一)第15页。

刃前驱,不烦一兵,不糜一饷。”^①尽管慈禧太后还没愚蠢到以为靠这种可笑的“法术”能够打败联军这等地步,但是封建迷信的充斥,造成了她一意“宣战”的社会条件。迷信误国,光绪帝可贵之处就在他不被迷信遮住了视线,更不对封建迷信抱着愚蠢的希望。他拨开迷雾,阐明己见,丝毫未减当年锐意变法时的敏捷目光和魄力,可惜现在光绪帝毫无“事权”,未能改变慈禧太后的冒险主见。

在五月二十二日的御前会议上,载漪从极端私利出发,竟煽动围攻使馆,慈禧太后当即表示“许之”,连得她的亲信荣禄也认为这种做法,是太冒险之举,向太后进行了“劝说”。军机大臣王文韶请求慈禧太后“三思”,而她根本听不进去,“火气”愈发上升,竟“手击案骂之”^②。吏部侍郎许景澄还想再次进言劝阻太后,光绪帝拉着许景澄的手沉痛地说:“兵端一开,朕一身不足惜,特苦天下苍生耳,”^③这一动作被西太后察觉,她厉声责斥光绪帝:“放手,毋谈事!”^④

五月二十三日(6月19日)最后一次御前会议上慈禧太后脑子里的温度上升到了沸点,强行通过对联军的“宣战”决策。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又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出诏书,正式宣战。诏书曰:

“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僉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

①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丛刊《义和团》(一)第15页。

②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丛刊《义和团》(一)第14页。

③ 《庚子记事》第81页。

④ 浑毓鼎:《崇陵传信录》丛刊《义和团》(一)第49页。

者不下数十万人,下至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①

慈禧太后这个“宣战诏书”,目的是为了避开义和团的斗争矛头,并把他们推到同联军作战的最前线,是彻头彻尾的利用义和团排外来报复列强干预她的废立“家事”,又利用联军的洋枪洋炮屠杀义和团的大骗局。

既然清政府正式同联军宣战,那么帝国主义的侵略也就可以放手大举向京、津进攻了。六月十七日(7月13日)俄、英、法、美、日发动了对天津城的攻击,次日清晨入城,占领天津。在天津沦陷二十天之后,侵略军由天津沿运河两岸,向北京进发。七月二十日(8月14日)侵略军进入北京城,义和团同侵略军浴血巷战,无数民众倒在联军的屠刀之下。继四十年前英法联军占领北京之后,首都又一次为各国侵略军所占领。

367

冒险主义者的另一极端就是逃跑主义。当侵略军步步向北京进逼之时,慈禧太后并没有认真的进行战争部署,却在紧张地准备着出逃事宜。光绪帝曾以同外国使团“面谈”为由向慈禧太后请求留京,企图利用这种特殊的机会来改变被幽禁的境遇,进而摆脱西太后的控制。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慈禧太后视光绪帝为政治赌注和最危险的政敌,因而更加严密地注视着光绪帝的动静,以为“帝留不为己利”^②,她不但拒绝了光绪帝留京请求,并且还采取了极为残忍手段,命爪牙把与光绪帝志同道合的珍妃投入了宁寿宫外的一口井里,其时,珍妃年方二十五岁,成了晚清宫廷争斗的牺牲

①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63页。

② 丛刊《义和团》(四)第43页。

品。光绪帝对于珍妃被害“悲愤之极,至于战栗”^①,精神上又受到了一次深重的创伤。七月二十一日(8月15日)光绪帝怀着失去心爱的珍妃悲痛心情,被慈禧太后挟持离了北京。离京前夕,西太后命“全权大臣李鸿章著准其便宜行事,将应办事宜,迅速办理,朕不为遥制。”^②八月十四日(9月7日)匆匆到了山西太原,又派出庆亲王奕訢回京,协助由上海奉命返京的李鸿章办理交涉事宜。九月初四日(10月26日)慈禧太后一行逃到了西安。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1901年9月7日)清政府的全权代表在《辛丑条约》上签字。八月二十四日(10月6日)慈禧太后挟持着光绪帝从西安启程,到十一月二十八日(1902年1月7日)回到了北京,结束了一年多的逃亡生活。八国联军武装侵略中国是近代史上的一次大灾难,在国难中光绪帝失去了心爱的伴侣——珍妃,中国人民身上又多了一道深重的枷锁——《辛丑条约》。可是对清朝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来讲,没有什么增多缺少,她仍然主宰着一切,继续坐在太上皇宝座上统治全国。

第三节 夙愿未酬身先逝

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902年1月7日)光绪帝回到北京,在至皇宫途中他“略略把坐辇上的丝罩拉开一

① 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第67卷,第5页。

② 丛刊:《义和团》(四)第43页。

些,想看看都中别后的风物。不料一连看到了好几个雄纠纠气昂昂的外国兵,荷枪实弹地在街上走着,或是在城墙上站着,使他立刻感到一种不能形容的耻辱。”^①光绪帝怀着国耻回到皇宫,“大行新政”仍是他所渴望的夙愿,前几年他亲手缔造的事业,从“心底上,始终确认那些新政的策划是绝对合理的,绝对可以推行的。但须等到老佛爷撒手西归的时候,他一定可以很顺利地干一番。”^②自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后,光绪帝的处境有了一丝转机。朝野形势的发展趋向对他是有利的。

首先,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下去不久,八国联军退出津、京地区,列强强迫清朝签订的《辛丑条约》,在中国人民身上加深了灾难,可是对慈禧太后来讲,无根本利益损害,在签约前夕,她曾慷慨表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③回到北京以后继续过着穷奢极欲的女皇生活。战后,外国使团也无进一步干预清朝“家事”迹象出现,慈禧太后原来的恐惧心理有所放松,因而对光绪帝的控制比战前也随之宽大了一些,让他有较多的机会参预朝政,当然这些参预必须在慈禧太后的安排下进行。

其次,慈禧太后原来准备取代光绪帝而立的“大阿哥”溥仪,自被接入皇宫之后,行为荒诞不轨,臭闻传遍宫廷。溥仪随慈禧太后逃往西安期间,他“顽劣日甚,时与宦官等私出冶游,甚至在宫中拔取皇后之簪珥以为戏乐。”^④溥仪的行为得到慈禧太后的庇护而愈发胆大妄为。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以

① 德龄:《瀛台泣血记》第355页。

② 德龄:《瀛台泣血记》第287页。

③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945页。

④ 《清鉴辑览》第27卷,第3页。

后,他的父亲载漪以及载澜等人都被帝国主义列为“惩凶”对象,慈禧太后于光绪二十六年底予以“惩治”,发往新疆,永远监禁。载漪集团的瓦解,“大阿哥”也就失去了价值。况且慈禧太后选定的光绪帝自小入宫,安分守己,又是她的亲甥,对“亲爸爸”唯命是从。可是到了亲政以后,也要离开她的政治轨道,而自行其政。鉴于立光绪帝入承继嗣的教训,她自然考虑到溥仪这个放纵不羁的花花公子,一旦与她反目,后果更加不可收拾。所以在光绪二十七年十月二十日(1901年11月30日)慈禧太后返京途中降懿旨声称:

“已革端郡王载漪之子溥仪,前经降旨立为大阿哥,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宣谕中外。慨自上年拳匪之乱,肇衅列邦,以致庙社震惊,乘舆播越。推究变端,载漪实为祸首,得罪列祖列宗,既经严谴。其子岂宜膺储位之重。溥仪亦自知惕息惴恐,吁恳废黜。自应更正前命,溥仪著撤去大阿哥名号,立即出宫。”^①

溥仪驱逐出宫,载漪发配新疆,光绪帝在政治上减去了一大威慑力量。慈禧太后暂时没有新的废立花招施出,自然对这位名正言顺的大清朝皇帝要故作姿态,以装璜门面,所以光绪帝也就多少有了一些“自由”和参政机会。

其三,人必衰老的自然规律纠缠着年已古稀的慈禧太后,自外逃回宫之后,她的健康状况一年不如年,到了光绪三十年左右,“太后根本已没有什么精神来监视光绪。因为她老人家已经病了,国事的棘手和年龄的增长,终于也使她进入了每个人所不能避免的老倦的阶段。最近她除掉还能进

^①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四)总第4784页。

些饭食之外,一切的政事,都完全不问,每天只在宫内服药将息”。^①慈禧太后的逐渐倦老,光绪帝重新执政的希望逐渐接近,“大行新政”的夙愿将成为现实,这就给他精神上有所倚托。

光绪帝在回宫后的一段岁月里,除了作为慈禧太后的陪衬,参预朝仪、御览臣工的部分疏奏之外,仍被幽禁瀛台过着与外世隔绝的寂寞生活,由于形势的发展给他带来了一丝新的转机和希望,所以光绪帝仍是“朝夕研求”古籍文献,“于西学书尤为留意”,^②女官“德龄每日以一小时教皇上以英文,皇上天资颖悟,记忆力绝强,故进步綦速。”据德龄著述称,“每早见皇帝,当余有暇时,光绪帝必问英文,所知甚多。余见皇帝,极有趣味。在太后面前,面容肃默,或有时如一呆子。若离开时,全然又是一人。”^③除向德龄请教英文之外,光绪帝还常问德龄关于西方国家的人情风物和各国之间的关系,他虽静居瀛台但目光仍投向世界。光绪帝在涵元殿埋头攻读,不全是为了打发光阴,更是企望着重新推行维新改革的政治抱负的实现。

自西安回宫,光绪帝又在瀛台孤单寂寞地度过了七个年头,他苦苦地等待着“老佛爷撒手西归。”呜呼哀哉!夙愿未酬身先逝,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年11月14日)酉刻(傍晚)三十八岁的光绪皇帝躺在冰凉寂静的瀛台涵元殿里,满含悲恨离开了人间。时隔不到一昼夜,二十二日下午未刻(中午)操纵清朝大政达半个世纪的太上皇——慈禧太后也崩于皇宫仪鸾殿,终年七十四岁。仅在二日之

371

① 德龄《瀛台泣血记》第35页。

② 王照口述、王树楠笔记:《德宗遗事》第56页。

③ 《清朝野史大观》第1卷,第102页。

间,清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和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接踵而崩,这是历史的巧合。中年的光绪帝崩在年迈的慈禧太后前步,不禁使人们对于光绪帝之死因产生种种猜测,成为清末最大的一桩历史疑案。关于光绪帝的死因有几种说法:

一种说法认为,慈禧太后在病危期间,惟恐自己死后光绪帝重新执政继续推行新政,翻她一手制造的种种冤案,所以指使太监下毒手害死光绪帝,以绝后患。此说出自下列书籍记载。

《清室外记》:“皇帝宾天之情形及其得病之由,外人无由详知,惟藏于李莲英辈之心中。关于太后,皇帝同时而崩,北京城中,言人人殊,然欲查其原因,则实毫无线索。但日处忧城之中之帝,一旦再操大柄,自为李莲英之不利。”

《清稗类钞·迷信类》:“因谓孝钦病革,不愿先帝升遐,授命亲信太监鸩毙之者。”

《崇陵传信录》:“帝闻太后病,有喜色”,(太后)曰:“我不能先尔死。”

清末名医屈桂庭在《诊治光绪帝秘记》(载《逸经》第29期)一文说,临死前三天见光绪帝“在床上乱滚”,“向我大叫肚子痛得了不得”,且“面黑,舌黄黑”,“此系与前病绝少关系。”

《瀛台泣血记》:“万恶的李莲英眼看太后的寿命已经不久,自己的靠山,快要发生问题了,便暗自着急起来。他想与其待光绪掌了权来和自己算帐,还不如让自己先下手为好。经过了几度的筹思,他的毒计便决定了。”

第二种说法,认定光绪帝是被袁世凯进药毒死的。因为戊戌变法时由于袁的告密,才使慈禧太后血腥镇压维新运

动。慈禧太后死后光绪帝重新执政,必然不会轻饶了他,所以袁世凯下此毒手。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说:“我还听见一个叫李长安的老太监说起光绪之死的疑案。照他说:光绪在死的前一天还是好好的,只是因为用了一剂药就坏了,后来才知道这剂药是袁世凯使人送来的……。据内务府某大臣的一位后人告诉我:光绪帝死前不过是一般的感冒,他看过那些药方,脉象极平常,加之有人前一天还看到他象好人一样,……病重消息传出不过两个时辰,就听说已经‘晏驾’了”。

第三种说法,是最近有的学者从考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清宫医案中得出光绪帝系是正常病死的结论。

认为清宫医案有大量的关于光绪帝病案资料记载,其中既有当年宫内御医为光绪帝诊病用药的档案,也有光绪帝本人向御医诉述的病史、病状以及亲书的“病原”,尤其是光绪帝临死前半年的“脉案”保存得相当完整。这些珍贵的原始诊病记录,应是研究光绪帝生前病状和病因的可靠资料。

根据“脉案”提供的材料,光绪帝的病状和死因是:

一、从光绪帝早年的脉案及其自述之病源来看,他自幼多病,且有长期遗精病史,身体素质极差。如光绪帝在三十七岁(光绪三十三年)时亲书“病原”说,“遗精之病将二十年,前数年每月必发十数次,近数年每月不过二、三次,且有无梦不举即自遗泄之时,冬天较甚。近数年遗泄较少者,并非渐愈,乃系肾经亏损太甚,无力发泄之故。”另据光绪二十五年正月初二日的“脉案”写道:“皇上脉息左寸关沉弦稍数,右寸关沉滑而数,两尺细弱,沉取尤甚。面色青黄而滞,

左鼻孔内肿痛渐消,干燥稍减,时或涕见黑丝。……进膳不香,消化不快,精神欠佳,肢体倦怠。……下部潮湿寒凉,大便燥结,小便频数,时或艰涩不利等症。本由禀赋虚弱,心脾欠虚,肝阴不足,虚火上浮,炎及肺金,木燥风生而动胃火使然。”这种病状本非不治之痕,然迁延日久,损害身体,后果是各种疾病恶性并发。所以到光绪二十六年以后的“脉案”内,就有其病已深入五脏,气血双亏的记录,光绪帝此时已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关节炎或骨结核以及血液系统的疾病,以中医而论,已属癆瘵范畴。

二、临终前半年,此时光绪帝之病复杂多变,日趋恶化,已是病入膏肓,危在旦夕。肝肾阴虚,脾阳不足,气血亏损,在治疗上已是寒凉药及温燥药均不能用,处于无药可对症之严重病状。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御医陈秉钧在“脉案”中云:“调理多时,全无寸效”,说明御医对光绪帝的疾病已是无能为力了。

三、临终前三、四天,光绪帝进入“病危”阶段。十月十七日,三名御医会诊,认为光绪帝已是上盛下虚,元气大亏,病势危笃已极。御医之一的杜锤骏事后说:“皇上气促口臭,带哭声而言曰:‘你有何法救我?’予曰:‘皇上大便如何?’皇上曰:‘九日不解,痰多气急心空。’……予案中有‘实实虚虚,恐有猝脱’语。继大臣曰:‘你此案如何这样写法,不怕皇上骇怕么?’予曰:‘此病不出四日,必出危险。’”就这般病危时期,亦并无发现突发性中毒或受其他伤害现象。二十一日子刻(半夜)开始,光绪帝处在弥留状态,“脉案”记载,“皇上脉息如丝欲绝,肢冷气陷,二日上翻,神识已迷,牙关紧闭,势已将脱,谨勉以生脉饮以尽血忱。”到此日午刻,则脉息“若有若

无。目直视 ,唇反鼻扇 ,阳散阴涸之象 ”出现。延至酉刻 ,终于“龙驭上宾 ” ,与世永辞了。

据上述病情 ,导致光绪帝中年夭折的病因是 :虚劳之病日久 ,五脏六腑皆损 ,阳散阴涸 ,阴阳离决。从现代医学而论 ,主要是肺结核、肝脏、心脏及风湿等长期慢性消耗性疾病 ,造成抵抗力的下降 ,出现多系统疾病。其直接死亡原因 ,可能是心脏功能的慢性衰竭 ,合并急性感染所造成。^①

笔者认为第三种说法以清宫医案的记载为依据 ,从医学病理上也解释得通 ,所以光绪帝死于正常疾病的结论可以成立。

由于光绪帝一生坎坷 ,长期来遭受慈禧太后的凌辱 ,尤其是后十年的幽禁之苦 ,使他在精神上受尽折磨 ,体质愈加虚弱 ,这也是导致光绪帝中年丧生的一个因素 ,因而人们寄予极大的同情。而且光绪帝早逝与慈禧太后一天的巧合 ,引起多方人士的种种怀疑和猜测 ,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 ,光绪帝死后传出的各种死因 ,均没有直接可信的资料为依据 ,所以不能得出“被害致死”的结论。

光绪帝逝世的那天 ,《光绪朝东华录》有如下记载 :有助于分析光绪帝的死因。

谕 :自去年入秋以来 ,朕躬不豫 ,当经谕令各省将军督抚保荐良医 ,……惟所服药方 ,迄未见效。近复阴阳两亏 ,标本兼病 ,胸满胃逆 ,腰腿酸痛 ,饮食减少 ,转动则气壅咳喘 ,益以麻冷发热等症。夜不能寐 ,精神田怠 ,实

^① 参见朱金甫 :《揭开光绪帝“猝死”之谜》载 :《故宫轶事》1984 年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难支持,朕以殊深焦急,著各省将军督抚遴先精通医学之人,无论有无官职,迅速保送来京,听候传诊。^①

《东华录》所载光绪帝病状与“脉案”所载基本相同。即使这些官方文献可以运用权力伪编篡改,那么从“脉案”到《实录》非是一人之力可为,亦未有杀戮幽禁御医或内廷官员灭口之事发生。辛亥革命之后,慈禧太后权力的影响已经消失,如有谋害光绪帝冤案,必有人揭露伸雪。可见在光绪帝驾崩之后的三、四年间,就无人证物证说明光绪帝是“被害致死”,时至今日,也只能凭档案文献的记载作为分析光绪帝死因的主要依据,得出正常病死的结论。

^①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五)总第6021页。

附 录 光 绪 帝 生 平 大 事 年 表

同治十年六月二十八日(1871. 8. 4) ,光绪帝载湫出生在北京宣武门内醇郡王奕譞邸第。

同治十三年十月三十日(1874. 12. 8) ,载湫四岁 ,同治帝患天花疾。

十二月初五日(1875. 1. 12)酉时 ,同治帝于清宫东暖阁逝世。慈禧太后在养心殿西暖阁召集御前会议 ,决定醇亲王奕訢子载湫入承大统 ,改明年为光绪元年。

十二月初六日(1. 13)辰时 ,载湫入宫。

十二月初八日(1. 15) ,两宫太后再次垂帘听政 ,命礼亲王世铎妥议“听政章程” ,通谕中外。

光绪元年正月初八日(2. 13) ,奕譞密奏慈禧太后《豫杜妄论》。

正月二十日(2. 25) ,载湫五岁即皇帝位 ,太和殿举行登基大典。

二月二十日(3. 27) ,同治帝皇后阿鲁特氏绝食自尽。

五月十二日(6. 15) ,加阿鲁特皇后谥号为孝哲嘉顺淑慎贤明宪天彰圣毅皇后。

十二月初七日(1876. 1. 3) ,命内阁学士翁同龢、侍郎夏同善于毓庆宫授读光绪帝 ,命醇亲王奕訢一体照料光绪帝典学一切事宜。

十二月十八日(1.14),两宫懿旨,为侍奉光绪帝典学太监定出戒规。

光绪二年载湉六岁,四月二十一日(5.14),光绪帝子毓庆宫典学。

七月二十六日(9.13),李鸿章与英使威妥玛签订《烟台条约》。

光绪五年载湉九岁,三月二十六日(1879.5.16),同治帝及嘉顺皇后大葬惠陵。御史吴可读尸谏“请为穆宗立嗣”。

同日,慈禧太后懿旨:赏奕~~纘~~食亲王双俸。

光绪七年载湉十一岁,三月初十日(1881.4.8),慈安皇太后突然崩于钟粹宫。

八月初五日(9.27),慈安皇太后奉安东陵。

光绪八年载湉十二岁,九月十八日(1881.10.2),签订《中俄伊犁条约》。

十一月初五日(12.14),翁同~~龢~~入军机处。

光绪九年载湉十三岁,三月二十五日(1883.5.1),命李鸿章赴广东督办越南事宜对法交涉。

四月十三日(5.19),刘永福率黑旗军援越,在河内大败法国侵略军。

八月二十二日(9.22),光绪帝阅彭玉麟关于筹勇赴广东事奏折,“颇恨战事不修”。

八月三十日(9.30),光绪帝召见军机大臣,表示“胁越

之约断不能签”。

九月初十日(10.10) ,清廷命军机处全面备战。

九月十八日(10.18) ,光绪帝主张“添重兵出关”以援刘永福军。

十月十八日(11.17) ,法国通知清政府 ,决意进攻越南北部 ,侵略矛头公开指向中国。

十月二十七日(11.26) ,法军炮击清军防地 ,公然向中国挑衅。

光绪十年载湉十四岁 ,三月十三日(1884.4.8) ,慈禧太后改组军机处 ,奕訢、翁同龢、李鸿藻等主战大臣均被罢黜。命札亲王世铎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三月十四日(4.9) ,慈禧太后懿旨 ,“军机处遇有要事件著会同醇亲王商办”。命奕訢掌军机处大权。

三月十七日(4.12) ,命奕訢管理总署事宜。

四月十一日(5.4) ,清廷命李鸿章主持对法议和事宜。

四月十七日(5.11) ,李鸿章与法国代表福禄诺签订《中法会议简明条款》。

闰五月初三日(6.25) ,法军进犯观音桥 ,清军回击重创法军。

闰五月二十四日(7.16) ,清政府命驻越清军撤回边境。

闰五月二十七日(7.19) ,清政府命曾国荃与法使巴德诺谈判。

六月初二日(7.23) ,光绪帝反对巴德诺提出的赔款等无理要求。

六月十四日(8.4) ,法兵舰侵犯台湾基隆。

七月初二日(8.22) ,光绪帝“意已决定主战” ,进行抗法

自卫战争。

七月初三日(8.23),法军突袭马尾军港,福建海军遭重创。

七月初六日(8.26),清政府对法宣战。

八月初五日(9.23),授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

十二月三十日(1885.2.14),法军侵占我国镇南关。

光绪十一年载湉十五岁,正月初九日(2.23),清政府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法议和。

二月初七日(3.23),刘永福黑旗军收复临洮。

二月十一日(3.27),冯子材等率清军收复镇南关。

二月十三日(3.29),冯子材军攻克谅山。

二月十五日(3.31),清政府下令停战。

三月初四日(4.18),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订《中日天津会议专条》。

四月二十七日(6.9),李鸿章与法使巴德诺签订《会订越南条约》。

五月二十一日(7.3),越南政变,请求清政府出援。

九月初六日(10.13),清政府设立海军衙门,“著派醇亲王总理海军事务”,“著李鸿章专司其事。”

光绪十二年载湉十六岁,四月十四日(1886.5.17),醇亲王奕譞由总管太监李莲英随同巡阅北洋海军。

六月初九日(7.10),慈禧太后召见醇亲王奕譞、礼亲王世铎,表示“著钦天监于明年正月选择吉期,举行亲政典礼”。

六月十四日(7.15),奕譞、世铎等合奏恳请太后“训政

数年”。

六月十八日(7.19),太后懿旨,表示“勉允所请,于皇帝亲政后再行训政数年”。

八月二十八日(9.25),御史朱一新因参劾总管太监李莲英“干预外事”被降职处分。

十月二十五日(11.20),礼亲王世铎拟定《训政细则》呈览太后定夺,光绪帝被置于傀儡地位。

十一月二十六日(12.21),光绪帝首次诣天坛主持冬至大祀仪式。

光绪十三年载湉十七岁,正月十五日(1887.2.7),清宫举行名为光绪帝亲政实为慈禧太后训政仪式。

闰四月十四日(6.5),慈禧太后为光绪帝大婚筹措经费。

五月二十四日(7.14),太后懿旨,命户部为光绪帝大婚拨银二百万两。

光绪十四年载湉十八岁,正月十七日(1888.2.28)太后懿旨为准备光绪帝大婚,再增拨银一百万两。

二月初一日(3.13),光绪帝颁谕扩建颐和园,为慈禧太后“归政”后“颐养天年”。

六月十九日(7.27),慈禧太后懿旨:定于明年正月为光绪帝举行大婚礼。

九月初一日(10.5),太后懿旨拨银十万两,于什刹海为醇亲王奕譞另建别邸。

十月初五日(11.8),慈禧太后为光绪帝选定后、妃。

十二月初一日(1889.12),清廷公布由礼亲王世铎所拟《归政条目》以《训政细则》为原本。

光绪十五年载湉十九岁,正月二十二(2.21),光绪帝大婚礼始至二十六日(2.25)举行大婚正典,二十七日(2.26),大婚礼成。

二月初三日(3.4),光绪帝举行亲政典礼。

光绪十六年载湉二十岁,二月十九日(1890.3.9),清政府命李鸿章整顿北洋海陆军。

十一月二十一日(1891.1.1),光绪帝生父奕綏病逝,王子镇国公载澧袭王爵。

十一月二十三日(1.3)慈禧太后懿旨赐醇亲王奕綏谥曰“贤”。

382

光绪十七年载湉二十一岁,四月十六日(5.23),北洋海军成军,李鸿章前往校阅。

四月二十八日(6.4)颐和园竣工,光绪帝奉慈禧太后临幸颐和园。

光绪十八年载湉二十二岁,十二月初一日(1893.1.18),诏王大臣承办盛太后六旬庆典。

光绪十九年载湉二十三岁,十二月初三日(1894.1.9),命徐用仪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光绪二十年载湉二十四岁,正月初三日(2.8)朝鲜东学党起事。

四月二十八日(6.1),东学党攻占全州。

四月二十九日(6.2),日本内阁决定出兵朝鲜。

四月三十日(6.3) 朝鲜政府正式致书清政府,要求派兵援助。

五月初二日(6.5) 清政府派直隶提督叶志超率兵赴朝。光绪帝鉴于日军动向,主张“厚集兵力,克期续发”。

五月初三日(6.6) 清政府根据中日《天津会议专条》规定,通告日使中国派兵赴朝。

五月初七日(6.10) 日驻朝公使大鸟圭介率数百日军进入汉城。

五月初八日(6.11) 朝鲜东学党起义失败。

五月初九日(6.12) 八百余名日军在朝鲜仁川登陆,次日开赴汉城。

五月十三日(6.16) 日军四千人在大岛义昌率领下,续抵仁川。

五月十七日(6.20) 李鸿章要求俄使喀希尼出面调停朝鲜冲突,建议中日同期撤兵。

五月二十二日(6.25) 光绪帝颁谕李鸿章,指出“口舌争辩,已无济于事”,主张即刻备战。

五月二十八日(7.1) 鉴于“倭焰日炽”,光绪帝谕令李鸿章迅速筹备御敌。

六月初二日(7.4) 光绪帝谕军机处,斥责李鸿章赖英俄出面干涉之议“仍贻后患”,指出“中国自应自保藩封,不宜借助他邦”。

六月初七日(7.9) 英使出面表示“调停”,奕訢与日使议谈无果。

六月十一日(7.13) 俄声称对朝鲜事端不能旁观。

六月十四日(7.16) 光绪帝命翁同龢、李鸿藻、刚毅为军机大臣,并表示对日“一力主战”,布告天下。同日,光绪帝命

李鸿章“布置进兵”增援牙山。

六月二十一日(7.23),日军闯入朝鲜王宫,劫持国王。

六月二十二日(7.24),光绪帝降谕李鸿章“毋误事机”,“倘有观望不前,致有贻误,定将该大臣等重惩”。

六月二十三日(7.25),日舰击沉中国运兵船“高升”号,并击伤济远等舰。

六月二十七日(7.29),日军进攻牙山成欢驿清军,清军败走。

六月二十九日(7.31),两江总督刘坤一向清廷提出对日“坚忍持之”的持久战建议。

七月一日(8.1),清政府颁谕对日宣战。

七月初七日(8.7),英国等列强宣布中立。

七月十五日(8.15),湖南巡抚吴大澂电奏请率湘军赴朝督战。光绪帝表彰他“奋勇可嘉,著照所请”。

七月十六日(8.16),李鸿章奏请依俄“调停”,光绪帝予以批责,重申抗击日军应以中朝自力。

八月十七日(9.16),日军攻占平壤,左宝贵牺牲。

八月十八日(9.17),黄海海战发生,清海军管带邓世昌等阵亡。同日,光绪帝降谕,斥李鸿章“日久无功”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处分。

八月二十八日(9.27),西太后召集枢臣会议,命翁同龢赴津向李鸿章授意和事宜。

九月初一日(9.29),慈禧太后起用奕訢主持总理衙门。

九月初二日(9.30),翁同龢至天津向李鸿章传达慈禧太后旨意。

九月二十二日(10.20),日军占领朝鲜义州。

九月二十六日(10.24),日军第二军在辽东半岛花园口

登陆,进犯旅顺、大连,第一军渡鸭绿江侵入中国境内。

九月二十八日(10.26),日军占领九连城、安东。

十月初九日(11.6),慈禧太后六旬寿辰庆典,光绪帝及诸臣三日内不得理事。

同日,日军陷金州。

十月十日(11.7),日军占领大连。

十月二十五日(11.22),日军占领旅顺。

十月二十七日(11.24),光绪帝斥李鸿章贻误战事,给予“革职留顶”处分。

十月二十九日(11.26),太后懿旨:瑾、珍二妃“干预朝政”降为贵人,并把主战官员志锐发遣乌里雅苏台。

十一月初八日(12.4),命恭亲王奕訢为军机大臣,督办军务。

十二月初二日(12.28),御史安维峻因劾李鸿章卖国和请西太后真正归政而被革职发遣。

十二月初十日(1895.1.5),户部左侍郎张荫桓、署湘抚邵友濂受命赴日求和。

光绪二十一年载湉二十五岁,正月初五日(1.30),日军占领威海卫南邦炮台。

正月初六日(1.31),中国代表到日本广岛被拒,日方指名要李鸿章为全权代表。

正月十七日(2.11),日军攻陷刘公岛,北洋海军覆灭,提督丁汝昌杀身尽职。

正月十九日(2.13),秉承慈禧太后旨意,清廷任命李鸿章为与日议和全权代表,并命其来京听训。

正月二十七日(2.21),孙中山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

正月二十八日(2.22),李鸿章应召从天津来京,光绪帝回避不见,由恭亲王奕訢传旨。

二月初八日(3.4),光绪帝被迫召见李鸿章,面谕“斟酌轻重,与倭磋磨定议”,不授割地大权。

二月初九日(3.5),李鸿章得西太后授意离京反津,准备赴日。

二月十一日(3.7),康有为、梁启超到京。

二月二十三日(3.19),李鸿章携美国顾问科士达随员子李经芳等到达日本马关。

二月二十四日(3.20),李鸿章与日本内阁大臣伊藤博文开始会谈。

三月二十三日(4.17),中日签订《马关条约》。

三月二十五日(4.19),台湾绅民挽留巡抚唐景崧守台。

三月二十六日(4.20),署两江总督张之洞反对与日议和。

三月二十七日(4.21),李鸿章派专人将《马关条约》送达北京。

三月二十八日(4.22),孙毓汶等“四小枢”逼迫批约,光绪帝予以拒绝。同日,在京部分举人联名上书,反对签订《马关条约》。

三月二十九日(4.23),俄、德、法三国驻公使照会日本外务省,要求日本放弃辽东半岛。

同日,清廷一百多名官员上奏,呼吁毁约。光绪帝面责主降官员“割台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

四月初一日(4.25),光绪帝“欲废约”而遭顽固派抵制。

四月初三日(4.27),光绪帝诣颐和园请慈禧太后抉择“和、战”,太后则谓“和战之局汝主之”责任全推给光绪帝。

四月初七日(5.1),广东举人康有为合十八省在京举人会商拒约自强。

四月初八日(5.2),一千三百名举人签名《公车上书》呈都察院。

同日,光绪帝含泪批准《马关条约》。

四月初九日(5.3),康有为中进士。

四月初十日(5.4),日本政府向俄、德、法三国政府声明愿放弃辽东半岛。

四月十一日(5.5),授康有为工部主事。

四月十四日(5.8),中、日代表在山东烟台换约,《马关条约》生效。

四月二十九日(5.23),台湾绅民决定成立台湾民主国,推唐景崧为总统。

五月初六日(5.29),日军在台湾登陆。

五月初十日(6.2),清政府派李经芳办理割台手续。

五月十一日(6.3),康有为第三次上书光绪帝。

闰五月初八日(6.30),康有为第四次上书光绪帝。

六月初三日(7.24),光绪帝命主降官僚徐用仪退出军机处。

六月初四日(7.25),光绪帝准孙毓汶“解职”驱出中枢。

六月初八日(7.29),李鸿章回京请安,光绪帝面责他“失民心,伤国体”。

七月初八日(8.28),李鸿章调北京,王文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十一月二十八日(1896.1.1),康有为在上海创刊《强学报》。

十二月六日(1.20),清廷封禁北京强学会。

光绪二十二年载湉二十六岁 ,二月十六日(3.29)文廷式被革职。

三月十八日(4.30) ,李鸿章出使俄国 ,参加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

四月二十二日(6.3) ,签订《中俄密约》。

七月初一日(8.9) ,梁启超在上海创刊《时务报》。

九月十八日(10.24) ,命李鸿章在总理衙门行走。

光绪二十三年载湉二十七岁 ,七月初三日(1897.7.31) ,协办大学士李鸿藻卒。

八月初五日(9.1) ,授户部尚书翁同龢为协办大学士。

十月二十日(11.14) ,德国舰队强占胶州湾。

十一月二十二日(11.15) ,俄国舰队侵占旅顺大连湾。

十二月十三日(1898.1.5) ,康有为等在北京成立粤学会。

十二月 ,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

光绪二十四年载湉二十八岁正月初三日(1.24) ,光绪帝命康有为进呈《日本变政考》等书 ,并谕令对于康有为的奏疏得随时呈进。

同日 ,总理衙门大臣等召见康有为问话。

正月初八日(1.29) ,康有为向光绪帝进呈《应诏统筹全局折》 ,即上清帝第六书。

正月二十一日(2.11) ,英强逼清政府声明不以长江流域各省割让与租他国。

二月初一日(2.21) ,谭嗣同等在长沙成立南学会。

二月二十四日(3.6),清政府与德签订《胶澳租界条约》。

二月二十九日(3.11),对康有为请设制度建议,光绪帝“飭下总理衙门议行”。

三月初六日(3.27)、清政府与沙俄签订《旅大租地条约》。

三月二十日(4.10),法强租广州湾,迫清政府宣布两广、云南不让与他国。

三月二十二日(4.12),康有为等在北京成立保国会。

三月二十三日(4.13),翁同龢将康有为所作《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考》等书进呈光绪帝。

三月二十四日(4.14),中美签订《粤汉铁路借款合同》。

闰三月初二日(4.22日),严复《天演论》出版。

闰三月初四日(4.24),日本强迫清政府声明,福建不割让他国。

四月初十日(5.29),恭亲王奕訢病死。

四月二十二日(6.10),授荣禄为大学士。

四月二十三日(6.11),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推行变法新政。同时命军机大臣、总署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筹办京师大学堂。

四月二十五日(6.13),侍读学士徐致靖向光绪帝保荐康有为等维新人士。

四月二十六日(6.14),光绪帝首次赴颐和园诣慈禧太后前请安驻蹕。

四月二十七日(6.15),慈禧太后逼迫光绪帝将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开缺回籍。命王文韶入京陛见,以荣禄暂署直隶总督,并规定嗣后凡赏一品文武廷臣须具折诣太后前

谢恩。宣布光绪帝于秋天“恭奉”太后赴“天津阅操”。

四月二十八日(6.16),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康有为及张元济,授康有为六品章京,准其专折奏事。光绪帝自颐和园还宫。

五月初二日(6.20),御史宋伯鲁、杨深秀奏参礼部尚书许应詠守旧迂谬,阻挠新政,光绪帝命其将所参各节明白回奏。

五月初四日(6.22),礼部尚书许应詠回奏,申明无阻新政等情。

五月初五日(6.23),光绪帝颁谕宣布,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考各试,废八股一律改试策论。

同日,王文韶为户部尚书,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在总理衙门行走,实授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五月初十日(6.28),准梁启超在上海所设译书局为官督商办,月拨二千两资助翻译西书。

五月十四日(7.2),奕訢等上奏反对设制度局。

五月十五日(7.3),光绪帝召见梁启超,授六品衔,命其管理译书局。

同日,创设京师大学堂,派孙家鼐管理。

五月十七日(7.5),光绪帝颁谕,奖励士民著作新书及创作新法,制成新器准其专利售卖,有能独立创建学堂、开辟地利兴造枪炮厂者给予特赏。并命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大臣,复议制度局事宜。

五月二十日(7.8),御史文悌疏劾康有为等“名为保国,势必乱国”。光绪帝责以受人唆使,结党攻讦,不胜御史之任,令其回原衙门行走。

五月二十二日(7.10),光绪帝谕令改各地书院为中小学

之学校,中西兼学。

五月二十三日(7.11),命裕禄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署镶蓝旗汉军都统。

五月二十四日(7.12),光绪帝谕,依总署议颁“振兴工艺章程十二款”。

五月二十五日(7.13),光绪帝颁朱谕,命军机和总理衙门大臣切实筹议设制度局事宜,并指出不得空言搪塞。

五月二十六日(7.14),光绪帝谕奖进工商业以保利权,并饬各地方官保护商务勿使倒闭。

六月初七日(7.25),翰林院侍讲黄绍箕呈进张之洞《劝学篇》。

六月初八日(7.26),光绪帝谕令将《时务报》改为官报,命康有为督办其事。

六月初十日(7.28),命荣禄会同张之洞督盛宣怀筹办芦汉铁路。

六月十一日(7.29),光绪帝谕令各部院衙门删去旧制,另立简明则例。命各省兴办中学堂、小学堂,培养人才。

六月十二日(7.30),光绪帝降谕,命刘坤一、张之洞等速饬黄遵宪、谭嗣同二员来京送部引见。

六月十五日(8.2),光绪帝颁谕,鼓励士民上书言事。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霈拒绝代呈主事王照上书。

同日,礼亲王世铎等上呈奏折,提出“变通办法”篡改康有为设制度局的建议。

六月十七日(8.4),命京城广办小学堂,举、贡、生、监入学深造,以备升入大学堂。

六月十九日(8.6),谕旅英、美、日各埠华侨创立学堂,派出使大臣劝办。

六月二十三日(8.10),光绪帝上谕内阁,重申变法自强道理,抨击昏官“墨守旧章”阻挠新政。

六月二十四日(8.11),授黄遵宪开缺以补二品京堂候补,充出使日本公使,命速来京听旨。

六月二十六日(8.13),光绪帝诞辰前夕御乾清宫受贺。

同日,康有为上疏请禁天下妇女缠足,并请奖励各省之不缠足会,令各督抚推行。

六月二十七日(8.14),徐致靖奏请开编书局一折,光绪帝命孙家鼐酌核具奏。

六月二十八日(8.15),光绪帝二十八岁寿辰,诣大高殿、寿皇殿行礼。

六月二十九日(8.16),译书局成立,拨开办费二万两,并定每月经费一千两外再行增给二千两,以备博选通才。

七月初二日(8.18),命各省督抚就学堂中挑选聪颖学生有志深造者派赴日本游学。

七月初五日(8.21),京师设立农工商总局。

七月初十日(8.26),准梁启超设立编译学堂于上海。

同日,光绪帝严责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谭钟麟因循玩愒,不肯力行新法。

七月十三日(8.29),复命沿江沿海商贾开办商会和商务局。

同日,就陈宝箴、王锡蕃奏保通人才一折,光绪帝降谕,命陈宝琛、杨锐、刘光第、严复、林旭等来京“豫备召见”。

七月十四日(8.30),光绪帝谕旨,裁撤中央及地方闲散机构和冗员。

七月十六日(9.1),光绪帝谕旨将通政司、詹事府等已裁撤衙门一切事宜归并六部。

同日,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詠等阻挠主事王照条陈,奉旨交部议处。

七月十七日(9.2),光绪帝谕军机大臣等遇有士民上书言事,都察院毋庸拆阅,并不得稽压。

七月十九日(9.4),光绪帝罢阻挠上书言事的怀塔布、许应联等六部堂官,并给王照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以昭激劝。

七月二十日(9.5),诏用西法练军,逐渐实行征兵,裁减绿营。

同日,任用礼部新官。赏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四人四品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

七月二十二日(9.7),光绪帝诏各省督抚访查通达事务勤政爱民之能员,随时保送引见,以备录用。又谕:李鸿章、敬信“均著毋庸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

七月二十三日(9.8),就孙家鼐请设医学堂奏,命归大堂兼辖,并详议办法。

七月二十四日(9.9),光绪帝谕军机大臣等嗣后凡各衙门呈请代奏之件,于到后即分日进呈,不必拘定值日之期。

七月二十六日(9.11),命荣禄传袁世凯即来京陛见。

同日,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抵津。

七月二十七日(9.12),光绪帝颁谕,命各衙门将新法谕旨抄录后悬挂大堂,“使有所警触”。

七月二十八日(9.13),光绪帝决意开懋勤殿以议制度。

七月二十九日(9.14),光绪帝十一次赴颐和园诣太后前请安,察觉气氛异常,即赐杨锐、林旭密诏,诏谕“朕位且不能保”令等良策。

同日,伊藤博文自津、京达京。

八月初一日(9.16),光绪帝首次召见袁世凯,授予侍郎候补,专办练兵事务。

同日,康有为到日公使馆访见伊藤博文。

八月二日(9.17),光绪帝命康有为迅速出京,前往上海督办官报局。

同日,光绪帝再次召见袁世凯,其时杨崇伊等至颐和园请慈禧太后“训政”。

八月初三日(9.18),谭嗣同密访袁世凯,希图借袁力以胁太后。

八月初四日(9.19),慈禧太后自颐和园还宫。

八月初五日(9.20),光绪帝接见伊藤博文于勤政殿。

同日,袁世凯“请训”后回津,将谭嗣同密访事泄于荣禄。

同日,荣禄入北京,康有为离京出逃。

八月初六日(9.21),光绪帝被禁,慈禧太后再度“训政”,即日起在便殿理事。

同日,宣布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将其革职,并通令捉拿康广仁。

八月初七日(9.22),荣禄派兵封闭北京城门;下令缉拿康有为。

八月初八日(9.23),光绪帝经西太后三次逼讯被囚禁于南海瀛台。

同日杨深秀被捕。

八月初九日(9.24),谭嗣同等被革职,并命步军统领衙门逮拿入狱。

八月初十日(9.25),梁启超乘船逃亡日本。

八月十一日(9.26),清廷宣布恢复被裁撤衙门、禁止士民上书,停办《时务报》,毋将祠庙改为学堂。

八月十三日(9.28),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杨深秀、康广仁戊戌六君子遇害。

八月十四日(9.29),宣布取消、“天津阅操”。

同日,张荫桓被发遣,徐致靖被监禁。

八月十九日(10.4),李端棻被革职,发遣。

八月二十一日(10.6),陈宝箴等被革职永不叙用。

八月二十二日(10.7),张元济被革职。

八月二十四日(10.9),撤销农工商总局。

九月三十日(11.13),各项考试恢复八股文。

十一月十一日(12.23),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刊《清议报》。

光绪二十五年载湉二十九岁,五月初六日(1899.6.13),康有为、梁启超在日本成立保皇会。

395

六月十三日(7.20),康有为在加拿大成立“保救大清皇帝会”。

六月二十六日(7.22),光绪帝三十诞辰,门庭冷落,景象萧条。

八月初二日(9.6),美国国务卿海约濠提出对华“门户开放”政策。

九月十四日(10.18),义和团朱红灯部与清军激战于森罗殿。

十一月二十八日(12.28),慈禧太后与荣禄策谋立大阿哥废光绪帝。

十二月二十四日(1900.1.24),慈禧太后召集王公大臣会议,宣布立端王载漪之子溥仪为大阿哥。

十二月二十五日(1.25),上海申商千余人联名电请总理

衙门代奏,反对废光绪帝之谋。

光绪二十六年载湉三十岁,正月初一日(1.31),西太后派大阿哥于大高殿等处代皇帝行礼,溥儀被接入皇宫。

正月初九日(2.8),知府经元善因联名上书请保皇帝被治罪。

五月十四日(6.10),英海军中将西摩尔率英、德、俄、法、美、日、意、奥八国联军二千人从天津向北京大举进犯。

五月十七日(6.13),义和团在北京焚烧教堂。

五月二十日(6.16),慈禧太后在仪銮殿召集御前会议,光绪帝出席,反对冒险“宣战”,并提出迁都主张。

五月二十三日(6.19),慈禧太后在御前会上强行“主战”。

五月二十四日(6.20),义和团与清军进攻北京东交民巷外国使馆。

五月二十五日(6.21),慈禧太后以光绪帝名义发出诏书,宣布清政府对八国联军宣战。

六月十八日(7.14),八国联军攻陷天津。

七月二十日(8.14),八国联军攻入北京。

七月二十一日(8.15),慈禧太后挟光绪帝离京出逃,其时,派太监崔玉贵将珍妃推入乐寿堂后井中溺死。

八月十四日(9.7),慈禧太后出走途中派庆礼王奕訢回京,协助李鸿章办理交涉事宜,并颁谕宣称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

闰八月十八日(10.11),李鸿章奉命从上海返京。

闰八月二十四日(10.17),奕訢、李鸿章照会各国使臣和议开始。

九月初四日(10.26) ,慈禧太后逃到西安。

十一月初一日(12.22) ,八国联军向清政府提出《和议大纲十二条》。

十二月初十日(1901. 1. 29) ,清廷在西安颁布变法上谕 ,宣称“维新” ,“改弦更张”。

十二月二十五日(2.13) ,清廷惩处一些官员。

十二月二十六日(2.14) ,慈禧太后在西安颁谕 ,宣布“量甲华之物力 ,结与国之欢心”的对外方针。

光绪二十七年载湉三十二岁 ,三月初三日(4.21) ,清政府与十一国公使签订《辛丑条约》。

八月二十四日(10.6) ,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自西安启程返京。

九月二十七日(11.7) ,李鸿章逝世。

十月二十日(11.30) ,慈禧太后在西安返京途中发出懿旨 ,“撤去大阿哥名号” ,命溥仪“立即出宫”。

十一月二十八日(1902. 1. 7) ,慈禧太后与光绪帝返回北京皇宫。

光绪二十八年载湉三十二岁 ,一月初一日(2.8) ,梁启超 在日本横滨创刊《新民丛报》。

三月初一日(4.8) ,中俄订立《交收东三省条约》。

五月初四日(6.9) ,授袁世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九月初六日(10.7) ,两江总督刘坤一逝世。

光绪二十九年载湉三十三岁 ,三月十四日(1903. 4. 11) ,荣禄死。

十二月二十一日(1904. 2. 6) ,日俄战争爆发。

十二月二十七日(3. 12) ,清政府宣布日俄战争中保持“中立”。

光绪三十一年载湉三十五岁 ,七月二十日(1905. 8. 20) ,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

八月初四日(9. 2) ,清政府决定自明年起废止科举。

八月初七日(9. 5) ,日俄战争结束。

光绪三十二年载湉三十六岁 ,七月十三日(1906. 9. 1) ,慈禧太后下诏 ,准备“仿行宪政” ,清政府预备立宪开始。

九月二十三日(11. 9) ,清政府改督办政务处为会议政务处。

光绪三十三年载湉三十七岁 ,正月初一日(1907. 2. 13) ,康有为、梁启超改保皇会为国民宪政会。

三月八日(4. 20) ,清政府改盛京将军为东三省总督 ,并设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巡抚。

八月十三日(9. 20) ,清政府决定在中央设立资政院。

九月十三日(10. 19) ,清政府命各省设咨议局。

光绪三十四年载湉三十八岁 ,六月初十日(1908. 7. 8) ,资政院奏拟院章。颁布咨议局及议员选举章程。

八月初一日(8. 27) ,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

十月二十一日(11. 14) ,酉刻 ,光绪帝在瀛台涵元殿与世长逝。

十月二十二日(11. 15) ,慈禧太后于仪銮殿死去。